

漢字簡化得不償失

(德國) 彭小明

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

目 錄

序	章詒和 3
1· 實驗繁簡兩體的比薩斜塔	6
2· 簡化字無助於快速認字	9
3· 簡化字無助於提高書寫效率	24
4· 簡化字的弊端	40
5· 漢字簡化與共產黨、與反右派運動的關係	64
6· 漢字簡化與掃盲	83
7· 簡化運動是中華民族的宿命	113
8· 識繁用簡：恢復官方正體，簡化字降格為書寫體	123
9· 簡化字與漢字信息處理	134
10· 「漢字難」說法的由來和發展	145
11· 全人類綠色文化意識	158
12· 漢字文化圈與漢字復興	169
13· 它山之石：德國的拉丁文教育和德文改革	187
14· 點評與反駁	201
15· 附錄：	
一· 艾偉	231
二· 胡錦濤、溫家寶寫繁體字的意義	234

染透猩猩血 風釀楚天秋

——彭小明《漢字簡化得不償失》序

章詒和

老舍1949年後創作了《龍鬚溝》、《春華秋實》、《青年突擊隊》、《女店員》，在這些作品裏，分明表現出一種主動尋找「新時代」的自覺性。父親（章伯鈞）在看了他的話劇《西望長安》後，再不讀老舍了。十幾年後，老舍仍在繼續「尋找」，不過，他轉換了方向，是向後「尋找」了！向後找什麼？他要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熟悉的人物，人情，人性。于是，晚年的他寫出了經典之作，也是收官之作的《茶館》。《茶館》的本質意義，是一個飽經社會滄桑，熟諳人情世故的作家對孩提時代的「文化反芻」。毫不過份地說，《茶館》挽救了老舍，也成就了老舍。筆寫至此，我又不禁聯想到京劇名演員程硯秋。1949年前的程老闆是想唱什麼就唱什麼，連唱數月戲碼不回頭，因為肚子裏裝著一、二百出戲呢。1949年後，他只能演七出戲，因為上邊只許他演七出戲。程硯秋要求上進，入了中共。可在病危時刻，他向黨提出的要求是希望能恢復演出《鎖麟囊》。這是什麼？這也是「文化反芻」——多麼深刻的文化現象啊！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體系裏，似乎更需要從歷史上、理論上、政策上對百年以來的文化問題做出新的反思和歸結。

無須點明說穿，我們的文化事業是被政治權力高度掌控、嚴格監管的。老舍的筆，程硯秋的嘴也不例外。更嚴重的是，在我們這裏一個政黨能動用國家力量，來強行貫徹文化政策。文字改革（即漢字簡化運動）就是首開先例的一個典型。文字乃文化之根，是歷史之本。從一個字的形成與演化，我們得以窺探到華夏千年的歷史，人類的發生和生存。紅色政權成立了，立即就要

改動這個「根」與「本」，而這個改動居然是由一個叫「文字改革委員會」的機構一手包攬。領導人吳玉章不是文字專家，是中共元老。這個機構開了些會議，便形成了「漢字簡化方案」文件；很快，「方案」上報了中共中央；很快（時隔三月），第一批漢字簡化方案在全國推行。推行的重點就是報紙和學校。當時，民盟中央領導人個個震驚，議論紛紛。如此重大的政策，咋就這樣出臺了？和中國老百姓商量了嗎？和文化教育新聞藝術機構商量了嗎？和語言文字的專業人士商量了嗎？而後者正是民盟組織之優勢所在。父親對這種獨斷專行做法和漢字簡化方案以及改豎排為橫排的版式都極為不滿，並到處表達這種不滿。

不久，在一次民主人士的聚會上，周恩來見到我的母親，特意走過去。寒暄幾句後即問：「健生，你是懂書法的，你說說，簡化字和橫排版好不好？」

母親答：「我不習慣。書法還是繁體字好看。讀書也是豎排好看，說不上一目十行，但是我瞥上兩眼，一頁內容就都能知道個大概了。現在看橫排版，我要一行一行看個仔細才行。」周恩來笑笑，點點頭。

回到家中，母親便把與周恩來的簡短談話告訴了我們。

父親聽後，說：「這叫徵求意見？」

以上的事發生在1956年。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漢字簡化運動」升格為政治問題，換句話說，對漢字簡化的態度就是對中共的政治態度。「染透猩猩血，風釀楚天秋。」章伯鈞反對漢字簡化的發言，成為他「劃右」定性的重要罪狀。著名學者、文字學家陳夢家為此而送命。還有許多的教師（特別是語文教師）、職員、機關幹部對行政干預漢字簡化工作表達了不同意見，而丟掉飯碗，最後家破人亡。彭小明先生的這本書，就是對這段沉重的歷史，對這個嚴重文化事件的系統梳理、解析與歸

納。書中有一節，標題為「識繁用簡：恢復官方正體，簡化字降格為書寫體」，對此，我是非常認同的。

最近從與齊白石子女家屬吃茶閑談中，我得知：有人說章詒和是個怨婦，滿篇滿紙皆是怨。他們概括得真准，說得也好。樹砍光了，水斷流了，太湖綠（藻）了，老鎮古城只剩下經緯度是真的了，怎地不怨？中華傳統快滅絕了，怎地不怨？民族文化的根子也拔了，怎地不怨？我想，無怨者定是既得利益者或是幹那些斷子絕孫事的人！

是的，而今能在文化上守住根的人，已經很少，很少了。我們這個民族還能有文化意識的復甦嗎？我是很悲觀的。現實的情況是——叫我們的孩子學簡化字，練英語，中學語文課本撤掉唐詩宋詞、換上金庸陳忠實。課外組織學生去參與「紅色經典」（實則是有紅色而無經典）的欣賞、學習、游覽等大型活動。而潛在的另一種現實情況是——那些政壇老將與新秀，幾乎個個都在家裏惡補古文，背古詩，哼京戲，拍昆曲，拉胡琴，練繁體字書法，把玩古董，收藏字畫。因為誰心裏都清楚——政治等級的終極體現是文化等級。于是，各級官員在一番吃喝的同時，也急著「提升」自己的文化品味。

最近，網上看到胡錦濤先生的四幅書法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高瞻遠矚」四字橫幅，流傳極為廣泛。寫得好壞還在其次，令大家感興趣的是，胡先生原本是想依照傳統書寫的，寫成繁體字，而且從右向左；（惜乎將矚字錯成了簡體）。無論如何，他還是懂漢字的。

2007年10月27日于北京守愚齋

第一章 實驗繁簡兩體的「比薩斜塔」

知道牛頓力學的人都記得，偉大的物理學家伽利略利用意大利的比薩斜塔，做了一個名垂千古的實驗，就是從塔樓的高層讓兩個重量懸殊的重物同時自由下落，看它們是否同時著陸。實驗的結果打破了人們長期以來想當然的錯誤看法：「重的物體下落時會首先著陸」。正確的結論是：（空氣阻力不計算在內的情況下），任何物體自由落體運動的速度跟它的重量無關。



在漢字簡化問題上也存在著一個根深蒂固的想當然，那就是「簡化字不僅寫起來簡單，而且容易記得住」。

我要告訴讀者的是這個結論是一個百年的誤區，簡化字只是減少了若干筆劃，除了極少數例外，根本無助於提高識字、掃盲和閱讀的效率。而且漢字簡化運動也沒有提高全民族的書寫效率。這本書就是一座中文的比薩斜塔。這裏沒有高深莫測的理論，只要有實事求是的認真態度和獨立思考的科學精神，每個關心祖國語文和民族文化前景的人都可以通過書中這些認知心理學、語言學、中國語文和歷史等文化常識和中文電腦處理經驗，走進這座中文的比薩斜塔，拾級而上，舉起簡體字和繁體字這兩件「重物」鄭重地任其自由落下，觀察、思考、判斷，然後得出自己的結論。簡化漢字能不能提高識字效率？漢字簡化到底提高了多少書寫效率？簡化漢字有哪些弊端？漢字簡化跟政治運動有過什麼樣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有沒有權利單方面地決定整個民族

的文字的改變？一個民族的重大文化事務非經充分的民主討論，能不能夠強行決策實施？具有東方文化特點的漢字文化如何才能適應電腦信息化的時代？是不是一定要「堅持西方拼音文字的方向」？

回首在祖國生活的滄桑歲月，忽然發現，不僅那些堅持反對漢字簡化的人們早已逐漸雕零，而且許多當年堅決支持簡化的名人也在漸次老去，有的人已經幡然悔悟，如巴金，有的人卻依然故我，如周有光。幼年時代我曾經學習過一些繁體字，也曾經以為中國文字將實行拼音化。文革的文化洪荒時代卻是我地下讀書的時代。悄悄地涉獵了一些中外名著，把家中在「掃四舊」混亂中偶然漏網而碩果僅存的幾冊舊版《聊齋志異》反復翻看。對文言文，對繁體字（異體字）有了切身的感受。文革後期，中美恢復外交往來以後，我的海外親戚重新跟我們開始通信。母親眼力不濟，寫信的任務就落到了我的身上，為了怕海外親戚不太熟悉簡體字，也為了顯示我們雖在國內，仍然沒有忘記傳統的文化，我堅持用繁體字給他們寫信。恢復高考，我考入中文系，發現文革時期所積累的古文知識給了我較大的幫助。這些知識更方便了後來我在海外從事中文教育中面對簡繁兩體的教學。現在中國大陸中年以下能讀繁體字文章的人還不少，但是會寫繁體字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2006年10月，漢字簡化五十周年的時候，中國官方仍然把漢字簡化當作光榮的功德來慶賀。我感到關於簡化字問題再不鄭重地提出質疑，再不系統地提出挑戰，恐怕真的要如俗語所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了！

我出生在中國大陸，出國前完全在國內接受教育；反右、掃盲、饑荒、下鄉都令我終身難忘，文革中當過中學教師，文革後又考入了復旦大學。畢業後在上海文藝出版社擔任編輯，出國後多年從事德語新聞編譯、中文報刊編輯和中文教育工作。青少

年時代我學習過俄語，文革中自學英語，後來又學習了德語，並且一步一步地觀察到我的孩子在德國（從托兒所階段開始）學習德語、英語、拉丁文和中文，進入大學的完整過程。對於歐洲語言和海外中文教學多少有一些切身的體會。我跟那些臺灣同胞和海外學者不同，他們往往搞不清規範簡化字跟民間俗體字的區別，1956年第一批規範簡化字跟1977年第二批（廢止）簡化字的區別，他們列舉的字例常常不能一語中的。對照之下，我隱隱承受了一種時不我予，責無旁貸的使命感。

當你準備翻開下一個章節的時候，請想像自己已經跨入了一座驗證科學的比薩斜塔，拋開所有未經證實的說法，不論這個說法是來自官方的宣傳文件，還是來自教授的權威判斷，認真實驗，尊重科學的結論。

此外，還有一些讀者認為必須進行實驗來驗證或反駁我的結論，我謹提出一點要求。由於中國的言論自由權利還停留在憲法的紙面上，黨和政府領導人的講話曾強調堅持簡化的方向，《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已經將簡化字定位為規範漢字，《中國教育報》（2006。7。23）的報道也曾據此企圖阻遏繁體字問題的討論，所以不一定是主持實驗的官員或教授不客觀，而是實驗中的教師、職員和學生可能會心存顧忌，甚至實驗中的名稱如簡化字、繁體字等等都有可能對未成年學童給出「簡化字簡單，繁體字難」的心理暗示。所以我建議，這類實驗不宜由中國大陸的單位單方面進行，而應當由兩岸三地的學術機構聯合進行，以示誠信。

第二章 簡化字無助於快速認字

為漢字簡化洗刷的人們都說：簡化字簡單，認字、記憶能快一點。很多群眾也跟著人云亦云，覺得應該是那麼回事。這是中國社會逾百年來的重大誤區。有關漢字認知心理和筆劃數的關係中國心理學家艾偉博士1920年代曾經有過初步的科學實驗。中國大陸實行簡化的時候並沒有進行過科學的論證。這種「想當然」十分類似於著名的伽利略比塞塔重物自由落體運動實驗以前，非經科學論證，人們都糊裏胡塗地認為，物體越重，下落就越快。科學論證的結果否定了想當然的說法。隨著計算機的進步和普及，人類的認知（習得）心理過程也逐漸明朗，人類的學習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計算機信息處理。但是人腦比計算機更靈活，更敏捷。認知心理學已經確認，不同於計算機，有關人腦如何加工信息的研究表明，大腦對信息使用了並行加工parallel processing，（即同時地處理多重信息），而不是系列處理serial processing（即逐個地處理多重信息）。（參看Robert J. Sternberg著《認知心理學》第三版222頁）。字形，作為一個整體的視覺圖像被傳輸，繁體字是一個視覺圖像單位，簡化字也是一個視覺圖像單位。視線掃描的面積都是相同的字形方塊。簡化字的空白雖然多一些，可是視線掃描並不能忽略這些空白，空白和筆劃在傳輸信號意義上是同等信息量的信號。閱讀一個漢字，不論繁簡，用信息學的說法就是對這個方塊字整體地，而不是按筆劃進行掃描、編碼、儲存，再提取、比對，做出判斷，認識或者不認識，理解或者不理解。跟這個漢字的筆劃多少沒有關係。由此得出的第一個結論，證明了無數（1956年前學過繁體字的）老年知識分子的經驗：會看繁簡兩種字體的人，繁簡閱讀一樣快。2005年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研究中心的江新博士在德

國美茵茲大學作了題為《針對西方學習者的漢字教學：認寫分流、多認少寫》的報告。這份報告是論證海外學生漢字教學的方法的。可是無意中使用了許多心理學實驗的例證，無論是北京的小學生，還是臺灣的大學生，還有西方的留學生的實踐都表明，漢字的筆劃多少對於學生認讀漢字沒有影響。甚至有一項實驗的結果令人十分驚異，京郊小學生的認讀心理測試中，棗、養、爺、雞、壺、亂、飯、鐵等八個繁體字的認讀成績，反而好於簡化字。心理學專家陳傳鋒、黃希庭寫道：實踐經驗告訴我們，人們閱讀認字的時候，是把整個漢字圖像作為一個整體，一眼看去，就可基本辨識，而無需把每一個筆劃都數過才認識一個漢字。只有當遇到相似的字或比較模糊難以分辨的情況，才多看上一眼，把不確定之處加以確認。也就是說，人認識漢字是利用漢字圖像的整體信息識別的過程。人們對筆劃斷裂或筆劃模糊的漢字仍然可以較好地認出這一事實，也證明人的認字過程不一定需要經過筆劃的提取。（《結構對稱性漢字認知》第100頁）。

然後，我們再探討人腦對簡化字和繁體字建立記憶的過程。從1920年代開始，中國的漢字心理學專家就開始了對於漢字認知心理的探索。經過實驗發現，「學習者對漢字字形的觀察辨認的難易，跟字的筆劃數目、筆劃種類和結構有重要關係」。

「後來有的研究表明：認識了相當數量漢字的小學低年級學生，漢字筆劃的多少對於字形的辨認和識記影響不大。辨認合體字字形的難度與構字部件的熟悉程度有關，若構字部件為兒童所熟悉的，辨認較易；反之就難。但隨著構字部件的增多，辨認難度也會增大。對那些難以分解為單元部件的字，筆劃雖較少，亦難辨認」。（《中國大百科全書·智能藏〈識字心理〉》詞條）。這裏的實驗結果表明，識字的難易程度跟筆劃數目、筆劃種類和結構有關；但是筆劃數並不是絕對的因素，如果小學低年級兒童認

識了相當數量的漢字以後，筆劃的多少對於他們來說已經在辨認和記憶方面作用不大了。而簡化字和繁體字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減少了筆劃。另外心理學專家朱曉平、顧泓彬（1992）在面對筆劃數效應的說法時認為必須注意以下兩個問題：1。筆劃數並不是漢字特徵的一個理想指針，因為它忽視了不同筆劃間複雜程度的差異；2。筆劃數效應並不是絕對的，研究表明在高頻字或被試閱讀技能較高時，並不存在筆劃數效應，在這種情況下，漢字是以整體單位被識別的。（《結構對稱性漢字認知》第4頁）這裏所說的「筆劃數效應」是認為筆劃數越多，學習和記憶所花費的時間就越多，也容易出錯；「高頻字」，是多次出現被熟悉了的字；「被試閱讀技能」是參加實驗被測試的人具有的閱讀水平、漢語程度。

對於高頻出現被熟悉的漢字來說，筆劃數效應不存在。這個結論很重要。想一想，幾乎所有被簡化的偏旁都是高頻度出現的比較熟悉的漢字成分，例如馬、鳥、頁、見、貝、龍，以及「漢」字的一半等等，如果對於這些成分來說，筆劃數效應不存在，即筆劃雖多也不影響認知和記憶，那麼漢字簡化還有多少存在的價值？

筆劃數效應不是絕對的，就是說，有的時候筆劃雖多，卻並不難記住；有的時候筆劃雖少，還不一定記得住。舉例來說，矗和鬯這兩個字，對於每一個學過一些漢字的人來說，雖然矗字多達24筆，而鬯（音chang，去聲，古代一種祭祀的酒），只有10筆，可是反而覺得矗立的矗好記，而鬯字難記。因為直是個常用字，三個直字排布在一起，上一下二，簡單明確；鬯字上半陌生少見，下面的匕也不是個很常用的字。理論上如何進一步解釋這個現象呢？

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人類的記憶有短時記憶和長時記憶

兩個部分。「短時記憶是信息通往長時記憶的一個中間環節或過渡階段」。「長時記憶是一個龐大的信息庫，它能貯存的信息在理論上可說是無限的」；「而短時記憶只能保持少數幾個項目，其數量根本無法與長時記憶相比」。「短時記憶容量（指加工信息的能力限制）為7加減2，即一般為7並可在5-9 之間波動」。

（王甦、汪安聖《認知心理學》第90頁）。也就是說，例如閱讀一次，大概可以記住7個項目。關於這個容量問題，存在著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就是這些項目並沒有一個特定的單位。它可以是字母、數字，也可以是音節、字、詞、邊旁。這一個心理學發現，Miller（1956）從信息加工的角度出發，提出了「組塊」Chunk概念。所謂組塊，作為動詞，就是將若干較小的單位（如字母、筆劃）聯合而成熟悉的較大的單位（如字、詞）的信息加工；作為名詞，就是這樣組合而成的單位。

短時記憶的過程有一個有趣的例子。

例如101001000100001000100，共21個數字。人們很難一下子記住這麼長的一個數字。但是如果我們將它分解成六個組塊，10,100,1000,10000,1000,100。我們就能輕而易舉地重述這個數字。（參看Robert J. Sternberg著《認知心理學》 118頁）。又例如，tothepark 這個字符串對初學英文者來說，是九個字母，即九個記憶項目。但是對於已會英文者，就可以視為to the park，僅三個組塊而已。（參看鄭麗玉著《認知心理學》59頁）。（如果將上述數字的組塊理解成二進制的數據，它們所包含的信息內容更加大得驚人）。依此類推，我們學習英語的時候，先學會了new新和news新聞，然後學會了paper紙，再學newspaper報紙，就很容易掌握了。這樣的例子還比較極端，其它很多英文單詞是由多個拼寫範型建構起來的，take， make， lake； pro-， por-， -dry， -ty， 雖不一定具有意義的邏輯關聯。漢

字的組成也基本上是這樣，而且不會像英文、德文那樣，有些單詞特別長，無法一口氣看完。漢字無論怎樣複雜，總還在一個方塊之內。上述的心理學理論都是外國專家的結論。他們想不到的問題是，西方文字的組成都是由左向右排列的，是單一線性結構。而漢字卻有多種不同的組合結構。上下、左右，上雙下單，或上單下雙，三層或四層迭加等等。這樣的話，分解漢字成為若干記憶項目的時候，就必須加入「結構排布」這個項目，包括漢字的結構和部首的結構。

所謂7加減2個記憶項目，應該也不是絕對的。根據各人智商的不同，會略有差異，九個項目應是指通常水平。根據上述這些原理，我們可以知道，矗立的矗之所以反而容易記，是因為直，值、植，以及真、填等都是常見字，上一下二的品字模式也是常見結構。而鬯字的上半僅見於鹵、鬱的繁體，本身這個古代祭祀用酒這樣的概念也是罕用的文言詞。所以一多一少筆劃相差十四筆，反而記得住筆劃多者，記不住筆劃少者。同樣道理，將漢字的偏旁簡化，把言字旁變成「讠」，把報字原來的幸字旁改成「扌」，在心理習得上並不減省心力和時間。僅僅減少了部分筆劃，認讀的心理記憶過程根本沒有簡化或易化。依此類推，所有門字旁，言字旁、食字旁、金字旁和絞絲旁的簡化（门、讠、饣、钅、纟），在認知習得的記憶心理過程上沒有簡省作用，不論繁體或簡體，經過學習很快就成為固定組塊被儲入記憶庫，與筆劃數無關。簡體僅僅是在抄寫方面省略了若干筆劃。（注意，本章僅論述所謂漢字難認難記的心理習得問題，關於書寫簡省問題容當另章論述，在閱讀本章內容時務請掌握這個分野。）而且早在1923年中國心理學家艾偉已經觀察發現，對稱結構的漢字比非對稱結構的漢字更容易觀察，後人更發現對稱結構的漢字也容易記憶。（《結構對稱性漢字認知》第17-18頁），可是1956年

的簡化運動偏偏將門字旁，言字旁、金字旁、車字旁和絞絲旁這些左右對稱的成分都改成了不對稱。

本來是一個曲，下麵加一個辰，組成一個農字，很容易分解成兩個組塊，簡化（草書化）以後反而成了一個無中生有的獨體字「农」，必須一筆一劃地特別記憶。

格式塔心理知覺原則告訴我們，在觀察周圍環境時，我們易於把相近的物體看成一類（相近原則），或把相似的物體看成一類（相似原則），或以整體而非部分看待物體（閉合原則），或把線段看成連續的而非斷裂的（連續原則），或把對稱的而非不對稱的物體看成一類（對稱原則）。（Robert J. Sternberg 著《認知心理學》第94頁）。對於學習漢字的人來說，會把一些相近於偏旁、部首的漢字部分，想像成完整偏旁、部首的一部分，或把一些相似又不盡相同的漢字成分歸為一類。

心理學和教育學者發現的筆劃數效應、部件數效應雖然不是絕對的，畢竟還是發揮作用的。那又如何解釋呢？應該說，這些效應發生在早期加工階段。例如，一個沒有啟蒙的孩子，一位從未學習過漢字的外國人，初次接觸漢字，當然覺得筆劃少，構造簡單的漢字，容易掌握，出錯少。還有，一個已經學習了一些漢字的人，又接觸到一個新的帶有從未學過的筆劃或偏旁的漢字，當然會感到筆劃數和部件數效應。針對這個漢字他又要開始早期信息加工的過程。但是經過學習，反復操練，一旦陌生的筆劃和部首被熟悉，多筆劃字和多筆劃的部首就變成了新的組塊，筆劃數效應驟減，或者只剩下組塊。如前所述，這樣的轉變不僅會出現在大中學生那裏，實驗表明也會出現在小學低年級學生那裏。當然，就像千百年來中國的教育所注重的那樣，在給初學者和啟蒙兒童的教材中應該儘量選用筆劃數較少，結構簡單的漢字，循序漸進，逐步深入。必須指出的是，不論是簡化字還是繁

體字，情況幾乎一樣。西方的拼音文字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多筆劃效應，例如l和w，這l只有一豎，而w卻有三個彎折，初學讀寫的孩子常常一筆根本畫不好一個w來，也需要不斷讀寫練習才能熟練。學中文的小學生總是被教導注意生字的筆順、邊旁，老師總要介紹一些簡單的漢字知識。1983年國家語委公佈了《漢字統一部首表》草案。將部首統一為201部，基本回到《康熙字典》的時代，水和氵，言和讠，食和饣，金和钅重新合併。教學中，老師必須把這些簡化偏旁的原形告訴小學生；他們還是必須學會並記住這些繁體範型。中國大陸和港臺的小學老師努力的要點幾乎一樣，港臺的學生在短時記憶早期信息加工階段會遭遇多一點筆劃數效應，大陸的學生相對少一點，（簡化字平均筆劃從16畫減少為10.3畫，但是並不是全部如此，兩千多個簡化字之外，常用漢字還有四千多並沒有簡化），對於機械記憶力最強的學齡兒童來說，多這一點點筆劃數效應根本不是問題。這樣的認讀和記憶漢字的操練正是對於中華民族漢字文化認同的熱身訓練的第一套動作。

前面介紹，認知心理學證實，第一，大腦處理漢字信息是同時進行平行加工；由於漢字的信息熵高，冗餘度大，從大致的輪廓就可以辨認漢字，不需要全部都一一涉及具體的筆劃，就能依照格式塔原則認讀並理解。如果遇到有疑問的信息，再進一步深入分解字中部件，然後綜合辨認之。第二，一般學習語文總是循序漸進的，也就是說由簡單到複雜，溫故而知新；先學「人、手、口、刀、牛、羊」，認知許多偏旁部首，就有利於深入提高。偏旁部首就是認知心理的「組塊」。第三，在短時記憶中，記憶項目不超過五到七個，最多不超過九個，就能同時留下短時記憶，然後進行閱讀抄寫應用，便能過渡到長時記憶。這類記憶項目，具體到中文裏面，包括筆劃、偏旁部首，還有就是他們相互間的結構排

布模式。第四，偏旁部首出現的次數增加，就能加強記憶，反復訓練就是讓低頻字印象，逐步成為高頻字的印象，頻繁度高的，我們就稱它們為常見字、常見偏旁部首。這樣的記憶組塊既節省心理反應時間，也不容易出錯。

1956年對漢字進行簡化的基本原則是「述而不作」，大致上分成八個部分。根據以上介紹的心理學原理，我們一一分析這些簡化字為什麼沒有必要簡化。

第一，簡化字採納了一部分筆劃簡單的古字，从、众、礼、尘、云、無等等。這些字都是《說文解字》已經加載的俗字。當時就已是被淘汰了的非正體，這類淘汰一定有相當的原因，今天只是我們缺乏史料很難論證而已。繁體的正字延續了大約兩千年，又去恢復此前的古字，這些古俗字沒有正式承載過跨越千年的歷史文獻，這類「恢復」本身就是一種割斷歷史的做法。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強調延續性，改革也不應忽略延續性。簡化字的理論強調的歷代簡化俗體的運用，其實是十分片面的。俗體字是民間的而非官方用字。正式的古典字書往往都標明它們是俗字，也就是不認為是官方文字；宋元話本明清小說，都是民間俗文學，不登大雅之堂，當時的小說作者一般都不敢堂皇署名，以免為惡名所累。其作者隊伍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抄繕刊刻原非嚴謹，在用字方面是根本不能跟官衙文獻、史書方志、科場試卷和楷書碑帖相提並論的。拿這些字書俗字和俗文學文本作為歷史上已經廣泛使用的例證，本身就十分牽強。而且從認知心理過程來分析，它們也不比繁體簡省心力。從字比从多了兩個成分，一個是雙人旁，一個是走字的下半，兩者都是常見項目，共三個部分，結構左一右上下；从字則兩個人字並排，成份和結構都常見，簡繁兩體的記憶項目都少於五個。認知心理過程相同。众字本來是眾，上面是橫寫的目，下面的則是众字的變形，三個人勾

肩搭背在一起。上下結構。簡化的众字由三個人字組成，常見部首，他們的記憶項目都是五個以下，認知心理過程相同。禮字，礻字旁加豎鉤。繁體為礻字旁加上曲下豆，記憶項目都不多，都是常用偏旁。按認知原則分析，繁體並不難記。云字的繁體是上加一個雨字。雨字很常用，下面云字又簡單，上下結構，繁體也不比簡體難記。無字的繁體是无，簡繁兩體都比較特殊。如果一個沒有學過這個字的人，不論學簡體還是繁體，都要從頭記憶。无，要記住它既不是元，也不是天，末筆平伸再上挑，這樣一個獨體字。無，要記住上面一撇，然後三橫四豎下加四點的結構，下面四點也是常見部首。也只有九個記憶項目。

第二，假借字。同音假借，如把面孔的面借作麵粉的麵。其實原來的面加上了麥字是合乎邏輯的偏旁。麥字本身是來字約略變形下含夕字，都是常見偏旁。山谷的谷借用為稻穀的穀。原來的穀是壳字頭下加禾旁，右邊加殳（沒有的沒的主要成分），部首常見，仍屬於容易分解的字。谷字分解為三個項目，穀字分解後也僅有四個項目。假借斗作鬥爭的鬥，卜作蘿蔔的蔔，發作頭髮的髮，都是非常沒有道理的假借，而且是不同音假借。原鬥字有一種最簡單的寫法類似繁體的鬥字，左右都由一豎加一個王字組成，相向對稱，是典型的對稱結構型漢字，最易於觀察和記憶，完全不需要簡化。蘿蔔的蔔本來上面是菊字頭，裏面是福字的一半，也很容易分解成好記的組塊。發字的問題非常多。本來是登字頭，下面加弓和殳，容易分解和記憶。結果廢止這個發字，借用頭髮的髮字的簡化字，原本上面是髟（右邊是長字的變形，左邊三撇），下面是友字加個點，不難分解記憶。結果簡化後發字一身而二任，變成了一個多音多義字。發展的發和毛髮的髮古音都是入聲，到了普通話裏，發展的發成了陰平，而毛髮的髮則成了去聲；這樣的同音假借純屬倒退。

第三，形聲字。1) 形符簡化：刮風的刮，原字是風字加舌，都是常見字，邏輯性強，其實並不難認，肮髒的髒，原本是骨字旁，改為月字旁。從認知心理過程分析，月字和骨字都是同等常見偏旁，記憶的難易相仿。2) 聲符簡化：襖原來是衤字旁加奧，改成袄，聲符失准，夭和奧都是次常見的偏旁，記憶難易相仿。襯衫的襯，原來是衤字旁加繁體親（亲加見），改成衬，聲符失准，（本來不准，改後仍不准）亲、見和寸都是常見偏旁，記憶難易亦相仿。礎原來是石頭旁加楚，改成础，聲符聲調不准。楚雖然不如出常用，但是楚是完全準確的聲符。礎的記憶難度未必輸於础。3) 聲符和形符都簡化：髒和驚。髒原本是骨字旁加葬。改為月字旁加庄。聲符失准；而且跟心臟的臟撞到一起，造成簡繁轉換時，心臟變成了心「（肮）髒」。驚原來是上敬下馬，形容馬匹受驚狀貌，簡化後從心，從京，改為形容人心受驚的狀貌，敬和京、豎心旁同馬，都屬於同類常見度的偏旁，從認知心理分析來說，難度相同。4) 非形聲字形聲化：郵和竄。郵原來是垂加右耳旁；簡化後獲得了聲符，但是垂（常用字睡的一半）常見程度與由字相類，認知難度亦相若。竄原來是穴字頭加鼠，形容老鼠急穿洞穴，十分形象。簡化後，聲符失准，串chuan，，竄cuan。在常見度上，串和鼠相類，認知心理亦應相若。

第四，草書楷化字。東东、車车、專专、貝貝、農农等。這類簡化字都是獨體字，或者草書楷化以後，成為獨體字，除了簡省若干筆劃外，因無法分解成已認知的部首偏旁，所以在認知心理上沒有任何簡省作用。反而還要重新花費精力作特別的記憶。東、車、貝這樣的繁體字原本都是典型的對稱型結構漢字，最易辨認和記憶，簡化後顯得不三不四。草書的筆意，楷書的筆觸，十分彆扭。

第五，特徵字。去多留少：醫、聲，捨棄的是爿、酉、耳等部首；去少留多：壘、陽、際，捨棄的是彡、一勿、登字頭等部首；半去半留：錄、號、麗，捨棄的是金、虎、鹿等常見偏旁。按照上述心理認知原則，這些被簡省部分原來都不是認知的負擔。

第六，輪廓字。鹵，省去其中四個點；龜，省去其中的複雜筆劃，僅保留一個輪廓。簡化字中，只有這類繁體字，筆劃很多，又是獨體字，省去若干筆劃，變成在九劃或七劃以內，可以便於記憶。但是，例如烏，省去其中的兩個短橫改為一點，下面四點改為一橫；主體本來筆劃就少於九劃，四個點並列是常見偏旁，很容易記憶。烏字原本與鳥字字形很近，簡化以後兩個字仍然差不多。慮，本來可以分解成虎字頭，田字和心字，是思想的思，義符的邏輯意義顯豁，決不難記。愛，本來其中含有一個心字，其餘皆是常見部首，簡化這類常見部首，無助於記憶。只有這裏的龜字是一個特例，後面將專門討論。

第七，會意字。將原字中筆劃較多的部分簡化成筆劃較少、又與字義有一定邏輯關聯的部首。塵尘、筆笔、淚泪，這三個字，原來的組成部分是鹿、聿和戾（戾可以分解成部首戶和犬），十分常見。如果已經學習過這些部首，這類簡省就對記憶並沒有幫助。繁體的塵是描繪自然界鹿奔跑時，絕塵而去的景象；筆的繁體，竹字頭下面一個聿。聿的本意就是古代的筆。淚的繁體是三點水加戾。戾代表聲旁。吳方言至今仍然戾淚同音。簡化所精簡的都是寶貴的歷史文化傳承信息。

第八，符號字。用沒有形聲意義的簡單符號代替許多繁體字的偏旁，漢汉、嘆叹、艱艰、難难、歡欢、觀观、權权、勸劝、僅仅、雞鸡、鄧邓、戲戏、對对，用又字作替代符號；還还、環环、懷怀、壞坏，用丩字作替代符號。省略的部分分別是

漢字的一半，灌字的一半、登字等等，都可以分解成較小部首：廿、口、夫，艸、口、佳，登字頭、豆，虎字頭、豆，业、八、王等等。還字系列的核心偏旁可以分解成四、一、口、衣等等。都可以幫助記憶。這些部首比較常用，一旦學會，就可以成為以後學習的基礎。再以鄧字為例，原是登字加右耳旁，跟簡化後的又字加右耳旁相比，都是用兩個常見的記憶項目，對記憶過程並無簡省，反而失去了合理的聲旁。而且跟原來的以登字為偏旁的系列脫離了關係。（燈字的情況是將登字換成了丁，登原是準確的聲旁，丁僅是近音而已，對習得記憶沒有幫助，反有干擾。證字原來的登字簡化為正，聲旁準確了，但是依然是兩個記憶項目）。原來這些漢字都有自己比較完整的音韻系統。符號字把這些系列徹底給攪亂了。誠然，漢字的形聲系列因歷史演變已不太準確；但是改革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要讓不夠系統、不夠準確的地方變得更合理、更準確。漢字簡化的結果卻使得這些符號字的系列關係更加面目全非、更成一筆胡塗賬，這樣的改革怎麼能說是成功的呢？

龜、鬱兩字是兩個著名的實例，很多簡化字擁護者都拿著兩個字來舉例。其實這兩個字剛好證明了認知心理學的結論。龜字不僅筆劃多，更加不好記的是它是一個獨體字，完全沒有什麼常見的偏旁部首可供分解，結構也獨特，即使是中文基礎很好的人，也必須死記硬背它的筆劃和結構。龜字的簡化也簡得不好，保留了上面的魚字頭，下方的部分卻不能歸於任何一個偏旁，應該改為甩，既便於稱說，又很形象，好似甩尾而行。鬱字的繁體不僅筆劃多，而且即使分解部首也找不到常見的部首。雙木林中間插入一個缶，很陌生，無點寶蓋頭下，鬯字也很陌生。只有三撇簡單一點。二十九個筆劃，幾乎無所依傍，當然很難記。這樣難記的漢字才是應該簡化的少數對象。而前面分析的許多字，即

使筆劃多，仍然可以分解成常見或比較常見的偏旁部首，就能減少記憶項目負擔。漢字改革不需要如此大面積地改變，只要按照認知心理學的理論，改掉極少部分像龜鬱這類確實過於繁難、無法分解成常見部首的漢字就可以了。五十多年的實踐證明，為了少數難寫的相對冷僻的漢字，去改變大部分的偏旁，進而改變了整個的正字法系統和傳統的檢索系統，實在是得不償失。

簡化對於認字沒有幫助，最雄辯的例證就是小學的學制始終無法削減，仍然是六年。這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各地各級學校教育實踐的結果，是大約三代人共二、三十億人次的認知實踐的現實結果，（少數經過考生精選入學的學校不足為訓），決不隨個別領導人的意志而轉移。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多次關於教育革命的講話（例如與毛遠新的談話）和文革中的《十六條》中都強調過「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之類的說法，可是小學的學制始終無法縮短。德國的初級學校（小學）只有四年，可是深入瞭解德國的國語教育就會發現，他們的德語語文聽寫一直持續到中學階段，幾乎到八年級才結束，大約相當於中國的初中二年級左右。

認知心理學要求語文學習儘量循序漸進，先學會簡單的漢字和偏旁部首，然後逐步接觸偏旁部首比較不常見的漢字。世界各國的語文教育可以說都離不開這個規律。但是也要承認，初始發蒙的學童並不能保證一定是循序漸進地學到漢字詞彙。例如，港臺的小學生一開始就不可回避地要認讀學生的「學」字。上面的偏旁足夠複雜，小學生不可能有什麼分析基礎，就得死記硬背，學會它。然後忽然有一天又遇上睡覺的「覺」。他就覺得不怎麼陌生，改變下半部就可以了。我們橫看世界，外文世界也不能避免類似的情況。德國小學生入學，也會不可回避地接觸到字母較多的單詞，例如：故事Geschichte，有趣的interessant，

幼兒園Kindergarten， 不好玩（沒勁）langweilig， 聖誕節Weihnachten， 夢想樂園Schlaraffenland（這些單詞都是德國兒童非常熟悉的概念，竟都超過十個字母），低年級的小學生不一定很早就能掌握分析單詞，將長詞分解成詞根、詞綴和詞尾等若干部分，僅是機械地記憶而已，多字母效應、有字母卻不發音的現象也會困擾他們。隨著年齡的增長，小學生積累的詞根、詞綴和詞尾變化形式多了，分析、綜合的能力也開始逐漸成熟，理性的習得和認知自然水到渠成。

在漢字部首中，即使是繁體字，超過九劃的也並不算多。臺灣比較權威的《國語日報詞典》的部首索引中，十劃和十劃以上的部首共二十八個。其中馬、魚、鳥、鹿、鼠、龍等動物名稱，黃、黑等色彩名稱，還有一些麥、麻等植物名稱，骨、齒、鼻等器官名稱都是常用字，剩下的還有高、齊等常見形容詞，還有鬼、鼓、鼎等次常用名詞和鬥這樣的常用動詞，隨後是一個現代已不太常見的植物名稱黍，剩下的則是比較難認的髟、鬯、鬲、鹵、鬻、睪、龠，其中幾個是組成鬢、髮、隔、繩、鑰等常用字的組成部分，而鬯、鹵、鬻則很少使用，一般不會進入小學課本。說到底，在一個人記憶力最強的童年時代記住二十幾個最難記的漢字和偏旁，實在算不得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起先比較繁難地認識了馬、鹿、魚這樣的多筆劃常用漢字或部首，嗣後在進一步學習漢字的過程中就可以受用無窮，並不是什麼吃虧的事情。

經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凡是分解成常見和比較常見偏旁部首的漢字都不難學習，跟外國人學習母語文字的情況，沒有本質的區別。少數筆劃比較多的部首偏旁，存在多筆劃效應，必須多用一些心力，如果是常用的記憶單位，一旦記住，以後終身受用。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認定漢語漢字比外國語文難

學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同理，簡化字只是減少了筆劃，並沒有改變漢字的基本構成，所以簡化字的習得認知記憶過程跟繁體字基本相同，除了少數特別的例外，並不比繁體字更容易。從以上的論證出發，「漢字簡化有助於更方便地認字」這個說法完全不是一個經得起推敲的科學論斷。

第三章 簡化字無助於提高書寫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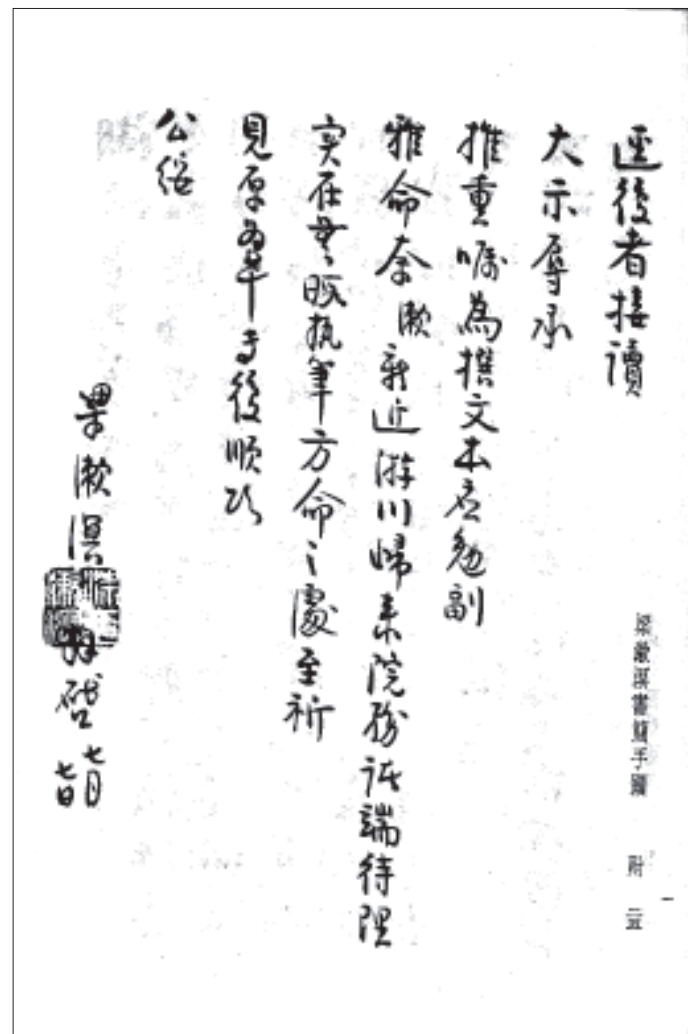
1・中文電腦令簡化字失去了理由

漢字簡化提高了多少書寫效率？

「簡化字能提高書寫的效率」，也是數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又一個重大誤區。書寫本來就只是漢字的一部分功能。對於一個民族來說，除了學生、教師、作家、編輯和文字廣告職業人士，絕大部分人民成年之後，文字書寫的時間僅占生命時間的很少或較少一部分，與文字打交道的時間幾乎都是閱讀（報刊書籍）、辨認（地點、名單）等等。對於每一個個人來說，除了作家、教育工作者、秘書以外，一生中只有學生時代需要大量書寫，書寫佔用一生的比例也遠不如閱讀、辨認那麼多。所以對漢字的訴求覆蓋面最廣的不是「寫得快」，而是「認得清」。當然，寫得快也是一種效率。因此簡化字可以少寫一些筆劃，成為漢字簡化論者的一個重要理由。然而，自從電腦中文處理成功推廣以後，簡化字的這一功能即簡省書寫的功能被大大取消了。中年以下的中國人，不論在兩岸三地的城鄉，電腦中文輸入正以迅猛的方式不斷地普及，能用電腦寫字的人越來越多。儘管輸入的編碼形式各不相同，專業人員中文輸入的速度已經跟英文輸入不相上下。所有的中文輸入法，語音、筆形、數碼，不論優劣難易，反正跟筆劃的數量已經沒有任何關係。簡繁轉換，（雖然當中會出現一些不一一對應的錯誤），只要發出一條命令就可以在若干秒內完成。從此，「簡化字可以加速書寫」基本上不再成為簡化有功的理由。

2・民間俗體字不自簡化運動始

筆劃簡省的功勞只剩下歷史意義，也就是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人有所得益。如官方所標榜的「大大提高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提高了國家建設的工作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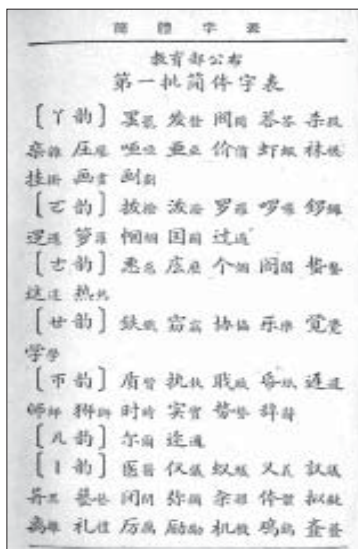


曾被毛澤東破口大罵的梁漱溟先生之早年行書雋秀可人，其中多有行草簡字。

等等。實際上這些說法也都是沒有經過前後對比的「想當然」，稍作分析，便大打折扣。為什麼？因為簡化字根本不是共產黨最先發明的，借用一句中國大陸的「套話」，應該說是歷代中國勞動人民創造的。民間不斷地使用簡體字，決不是按中共中央文件規定，從1956年二月開始的。

從東漢許慎編寫的《說文解字》開始，就收錄了大量古字、俗字。這些就是簡體字的先聲。其中如「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阳、风、声、义、乱、台、党、归、办、辞、断、罗、会、怜、怀」等字跟今天的簡化字一樣。從漢代到唐宋，再延續到元明清，中華民國時代，已經流行著不太統一，卻大致差不多的簡體字，當時或稱為「俗體字、手頭字」。歷代的聞人書簡中，這類簡牘俯拾皆是。例如梁漱溟的簡函，寥寥數行，竟有囑、應、新、遊、歸、來、務、實、無、暇、執、處、為、專、順、頌等許多簡體字，有的不同於後來的規範簡化字，但是卻是當時約定俗成的行草簡字。

1935年國民政府曾經頒令試行簡化字，公佈了324個簡化字。不久因國民黨內的反對被飭令收回。抗戰勝利後的香港和上海文化界還在民間推行過平民文學和簡化字（手頭字）運動。這些運動對於民間的簡體字使用多有推動作用。抗日將領張靈甫，國民黨精銳部隊74師師長後來在山東孟



民國政府教育部公佈的簡化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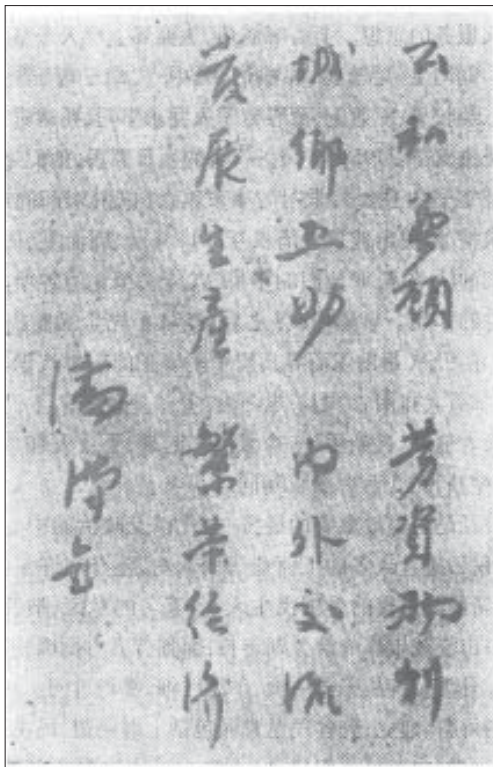
良崗戰役陣亡。此公學貫中西，尤通書法，他的戰地遺書中，竟也有許多簡體字。足見當時簡體字流行的程度。當然這些簡體字也與後來的簡化字不盡相同。



抗日名將張靈甫國共內戰孟良崗戰役絕命書：十餘萬之匪向我猛撲，今日戰況更惡化，彈盡援絕，水糧俱罄，我與仁傑決戰至最後，以一彈飲訣成仁，上報國家與領袖，下答人民與部屬。老父來京未見，痛極，望善侍之；幼子望養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訣矣。「盡、糧、罄、與、至、望、訣」等字皆為行草簡字
張妻後來曾受鄧穎超接見，近年定居上海。

另外，三十年代左翼文人、抗戰時期中受延安指派與日軍暗中聯絡的共產黨代表、前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在1950年的一篇題詞中，也使用了多個簡體字。他寫的簡體字跟1955年中

共中央關於漢字簡化的規定沒有直接聯繫。中共中央敕令推行簡化字之時（1956年2月），他和夫人早已被毛澤東下令關押在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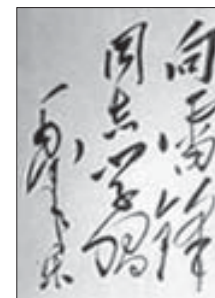


前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1951年2月18日的題詞：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其中多有行草簡字：兼、顧、勞、發、榮、經、濟。有的不同於1956年簡化字。

京市監獄（1955年4月）。這些例證無不說明在中國民間簡體字早已蔚然成風，不自1956年簡化運動始。況且漢字歷來就有草書和行書在民間流行。

這裏再舉毛澤東為例。毛澤東稟性頑固，一生除了青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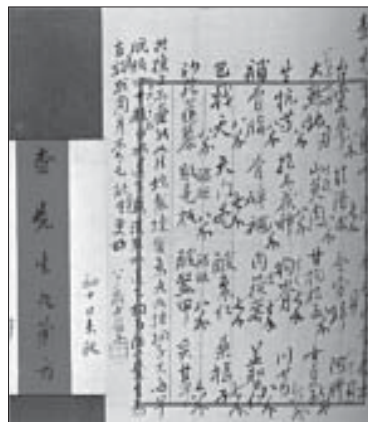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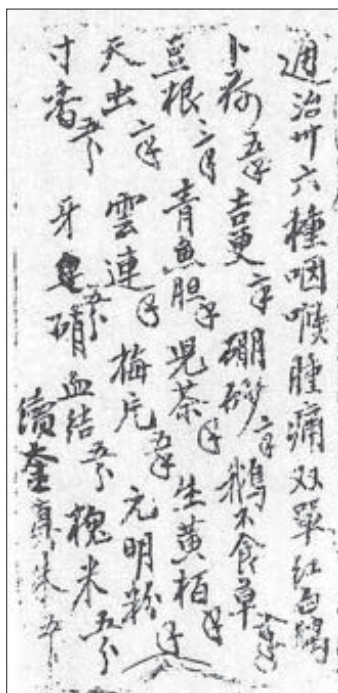
時代生活在故鄉湖南省，其餘時間都在外省市潛藏征戰，早期赴北大圖書館打工，稍晚遊歷上海，多年盤桓江西，然後轉戰陝北，最後入主北京，可是從來沒有學一句普通話，學一個簡化字。他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呼的口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完全是地道的湘潭口音，1963年題寫的《向雷鋒同志學習》，鋒、學、習三個字，應該簡化，但他寫的都不是簡化字，而是行草。在行草中，學字與今簡化字相同，鋒字略近，習字分明還是繁體。當時簡化運動已經推行七年，明知這樣的題詞將面對全國的工農兵和青少年，他卻完全無動於衷，不予關注。



據港臺書刊透露，青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時，他的方言土音難懂，草書字跡難認，引起他的服務對象北大師生的相當不滿，某日竟發生爭執，居然遭致某大學生猛然打來一記耳光。平心而論，在大學圖書館這樣的地點，五方雜處，學風嚴謹，毛鄉音不改，出手便是自由散漫的草書，這樣的服務質量當然不合時宜。據說這位憤怒出手打他的大學生，不是別人，正是後來敢做敢當，不畏強權，當面指斥委員長蔣介石、堅決彈劾大貪官宋子文的著名學者、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見香港《動向》雜誌2001年第十一期，劉志明與黃河清相關文章）以上例證盡皆證明，當時民間的書寫情況，存在大量民間俗字，知識分子在私人信件和非正式文件中經常使用各類行草簡字。許多行草筆劃也對民間書寫發生影響，百姓亦多自如選用，提供了較高的效率。比如明白的明，日字旁邊僅僅彎上三道弯，新鮮的新，一點一橫折再上彎斜出，上繞一圈向下甩出。這類行草簡字有的減少了筆劃，有的僅僅改換了筆順的方向，並一筆連成，加快了速度。例如，如、州

州、四〇、事了、每等等，類似的行草簡字還有很多，當今規範簡化字總表並沒有包含。這種簡體字風氣在海峽兩岸都普遍存在，雖沒有嚴格的規範，卻大致在民間都能廣泛溝通。由於這類簡體字風氣的存在，民間的書寫並不呆板緩慢，而且一般都掌握分寸，公文官函必用正體，私人書簡，工作同事之間可以選用簡體，尤其是行業內部，最典型的就中醫中藥界，計量單位例如「錢」和一部分藥名，如甘草的草，都有特別的簡體字。因此在實行簡化以前，人民的書寫效率並非很低，決不是一律都寫繁體正楷，畢恭畢敬。藥方裏每一味藥幾乎都要標明用量幾「錢」（一錢，舊秤一兩的十分之一），於是就發明一個符號，代表這個計量單位。

1956年實行簡化之後，一方面因為提倡所謂「尊重人民群



眾的首創精神」（郭沫若語），低層次人群中白反（白飯）、電糸來（電纜）（吳方言區）和?夫子（褲子）（粵方言區）之類的創造性簡化字泛濫於街頭巷尾；這類非法簡化字恰恰代表了改革中最受專家詬病的同音替代傾向和方言侵入現象。另一方面不僅「教育大綱」和「編輯守則」強調簡化字規範化，更有一種無形的「准文字獄」氛圍令知識界、教育界膽戰心驚，害怕傳統上約定俗成的行草簡字不規範而不敢使用，客觀上抑制了它們的繼續流行。個別行草簡字收入了第二套簡化字表，後來被廢止。所以推行簡化字以後，已經確認的簡化字被納入規範字，沒有確認的民間行草簡字則在幾十年中逐漸銷聲匿跡。本來課堂筆記或是會議筆記，一般都是十分個人化、實用化的，可以大量使用民間行草簡字，「規範化」的結果反而減少了它們的普及程度。官方沒有標準行書規範，強調規範化的結果，就是肯定楷書，貶抑概括化、簡約化的行書和草書。簡化運動以後，因為顧忌「規範化」，新版行書草書字帖絕少出版，文革中甚至將隸書的偏旁也改作簡化偏旁（例如絞絲旁不再對稱）。

3・民間行草簡字和准文字獄

實際上，遍查中國黨政當局的法規文獻，並沒有任何規定是查禁這類行草簡字的條款。為什麼這類行草簡字會在中國大陸突然衰微不振呢？這種行草簡字的衰微跟當時的社會政治氣氛存在密切的關係。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多少都有一些書法功底，行草簡字是師生之間世代傳承的校園美俗。往往通過耳濡目染，無師自通，而非用力習得。漢字簡化運動以後，緊接著就是整風反右，然後是大躍進，批判彭德懷的反右傾、拔白旗，接著就是餓死三千多萬平民還不准人們議論的全國大饑荒，然後是強調階級鬥爭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接著又爆發了文革。

每次運動，總是知識分子首當其衝，接受黨和革命群眾的教育和改造。大家爭先恐後向工農兵靠攏，不僅要應付工作單位的政治運動，還要經常下鄉、下廠，或接受思想教育，或參加勞動鍛煉，要寫思想彙報，寫宣傳材料，不僅面對業務上的領導，還要面對政治上的領導，歷次運動，都有一批文化水平不高，出身工農或軍人的領導幹部，工宣隊或軍宣隊成員，工農兵學員（當時宣傳說，他們是代表工農兵來「上大學、管大學」），這些人中常有部分知識欠缺，權力不小的人，在運動中專挑知識分子毛病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於是就在那個年代形成了一種現代「准文字獄」的文化氛圍。它跟清代文字獄並不完全相同，五五年胡風私人書信被公佈為反革命材料，五七年整風的鳴放言論被作為右派定罪依據，中國知識分子早已噤若寒蟬，很少還會寫出「清風不識字，何必來翻書」這樣的消閑文句來惹是生非，書信往來盡量避談政治，很多人不約而同地改掉了愛寫日記的習慣。然而還是防不勝防，運動中經常連並無含義的書寫也會成為嚴肅批判的目標，全國各地，各級學校，各不同單位都發生過這類批判鬥爭。例如，把字寫得很「花」，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思想感情的表現，是故意不讓工農兵看懂，是看不起勞動人民，是打擊工農子女等等。所以知識分子都不約而同下意識地暗中自律，寫字也不宜任意揮灑。大家都隱約地記得，接受思想改造必讀的毛澤東著作《反對黨八股》中第三條罪狀就是批評知識分子寫的字略有變化是「下決心不讓老百姓看懂」（《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37頁）。如果你寫的字太草太簡太「花」，工農兵看不懂，《簡化字總表》裏確實不載，中學小學又都不教，字典字書也查不到，人們就有可能提出質問，甚至被提高到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高度來批判。這類批判雖不會招來殺身之禍，但是很可能會惹來一次嚴重警告，多次的認罪檢討，膽戰心驚的不眠之夜。所以，知識

分子們不言自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老實實寫規範簡化字，儘量不要沒事找事，招惹是非。政治運動，厲行全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於是曾經約定俗成的行草簡字就這樣在中國大陸逐漸式微了。簡化運動將兩千多個簡化字升格為正式文字，同時也阻礙了大量約定俗成的行草簡字的流行。誠然，行草簡字沒有統一規範，帶有個人偶然性，有的人簡化了這些字，另一些人簡化了另一些字。但是不要忘了，這些行草簡字都是行書帶草，活潑、自由，不拘一格；而1956年以後的簡化字，強調的是規範統一，楷書為主；兩相比較，書寫速度是很不相同的。全民族書寫人的主體是知識分子，從民眾書寫的總效率來看，推行簡化字以前人們的書寫速度並不比簡化後慢，簡化規範化和政治運動造成的准文字獄從另一個角度降低了全民族的書寫效率，抵消了簡化字帶來的實際效率。以下表格所列的是一些較常用的草書簡字例字，每個都與行書、楷書作對照，實際上還有不少。均未收入簡化字總表。

4 · 臺灣的教育部《標準行書範本》

常見字草行楷對照一覽表														
手	年	年	半	半	半	平	平	平	然	然	然			
粉	粉	粉	分	分	分	是	是	是	思	思	思			
南	南	南	西	西	西	得	得	得	正	正	正			
知	知	知	千	千	千	等	等	等	出	出	出			
故	故	故	曾	曾	曾	起	起	起	山	山	山			
青	青	青	清	清	清	五	五	五	四	四	四			
洛	洛	洛	落	落	落	六	六	六	教	教	教			
奇	奇	奇	何	何	何	荷	荷	荷	高	高	高			
身	身	身	正	正	正	香	香	香	寒	寒	寒			
春	春	春	樹	樹	樹	州	州	州	而	而	而			
如	如	如	妝	妝	妝	安	安	安	林	林	林			
容	容	容	容	容	容	露	露	露	和	和	和			
月	月	月	湖	湖	湖	到	到	到	此	此	此			
明	明	明	今	今	今	吟	吟	吟	解	解	解			
莓	莓	莓	海	海	海	梅	梅	梅	同	同	同			
香	香	香	章	章	章	城	城	城	望	望	望			
過	過	過	事	事	事	後	後	後	相	相	相			

無獨有偶，臺灣於1980年由教育部出版了一本標準行書字帖，供師生習用。其中有585個字與中國大陸的簡化字相同。另外金部61個，馬部34個，鳥部31個字形與大陸的簡化字略有不同，極為接近。但是臺灣的官方用字仍然維持了傳統正體。行書

用字僅僅限於作為民間私下交流的書寫形式，還可以依理類推。實際上為漢字改革摸索了一條走向成熟之路。一個有趣的實驗就是請海峽兩岸學歷相同的朋友一起聽寫，約定不要求工整、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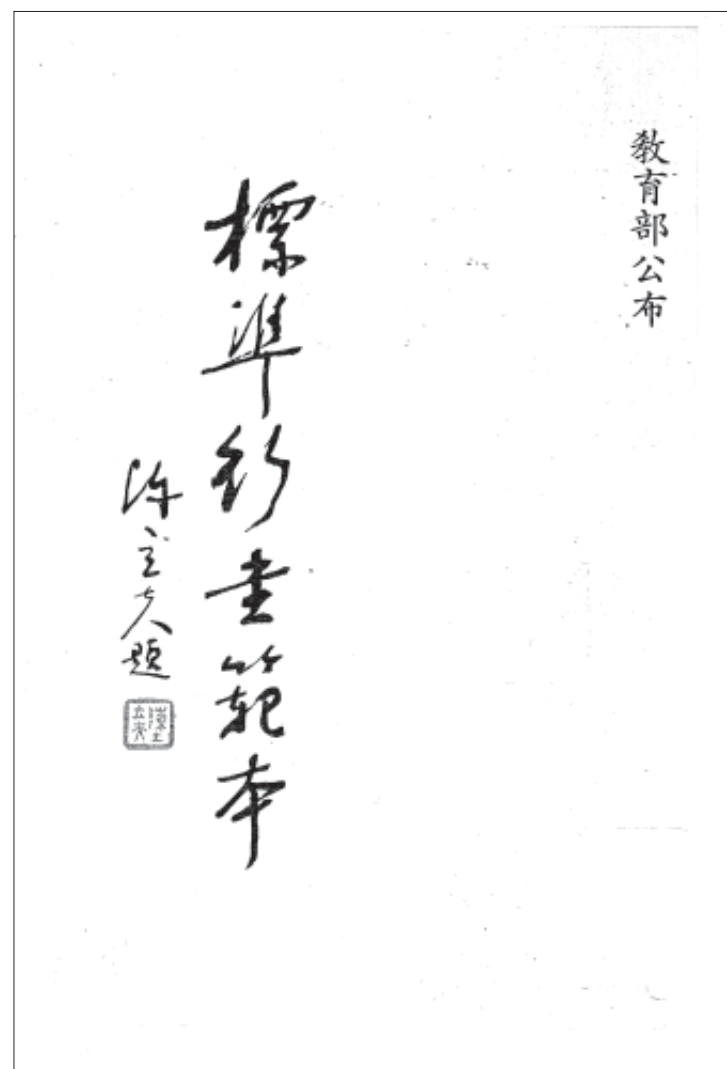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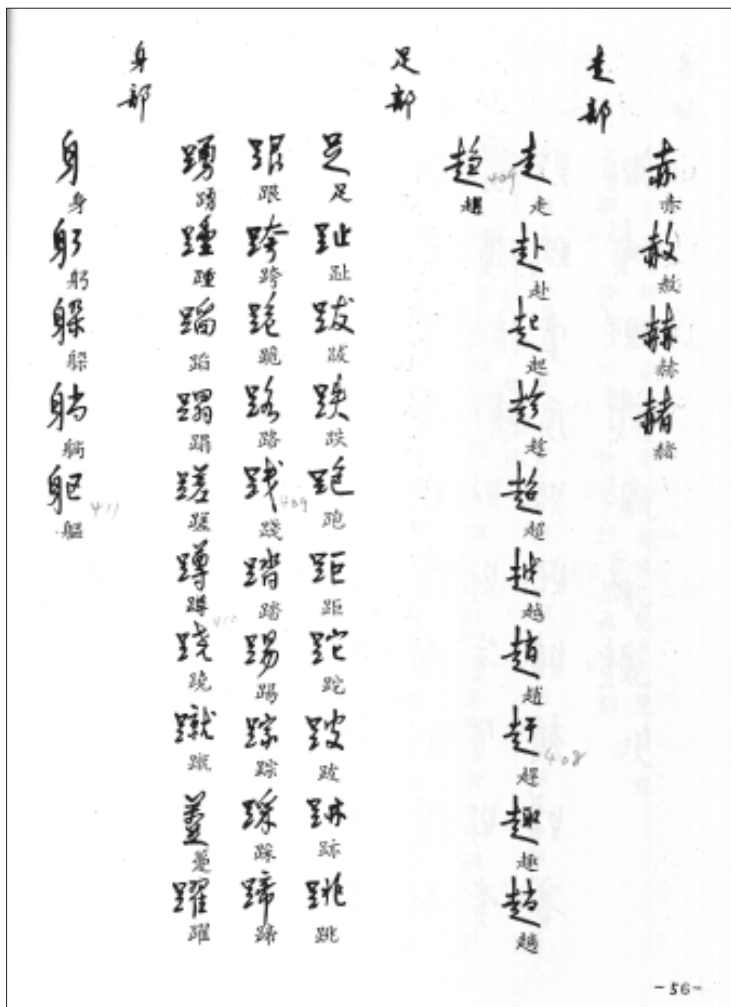


圖1 臺灣教育部編《標準行書範本》 陳立夫題寫書名



（可用俗體、行草簡字），只要求快速、可讀；文章「中性」，不帶有任何一方的冷僻詞語，聽寫的結果往往就是差不多一樣快。有的人沾沾自喜，說是「臺灣知識分子也學寫簡化字了」。好像簡化字就要統一兩岸三地似的。他們根本不瞭解臺灣的情況，人家是從小按照他們教育部的規範學習的行書簡字，僅用於

書寫，跟官方正體印刷品互不妨礙。

5 · 簡化字對小學生的意義

簡化字可以簡省筆劃，僅僅在小學生習字的階段，每個簡化字少寫若干筆。根據國務院語文工作委員會的統計，簡化字從過去平均十六筆，減少到十點三筆，節省了五點七筆。一般文章並非全部是簡化字，如果按一半計算，大概平均減省了兩三筆，實在可以說微不足道。而且從民族文化的深層角度來說，幼年學童在漢字書寫上稍微多花一點功夫，認識偏旁部首及其組合，注意搭配和間架，是認識民族文化的一種基本功操練，一場入門的熱身活動。

小學生在低年級時，每上課日包括家庭作業，平均大約不出百字。平均簡省兩三筆，大約兩秒鐘。那麼約兩百秒，合三分二十秒。中高年級小學生每上課日包括家庭作業，平均大約不出兩百字。平均簡省兩三筆，因熟練需大約一秒半。約三百秒，合五分鐘。如果每一個小學生每天多花三到五分鐘的時間，對於中國文化的本位即漢字，能多一點實踐和認知，實在並不過分。從俄羅斯到整個歐洲，以至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都對大部分中學生開設拉丁文課程，以便讓下一代具備接近古典文化的能力。我們的文字，從漢代漸趨穩定以後，隋唐科舉濫觴，宋元明清刊印刻本，書法碑帖一脈相承，只是到1956年方才發生廢止正體，將民間俗字「扶正」的簡化運動。如果學童們只需每天不知不覺間花費三、五分鐘，就能在成年之後，直接閱讀名勝古跡中的對聯或碑文，能夠辨識一兩千年久遠的古代文物上的字跡，難道不是我們民族的文化幸事？兒童節省了那麼一點點功夫，卻失去了直接認識古典文化的能力，難道不是民族的損失？

6 · 簡化字的假定效率也十分有限

退一步說，假定中國人當時都比較規矩地寫字（從來不知道民間俗體字），我們才能說，寫簡化字就能夠節約一點時間。即使如此，節省也非常有限。

首先，工農群眾每天的職業活動絕大多數都跟寫字沒有直接關係，閱讀和辨認大大多於寫字。每個字平均少寫兩三筆，大概可節約一秒鐘，如果平均每工作日寫不到一百字，節約一分鐘左右，可以說沒有什麼意義。科技、醫療單位職員、醫護人員，書寫的內容常常夾雜一些外文詞或縮略語（例如癌症寫成can-，酸鹼度寫成PH）、專業符號（+=等），與簡化字沒關係，剩下的內容每個工作日一般不會超過兩三百字。每字節省兩三筆，完成這兩三筆大概只用零點七八秒，每日大概可以節約三五分鐘而已。

秘書、編輯和作家，專業從事寫作的人，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總共不到幾十萬人。香港作家梁鳳儀一天寫作甚至突破萬字記錄。但是這是非常極端的實例。中國大陸的作家這樣多產的極為罕見。文史哲學者、專業作家以長期計算每天平均能夠寫下一千字，就相當可觀了。這些專業人士寫字本來就駕輕就熟，以每個字節省兩三筆，每個字可以節省半秒鐘計算，一天也僅僅節約不到十分鐘。（他們本來最善於寫行草簡字，這時已經被規範掉了。）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每天花費在交通擁擠、購物排隊的時間遠遠不止十分鐘。文革浩劫時期，這些學者教授作家受到的衝擊尤重。許多人被耽誤的時間絕難以分鐘計算，都是十年八年被審查、被關押、被閒置。由於政治運動的干擾和衝擊，上述科技工作者和作家、文史哲學者的許多書寫都與專業無關，大量耗費在思想檢查、彙報認識、表忠心、大批判之類的無效勞作

之中，如果總效率為零，便無所謂節約，則上述的計算還要大打折扣。總之，在電腦普及前的時代，簡化字在提高書寫效率方面的成績也是微不足道的。

2005年十月中國文聯主席、著名現代作家巴金逝世。終其一生，他的所有創作和譯作都是用筆墨寫成的，（晚年少數文章是口述經他人筆錄的）。巴金103歲的辭世，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從這個時刻開始，用筆墨創作的作家已經離開我們遠去，今天無論是專業作家還是普通民眾，除書法以外，稍有規模的書寫作品都將是電腦處理的文字，它們跟簡化字的效率已經毫無關係。

第四章 簡化字的弊端

1 · 韓敬體的意見

簡化字到底有哪些弊端，前面已經約略提到。但是不夠系統。近年來海內外的中文網絡世界已經有很多批評簡化字的（當然也有捍衛簡化字的）文章。我從1996年開始就在報紙《德國導報》、網站《華夏文摘》上連續發表過有關「漢字簡化得不償失」的文章，列舉了簡化字的弊端。現在在網絡上可以看到的類似文件中，情緒化的議論比較多，列舉也失之於片面，涉獵所見，有兩篇論述比較全面，這裏謹引述他們關於簡化字弊端的內容。第一篇是韓敬體先生的文章。韓敬體先生是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也是從文革前（1961年）開始就參與編纂《現代漢語詞典》的資深編委，嗣後曾位列該詞典的主要修訂主持人之一。他發表的一篇文章是《談我國的漢字簡化問題》。從韓敬體的角色身份出發，他是不便正面反對漢字簡化的。但是他的論述卻相當中肯地歷數簡化字的種種弊端。他指出：「進行政治革命，強化經濟基礎，才是發展文化教育、發展科技、解決識字用字問題最根本的問題。不考慮政治經濟的根本問題，只是責怪文字阻礙了社會前進，只能是本末倒置」。這段話實際上已經否定了歷史上對繁體漢字的責難。韓敬體又說：「由於當時推行簡化漢字的指導思想存在問題，只是把漢字簡化工作當作改革漢字、通向拼音文字的過渡時期的一種權宜辦法（吳玉章），變成了一種短期行為，對問題想像得過於簡單，好像能較快地駛向漢字的拼音化，所以對整理和簡化漢字的理論和方法、漢字的學理和系統性、古今貫通、繁簡轉換、海內外協調、字形的勻稱美觀等問題缺乏深入細緻的科學論證」。雖然這是一篇個人署名的文章，

但是應該說是迄今為止中國官方權威人士關於漢字簡化問題的絕無僅有的檢討。韓敬體特別指出了漢字字數沒有減少反而大大增加的弊端。例如，簡化形聲字「減少了一個繁體字，增加了一個簡化字，只是減少了筆劃，沒有減少字數。這與前面說的幾種辦法的缺欠是相同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廢除一個繁體字，增加一個簡化偏旁類推字，字數沒有減少，在我們的字典裏，只要是繁簡都收，就得都收下來。比原先沒有簡化時多收了一些簡化字。新造簡化字和類推簡化字又為我們的漢字總字庫增添出來數量可觀的新的成員。這與漢字簡化的減少漢字總字數的目標是不一致的」。關於類推簡化字問題，韓敬體提到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中國古典文獻中漢字的類推簡化問題。過去有不少人談到「漢字簡化以後，出現後代人民無法接觸古典文化的缺憾」時不假思索地說，「可以將古籍用簡化字出版嘛」。然而古籍用簡化字出版，類推簡化字問題將會浮上水面，勢必增加更大規模的類推簡化字。翻譯成簡化字，不簡化則不規範，簡化的話，就又增加一個新的簡化字。這些文言古字並非常用字，在大型字書中已經佔有一席之地，作為簡化字還要佔用一個位置，如果在紙筆時代，也就無所謂，可是在電腦時代，每一個漢字都要在字庫中佔有位置；而我們的古代典籍又是世界上最壯觀的經典寶庫，這個數字將大得驚人；而且漢字在國際信息交換的網絡中已經佔用了比任何語文都更多的有效空間，如果進一步容忍如此大量的古典類推簡化字入庫，那幾乎是不可能接受的。現實的發展已經給予那些「想當然」就能把典籍翻印成簡化字版本的人們以當頭棒喝。關於簡化漢字對於適應電腦時代毫無好處，只有弊端的問題，後面另有專章敘述，此處暫且點到為止。

2 · 羅寧的五大理由

另一篇文章簡化字的弊端的作者是羅寧。因為網絡沒有出處，所以目前對於他/她的職務職稱和服務單位都付諸闕如。但是文章的論述十分中肯，舉例也十分到位，具備專業水平。羅寧的文章寫道：

（一）、簡化方案中以一字合併多字易引發歧義。

在簡化字方案中，由於將很多意義相差很大甚至毫不相關的兩個字或多個字合併為一個字，讀時容易產生歧義。比如，餘余、雲云、後后、裏里、松鬆、穀谷、鬥斗、幾几、徵征、曲麴、豐丰、表錶、衝冲、葉叶、盡儘、發髮、歷曆、鍾鐘、干幹、乾、復覆、復、雕凋、彫等。雖然有時候我們也能根據上下文來確定某一字的意思，但多保留幾個字形以減少文字上的歧義，我認為是值得的。如果在簡體文本中，本來只想檢索「雲」字，但檢索結果雲字也大量參雜其間，需要人工再進行區分，增加了工作量。這些都是計算機漢字處理技術中出現的新問題，我們在文字整理工作中必須注意。

（二）、推行簡化字後增加了成本，帶來極大的浪費。

八十年代以前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簡化字差不多可以一統天下，只有少數古籍使用繁體字。但八十年代以後隨著國際交流的增加，由於港澳臺以及海外漢學界仍然使用繁體字，一些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還需要再出版一個繁體本面向海外，而引進的一些繁體字書籍又須改印為簡體字。這時候開始感到問題存在。第二套簡化方案的廢止正是在開放之後。現在香港、澳門迴歸祖國以後，大陸與港、澳地區的交往更趨頻繁，信件、公文、合同、章程等文書都增加了處理難度。請想想，《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該印成什麼字體呢？還是兩種字體各印一套？另外，最近十年來網絡興起，網站紛紛出現，但很多網站不僅製作簡體網頁，還需製作繁體網頁。我們只要看過一些網站就知道這一點，

如CHINA中華網。這些都已經造成而且正在繼續造成極大的浪費。大陸和臺灣本來是同文同種，但現在卻搞成不同文，其過錯在於我們自己。就大陸來說，由於事實上不能完全廢除繁體字，簡化字和繁體字同時使用，大的字庫中既要包括簡化字又要包括繁體字，於是字庫大大增加其字數。如GBK中既有国又有國字，既有钟字又有鍾鐘二字。不僅GBK如此，GB2312-80也增加了字。由於餘字在1986年的《簡化字總表》中取得了合法地位，GB2312根據類推的方法造出了余字，這樣在GBK中便有了餘余余三個字。簡化字帶來的電腦操作上的弊端還不止這些。很多做過文字處理的人常會遇到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的問題，由於一個簡化字有時對應多個繁體字，加上軟件設計上的缺陷，把云一概轉為雲，余一概轉為餘，里一概轉為裡的事情屢見不鮮，令人哭笑不得。繁體字轉換為簡體字雖然沒有上述問題，但一些僻字因為不能識別而變為空格也經常發生。像東方快車、Word2000都有類似的缺點。此外，GB2312中也包含了後、於、鍾等不在《簡化字總表》中的字，繁體本的後字轉為簡體仍然作後字而不是后。不知道算是折中和進步還是自亂其例？如果沒有兩套文字系統，就不會有這些轉換帶來的煩惱了。

（三）、簡化字破壞漢字結構、割裂傳統文化。

簡化字最主要的缺點就是破壞漢字的字形結構，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弊端。歷史上漢字的字形也屢經變化。如漢字由小篆變為隸書再楷化，其間字形都有較大變化，但這些比起簡化字來說已經算是較小的了。歷史上人為地進行文字改革，較大的只有兩次——秦始皇時期和共產黨執政時期。但秦始皇是為了統一戰國時期各國不同的字形，以適應國家統一的需要。共產黨將文字簡化主要則是出於一廂情願的想法，即將漢字筆劃簡省後便於學習和使用，而忽略了漢字文化的傳統，這其中也包括漢字造字

和字形構成的基本規律。很多漢字在簡化時沒有考慮字形，常常僅是將其視為一個符號。這樣做的結果就使的一些字不再適用於六書的規律。比如雞字左邊原本表聲，簡化為鸡字，左邊的「又」完全是一個符號，讓人摸不著頭腦。如果說「又」就等於奚，但同樣這個「又」，放在漢字裏寫作汧，在歡字作欢，在僅字作仅，在鳳字作凤，在鄧字作邓，在戲字作戏，在樹字作树，在對字作对，在轟字作轰。再比如乂，在趙字中等於肖，在風字、岡字、區字、網字、鹵字中又是什麼呢？「文」字在這（这）字中表示言，在劉（刘）字中又是什麼呢？團字中專是聲符，簡化成团，方框裏的「才」是什麼意思呢？很多按照草書筆意原則簡化的字都存在這問題。如長（长）、書（书）、專（专）、楊（楊）、東（东）、車（车）等字。至於一些新造字如滅（灭）、叢（丛）、導（导）、衛（卫）等更是不知所云。

簡化字中仍有很多字的筆劃太複雜，如果完全按照書寫簡便的原則，我們還可以將很多字繼續簡化下去，也就會更進一步地破壞漢字的結構、脫離漢字的歷史。1977年的第二套簡化字方案也正是在這一指導思想下出臺的，結果呢？雪寫作㇏（這和電寫作电，雲寫作云，有什麼分別？——我們現在只是因為看慣了第一套簡化字纔不覺其怪）信寫作伡，餐寫作𠂇，煤寫作𤇗，稻寫作禾刀，展寫作屍下加一橫，圓寫作元，蛋寫作旦，「元旦」二字則不知所謂。這樣還能算是漢字嗎？還需指出的是，簡化字對筆劃的精簡並不如想像那樣多。根據對掃盲2000字繁簡不同書寫的統計，筆劃減少僅12.5%。要知道這2000字很多都有簡化寫法，如果以GB2312-80（《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來統計，筆劃減少的比例還將大大降低。

破壞漢字結構還引出部首歸類的問題。漢字是音意文字，字體結構中往往包含聲符和意符。現在的簡化字因為破壞了很多

漢字的結構，也就使得很多漢字不倫不類，一些簡化符號既不能表音又不能表意。如上文所說的「又」、「乂」等。傳、搏、轉、團字原來都是同一聲符「專」，現在卻變成傳、搏、轉、團，團字和其他字之間在也看不出有什麼聯繫。更為荒唐的是愛字寫成爰，連心都沒有了還怎麼去愛？雖然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但愛由心生總不錯啊？愛原屬心部，現在竟然屬爪部！聲字原屬耳部，聲現屬士部，真不知道聲和士有什麼關係？鳳字當然應屬鳥部，現在鳳屬几部。這些都很難讓人能理解和接受。

漢字簡化的另一弊端是產生了一批形近字，讀寫上容易出錯。漢字原本就有一些形近字，如己巳已等。但簡化字更增加了形近字的數量，如厂广、汴汴、远运、从丛、汇江、仑仓、厉历、义乂、风凤、归旧、设没、划划等。這增加了排印和閱讀上出錯的幾率。

不管當初搞文字改革的那些人想到過沒有，簡化漢字的實際後果就是讓現代中國人遠離我們的傳統。五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已經習慣了簡體字，而看不慣繁體字，會寫的就更少。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就是這樣被人為地隔開了。我們常常責備青年人不注重學習傳統文化，他們看到繁體排印的古書就自然產生生疏隔膜的感覺，怎麼可能去學習呢？一些優秀的古典著作也有簡化字排印本，他們仍然不會用心去讀，究其原因也與我們的語文教育有關。我們建國以來太過忽視文言文教育（過去反傳統，批判「封建糟粕」，那就不用說了。）如今終於嚐到了惡果。幸好，現在的中小學語文教育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而且正在改變。（羅寧：《恢復繁體的五大理由》）

3·其他因簡化造成的問題和（葷）笑話舉例

這裏再補充一段韓敬體先生所列舉的一些實例：比如簡化

字「干」字，近年常見「干細胞」（幹細胞）一詞，其中的「幹」有人讀陰平，有人讀去聲，如不瞭解術語含義，就難以確定，（應讀幹，去聲）；翻譯地名「塔什干」中的「干」，中央電視臺的播音員不止一個人讀成去聲。再比如，我見到有位經理的名片，全用繁體字，上面的地址「海淀區芙蓉裏」中的「淀」印作「澱」，「里」印作「裡」；還有的把「家」字無限制地轉換繁體為「傢」字；我買到一本開本很小印裝精緻的《論語》，用繁體字排版，裏面當作說話義的「云」，沒有例外地全都上面加個「雨」字頭印作「雲」；近年出現的「二惡英」一詞，因為「惡」是多音字，常用音義是負面的，所以專家們堅持用帶「口」旁的「噁」字，簡化字表卻是把這個字作為「惡」的繁體廢除了。這些問題大都是用同音代替或假借法進行簡化而字表又沒有注釋明白造成的。（韓敬體：《談我國的漢字簡化問題》）

此外，凡與他們重複的部分我就不再贅述，僅補充他們所沒有涉及或我認為可以再深入的內容。

五十年代中學畢業就可以誦讀古跡中的碑文、對聯，辨認古代典籍中的正楷漢字並不困難，甚至還可以辨認出大部分隸書和行書，時間大約可以上溯到兩千年前的漢代。現代中國的青少年非經訓練（自學）無法閱讀古舊書籍，看不懂港臺小說和文件。臺灣藍營2008年總統競選人馬英九在訪問美國會見同胞發表講演的時候曾舉例說，前（臺灣）清華大學校長劉兆玄前陣子到長沙「馬



王堆」參觀出土文物，他看著帛書（漢朝的隸書寫在錦帛上）時，一對英國夫婦訝異地問：「你看得懂啊？」他們說這是兩千多年前的東西，怎麼看得懂呢？劉兆玄回說，「我們臺灣人都看得懂啊！」可是大陸導遊卻看不懂，「這就是差別的地方！」（轉引自《星島環球網·文化觀察》《建議漢字分工》2006年4月12日 作者 王若谷）

能識繁體字就不難辨認漢代的隸書文獻，這是十分平常的事情。

簡化字方案歸並了異體字，只是減少了少量漢字，可是對歷史文化總量來說，反而是增加了一大批簡化字。古代文獻又不能拋棄，需要一套檢索系統，簡化字不能使用這套系統，就另搞一套檢索系統。結果在所有的正式圖書館都必須擁有兩套檢索系統，管理人員和檢索者都必須學會兩種檢索方法。從北京、上海到美國國會圖書館，無一例外。精力和經費的浪費無法統計。

簡化字的形似字例還有以下這些：「汁」和「计」，「论」和「伦」，「儿」和「几」，「开」和「井」，「条」和「各」，「乔」和「务」，「虏」和「虑」等，字形相似，務必需要目光停留，反而增加了閱讀的困難，平添了閱讀的疲勞。而看「設」和「沒」，「倫」和「論」，「鳳」和「風」，「倉」和「侖」，「歷」和「厲」等，這些問題根本不存在。

簡化運動胡亂尊重所謂的「群眾首創精神」，違背了漢字原有的音韻系列和偏旁規則。例如「進」讀jin，繁體是誰字一半加？。簡化成井字加走之。井字不念jin 而是jing. 鄰讀lin，繁體是上米下舛加耳朵，跟麟磷鱗粼成一系列。簡化以後，成了令字加耳朵。令字讀ling 跟他們完全不是一個系列。漢字的音韻系列大部分有助於認字。破壞了系列，反而導致讀錯（例如前後鼻音）。「這」字裏面是言字，似應該簡化成統一的：讠加

讠，或者不簡化，這字也不算難。可是卻簡化成「文」字加讠。全不合規範，增加了混亂。這類問題並非個別。



油漆的漆這樣簡化不規範。

簡化字立民間不規範書寫形式為官方形式，首開惡例，造成各種不規範書寫在社會上的惡性氾濫成災。所謂「二簡字」，即1977年國務院公佈的第二批簡化字，正是這一災害的集中表現。

電腦漢字系統也裝備兩套漢字系統。繁簡轉換不能完全一一對應，同音替代的詞就會出現錯別字。凡是用中國大陸國標碼輸入，又在海外印成繁體的文章出現了一套特有的簡繁轉換錯字。許多描寫舊時代的影視節目不斷出現簡繁對換的錯字笑話，令海峽對岸的知識分子錯愕不已，電視劇鏡頭裏百姓抬著大幅匾額，送給神醫，匾額上寫的竟是「造福鄉裡」，里成了裡面的裡。北京頤和園舉辦《慈禧太后生活展》竟然寫太后為太後。

簡化漢字造成了兩岸人民文化上統一的隔閡。數千年書同

文的中國變成了不盡同文。海外的中文學校很難統合在一起。無論歐洲、美國、日本和澳洲，沒有一個地方的中文學校能把兩岸的學生家長和教師統合起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簡化字。港臺青年不願意主動閱讀大陸報刊和網頁，大陸青少年更難閱讀臺灣網頁和文獻。兩岸三地的青少年幾乎是「同入中文網路，邂逅不相往來」。有人說，簡化字筆劃少，每年每台打印機可以節省幾塊錢油墨開銷，有利於環保。這是坐井觀天的說法。一國兩字不僅讓微軟等電腦公司都需要開發簡繁兩套中文系統，而且造成了所有的國際商品在出版使用說明的时候都不得不考慮印刷繁簡兩種漢字的說明書。這類（紙張、油墨、時間、精力的）浪費對環境的負擔大大超過中國大陸每台打印機節省的那一點點油墨。

「一國兩字」造成兩岸人民的隔閡，已經在民間傳出各種笑話。有一則笑話是這樣的：傳說有一年三八婦女節，幾十名臺灣婦女人權活動家高舉著「反對一國兩妻」的橫幅，遊行至臺北「總統府」前示威，要求政府懲治在大陸包二奶的台商。臺灣海基會向大陸海協會提出交涉。大陸方面答應採取措施。凡是台商在大陸嫖娼或包二奶被公安活捉，將一律懲罰性地在其臺灣護照上加蓋「淫蟲」兩字的黑戳。一名「淫蟲」台商被蓋上黑戳後，惶恐不安，擔憂回台後無法向太太交代，於是靈機一動便在「淫蟲」二字中間添加一個「火」字，變成了「淫火蟲」三個字。回到臺灣，太太立刻查看護照上是否有什麼紀錄。翻開發現「淫火蟲」官印，不解何意，那台商便振振有辭地解釋道：「這是在大陸觀賞螢火蟲表演的紀念戳。」太太疑惑地追問：「咦，這怎麼是『淫』不是『螢』呀？」台商正顏厲色道：「女人家就是頭髮長見識短哪。人家大陸用的是簡體字嘛！」繁簡之間的誤解說明兩岸的隔閡早已不僅是政治的隔閡，而是進入文化的隔閡了。

如果說，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功勳卓著，那麼共產黨造

成一國兩字，分裂文化阻礙統一，該當何罪？

文字的功能是讀寫兩用的。如果簡繁都認識，閱讀一樣快。任何人都是閱讀、辨認大大超過書寫。簡化以後，書寫效率提高微乎其微，辨認的困難卻增添了不少，例如設和沒，造成笑話：「本店设有充电裝置」，被讀作「本店沒有充电裝置」，「我沒法去办」和「我设法去办」，很不容易看清楚。有人辯解說，漢字本來就有一些字容易混淆。是的。但是根據統計，戊戌戊這三個字出現的頻率是在一千萬個語詞中僅出現123次，（《揚州大學學報》第7卷第一期，張其均《從信息論角度談漢字的認知》）而沒和設、計和汁這樣的字出現頻率要高得多，而且這裏還涉及到「沒」這個否定判斷詞，它的頻繁度之高是不言而喻的。既然進行文字改革就應當改得更好，結果是舊的混淆沒有改進，又出現了更易產生誤會的新的混淆。

為簡化字辯護的論者堅持說當前這些同音替代的簡化字不會造成混亂，甚至嘲笑批評者是「挖空心思」、「杞人憂天」。其實混亂是存在的。例如：白居易著名的《長恨歌》中，「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查大陸舊版和臺灣版、香港版的《唐詩三百首》，皆作後宮。我對學生們講課的時候，特別強調，後宮佳麗三千人（嬪妃）當中，是一個后也沒有的。皇后和太后都不住在後面的後宮，而是住在后宮。一篇文言故事這樣寫道：「……大夫先言于帝，而太子泣訴于后，帝聞之大怒，遂廢太子，貶為津王。」這裏就可能有兩種解釋：1）……大夫先告訴了皇上，而太子到皇后那裏去哭訴，皇上知道以後，反而大怒，索性廢黜了太子，將他貶為津王。2）……大夫先告訴了皇上，此後太子也到皇上那裏去哭訴，這時皇上聽了反而大怒，索性廢黜了太子，將他貶為津王。如果使用繁體字，用「后」是第一種情況，用後是第二種情況，決不會誤會。如果使

用簡化字，那就出現羅生門情節了。

唐詩《答人》（太上隱者）的名句：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此處的历當為曆，解為曆書、記錄；而不解作歷。如果作歷解，則意義近於經歷、作為；則完全背離了全詩隱逸出世的意境，而落入了入世算計的塵俗。從簡化字的「中国历史」四個字的書名中，讀者怎麼會想到，這是一本從甲骨文時代占卜記載天象的紀錄開始，介紹天干地支紀年，直到記載清朝關於西洋曆法和傳統中國陰曆之間爭議的歷史專著？它竟不是一冊普通歷史，而是中國的天文曆算之史？

后宮和後宮應該是歷史文化遺留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殘餘，但是它們仍然是現代漢語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船只……」和「船隻……」各有不同含義；例如：外国船只允许进入船塢，「布景」和「佈景」，「戲院裏」和「戲院里」，「谷神」和「穀神」等，則全是現代漢語裏的實例了。香港還真有一個地名叫做「戲院里」。（布、裏、穀等字例源自香港同胞李小狼的網頁）。

關於面和麵的混淆，海外的諧趣說法是又一則「葷笑話」。說的是一名（大陸）蕩婦，勾引男士時，寫道：「不看僧面看佛面，我將下面給你看，給你吃！」例不雅馴，「葷」說一「面」之詞，卻也一針見血。

再說「干和幹、乾」的簡繁對換。在臺灣口語中，「幹」可以解釋為「性暴力侵犯」的動詞。在這類簡繁對換中，偏偏經常出現倒錯的對換，例如將「乾女兒」錯成「幹女兒」、「乾兒媳」錯成「幹兒媳」，於是給人以非常不雅性暴力亂倫犯罪的錯覺。

4 · 漢字的歷史文化信息承載

談到漢字承載了漢字源流的文化信息，簡化字的辯護論者認為：「其實漢字演變到楷書，不管繁、簡，都已是面目全非了，真想知道一個字的由來，至少也必須懂得小篆甚至甲骨文，而教兒童認字的小學教師，哪會有這樣的功力？即使有水平高超的小學老師，能把某個字為何這麼寫講得頭頭是道，又豈是小學生能領會得了的？用繁體字的各位平心靜氣地想想，自己當初認字時有多少字是通過瞭解字源才記下的？恐怕絕大部分字都是靠死記硬背記下的吧？既然都是死記硬背，當然是筆劃較簡單的簡體字好記好認好寫」。（方舟子：《簡化字和字源》）

這種說法還是停留在簡化字易認易記的誤區內，不明白很多漢字都不是死記硬背而學會的。另外，這種說法還存在一個更嚴重的誤會。漢字保存的文化源流信息是用來幹什麼的？把這個語源學、字源學的科學問題，扯到小學教師給小朋友上識字課的問題，真可謂坐擁寶山不識寶了。給小學生上課，當然需要在演示筆劃、筆順的同時，適當講解一些基本的漢字知識，言字旁表示說話，提手旁有動作的含義，木字旁和竹字頭可以幫助記憶。這些雖然也是漢字提供的文化信息，但是僅僅是一些淺層的、比較直觀的信息，在教學上也僅僅作為一種輔助方法，一種教學記憶小手段而已。中文沒有確切的詞語描寫這個手段，德文倒有一個有趣的名詞Eselsbrueck，直譯是「驢橋」。意思是幫助（笨驢）記憶的「橋」，還有中世紀拉丁文的出典。我們所說的漢字包含的歷史文化信息，遠遠不止有用來做「驢橋」的用途。漢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是語源學、字源學的基本研究對象，是中華民族文化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語言文字學、訓詁學以及許多人文學科賴以生存的基礎材料之一。西方國家非常重視他們語文的詞源和語源，在西方文化的著作中，文辭語境的字裏行間在在都顯現出一種文化尋根的歸宿指向，一種文化歷史的自豪感。稍

微大型一點的詞典就會在詞條中注明詞源，拉丁文或古希臘文，希伯來文等等，儘管有些詞的構成已經很難直接看出其來源。西方的小學生也並不被要求在識字以外，再記誦詞源，或者利用詞源記憶單詞。那是高中生大學生研究生的事情。漢字能承載極其豐富的語源信息，正是漢字重大的優越性，是堪與西方古代語文比美的長處，每一個中國人應該熱情呵護唯恐不及，可是數十年來，漢字的這種優點不斷地受到戕害和作踐，簡化運動就是最集中的沉重打擊。即使簡化運動有利於認字、記憶和書寫，也未必應該割捨這樣的優點，何況科學實驗已經證明，簡化漢字根本就是得不償失；漢字就更不應該如此自我作踐、自我戕害了。

有人說，不能為了保留古典文化信息而抱殘守缺，阻礙語言文字的發展和演變。這種提法對於1956年的漢字簡化運動並不適用。歷史上漢字的演變有人為的變化，即官府政令強制執行的改變，例如秦始皇的書同文。經過這樣的強制貫徹，統一了六國不甚相同的文字，有助於國家的統一和行政的管理；另一種演變是自然的變化，例如甲骨文變成隸書，隸書變成楷書、行書或草書，完全是因為書寫工具的改變。刀刻、火燙，牛骨、龜甲，跟筆墨，絲帛和竹木簡策，直到形成文房四寶，完全是不同的書寫工具，漢字的書寫在變化中更加脫離了象形文字的圖形具象，更加抽象化、筆劃化了。這類改變是民族祖先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進步的必然結果。大量的形聲字，加偏旁以繁化的漢字都出現在漢唐時代。而1956年的改變完全是人為的強制改變，破壞了兩千多年的統一局面，損害了漢字原創的六書系統，擾亂了原來存在的音韻系統，捨棄了本來包含的傳承古今文化的信息紐帶，這場改革是被歷史證明完全失敗的變革，談不上任何進步，特別是電腦信息化出現以後，簡化字完全沒有表現出比傳統漢字更加適應電腦信息化的進步性，反而使中文字庫負擔更重，更不合

理。從效果上說，無論在認知效率和書寫效率方面也是得不償失的。如果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代價，中華民族為什麼要承受這樣得不償失的改革？

從語言學的基本理論出發，語言文字的延續性是本身的根本特點之一。當代的文字是歷史文字的邏輯發展。其中必有歷史文字留下的寶貴痕跡。而傳統漢字堪稱是保留文字歷史信息最為完整的文字之一。另外，語言學理論告訴我們，文字不僅僅是記錄語言的工具，記錄文字（文化）的歷史信息也是文字的基本功能。簡化漢字的缺陷正是完全忽視漢字記錄歷史文化信息的功能，僅僅滿足當前的易認、易寫功能，結果易認易寫的目的未必達到，卻無端戕害了漢字對歷史文化的記錄功能。世界各文明民族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都會遇到如何面對語文的當前應用和歷史文化承載之間的矛盾。英語民族是最為保守的。基本拒絕改變歷史文化信息的承載面貌以遷就當今的拼讀規則。美國英語作了適當的小改革，labour /labor, centre/center之類，英國仍然堅拒不受。德國（包括瑞士和其他德語區）則全民達成基本共識，僅作一點較小改革，不涉及重大改革。改革當然為提高效率，但不得傷害民族文化特點，而且改革不是向英語靠攏，而是更加德語化，即民族化。相比之下，漢字文化圈各民族的語文在已逾百年的近現代化進程中受到過不同程度的傷害，最嚴重的是越南語文。改進和完善語音表達符號系統是必要的。但是完全實現去民族化、去漢字化，卻是跟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入侵相伴隨的歷史現象，是歐洲文化優越論和共產主義極端派（馬爾主義）意識形態階級論摧殘的結果。兩次大戰以後，人權理念不斷高張，人類文化平等共生的現代文化人類學思想從歐美各國向世界擴展，保護人類多民族文化自然生態的認識正在日益深入人心。電腦輸入和保存多民族文字信息日益便捷而便宜。犧牲自然語文的

歷史文化信息以換取點滴機械效率的想法日益成為不文明的陋見和淺見。我國朝野進入二十一世紀仍舊歌頌簡化漢字，繼續稱讚簡化理念，極端拼音派鼓吹廢除漢字，拼音化、甚至英文化的傾向，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落後思潮。

5 · 簡化字和兩岸掃盲對比

當代以後，中國（大陸）人普遍不便直接閱讀歷史上一脈相承的漢字文獻。毛澤東決定方向，周恩來主持簡化漢字工作，已是歷史的鐵案。中國的歷史文化好象被毛澤東砍了一刀。從此出現了一道斷痕。五十年代以後，中國的歷史文化將會劃分成「今文」（簡體）和「古文」（繁體）兩大階段。分水嶺就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時代。毛澤東誅殺功臣，迫害作家、藝術家、學者，焚書毀廟之類的政績可能會被人們逐漸淡忘一些，因為這些言行跟歷史上的統治者仍多類似，屢見不鮮。可是草莽愚魯斫傷中國文化血脈的罪孽卻將隨著文化歷史的延續愈顯昭著。對於民族整體而言，文化的毀傷當然比殺戮的血債留下更多痛楚，更多遺恨。

如前所說，小學學制依舊六年，不能縮短，就是簡化漢字最根本的慘敗。從概率論的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動用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數量進行了五十年的漢字簡化實驗，用數以十億計的受教育人口的實驗結果告訴人們，漢字簡化並不能減少學童認字的困難，初等教育的年限依然跟臺灣香港的教育體制（六年）一樣。

將文盲現象怪罪於漢字繁難毫無理由，兩岸的對比證據確鑿。海峽對岸沒有實行漢字簡化，注重教育，不到三十年，約在70年代末基本消除了文盲，到1988年全面解除黨禁報禁實現民主化。「1946年，臺灣的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一，至

一九八八年，因適齡兒童就學率已經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八九，故文盲兒童幾已絕跡。日據時期，日人為對臺灣實施奴化教育，特別限制臺灣同胞進入普通高中，最多只能進入初級職業學校。但一九八八年高職和高級中學學生數，已占全體中學生數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九九。日據時期臺灣人進入大學者極少，並且限讀醫理工科，文法藝科則不准華人就讀。但一九八八年專科學生已達二五六六一零人，大學生已達一九二九三三人，碩士研究生已達一二四二六人，博士生已達二六九五五人」。（辛灝年《誰是新中國》第八卷第一節）。根據臺灣教育界的回憶，臺灣脫離日本回歸中華民國初期，文化狀況比中國大陸更加糟糕。日本殖民當局長期推行皇民化運動，中小學校以日語日文教學，中文報刊被查禁，人民不能接觸到正式的漢語漢文，漢語文化僅僅殘存於民間的閩南方言和客家方言等亞文化層次之中。接收官員和中文教員遇到的民眾絕大部分是一群不通國語，不識漢文的同胞。臺灣的教育工作者就是在這樣的艱難基礎之上比較迅速地掃除了文盲，推行了國語，為後來的臺灣經濟高速發展打下了根基。他們使用的文字工具就是傳統的漢字和民國時期的注音符號。完全沒有推行漢字簡化。2003年臺灣十五歲以上文盲占3.02%（《維基百科辭典·中華民國條》）。香港長期曾被稱為文化沙漠。1961年香港文盲人口20%，1980年代初期，旅歐港人中文盲半文盲也非常普遍。香港1974年開始實行義務教育制。現在的中青年港人已基本無文盲。（港臺地區的極少數文盲中包括一些外籍新娘和新移民）。文化城市的姿色已經漸露端倪。香港學校教學並沒有推行簡化字。今後也不必推行簡化字。

簡化運動對中國大陸掃盲並無幫助。1964年中國文盲兩億三千多萬，占人口33.58%，文革後改革開放，1982年文盲兩億兩千九百多萬，占人口22.81%；2005年文盲率才降到了

8.33%。（《中國人口網站》統計資料）漢字簡化半個世紀過去，到2006年15歲以上的文盲仍然高達1.14億人，其中大半是邊遠農村的女性，（據新華社2006年9月9日報道）。現在在德國的中國難民文盲也絕非個別。我曾詢問他們不能上學的原因。他們的答復全都與「漢字難學」無關，而是社會性的：要麼因為爺爺是地主或富農，不准入學；要麼是（文革動亂）沒有老師沒有學校。再過十年，成年的中國文盲大概要說：「因為爸爸是農民工，付不起城市學校的贊助費」了。總之，文盲現象跟漢字的繁簡沒有關係。關鍵還是社會環境的安定（未必需要韓敬體說的政治革命，更不應發生文革動亂），國家對教育的投入。臺灣的教育預算高，師資陣容強，政府善待知識分子，鼓勵人民尊師重教。臺灣的教育真正地做到了有教無類，一視同仁。過去中國黨政的宣傳指責臺灣的教育是資產階級的奴化教育，勞動人民的子女沒有受教育的權利。結果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才知道，臺北木工的女兒陳若曦是著名海歸女作家，台南農民的兒子陳水扁是法律學博士，湖南赴台國軍老兵的女兒龍應台是外文博士，竟然都是「工農兵子女」，而且文化界知識界有很多女性嶄露頭角，不讓鬚眉。中國大陸的教育落後，恰恰是土改摧毀了農村的文化根基，運動整肅了城鄉知識分子，發展軍備和核武器，壓縮了教育經費，政治嚴重地干擾了教育，幾代人積重難返。

6 · 關於漢字不斷簡化的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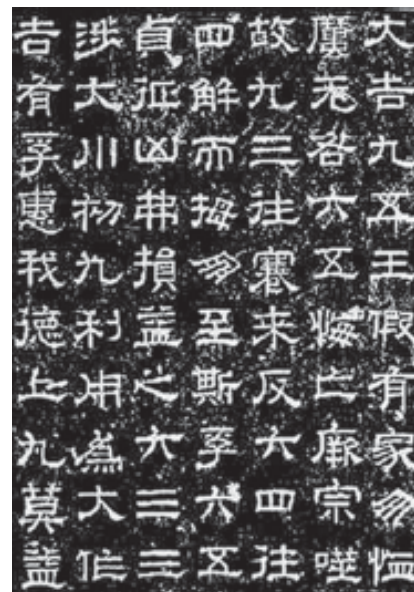
有人說，漢字在歷史上不斷地簡化，是客觀規律。（參看周有光《語文閑談》第一八三頁，余秋雨，《華夏文摘》1997 11c）這種論點有多少根據？具有書法常識的人都知道，從甲骨文到小篆，漢字文化還在發育成長，字形複雜起來，不是在簡化，而是在繁化，以形成更多的漢字，表達日益增多的概念。從

小篆到隸書是脫離刀刻文字，走向筆墨簡帛文字的變化。筆劃確實簡化了一些，但是不一定是縮減筆劃和改變結構的簡化，主要大概是「減少彎折，順從筆觸走勢」的變化。隨著紙的發明，從隸書到楷書，筆劃的演變更難簡單地說是簡化或者繁化，而是徹底的抽象化、筆劃化了。也就是說，由於物質原因完全脫離刀刻甲骨，經過鐘鼎、簡帛，成為筆墨紙硯的文化。同時出現的草書、行書，應該是隸書楷書的藝術（或急就）變體，是以隸書楷書的基本型為基準的寫意藝術。從先秦到兩漢，漢字文化趨向成熟。「集」字的木字以上部分，原來重複三次（表示多鳥集合於一棵樹木），後來簡化為一次，是抽象化。「私」字原來沒有禾旁，僅表示與族群相對的個體，加禾旁增添了農耕社會的特徵（繁化？）。陳和陣，原在篆書中是一個字，用刀刻，它們難分彼此，用筆墨就逐漸分離，不再通假（繁化？）。《論語·公治長》說「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希字實際意思是「稀」。後世稀少都寫作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古書中智寫作「知」。這類棄通假而就精確，其實都是重要的進步。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標志著漢字文化進入了成熟期。而隋朝發端的科舉制度是促成漢字逐步穩定的重大因素。統一的考試制度需要統一的書寫規範，奉命唯謹的儒生決不敢在書寫規範上向考官挑戰。「唐開元天寶年間，顏元孫通過約定俗成的方法，參校是非，較量異同，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整理文字，編寫了《干祿字書》。官府既然利用『既考文辭，兼詳翰墨』的科舉考試取士，知識份子也利用書判爭取仕祿。『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所以楷書地位不僅得到鞏固，也因此促進了楷書字體的統一」（朱關田《唐代書法考評》一七二頁）。經過這樣嚴格篩選考核的文官體系勢必促成全國文牘的規範化和長期穩定。論者不以歷代官方文獻為證，卻拿出零散出土的一些古代民間器皿和平民墓葬碑文的簡化

字作為漢字不斷簡化的證據是缺乏說服力的。民間小說中倒不乏相反的例證。相傳某書生科場失誤，試卷某字缺漏一點，按歷代科場通例，凡試卷錯寫白字，考官一律棄置不閱。書生下場後不禁悔恨萬端。不料，書生往昔曾經施恩於某人，此人知恩圖報，化作一羽小蟲，飛近考官書案，悄然降落試卷缺漏墨點之處，赫然化為一點。考官渾然不覺，一氣呵成，批閱終卷。考生終於高中孝廉。

宋代出現了活版印刷。坊間刻本的印行使文人解脫了抄書傳閱的沉重負擔，由刻書匠人承接為職業性行當。匠人的商業化勞動更加減弱了抄書活動中減省筆劃的要求。由此出現的印刷體更使漢字的基本形態標準化，而不是簡化了。

不用繁瑣的考證，只要看一看今天市面上常見的字帖就一目了然了。晉代王羲之的真跡不傳，爭議太大，且看北朝（約一千五百年前）的魏碑拓本，楷書的字形已經跟今天的字形相去不遠，唐代（約一千三百年前）的顏真卿、柳公權正楷，跟五十年代、目前港臺的字體幾乎完全一樣。宋代（約一千年前）刻本《廣韻》字體幾乎就是我們今天的繁體字。這些字帖韻書就是歷代學童學習漢字和音韻的範本，千年不衰。簡化字實行以前，官方文字何曾有過簡化？



洛陽熹平石經是漢末人書寫的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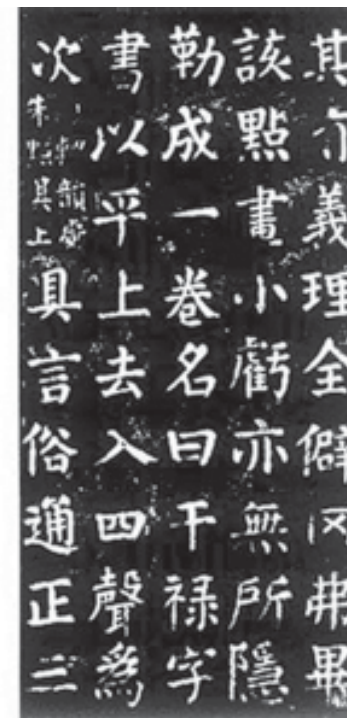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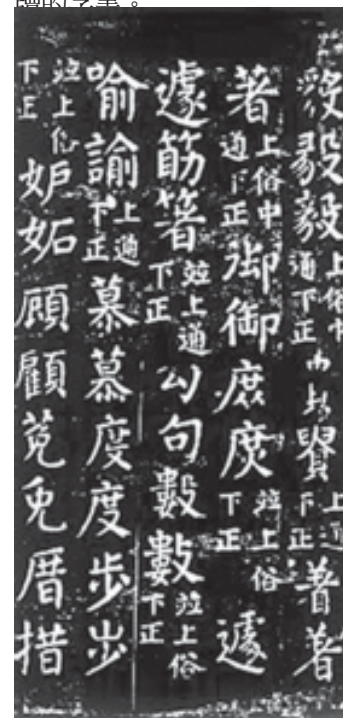
一個民族的文化持續發展，要求她的文字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由於技術的進步、文具的變遷，文字發生相應的變化，也有一定的承繼關係。由篆到隸，由隸到楷，大致適應了由刀到筆，由甲骨、帛簡到紙的過程。絕不是簡化兩個字可以概括的。從遠古的甲骨文字到西漢的隸書，大概可看成是漢字文化的幼年 and 少年時代，姑且算他兩千年。從東漢逐漸出現楷書直到現代，應該屬於漢字文化的青春期和成熟期，大約也是兩千年。童年的天真固然可貴，跟青春期的意氣風發卻不能同日而語。在這個兩千年裏，由於我們的祖先發明了紙（東漢），後來又發明了印刷術，將上古的文獻通過傳抄和刻印，傳承了下來（既有散失，也有保存），成為楷書繁體字文獻。中古的漢字文化又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之後，也由於文字的穩定，後世一直可以直接閱讀前代的文獻。漢民族擁有數千年一脈相承的文化，其意義就在這裏，正楷漢字的可貴價值也在這裏。在這兩千年裏形成的楷書漢字是成熟的文字，仍然具有吸收外來文化能力的文字。需要的只是調整（規範讀音）和整理（刪除異體），而不是簡化。中國大陸五十年代的漢字簡化並沒有迫切的物質原因，（電腦文字處理還沒有開始），主要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黨政軍幹部隊伍文盲太多，壓力太大，急切需要尋找一種方法能夠迅速改變幹部隊伍文盲狀況。於是就將解決的辦法寄託在簡化漢字的幻想之上，希望簡化了的漢字能夠較快地改變這類現狀。

7. 民間俗字和《干祿字書》

《簡化字繁體字對照字典》和其他一些談簡化字的文章常常列舉一些字書和明清小說刻本中的俗字來說明中國古代就已經實行簡化了。這樣的推理是似是而非的。漢字簡化的要點是官方規範是否被簡化。如果僅僅是民間有人書寫一些簡筆字（俗

字），官方規範不變，不能說是實行了簡化。否則，1956年以前的中國大陸、今天的香港臺灣民眾也寫很多行書簡筆字（俗字），並不能說明已經實行簡化了。字書收錄這些字，明明標明了是俗字，也就是說這些字不登大雅之堂，這些俗字僅僅說明民間有這樣的文字現象，並不表明官方認可，也不說明十分流行。比如今天的某些字典也收女字旁的你（妳）表示女性的第二人稱和示字旁的他（祂）表示神或上帝的第三人稱。這類收字並不表明社會對這類表達的承認和普遍流行，只是說明有過這類現象而已。

《干祿字書》是武則天時代問世的一本應付科舉和官場文牘的字書。



這本書提供了漢字俗、通、正三種可能的字體，可以在不同方面應用，俗體可用於書寫契券、文案、戶籍帳簿、藥方等，通體可用於書寫表奏、箋啟、尺牘、判狀，但書寫著述、文章、對策、碑碣最好用正體，進士考試，理應用正體。對於編者顏元孫的這個說法不可以機械地理解。正體應該對所有文牘都使用，但是著述、文章、對策和碑碣最好用正體。通體可以用於書寫表奏、箋啟、尺牘、判狀之類，也能寫入俗體所用的契卷、文案、戶籍帳簿和藥方等等。但是俗體卻只能用在最後這類家庭、個人之間的俗務用途，包括藥方之類。古代的郎中、藥工沒有科舉功名，所以沒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藥方不算正式的文件。通體的存在是中國社會的特別現象，因為書法品位的高下象徵著文化人的才具和能力，所以文牘的書法之美受人重視。書法之美要求同一篇文章，至少同一頁上不宜有完全相同的筆劃。即使是同一個字，也要有所變化。所以文人必須在掌握正體之外，會寫一兩個通體（異體），以應書法之需。這也是漢字為什麼會有大量異體的原因之一。至於俗體則是民間為簡便快速書寫急就文牘所需，約定俗成即可，但不得寫入針對社會的著述和文章、面對朝廷和官府的對策，面對祖宗和後世的碑碣。而俗體進入不登大雅之堂的市井小說則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干祿字書》是提供給科舉考生的漢字規範讀本，類似今天的高考試題標準答案，對於官方文牘、朝野文人的規範作用絕對大大超過那些字書中的俗字和小說刻本中的俗字，則是不言而喻的。

8 · 關於「簡化字不美觀」的說法

在陳述簡化字的弊端時，不少人談到簡化字常常批評簡化字不如繁體字好看。美觀涉及美學趣味和審美價值的問題。文學

作品中經常出現各民族作者歌頌本族母語是最美好最悅耳的語言。這些都是一定的民族情緒的文藝性表達，而不是嚴謹的科學鑒定。作為科學的語言學不能承認某一種語言是美好的語言，另一種語言是不美好的語言。語言只有豐富、嚴謹、表現力強和不夠豐富、不夠嚴謹和表現力不足的區別。文字也應當作類似的判斷。簡化字並沒有完全脫離漢字的基本筆劃和基本架構，如果說筆劃少，簡單，就難看了，那麼傳統漢字中也有筆劃很少的漢字，如工、戶、人、口、入、小、八，至今沒有簡化，又如何解釋？因此原則上不應支持所謂「因為筆畫少了，所以簡化字不好看」的看法。

只有部分來源於草書的簡體字在筆劃上明明是草書的筆觸，偏偏寫成楷書或印刷體，跟其他楷體字不夠協調。另外，本來對稱是篆書和隸書的重大特點，楷書也繼承了它們很多對稱的結構。改用簡化字書寫，許多對稱部分被草書筆畫所取代，喪失了原先的對稱、協調之美，例如東东、車车、門門、樂樂、華華等等，作為草書筆畫，還有躍動飛舞之美，可是又硬作楷書筆畫呈現，當然是大煞風景。但是2001年的《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書法不受簡化規範的約束，那麼這類問題應該已經不再突出。

簡化字的弊端主要不在於主觀的審美感覺。關鍵還是簡化字對於識字、閱讀和電腦文字處理都沒有好處，反而造成諸多混亂，喪失許多古典文化信息，妨礙兩岸三地的溝通、妨礙子孫後代接觸古典文化。

第五章 漢字簡化與共產黨、與反右派運動的關係

1 · 毛澤東等人的歷史罪責

中國共產黨人並不是漢字簡化的始作俑者，但是共產黨是革命時期簡化字的大力提倡者，建國後更是運用政治暴力強制推行簡化字的始作俑者。左翼作家魯迅、茅盾和共產黨人瞿秋白、吳玉章等人，尤其是魯迅和瞿秋白為漢字簡化作了極端而過激的輿論鋪墊，堅持廢除漢字，改用拉丁拼音，甚至罵出了「漢字是最骯髒、最齷齪的茅坑」（瞿秋白）、「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魯迅）這樣狠毒、卑污的語言。在革命根據地和1956年以後的中國大陸，真正實行漢字簡化的完全是共產黨。國民黨兩度（1935年和1952年）動議，終因遭到內部抵制而擱淺，第三次1980年沒有大張旗鼓的宣傳，卻直接公佈了《標準行書範本》，繼承了大量行草簡字作為行書標準書體。中國大陸廢除傳統官方正體，將簡化漢字升格為官方字體造成今日局面的歷史責任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

是要由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來承擔的。

當我針對漢字簡化問題進行思考並發表看法的時候，一些好心的朋友建議我「就事論事」，「沒必要把文字改革的問題跟政治問題牽扯到一起」。我能理解他們的善意，但是歷史不容違背。歷史上發生了政治暴力干預文字改革的事實，今天不可以清算一方面，卻規避另一方面。

文字改革並不是錯誤。世界上進行文字改革的國家所在多有，俄羅斯、土耳其、日本、朝鮮、越南都進行過文字改革，德國的文字改革曠日持久爭議至今還沒有結束。英國的英文拼寫改革組織是一個民間常設機構。我們今天要清算的，第一是中國共產黨人將改革作為事務工作限定在短期內立刻實行，1955年10月文字改革委員會和教育部舉行會議，會議報告獲得中共中央批准，1956年2月1日首批簡化字公佈，全國推廣，僅三個月時間。（對比國民黨政府1934年8月21日公佈簡化字表，要求全國小學試行，到1935年2月原應全面執行之日宣佈停止實施，歷時半年。）期間討論極不充分，未經慎重試點和嚴肅聽取批評意見。第二就是他們將文字改革納入政治運動強制推行，導致任何不同意見者均成為政治整肅對象，徹底堵塞了言路。當我將因漢字簡化提出不同意見被打成人民的敵人（指右派分子）的歷史情況告訴聯邦德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主任秘書封克先生時，這位語言學博士怎麼也想像不出，文字改革的爭議竟也能成為整肅和勞改的起因。

2 · 反民主的漢字改革方式

任何社會改革總要有一個試點時期。可是漢字簡化從決議到執行只有三個月。全國報刊一律簡化，沒有商量餘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就開始醞釀建立文字改革協會，（後來改名為文字改革委員會，即今語文工作委員會，直屬中央人民政府即國務院），但是並非在人民當中廣泛聽取意見，而且主要商議的是漢字拉丁化的問題。共產黨在過去的革命年代所有的文字改革經驗，只是在根據地農民和軍隊文盲中掃盲的嘗試，主要是所謂新文字，即拉丁化拼音認字，在蘇俄遠東華工中的嘗試則完全是拼音化實驗，都存在很大的片面性。真正在全國各階層人民

中，在各級學校中推廣簡化漢字，本應謹慎試點，反復評議，然後才能決定是否逐步深入。

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召開，會後中共中央發出了指示：

中共中央關於文字改革工作問題的指示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黨組，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現將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黨組和教育部黨組《關於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的情況 and 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請示報告》發給你們。這個報告中關於我國文字改革的方針、關於漢字簡化的原則和步驟、關於大力推廣普通話和積極準備文字拼音化的各項措施的意見，中央認為都是正確的。希望各地和各有關部門在黨內外加以宣傳，並研究執行。除《人民日報》已經中央同意自1956年1月1日起改為橫排外，關於這個報告中提出的其他事項，中央決定如下：

（一）漢字簡化方案即由國務院公佈；其中的第一批230個簡化漢字自公佈的日子起正式推行；其餘的285個簡化漢字和54個簡化偏旁即可陸續分批試用，同時交由各省市政協討論，在兩個月之內將討論結果報告國務院，以便根據多數意見對其中個別的字作一些必要的修正。

（二）在全國漢族人民中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是加強我國在政治、經濟、國防、文化各方面的統一和發展的重要措施，是一個迫切的政治任務。教育部決定自1956年秋季起在全國中小學和師範學校開始教學普通話。軍委總政治部亦已指示全軍推廣普通話。各地和各有關部門黨的組織必須重視這個工作，加強對這個工作的領導和檢查，使它能夠迅速地順

暢地開展。中央同意成立中央一級的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和這個委員會的名單，各省、市、自治區也應及早成立同樣的機構（不設編制，其日常工作由教育廳、局負責）來號召和推動這個工作。

報告中提出的有關推廣普通話的其他建議，由國務院指示有關部門切實執行。

（三）為了推廣普通話和輔助掃盲教育中的漢字注音，漢語拼音方案應該早日確定。中央認為，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比較適宜。文字改革委員會現已擬定草案，提交全國政協和各省市自治區政協討論，同時在報刊發表，徵求各方意見，以便爭取在今年4月修正確定，並在今年5月1日前後公佈。

（四）為了在黨內黨外引起對文字改革應有的重視，為了加強和改進關於文字改革的宣傳工作，並消除一部分人的懷疑和顧慮，中央決定在最近期間發佈一個文字改革宣傳提綱。這個提綱的草稿由中央宣傳部會同文改會擬定後送中央審核。

本件和附件可在黨刊發表。

中央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原件刊印）

〔附件〕

關於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的情況 and 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請示報告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央：

教育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聯合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來自全國28個省、

市、自治區和中央一級有關機關、團體和部隊的代表207人。出席會議的代表中，大約三分之二是中小學、師範學校和工農業餘學校的語文教師，其餘是語言學家、文字學家、語文工作者和教育行政工作者。會議第一天開幕時，由陳毅副總理作了關於目前時局的報告，吳玉章同志作了《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的報告，閉幕時，又由胡喬木同志作了總結性的發言。吳玉章同志在報告中闡明瞭中央和毛主席關於文字改革的方針，即漢字必須改革，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這一方針得到到會代表的一致擁護。在這一正確方針的指導之下，會議著重討論了簡化漢字和推廣普通話這兩個問題，並一致通過了《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草案》和8項決議。這次會議是成功的，到會的人都認為收穫很大。現在把會議的經過情況和我們準備進行的工作報告如下：

一、關於漢字簡化

關於漢字簡化問題，由文改會漢字整理部主任葉恭綽在會上作了《關於漢字簡化工作的報告》。這次會議關於漢字簡化有以下三點收穫：

首先，這次會議使到會代表進一步認識了漢字簡化的好處，認識了漢字簡化是符合廣大人民的迫切要求的。在分組討論和大會發言中，很多代表反映，簡化漢字普遍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河南省實驗小學教師胡逸生說，當他在講臺上向學生介紹簡化漢字，舉出「艷」字今後簡化為「艷」字時，孩子們馬上熱烈鼓掌歡呼。天津代表陳淑華說，一個女工說「盡辦邊」這三個字她再也記不住，這回改成「尽办边」一下就記住了。部隊代表說，根據個別軍事學校的實驗，學員寫簡字比寫繁字大約可節省

三分之一的時間。有些代表過去懷疑漢字簡化的作用，經過這次會議改正了這種看法。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長傅彬然說，他過去以為漢字簡化好處不大，現在看來，是把它的作用估計低了。

其次，這次會議一致接受了文改會提出的漢字簡化的方針步驟，即選定字形要儘量採用群眾中已經通行的簡字，而推行步驟要採取逐步分批實施的方式。到會代表中，只有中山大學教授容庚主張一次系統全部徹底簡化，武漢文史館館員饒校文等對採取「俗字」思想上有些抵觸。由於他們的主張不切實際，絕大多數代表不表贊同，最後他們同意了文改會的方針。

最後，會議對文改會提出的《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進行了分組逐字討論。因為這個方案幾年來經過很多次修改，全國各方面廣泛討論，並經過國務院審訂委員會的一再修正，比較成熟，所以討論結果意見基本上一致，只對其中19個簡化漢字作了修改，並取消了其中一個簡化偏旁，此外全部通過。對於《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草案》，會議建議新聞出版單位立即實施。

在會議閉幕以後，對於簡化和整理漢字，我們正在進行以下工作。

首先是準備簡化漢字的分批推行。《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經會議通過後由文改會加以整理，共計簡化漢字517個，簡化偏旁54個。推行辦法擬從1956年1月起每4個月推行一批，第一批推行230個字（包括1955年報刊兩次試用的140個字在內），第二批（1956年5月）推行200餘字，第三批推行其餘的簡化字（100個字左右）和一部分簡化偏旁。依此分批推行，到1957年夏季，可在書報上全部推行。文改會已經邀集新聞、出版、印刷界開了會，除小學教科書和大部頭著作，因為不便分批，需要盡可能一次採用外，其餘按照這樣的辦法分批推行，大家都同意，分批製造銅模也不會有困難。

到會代表和新聞出版界一般都希望漢字簡化方案由政府公佈，以便於推行，並減少社會上的許多懷疑和教學、使用上的混亂。我們建議，在中央審查通過後，由國務院在1956年年初明令公佈並規定分批推行。至於異體字整理表已由新聞出版界同意採用，擬由文化部會同文改會發佈給全國出版機關實施，不必再由國務院公佈了。

其次是漢字簡化工作的繼續進行。經過這次簡化以後，在日常應用的6,000多個漢字中，已有1,700多字得到簡化，估計還可以再簡化1,000多字，即6,000多字中有半數乃至過半數可能簡化。文改會正在繼續廣泛搜集材料，並擬公開徵求群眾意見，準備一、二年內提出第二次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

文改會並準備繼續整理異體字，並擬訂《通用漢字表》，以進一步減少漢字字數。同時會同文化部研究刻制漢字標準銅模，使我國鉛字字體逐步做到有統一的規格，並提高印刷質量。具體辦法正在研究中。

（其餘關於關於推廣普通話和拼音方案和橫排橫寫等問題，從略）

以上是否有當，請中央指示。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黨組

教 育 部 黨 組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原件刊印）

讀完這份文件，人們可能會有一種似是而非的感覺。文件中有議論，有正反兩面意見，與會人士來自全國各地、遍及黨政軍各行各業。只有曾經在中國大陸長期生活過的人們才能從中感覺出共產黨人操縱會議，製造假象，強行貫徹既定決策的慣用方

式。

首先，文件認為：「這個報告中關於我國文字改革的方針、關於漢字簡化的原則和步驟、關於大力推廣普通話和積極準備文字拼音化的各項措施的意見，中央認為都是正確的。希望各地和各有關部門在黨內外加以宣傳，並研究執行。」「吳玉章同志在報告中闡明了中央和毛主席關於文字改革的方針，即漢字必須改革，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漢字簡化實際上是拼音化的準備工作和權宜之計。然後，中央文件還宣佈，第一批簡化字就在公佈之日，即三天之後（二月一日）全國推行。文件顯示，對於漢字要不要簡化，漢字應不應該拼音化，並沒有經過討論，甚至沒有聽取過反對意見。到會的207名代表，沒有一名是真正的持反對意見的專家。發言都是贊同的意見。「到會代表中，只有中山大學教授容庚主張一次系統全部徹底簡化，武漢文史館館員饒校文等對採取『俗』字思想上有些抵觸。由於他們的主張不切實際，絕大多數代表不表贊同，最後他們同意了文改會的方針」。這是典型的共產黨操作手法。會議主持單位在會議之前早就把與會代表的發言傾向都安排好了，然後開會，按角色安排妥當的代表各自按領導的意圖表演，看上去好像有一點爭議，然後一致同意，最後宣告圓滿成功。容庚教授和饒校文館員，一個代表激進主張，一個代表保守主張，可能大會主辦人已經掌握材料，料定他們不會有強烈反應，很快能夠順從，或者乾脆就是早已安排他們先表演不同意見，再表演心悅誠服。如果不是這樣，大會絕不會邀請他們出席。然後大會的文件就可以交黨報黨刊發表轉載，以便「加強和改進關於文字改革的宣傳工作，並消除一部分人的懷疑和顧慮」。這類工作方式就是中國黨政機關最典型的、數十年一貫制

的運作模式。

關於河南實驗小學的小朋友鼓掌歡呼簡化字的事例也包含著極大的片面性。美國初等教育中也曾經引入過兒童電子計算器，受到小朋友的熱烈歡迎。可是很快就造成了兒童心算能力的退化。美籍華人科學家楊振寧曾經對周恩來說過，引導美國學童依賴計算器的人應當判處死刑。如前所述，中國兒童在啟蒙時期對漢字固有形態作適當的認讀抄默，是認識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素質訓練。

3 · 1957 年鳴放中的文字改革問題

在德國的留學生報紙上展開簡化字和繁體字問題爭論的時候，許多年輕的中國留學生甚至不相信曾經有人因為對簡化字提出不同意見竟被打成右派。中國現代歷史上被掩蓋的史實太多了。這一段歷史必須源源本本地告訴我們的子孫後代。

漢字簡化是1955年1月提出草案，10月文改會通過，1956年2月1日遵中共中央之令全國推行。以後又公佈第二、第三方案。從此時開始到1957年初夏之交，大約一年半時間，正是試點反饋，聽取簡化字意見的時機。恰好爆發了慘烈的陽謀迫害事件——反右派鬥爭。1957年的2月27日，北京還是春寒料峭的時候，毛澤東召開了一次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他在會上作了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矛盾問題的報告》，向被擴大參會的一大批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坦陳心跡，表示共產黨要實行整風，推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大政方針，尤其令人鼓舞的是，他鄭重其事地宣佈，在「鳴放」過程中，要實行言者無罪，聞者足誠的政策。因為在這之前，抓辮子、打棍子已經成了政治生活的常態，反胡風運動已經為把思想言論問題轉變為政治問題樹立了極為惡劣的榜樣。中國知識分子已經積累了非常強烈

的不滿，希望共產黨改弦易轍，棄舊圖新。毛澤東和黨中央信誓旦旦言猶在耳，卻突然變臉，將所有提意見的人士，包括民主黨派人士、教授、學者、大批教師、職員、大學生和部分共產黨的幹部，大約五十五萬餘人（官方數字，實際上高達一百零二萬人）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降職、降薪、開除公職、勞教、勞改，一部分不服批鬥的右派分子被升級為反革命分子判刑，甚至處死。牽連家屬子女達上千萬人口。至1979年才僅僅從政治上予以「改正」。

民族文化的重大改革事宜，恰好遇到了這樣一場如此陰謀設陷的鬥爭，實屬民族的不幸。從漢字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一部分的角度來看，更是人類文化的一場劫難。以下引證《人民日報》1957年5月22日刊登的北京民主黨派座談會談話記錄，許多文字改革掃盲問題的批評言論都有反映。知識分子心中有些怨氣，但是批評還是相當溫和的。

5月21日

第一個發言是章伯鈞。他說，近二十多天來，全國各地都在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來是很正常的。這證明



章伯鈞先生。

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他舉出引起了很多討論的學校中黨委治校問題為例，他說就他接觸到的朋友來說，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認為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缺少的，黨是可以從政治上領導科學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這種制度有缺點，發生了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缺點。因此大家認為應該更多地聽取教

授和學生的意見。

章伯鈞還提出，現在是中上層人物發表意見，今後應該徹底地廣開言路，希望這次整風能聽一聽基層人民的意見。他說，今後有關國家的政策、方針性的重大問題，可以多聽一聽各方面的意見。他提到過去一些工作中的失誤，如掃盲運動、五年一貫制、推廣雙輪雙鉞犁等問題，如果事先經過國務院的部長們，根據材料，多方面地進行討論，或經過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專家的討論，就會減少損失。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的。再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卻只由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這樣，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黨內的一些同志，大有問題，相當混亂。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沒有意見，我不能反對；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黨內外展開討論，應該多從學術、政治、道理上進行討論。

章伯鈞說，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在這一天的座談會上，章伯鈞還說：大多數教授都反映說會多，這要看什麼樣的會。假使是千篇一律的報告會，形式主義的會，最好是少開一點。比如國務院開會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這樣的形式主義的會，是可以少開的，但如果能夠提出問題，拿出材料認真討論，有豐富的內容，能夠發揮各個人的見解，這種會大家不會感到多的。章伯鈞的這個意見後來也遭到了集中的批判。

章伯鈞說完，邵力子立刻起來同他辯論。他說，我是參加了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的，伯鈞先生說文字改革只是幾個人關起門來稿的，這樣說是太冤枉了。事實上，每個方案提出時，文字改革委員會都徵求了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全國政協也討論過兩三次，伯鈞先生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身份，提出這樣的意見就相當嚴重了。



羅隆基先生。

羅隆基接著發言。他針對邵力子的發言補充說明了一些情況。他說，文字改革問題，是討論過的。當時討論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討論中國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說到漢字簡化，也沒有討論漢字簡化的方向問題，拿出來討論的是簡化字。而且拿出來討論時，說是黨已經決定了，這樣，如果展開討論，就會說是反對黨的政策，當時很多人是不敢講話的。

章伯鈞接著說，邵力子先生對我的批評是對的。以前有些人說我是共產黨的尾巴，百依百順。但是，將漢字改為拼音文字，我是懷疑的，政協討論時，陳毅叫我講話，我不講話。但是大家贊成通過，我也不反對。

羅隆基說，毛主席是贊成拼音化的，這樣讓大家討論就很難發表意見了。

邵力子反問說，既然你有意見，當時為什麼不講？現在事情都推到共產黨身上，太冤枉了。

章伯鈞回答說，今天就講了嘛。

這天的會上，民主促進會副主席許廣平和林漢達發了言。許廣平說，當然，民主黨派需要有共產黨的領導，但是如果民主

黨派做的事情于人民有利，不違犯政策，就應該發揮民主黨派的創造性獨立性。如過去我們民進到基層去發動群眾和平簽名，常常碰到幹部說：黨還沒有佈置，慢點做。我們也只好收起來不做了。我以為像這類不違犯政策的事情，可以讓民主黨派多做一些。許廣平還談到，中小學提拔幹部偏重於黨團員，有些甚至是清一色的黨員，有些教書教不了，才提升為幹部。老教師不管經驗多麼豐富，也不能提拔。有些教師教學成績不好，批准入黨後馬上可以被提拔。

擔任教育部副部長的林漢達談到有職有權問題。他說，我不是講我個人有職無權，而是說整個教育部都是有職無權。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發通知下去，不靈，加上國務院，還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聯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門有什麼用？肯定你有成績，就有成績，說有偏差，就有偏差。比如1952年把祁建華一捧捧到天上，好像倉頡第二，孔夫子第二，第二年就打下去了，統統否定了。這裏要作一點注釋：祁建華是部隊的文化教員，利用注音符號作為識字教學的工具，當時報紙上說他創造了速成識字法，大力推廣。

林漢達還談到掃除文盲的工作。他說，1954～1955年做得比較好，1956年在冒進。冒進主要表現在規劃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務說成三年五年，實際上是紙上談兵。到春耕的時候掃盲工作本來已是在走下坡路了，《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篇社論，糾正盲目冒進。《人民日報》社論哪里來的？教育部的部長都不知道。誰能夠指揮教育部呢？說1956年掃除文盲900萬人，其實這是1954～1955年的成績，1956年的要到1958年才能看到成績。（後面不涉及文字改革和掃盲，從略）

（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

4 · 右派言論為歷史留下了寶貴的見證

這次發言後不久，上述章伯鈞、羅隆基和林漢達等人都被



章伯鈞先生在反右批判會上。

打成右派分子。章羅兩位還被誣陷是「章羅反黨聯盟」。

歷史證明，毛澤東指責的章羅聯盟並不存在。但是在這一天章羅兩位配合默契，竟將這些情況如實說出，經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白紙黑字地記錄下來，真是中國文化史和文字改革史上不幸中之大幸。他們批評漢字改革沒有聽取反面意見，沒有討論過拼音方向，沒有討論過漢字簡化方向，當年成為他們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帽子的「罪證」，今天卻成了文字改革討論不充分、決策不民主的鐵證。打成右派以後，他倆被革除（交通部和森林工業部）部長職務，居家賦閑，實際上終身被剝奪了政治權利。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在政協全國委員上的報

告《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有這麼幾句話：「在整風運動初期，一些右派分子對文字改革進行了惡毒的攻擊，說漢字簡化搞糟了，群眾都反對，要國務院收回成命，把「漢字簡化方案」撤回。右派分子的攻擊文字改革，自然是別有用心，他們是要借此向黨和政府進攻，但是另外他們確實也是反對文字改革。漢字簡化是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對。我們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首先應該把漢字簡化這項工作肯定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下來。」

周恩來的說法剛好跟事實相反。恰恰是一些知識分子對漢字簡化的方向和必要性提出了質疑，結果竟被無中生有地認為是政治問題，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1958年2月3日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作關於文字改革的報告時，同樣罔顧事實，顛倒黑白地說：「一些右派分子利用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對文字改革進行了惡毒的攻擊」、「簡化漢

字是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對……」談到漢字拼音化問題時，吳玉章直接點名說「右派分子章伯鈞」的鳴放講話「自然是別有用心的污蔑」。（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2月4日）把不同意見說成是惡毒攻擊，說「簡化漢字符合人民利益」，有不同意見，就不符合人民利益？這是什麼邏輯？有不同意見就是



國務院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

「別有用心」，就是「污蔑」，完全是強詞奪理。吳玉章是共產黨內年齡最老的知識幹部之一。1948年5月13日任解放區華北大學校長時，提倡「主要應學習毛澤東主義」的校訓，並故意將此意見發給毛澤東本人，被毛澤東拒絕，（斯大林尚還健在，毛深知妄稱主義是十分危險的）。吳玉章當時已經年屆古稀，絕非年少熱情衝動，在此一年前中共七大已經由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並形成決議，吳玉章的這種言行除了拍馬奉迎恐怕很難有其他解釋。根據史學家李新的回憶文章透露，李新和吳玉章在反右運動初期已經獲知毛澤東黨中央將從鳴放言論中抓右派分子的內部消息，李新求助之後，吳玉章設計讓李新安然過關，傳為佳話。另外，吳玉章也曾對女青年大右派林希翎有所照顧，仿佛良心未泯。但是在對待斗膽直接非議他所主管之文改會的羅、章兩氏，吳則完全老於政治世故，毫無惻隱之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章羅兩位是中國最大的右派分子，至今沒有獲得「改正」。他們被打成右派當然遠不止是因為漢字簡化和拼音。但是反對漢字簡化也是諸罪並罰中的一項小罪。章伯鈞的右派罪名中，「反對文字改革」是他的第五項罪名。（章詒和：《往事並

不如煙》第379頁）。另一位名人就是新月派詩人、考古研究所文字學研究員陳夢家。他的「反對文字改革罪名」是提了「文字改革要慎重」的意見。他的具體意見是說：「文字是需要簡單的，但不要混淆。這些簡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簡化後有些混淆。」（轉引自《南方都市報》2006年3月20日文章《簡化字改革五十年》）你敢要求黨「慎重」？你的意思是說黨不夠慎重？那不是反黨是什麼？文革中他作為右派不堪折磨自殺身死，夫人翻譯家趙蘿蕤精神失常。今天回看他當年所提的混淆問題，可以說正好擊中了簡化漢字的要害，真不愧為文字學專家。

另外當時的國務院文字改革委員會幹部李濤也因對文字改革中過左的做法發表了不同意見，被打成右派。（《昭雪漢字百年冤案·後記》）；上海青年國畫藝術家蕭小塵，因為他寫過大字報，批評「漢字簡化是粗暴的行政干預，摧殘了祖國文化」，打成右派後送新疆勞改，從此人間蒸



新月派詩人，文字學家，
陳夢家。

發，杳無音訊。（香港《開放雜誌》2006年6月號第95頁）。其餘各地基層的中小學教師、大學講師、教授、機關幹部到底有多少人因此（或多罪並罰之一）被打成右派今天已無法統計。因為他們不是知名人士，所以對於他們的處分，遠比章羅兩位嚴酷得多。有的人被判刑勞改，勞教，有的人被送往邊疆勞改營，凍死餓死，從此再沒有回來。

反右運動研究者（受害者）朱正指出，反右以後，所有提出不同意見的人都遭到如此的下場，於是不再發表意見。然後，

大躍進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降臨了。（《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

漢字簡化也是如此。關於漢字簡化的批評意見已經不再出現。直到文革時期1973年，《光明日報》的文字改革專欄文章甚至宣佈，反對漢字簡化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國民黨推行簡化字，遇到那麼大的阻力，兩次令出而不行；同樣是面對中國知識分子，而且傳統文化的主幹就在中國大陸，為什麼在中國大陸竟然幾乎沒有什麼抵制的聲音呢？原因就是發生了從整風突然轉化而來的反右派運動。反右荼毒猛烈異常，知識分子人人自危，凡「右派言論」，例如批評黨天下、肅反、向蘇聯一邊倒、統購統銷等等，絕對都要打成右派，如此明正典刑，誰不刻骨銘心？1958年1月10日和2月4日，全國各地報刊刊登了吳玉章在人大關於文字改革的報告，（按中國黨政宣傳慣例，《人民日報》的主要新聞，各地報紙務必轉載），周恩來批判右派分子惡毒攻擊文字改革，吳玉章直接點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章伯鈞」，等於明確宣示，凡是對文字改革提出不同意見的，就是右派分子。面對右派分子的可悲下場，（勞改、勞教、開除公職、監督勞動），誰還敢對文字改革提什麼不同意見？於是中國大陸的簡化運動從此就再也沒有遇到任何比較重大的阻礙，一路暢行二十年。這場運動將一代知識分子中比較敢於發表意見的諤諤之士幾乎一網打盡，紛紛送入監獄、勞改勞教場所，或者下放農村、監督改造。面對如此的暴力處罰，人民甚至沒有思考的餘地，唯一的選擇就是接受簡化漢字。不正視這段歷史，卻想當然地認為「人民選擇了簡化字」，是不符合歷史情況的。1962年9月6日，文改會決定成立漢字簡化方案修訂小組。採取座談、通信、訪問等方式徵求意見。事後幾乎沒有看到任何實質

的修訂。人們對右派分子的結局都記憶猶新，座談記錄、私人信件、訪談筆錄隨時都可能成為反黨言論的罪證，誰會願意再去重蹈前車之覆轍？直到1977年，毛澤東、周恩來都已去世，中國黨政當局再次未經討論推出簡化字第二表，人民終於感到再簡化下去實在太荒謬、太混亂了，開始埋怨和抵制，終於令中共中央於九年之後，1986年正式取消了「二簡」。

總之，1956年漢字簡化運動為什麼沒有遇到國民黨當局所遇到的嚴重阻力，原因就在於，這場運動的背後有一場隱性卻非常恐怖的暴力，就是政治的專制，具體表現就是慘烈的反右派鬥爭。

第六章 簡化與掃盲

中國至今仍然是世界文盲大國。2006年9月新華社報道了中國十五歲以上的文盲共有1.14億人。

關於簡化漢字的各類文章中，簡化漢字以利掃盲的說法簡直是俯拾皆是。這類宣傳的主旨是說，中國共產黨簡化漢字用心良苦，就是為了掃除文盲，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但是，一個歷史的隱秘情況是，中國共產黨人既是他們所宣揚的堅持掃盲運動的推動者，又是共產黨執政以來的文盲現象的罪魁禍首。而鼓噪多年的簡化漢字以利掃盲的說法則從未得到實踐和理論的證實。漢字簡化得不償失，功過無法相抵。

1．歷史上的文盲現象

古代中國的文盲現象未必如共產黨人所宣揚的那樣嚴重。中國社會的儒家傳統歷來尊師重道，宋代以來不少地方甚至長期保有氏族公田，以田產獲利專門供給因疾病、災害造成的孤兒或清寒家庭子弟入學。錢穆、錢偉長的故鄉無錫七房橋村就是這樣的典型。錢穆、錢偉長叔侄就是部分依靠錢氏「義莊」的接濟完成學業的。歷史上一般農家子弟，只要不是一貧如洗的赤貧，總是要送去塾館讀幾年書。殷實一點的家族還會延請塾師入室課讀。女性後代文盲比較普遍，男子好歹都會一些讀寫和珠算。比如歷代農民起義的頭領，陳勝能說出「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這樣的話來，應該不是完全沒有啟蒙的文盲。黃巢竟能寫出「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也絕不是文盲。李自成出生在陝西米脂縣離縣治兩百里外的荒僻山村，家境貧寒，竟也曾讀過詩書，並非文盲，兵敗之時，還與士卒一起「讀兵書，說得失」。朱元璋也出身寒微，卻

能識文斷字，登基後好讀儒家經典，還擅自刪削，肆意點評，分明不是文盲。李秀成出身貧寒，他在繫獄中寫下的《李自成自述》雖然錯字連篇，畢竟也不能算文盲。這麼多農民造反的領袖都不是文盲，難道僅僅是巧合嗎？長期戰亂，社會動盪，當然會造成文盲充斥；一旦征戰平息，社會安定，尊師重道的文化傳統，「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俗習慣，都會推動農家子弟嚮往文化。岳母刺字、王冕學畫，范仲淹發奮讀書等等傳統故事都說明貧寒家庭子弟仍有一定的機會掌握文化知識，陞入上流社會。即使不能入仕，識文斷字，應付日用還是可能的。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文盲現象，應該是清朝的腐敗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的惡果。國勢羸弱，列強進犯，割地賠款，民不聊生。最為典型的是馬關條約賠償日本國軍費白銀二億兩。日本天皇詔令此項鉅款不得擅用，全部用於日本掃除文盲。各地招收優等生入師範，邊遠山區以優渥待遇接納優秀師範生為教師。數年之後，日本徹底告別了文盲現象。而我國人民啼饑號寒，白丁遍地。辛亥革命建立了中華民國，可是軍閥混戰，蘇俄又插手中國，建立共產黨挑動武裝暴動，建立武裝割據地盤；日寇進犯東北，成立偽滿政權，蠶食華北，終於全面入侵，扶植汪偽傀儡。中國雖國貧民弱，仍不得不奮起抗戰。如此戰亂頻仍，又逢天災頻仍，怎能不一窮二白？明明是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的錯失，歸根結底是制度的落後和思想的落後，一大批知識分子卻將文盲現象的責任推給了傳統的漢字。

2・共產黨是邊緣人精英加文盲的隊伍

中國共產黨創黨初期，「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都是當時中國著名的左派教授。李大釗不久被殺害；陳獨秀也是著名文壇領袖，而且是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早認清無產階級專政殘忍

暴力危害性的人。可惜他很快就被排擠出黨，潦倒一生。陳公博、李達、王燼美、毛澤東這些創黨幹部都是當時思想活躍，對社會不滿的青年知識分子，特別是毛澤東，沒有固定職業，沒有專業技能，恃才傲物，不滿現實，是典型的社會邊緣人（余英時論毛澤東語）。劉少奇也曾感慨地說，反正個人問題解決不了，於是投身革命運動。也是比較典型的社會邊緣人。共產黨接納了留法勤工儉學的知識分子，周恩來、鄧小平、蔡暢、徐特立等人，共產黨還接納了蘇聯特意為中國革命培養的幹部，他們是在蘇聯東方大學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格勒炮兵學院等院校接受幹部培訓的學員，例如瞿秋白、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楊尚昆、顧順章等人。他們在海外學習的不是專業知識，而是革命理論，不適合當時的任何社會職業，只能從事反政府抗爭。9・18事變以後，共產黨發動12・9運動，吸引了大批知識青年前往延安。蔣南翔、韋君宜、溫濟澤、何家棟等人都是這樣的青年。其中多半都是大學生、高中生，但是很多人都是中途輟學，沒有學位，沒有文憑，沒有專業技能，充滿革命理想的人。這幾部分知識幹部組成了共產黨的高層和中層領導機構。共產黨的這支幹部隊伍跟國民黨避走臺灣，重組政府的幹部隊伍相比，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國民黨的幹部較多地擁有海內外完整的學歷，持有正式的文憑，具備專業的知識技能。例如李登輝、李煥、李國鼎、辜振甫、梁肅戎等等。國共兩黨軍隊的基層兵勇士卒的文盲現象彼此相仿佛。但是幹部隊伍除了學歷陣容的不同以外，共產黨還有一部分全文盲和半文盲高級幹部，如王震、譚震林、許世友、陳再道等等。從這類將領到基層普遍都是文盲的下層指戰員，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共產黨人文盲文化，以革命大老粗為榮的文化。在這種對比中今天幾乎可以看得出1950年代後兩岸經濟文化發展的大致走向。如果說在延安時期文盲現象造成的缺憾還

不太明顯；那麼當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全面行政的時候，幹部隊伍的文盲現象就更加突出起來。劉少奇公開承認：「中國共產黨的絕大多數黨員（他們來自最貧窮的農民階層）不識字，這是搞好黨員學習的嚴重障礙。就自己的階級出身來說，中國共產黨黨員中70-80%為最貧窮的農民，10%為工人，10-20%為知識分子和其他階級出身的人。」（摘自《蘇聯在華專家歷史檔案資料·1949年10月25日 劉少奇同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的談話》）

「中共在國家管理方面的主要難題也是幹部文化水平低下。根據1950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陸定一接見蘇聯駐華代辦謝巴耶夫時通報的材料，當時華北有150萬黨員，其中130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區委以上領導人員中，近50% 沒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準備在2-3年的時間在黨的基層幹部中掃除文盲，用5年時間在一般黨員中掃除文盲。依靠這樣一支幹部隊伍當然是無法對偌大中國進行有效管理的」。軍隊的文盲情況也是嚴重的：「據統計，1952年中國（共產黨的）軍隊128萬排以上的軍官，達到大學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占12%，還有27，21%的人是文盲」。（沈志華：《對在華蘇聯專家問題的歷史考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對於幹部隊伍教育程度的先天不足，共產黨並沒有懈怠，而是採取了許多措施。部分中低等教育程度的幹部「調幹」深造，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各大學、中專學校都有許多調幹生，年齡稍大，有黨齡和軍齡，有的還享受工資待遇。還有許多工農速成中學專門培養工農或幹部家庭出身的、能力較強的青年，補習文化，快速完成初等和中等教育。這些調幹生和速成生，要麼本來就有一定的文化基礎，要麼還很年輕，多半能成長為黨的文化幹部。真正成問題的是大批文盲半文盲幹部，此時他們已經度過了青年時代，即語文學習的關鍵期。作為革命功臣，他們必須給以安排工

作，而且各地方、各部門也正需要幹部。於是大批以大老粗自居，不肯下苦功脫盲，或者即使下功夫，也未必能脫盲的軍人、地下黨幹部進入了各級黨政軍領導崗位。即使是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許多基層單位的領導幹部文化程度也不高。有的小學校長兼黨支書僅有小學畢業程度，有不少公私合營的小廠，黨支書就是半文盲；更遑論內地和其他邊遠省區的縣鄉各級領導職務上的幹部了。如果1949年他們三十歲左右，那麼他們一直要到1979年左右才進入離休年齡。從行伍到行政，生存狀態的突然變化，行政權力和文化水平，社會地位和談吐風貌，嚴重矛盾的現象非常普遍。文革時期，江蘇省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部隊領導人在同意處決南京文工團員李香芝的批示中把「立即」執行寫成「力級」執行。（《女演員因大字報反對陪中央首長跳舞被處決》原載《文史精華》2005年第七期）這樣常用的詞語居然也會寫錯，說明閱讀黨政文件、作批示和紀錄，對於他們來說簡直是一種折磨；即使他們達到級別，配備秘書，秘書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為之代勞。這樣產生的矛盾必定反映到中央高層。從五十年代幾乎每年都有若干篇人民日報社論以掃盲為題目，就可以看出黨內對文盲現象的憂慮心情。從實質上說，工人農民大字不識幾個，影響不了太多的問題。可是各級幹部魚魯亥豕，就會嚴重影響黨政意志的貫徹和反饋。幹部隊伍的文盲現象導致全黨文化心理上的焦慮狀態，乃至文化心理上的躁狂反應，折射到文化政策上，就是盼望有一種簡單神速的文化工具，可以較迅速地改變全黨的文盲窘迫狀況。於是不論從基層還是從高層都產生了倉卒推行文字改革的想法，迅速準備拼音替代漢字，並把簡化當作權宜之計。

由於沒有文化也可以出任領導職務，沒有文化也可以上講臺批判專家學者，中國社會出現了舉世罕見的文盲自豪現象。直

到文革結束為止，「我們大老粗如何如何……」都是理直氣壯的革命豪言壯語，與毛澤東、張春橋所宣傳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最無知識」、「知識越多越反動」等說法相映成趣。掃盲最需要虛心學習，努力用功。社會上形成這類找捷徑，圖方便的想法，沒文化照樣搞革命，照樣當領導的想法，實際上是給掃盲製造了社會心理的阻力。

3・政治運動造成了更加嚴重的文盲現象

中央電視臺2006年9月25日《探索・發現》十・一特別節目《新中國的記憶》裏講了一個故事：「1949年初秋，一份緊急的密信送到黑龍江寧安縣某村長手上。村長不識字，連夜挨家敲門找人來讀！終於，村長找到了村裏唯一能識字的、外號叫「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原來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讓村長監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這個真實故事的背後，是一個嚴峻的現實：全國剛解放時，文盲和半文盲的數量占總人口的80%。」

如果換個角度想想，這個真實的故事恐怕說明了一個更加嚴酷的歷史現實：一位被叫做秀才的普通村民，是方圓遠近絕無僅有的識字分子。既是村民，仍住在這個鄉村，應該不是什麼軍警官吏。或許前政權也苦於文盲充斥，多少要囑託他辦一點行政、溝通的事務。於是這就構成了反革命、階級敵人之類的罪名。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過分嚴酷的清剿，傷害了民族的文化肌體。民族的文化是由人民承載的。地主、富農、前軍政人員、右派分子正是人民中知識分子的很大一部分。這些人數以百萬計地被整肅、被監禁、殺戮，他們的親屬子女不再被信任，其餘知識分子都在政治運動中戰戰兢兢，呻吟骸，消極觀望，從整個民族史的角度來看，是民族文化細胞遭到過分殺傷後造成的

民族肌體的生理和心理痙攣。反過來又令共產黨高層領導猜疑知識分子離心離德。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高級領導人不斷地重複「要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表現了他們的這類躁狂心理。在文字政策上，便更容易採取冒進急取的方針：幻想漢字簡化迅速過渡到拼音文字，並能迅速掃盲。

1949年中國的文盲達80%。這個數字見於毛澤東1960年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國過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況實在難以忍受。自己沒有工業，糧食不夠得進口，棉花得進口，工業品業得進口。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很窮的，就是工人、貧農、雇農，革命主要靠這些人。還有被分之二十是城市裏的小資產階級，農村中的重農和富裕中農。剩下的百分之十左右就是地主、富農、城市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國有文化的主要是這一部分人。還有百分之十的人是識字的，就是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富裕中農。百分之八十的人過去都是文盲。」（《毛澤東文集》第八卷214頁）。



鬥地主大會。

這是一種很粗略的估計，沒有具體的出處，更沒有小數點後的精確數位。當時戰火連綿，民不聊生，既然沒有更加精確的統計，也只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文盲普遍固然跟中國社會的貧窮落後共生而互為因果。但是五六十年代基本持續和平，文教事業卻持續蒼白，是跟共產黨建立政權後的殺戮、報復政策密切相關的。一共才百分之十的人有文化。其中地主富農的全部、城市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中的相當一部分作為反革命和右派分子，都被殺、關、管。最先開始的是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運動。土改打擊的就是地主和富農。在經濟方面他們是地主富農，在文化和社會方面他們是鄉紳。地主階級是中國社會中文化最悠久的階層。土改的結果，不僅將他們的土地、房屋、金錢分給農民，而且從文化上剝奪了他們的尊嚴，從教育上剝奪了他們師長的地位。中國大陸的土改是暴力土改，（臺灣的土改是不流血的和平土改）。所謂惡霸、土豪劣紳，並沒有客觀標準。如果確有刑事劣跡，應由法院審理，跟土地所有權沒有因果關係。被處決的地主富農自不待說，許多地主富農就是當地的文化人，這些知識分子雖未從肉體上消滅，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失去了起碼的文化性格，除了從事繁重的體力處罰勞動以外，沒有任何言論和行動自由，頂多在春節期間幫忙寫寫春聯。有些地主家庭成員本來還在城鄉地方兼任校長、教師或文化團體職司（書畫會、詩會），土改以後，不要說他們本人失去了文化權利，甚至連子女，有的地方連孫輩，都失去了入學、升學的受教育權利。中共中央頒佈的《怎樣劃分農村階級》規定地主富農成分可以在五年後改變。（1950年8月21日《人民日報》刊登，後來出版單行本全國公開發行）。可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越來越嚴緊，從土改到文革，沒有任何地富人員得到改變成分的幸運，反而是處境越來越嚴酷，文革中京郊、湖南、廣西等地直接將地富家庭滿門殺絕。

直到文革結束後1979年宣佈普遍「摘帽」，這些地主富農大部分都已經去世，存活在世的也已風燭殘年，無力于文化奉獻。

鎮壓反革命和肅清反革命是兩次針對政治敵人的暴力鎮壓。每個政權上臺都會立刻清剿社會上的反抗殘餘。但是中國共產黨不僅清剿了確有反抗行為的反抗分子，而且繼續懲治早已放下武器沒有任何反抗的前軍政人員。中國共產黨制定的肅反政策，不論是否犯有刑事罪行，凡是在前政權有過一定黨政軍職務的人員全部追究。1967年公開張貼的《關於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工作的規定》（俗稱公安六條）雖然是文革時期的文件，其實主要的政策內容都是文革前十七年內部掌握的政策條款，包括反革命分子的標準。其中除了現行罪犯以外，對於敵偽的反動黨團骨幹（國民黨、三青团區分部委員以上）、政（保長以上）、軍（連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以上）和特（特務人員），雖無刑事犯罪行為，一律按歷史反革命處理。這是世界上罕見的嚴刑峻法。德日法西斯政權崩潰以後，舉行了紐倫堡和東京兩次「世紀大審判」，對首惡的戰爭罪犯判處了極刑。可是對於一般前軍政人員並沒有全面的追究，在西德，他們被登記在案，參加「去納粹化」學習班，除非有人控告，才能審判，依刑法定罪。對待前共產黨幹部更加緩和而人道。1991年德國統一以後，僅僅因柏林牆槍殺案判處三名前共產黨政治局領導人三到六年的徒刑，兩名邊防軍人直接開槍射殺翻越柏林牆的青年，被判處兩年半徒刑，其餘黨政幹部按時作為公務員退休，除非確有刑事指控，一般都不判罪。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1969屆聯邦總理、《時代週刊》主筆施密特曾經是納粹少尉軍官，德國著名色情業大老、企業女強人貝阿特·烏澤女士曾經是納粹空軍女飛行員，德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君特爾·格拉斯曾經是納粹衝鋒隊員，（並在美國佔領軍登記處登記）。他們都沒

有被追究，戰後都發揮了個人的特長，服務於社會。如果他（她）們生活在東德，或生活在中國，必定會在勞改營中九死一生。

中國共產黨人違背了自己在奪取全國勝利前夕的許諾。1949年4月25日以毛澤東、朱德兩人名義發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宣佈，除了國民黨高級戰犯以外的軍政人員，只要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一律不加逮捕，不加侮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460頁），然而在取得政權以後，他們對前軍政人員進行了殘酷的報復處罰。除了少數具有宣傳作用的人物，（原地位較高，又善於表演順從和歌頌黨政領導）被選為中國共產黨「寬大為懷」榜樣的花瓶，例如末代皇帝溥儀、前國民黨情治官員沈醉和前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前線指揮宋希濂等，其他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都遭到殺（死刑）、關（關押、勞改）、管（不入監獄留在社會上嚴格限制人身自由）各種懲處。根據華東師大歷史系楊奎松教授《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的說法，毛澤東不是因為出現大規模的暴力反抗人員而處死人犯，而是為了「發動群眾」。「毛澤東當時有個說法，殺70萬，關120，管120萬」。當時全國人口約四億五千萬。處決人數大大超過毛澤東欽定的千分之一。政治經濟發達地區更超過千分之二或三。當時廢止了中華民國的法律，但是中共自己頒佈了《懲治反革命條例》。死刑的依據卻不是人犯的罪行是否該當死罪，而是為了「發動群眾」。不論「發動群眾」作何種解釋，都不符合人權、民主和法治的精神。歷代王朝在確立新政之後，往往都是大赦天下，收拾人心；而中國共產黨卻選擇了殺人祭刀，震懾人心。為了湊足百分比，許多起義投奔共產黨的軍政人員也遭到殺害。例如著名民主理論家胡平的父親就是傅作義起義部隊的中級軍官，在鎮反時期忽遭逮捕槍殺。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抗戰

時期受共產黨指派加入國民黨宣傳機構，結果竟也被定為反革命慘遭殺害。到1958年為止，所有符合或接近上述公安六條界限的前國民黨軍政人員都作為反革命受到殺關管的懲處，絕少例外。毛澤東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說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完全是宣傳上的說法，實際上根本沒有兌現。「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毛澤東的這一段講話，發表於1958年5月舉行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多年來被廣泛引用。毛澤東在這裏強調的是他們殺掉的不僅是一般的反抗者，而且包括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

肅反和反右以後，1958年中國的監獄和勞改營關押的人犯估計至少高達一千萬，（陳鳳孝：《夢斷未名湖》第319頁），還不包括社會上被管制的人犯，也不包括已經處決的人犯和已經服完刑期繼續留場勞動（即使刑滿也不准返回原駐地，繼續受監控和管制）的刑滿釋放人員和被關押的勞動教養人員。其中主要是政治懲罰囚犯，即國民黨軍政人員，還有部分右派分子等思想言論罪犯。張戎在《毛：鮮為人知的故事·登基之初》中進一步證實說，這每年一千萬人中，因各種原因死亡的人數則不下百分之十。在整個毛統治期間，死在監獄、勞改營裏的人，和被槍斃的人，總數大約有兩千七百萬。

這樣的整肅是直接違背國際法的滅絕人類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1948年聯合國通過了《內瓦戰俘公約》。其中第三條規定了一國之內的戰爭衝突，戰俘待遇也適用於該公約。1952年7月13日 周恩來外交部長經中國政府授權聲明接受

該公約，1956年11月5日，全國人大批准了該公約。但是中國當局只是當時要利用這項公約拿中美朝鮮戰場的俘虜問題向對方討價還價，對於在國內戰爭之後他們懲罰早已放下武器沒有反抗、連戰俘也算不上的前軍政人員，共產黨人連想都沒有想到過應該怎樣遵守自己簽署過的國際公約。許多國民黨軍政人員恰恰是聽信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的許諾，厭惡國民黨時代的貪汙腐敗，決定「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準備報效國家民族，結果當他們迎接共產黨新社會到來的時候，等待他們的卻是監獄的鐐銬和勞改營的苦役。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勞改營中，在各單位受管制的人員中，除了一部分刑事罪犯以外，政治罪犯群內藏龍臥虎，不僅有各種專業的知識分子，更有許多重要的精英人才。最為典型的是現代詩人、現代漢語典範語文的代表人物穆旦（1918-1977）的遭遇。

1942年他作為英文專業的大學生毅然為抗戰從軍，擔任了中國遠征軍的翻譯官。他的長官就是抗戰英雄張靈甫（內戰期間與解放軍交戰陣亡）。抗戰勝利後穆旦赴美留學，1952年滿腔愛國情懷的詩人告別楊振寧等學友，艱辛輾轉回到祖國。不料竟因他曾經是國軍軍官的身份，被定性為歷史反革命，他的遠征軍旅詩篇，現代的邊塞新詩，竟成為他「歷史罪行的自供與罪證」。沒有等到恢復名譽的通知，他於1977年含冤去世。白天苦役，晚間翻譯，留下的大量譯稿成為今天文學界、翻譯界的詩壇絕唱。另一位曠世奇才科學家束星北教授，愛因斯坦的學生，許多中外物理學家的理論導師，因為為肅反運動受迫害的師生鳴冤叫屈，被



詩人、翻譯家穆旦。

定性為反革命分子，勞改、家破人亡，不准教學科研，只能為實驗室修理進口器械。他僅用一支筆幾張紙就能為第一顆人造衛星計算數據，分毫不差，國內外的科學家都曾預估他本應是獲取諾貝爾獎金的天才人物。肅反、反右讓中國失去了為物理學界贏得重大科學成果的人才和機會。抗戰時期中國銀行界高級職員池步洲比英美情報機構更早地破譯了日軍偷襲珍珠港的密碼，他只是協助重慶的電訊機構完成了破譯日軍密碼的工作，並未加入過軍統組織。可是在1952年的鎮反運動中仍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二年。這位無名英雄創造了令英美諜報機構不敢相信的奇跡，卻在勞改和屈辱中耗費了後半生的寶貴時光。

三反五反運動名義上是打擊偷稅漏稅行為和反對貪汙浪費。查稅和反貪任何國家都會發生，可是共產黨人不是採取制定稅法，依法查帳，依法追究，而是採用逼供、批鬥、疲勞轟炸、威脅恐嚇的辦法，非法拘禁非常急需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而且稅務追討的上限從滿清年間起算，結果上海工商界很多資產階級企業人士跳樓自殺，被共產黨的上海市長陳毅喻為「降落傘部隊」，這樣殘忍的笑話背後該有多少家庭的悲劇和冤屈，無從申訴。最為著名的是重慶的中國船王、抗戰愛國的大企業家盧作孚自殺身亡。

這裏列舉的都是全國第一流的、被埋沒的重要人才。在各地省市縣區鄉各層次上都有當地的知識分子、優秀人才，不少人都被共產黨的嚴刑峻法整肅懲治，消滅於無形之中。文革後右派幾乎全部「改正」，僅有近百名仍不予「改正」，（以示反右之必要）；數以百萬計的反革命分子獲得「平反昭雪」。如果這些人當時參加國家建設，是國家的教師、工程技術人員、醫護人員、公務員、作家、藝術家的組成部分。毛澤東在鎮反運動中各地殺人數目急劇上升，超過原定的千分之一時，他說，這些人

也「是一批很大的生產力」（不予處死），結果這部分人被送往勞改農場從事奴隸勞動。他沒有想一想，這麼多被錯殺、錯判、逼死的蒙冤者更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承載者，糟踏他們的青春和生命，禍延他們的家庭，就是對一窮二白的雪上加霜。黨政宣傳所說的一窮二白似乎是歷史上統治階級造成的。實際上共產黨人建國以後沒有大赦天下，予民休息，反而連番整肅，摧殘知識分子，恰恰是這樣的濫捕濫殺給一窮二白的狀況雪上加霜。掃盲最需要的是師資。可是1957年的反右，對象全部是知識分子。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當然是教師。到底全國有多少教師被打成右派，目前還沒有找到全國的百分比。僅有一個河南省的實例：「——關於河南省反右情況，（《共和國早期的故事》）書中有這樣幾個統計數字：全省共劃右派9萬人，占全國15%；學校教職員中被劃右派、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平均占23%，有的地區達50%以上，個別學校達70%以上。固始縣劃右數占全體教師的48%，遂平縣占52%」。（李銳：《按照歷史的真相總結歷史》《炎黃春秋》2005年第六期）。從河南全省和一些縣的數字不難推測全國的情形。一個國家，一個省，一個縣，如果有這麼多的教育工作者被戴上階級敵人的帽子，被殺被關被管，對於全國的掃除文盲、發展教育將是何等重大的打擊？

從1949年開始，北京的老虎橋監獄，上海的提籃橋監獄，各地的監獄和看守所都不足以容納輪番的政治運動所逮捕的人犯，北京市立刻建設清河農場（1950），爾後陸續增建秦城監獄、黑龍江的興凱湖農場；上海市立刻興建江蘇大豐農場（1949），爾後陸續增建安徽白茅嶺農場、軍天湖農場，並建立青海勞改支隊，各省市也紛紛建立勞改農場和勞教農場，黑龍江、青海、內蒙、安徽等地興建了多達上百個這類勞改場所。安徽宣城人說，宣城沒有一所大學，卻有十多個勞改勞教場所，白

茅嶺、軍天湖在上海無人不曉。



北京秦城監獄正門。

據說建一所勞改農場比建一所大學花錢還要多，因為需要鋼鐵安全設備，電網高牆，武裝配置。為了關押每年上千萬的人犯，從1949年到文革時期，這類興建全國各地始終沒有停止。



四川涼山雷馬屏勞改農場的囚衣。

文革後大批平反通知下達的時候，大部分冤獄者早已長眠在勞改營邊的草莽之中。

然而就在肅反和反右之間的1956年，毛澤東給《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撰寫按語時，他談到中國農村還有很多地方不僅學齡青少年沒有學校，而且還有超過學齡的青少年也不能入學，成人文盲更不待說。他要求各地合作社自編本地掃盲教材，編入人名、地名、農具、農活，縣區也編寫地區教材，省市再編省市教材，中央僅給予指導。教員則利用本鄉的高小畢業生，開展掃盲。（《毛澤東文集》第六卷456頁）。一方面是大批知識分子被整肅，被勞改，被監禁，國家花費非常巨額的資金，配備武裝力量，增擴遍及各省市自治區的監獄和勞改農場，關押這些原本可以效力建設的公民；另一方面，各地沒有資金為農村青少年建設學校，沒有資金編印各類教材，沒有資金聘任教學和掃盲的師資，甚至已經找不到合適的師資，只好找僅有小學畢業水平的人來充任義務教員。青少年的校舍校園化作了勞改營的鐵網高牆，這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時代的德政。在這段按語中，毛澤東引用了列寧的名言：「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恐怕毛澤東一輩子也不知道，另一位俄羅斯的名人托爾斯泰曾經大聲疾呼，多建設一所學校，就可以少建造一座監獄。

1949年以來，中國政府對教育的投資始終處於世界最低水平上，無論改革前還是改革後都是如此。從1952年到1980年，中國歷年浪費掉的基建投資費用約為6000億元，而用於教育的總投資僅為1000億元，年均只有34億元；教育經費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印度為20.8%（1969年），日本為22.3%（1975年），世界水平一般為15～20%，而中國一直沒有達到過10%（其中1971年只占4

%，為世界倒數第一）。毛澤東去世的1976年，中國人均教育經費在世界151個有統計資料的國家裏占第149位（《高等教育學報》1985年第一期，第64頁）。從1931年東三省淪陷，1937年八年抗戰，1946年三年內戰，直到1950至1953年的朝鮮戰爭，二十餘年的長期戰亂之後，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沒有與民休息，反而在國家最需要文化科學人才的時候，全面整肅知識分子，在國家最需要恢復教育事業的時候，中國政府成了世界上投資教育最少的政府之一。

在中國古代，受謫貶的文人還可以在任所之地做一番事業，為官一任，潤澤一方。例如唐代文豪韓愈受貶來到潮州，僅僅八個月的時間，他為民眾驅蠃除害，扶助農桑，贖救奴婢，延師興學。韓愈離開不久，邊鄙的潮州學子就開始在朝廷的科舉試場上金榜題名了。明清兩朝文字獄猖獗，許多官員九族流徙北大荒（寧古塔），他們在塞外邊地還可以撰寫當地史志，教化鄉里民眾。然而被共產黨整肅的知識分子卻遠沒有這樣的幸運。一旦被打成地富反壞右分子，即使能苟全性命，也絕沒有任何人的尊嚴，除了做體力的苦活累活以外，絕沒有為人師表的權利，（尤其不准當編輯，不准授課，不准出書）。打成右派以後，老詩人艾青被發配到新疆，青年詩人流沙河拉車鋸木，美學家呂澂在甘肅夾邊溝病餓而死。在國民黨監獄裏共產黨囚犯方志敏留下了散文集《可愛的中國》；從五十年代開始的囚犯中竟然沒有留下任何一本在獄中寫成的文學作品。這樣的現象決不是偶然的。說明共產黨的獄政是世界上最嚴酷的獄政。

潮州學子欣然向學，是因為他們仰慕韓愈的文采和人格，即使韓愈被貶降職，畢竟皇帝沒有褫奪他的文名，更沒有摧毀他的德望。而現代中國受打擊的知識分子從人身自由，文化性格，到道德尊嚴皆被剝奪淨盡而一無所有，在人民中喪失了一切威

望。知識分子不斷遭到打擊，文化人不再成為社會的楷模和風範，社會對知識和人格失去了崇敬和嚮往，這樣的氛圍更加加強了形成文盲的社會環境。在分析人民共和國期間掃盲失敗的原因時，除了資金、師資等原因以外，切切不能忽略這一個重要的社會心理原因。

4・簡化字對掃盲並無推助之功

今天為簡化字辯護的人往往堅持說，「簡化字在中國大陸大規模掃盲運動中功不可沒」。有的人甚至說，簡化就是為了掃盲。對掃盲有好處，是簡化唯一的好處。這又是一個嚴重的誤區。前面的章節已經介紹，現代認知心理學對於漢字的簡繁做出研究，並不是筆劃少就好認好記這麼簡單。對漢字完全沒有概念時，認知多筆劃和多部件會困難一些。但是經過分析和解說，熟悉和掌握偏旁部首（組塊化記憶）之後，記憶就大規模推進。尤其是在掃盲中，掃盲對象往往是成年人，錯過了語文學習的關鍵期，錯過了青春期，大腦神經細胞已經定型。他們的學習跟學童的啟蒙不一樣，學童可以憑藉大腦的強健記憶力，比較容易機械地記住字詞；成年文盲必須頻繁反復，主要是認讀，才可能記住一些字詞。認知心理學實驗的結果表明，一個字或一個部首出現的頻繁度越高，它筆劃的多少就越沒有意義。一旦形成邊旁部首記憶，即固定組塊化記憶，作為一個整體，根本不再在乎多少筆劃。漢字簡化並不是將所有的漢字都簡化，而是簡化了一部分，據統計，原有的繁體字平均每字16畫，簡化之後，平均每字降到10.3畫，節省了35%的筆劃。在7000個常用字中，有簡化字2235個。簡化字約占現代漢語用字的三分之一。掃盲教材的字又都是經過篩選的最常用的字，人手口刀牛羊等等本來就筆劃不多，沒有簡化。成年文盲一共大約要學習2000個常用字，俗稱

「掃盲兩千字」，其中必須掌握1500個字，主要就是認讀，然後能寫自己的姓名和數字，可以記工分，算收入，就可以算「脫盲」。這兩千字不可能把上述2235個簡化字全部拿來，因為還有很多如「的、你、我、他、家、花、大、小、上、下」等等沒有簡化的常用字。據統計，加在一起掃盲兩千字中省略的筆劃僅占12.5%而已。（見北大中文網：羅寧《恢復繁體字的五大理由》）。



農民脫盲以後獲得文化證。

如果以每個字十二畫計算（據科學家對電腦信息熵的計算簡化字平均筆劃數為12），平均每字節省僅一筆左右。對於成年文盲來說，多一筆、少一筆，實在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有決心要學文化，不在乎這多一筆少一筆；無恒心擺脫文盲困境的，少寫更多的幾筆，恐怕也無濟於事。根據認知心理學的分析，漢字筆劃對認讀沒有影響，我們可以說，簡化字對掃盲根本沒有貢獻。

5・虛狂的掃盲大躍進

簡化全面實行後的1958年，伴隨著工農業的所謂大躍進，還有一場掃盲大躍進。實際上是共產黨當局要把簡化漢字迅速推廣，並讓簡化字的認字「高效率」立竿見影。可是跟其他大躍進一樣，掃盲大躍進也是充滿了狂熱和浮誇。掃盲大躍進的成果好似一堆炮竹，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下面引用兩段回憶文章，掃盲大躍進的浮誇情況可見一斑：

（一）《掃盲親歷記》 作者 孟祥才

1958年7月下旬，我正在山東臨沂北老屯村家中度暑假，每天同社員一起下地幹活。有一天剛吃過早飯，大隊長找到我說：「今天上午公社召開掃盲誓師大會，你就不要下地幹活了，帶幾個學生去開會，回來咱們商量怎麼掃盲。」當時我這個高二的學生在全村是最高學歷，參加掃除文盲的活動是責無旁貸。於是我急忙找了四五個中學生，一起趕到五里之外的公社駐地付莊。

進入公社大院，只見剛剛搭建的主席臺上紅旗招展，旁邊幾個年輕人起勁地敲打鑼鼓。院內牆壁上貼著大字標語：「工業大躍進！農業大躍進！掃盲也要大躍進！」「苦戰三個月，掃除全公社文盲！」大約九時，誓師大會開始，公社書記作動員報告，大講了一通掃除文盲的意義，號召全公社敢想敢幹，一定在三個月內將文盲掃光，每人都能識字三千，達到熟練地讀書看報的水平。接著文教助理將掃盲的組織領導、工作步驟、檢查驗收等有關事宜做了佈置，最後是幾個大隊代表表決心，調子出奇地一致，都是保證超前完成任務。

散會後回村的路上，我心裏直打鼓：小孩子6年小學畢業，還不一定能順順當當地讀書看報。現在正值夏季，農活挺多，組織文盲識字一無時間，二無教材，要求三個月掃光文盲，簡直是

開玩笑。我回村就找大隊長彙報，講了許多困難，表示三個月無法完成掃盲任務。大隊長是我的同姓長輩，他苦笑著說：「現在什麼都躍進，上面怎麼佈置，咱就怎麼幹。反正別人能完成，咱也能完成。」他要我立即向全村廣播，要求全村50歲以下的青壯年文盲，不分男女，從明天起，以小隊為單位，利用午飯後時間，各自找一片樹蔭，學識字一小時，然後再幹活。當天下午，我就召集全村八九個初中生開會，要求每人包一個小隊，以小學語文課本作教材，以一塊小黑板作教具，自找場地，從明天起，利用午休時間，開展掃盲教學活動。

第二天中午，我「巡視」了全村八九個樹蔭下的教學點。這些點上，多則二三十人，少則十幾人，都在老師的帶領下認真地看著黑板學識字。當時我很高興，心想，雖然三個月完成掃盲任務有困難，但只要這樣堅持下去，讓文盲識些字還是不成問題。識字教學進行到第四天中午，我正在一個教學點上教社員識字，大隊長心急火燎地找到我，說：「壞了！咱們大隊的掃盲落後了。人家付莊大隊，上午開完誓師大會，下午就向公社報捷，說他們已經完成了掃盲任務。你快去大隊辦公室，用紅紙寫一份報捷的喜報，就說我們大隊經過苦幹加巧幹，也超前完成了掃盲任務。然後找幾個年輕人，敲鑼打鼓將喜報送到公社。」他看我吃驚的樣子，不容置疑地說：「快去辦！再不快點，咱就更落後了。」

我只得按照他的要求寫了「喜報」，於當日下午四時左右敲鑼打鼓送到公社大院，受到公社副社長、文教助理、團委書記的接待。他們接受了我們送去的「喜報」，說了些「繼續努力，鞏固成績」之類的話。回過身來，我環視公社大院，看到四面牆上貼滿了報捷的「喜報」，全公社的大多數生產大隊都在我們之前報了捷，我們真是有點落後了。

回村後我向隊長彙報了報捷情況，談到怕公社檢查露餡時，隊長說：「不用擔心。我估計十之八九不會檢查。為防萬一，你把全村上過小學和初中的人列個名單，讓他們隨時準備應付檢查。」以後，我們又組織了幾次識字教學活動。由於已經報捷，組織者和參加者都沒了積極性，「掃盲大躍進」也就結束了。

平心而論，「掃盲大躍進」不過是整個「大躍進」中微不足道的一出小小的鬧劇，但它卻具備「大躍進」中荒唐事件的基本特徵：上面下面一齊吹牛、造假，彼此心照不宣而又裝得煞有介事。

摘自《炎黃春秋》2005年第一期

（二）《速成掃盲各有高招》 作者不詳，應是一位退休老教師

1958年6月15日《人民日報》在題為《文化革命開始了》的社論中提出「工業化、機械化、電氣化，技術革命要文化」的大躍進口號。的確，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如何適應工農業的發展呢？在這個背景下掃盲逼在眉睫勢在必行！

我參加了在縣裏召開的掃盲動員大會。會上，由宣傳部和文教科的領導大講其掃盲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要與會者克服右傾畏難情緒，在「總路線」的指導下，用大躍進的速度儘快掃除文盲。

總路線的具體內容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大躍進的速度當然是愈快愈好。快到什麼程度是通過「打擂臺」來決定的。這是一個敢想敢幹的大會。最先提出的時限是一個月掃除青壯年文盲。隨後一個比一個躍進的指標不斷更新。很快由一個月降到15天、10天。負責掃盲的領導覺得十天也夠

快的了，正準備一錘定音。豈料和順鄉的崔某一聲斷喝：「莫忙！」他跑上擂臺響雷似地朗誦道：

「橫斷烏江水，力拔彈子山。

文盲何所懼，七天能掃完。

雄心加幹勁，掃盲鼇頭占！」

與會者先是一愣，繼而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顯然是被他敢想敢幹的大躍進精神所折服。掌聲之後，有人提出質疑：「七天是不是太短了點？」

會議主持人駁斥道：「我們要的就是幹勁加速度嘛，不然怎麼體現大躍進？幹勁可鼓不可泄！和順鄉山高坡陡文盲多的地方都能辦到，平壩低地還不行嗎？七天就七天！只能提前，不能延後，這才是毛主席倡導的大躍進精神！」

執行會議的決議自然是雷厲風行的。

我們南坪鄉經過兩天三夜的籌劃和準備，決定全體鄉幹部和教師每人負責一個初級社。把識字的和不識字的組織起來搭配編成包教包學組，任務落實到組上。與此同時，由我組織教師們連夜將三千常用字編聯成日常用語、實物名稱油印出來，人手一冊。開學那天，全鄉舉行開學典禮，領導作了動員報告，包教人員和學員代表也各自表決心、鼓幹勁，氣氛十分熱烈。大家都想儘快摘掉文盲帽子！

被大躍進幹勁衝昏頭腦的所有人們，都把事情估計得太簡單，沒有想到苦學了兩天兩夜，就有人就受不了啦。這些自出娘胎從未和書本打過交道的人，兩天來被紙上那些看得見摸不著的黑巴巴搞得嘶聲嚎氣頭暈腦脹，他們說比挑大糞還吃力。有的學員畏難乾脆開小差走了，還詛咒發誓不再和這勞什子打交道！這怎麼行呢？鄉裏立即制訂了幾條保證能儘快掃盲的措施：凡不参加掃盲學習開小差者，每天扣除15個工分；凡不努力學習影響

集體進度者每天扣10分；凡不認真教學者除扣一定的工分外，還要受批判！凡駐隊幹部、教師務必認真督促檢查，確保掃盲任務按時完成，否則以思想右傾論處！

物質利益和精神壓力雙管齊下，這一招還奏效。逃學的只好硬著頭皮回來坐下。我負責的七大隊三社的大孀子、小媳婦們讀得涕淚長流。發誓今後砸鍋賣鐵也要送子女讀書，免得掃盲受罪！一個婦女邊奶孩子邊念字，上下眼皮老粘在一起。她實在無奈，用拳頭捶著腦袋大叫，想借此驅走瞌睡和發洩怨氣，嚇得懷中孩子哇哇直叫。五十年代的農村還沒有電燈，煤油燈也很少，全是用松油燭照明。松油燭發光暗，油煙大，必須人手一支。幾十支松油燭濃煙滾滾充滿整個屋子，嗆得人的喉頭火辣辣的。黑煙熏到出汗的臉上，不到半小時，人人都變成大花臉。那年頭，人們思想純樸，儘管如此費力，文盲們還是把掃盲當作黨的關懷，為的是今後過幸福生活。

如此苦戰了四天四夜，有消息傳來說，和順鄉已經報捷了。這消息如晴天霹靂，驚的大家目瞪口呆。不曉得他們用的什麼神仙妙法，不到一星期就掃除了文盲！震驚之後才想起派人去取經，原來人家使用的是同音字表，只讀打頭一個字，其餘的字就可視為認識。據稱這經驗符合「多、快、好、省」的總路線，已得到有關領導的首肯。

这下子，包教人員和學員們都把怨氣發洩到編教材的教師們身上。罵我們右傾保守，思想不躍進。拖了全鄉的後腿不算，還讓大家受洋罪！編教材的教師們戴起碓窩唱戲——吃力不討好，啞巴吃黃連還得自認理虧，連夜補印同音字表。幸而還有三天時間，加上前兩天的學習基礎。不到兩天，我們南坪鄉也向區裏報捷了。上自領導，下至包教人員、學員都長長的吐了一口氣，皆大歡喜。特別是學員們更是如獲大赦，高興得直掉眼淚。

幾千年遺留下來的中國文盲，就這樣用大躍進的速度掃除了！？

這個賬當然的記載到急於求成虛報浮誇身上了。於是文盲依舊！

我在小學工作了26年，其間除三年餓肚子沒有喊掃盲外，年年歲歲都在叫喊掃盲！而且這掃盲也總是小學教師的專利，似乎文盲就是小學教師造成的，非要小學教師償還這筆永遠也掃不清的文盲債不可！直到1982年我離開小學到了中學，才擺脫了掃盲的羈絆。可是我的女兒又接了我的掃盲班，象愚公移山那樣世世代代掃下去。

掃盲的方式也年年翻新，花招層出不窮。從最初的農民夜校到青壯年掃盲班，從大躍進的擂臺突擊到文革期間讀語錄背老三篇。什麼教師送字上門，學生包乾家庭，父子包教，夫妻包教等等不一而足，文盲仍然多如牛毛。

退休後每當談起掃盲，反省當年我們諸多方法諸多水分，教師厭倦，文盲心煩，似乎問心有愧。孰料我女兒說，你們不管怎樣，還是熬更守夜做了大量的實際掃盲工作嘛，有什麼慚愧的？你看我們現在掃盲那才「先進」呢，連文盲的面孔都沒見到就100%的掃除了。哪象你們那樣費勁吃力不討好？我十分驚喜，迫不及待的問方法。女兒說，現在的文盲們致富忙得很，他才不要你掃盲呢，反而說你們是越掃越「盲」。公開說，上頭來檢查，我請個人代替就是了，檢查團也是人，懂得起！於是大家何樂而不為？到了假期，花點加班費，十幾個教師坐鎮，造好掃盲成績名冊上報就完事。檢查接待工作也同步安排就緒，到時酒席桌上一陣觥籌交錯虎咽狼吞，吃飽喝足之後按圖索驥，保證人人合格，個個過關。因為名冊上的文盲，至低水平也是小學或初中生。於是舉國上下皆大歡喜！聽得我這當年掃盲老手自愧弗如，感歎生不逢時，吃苦受累還費力不討好！幸甚至哉，後生可

畏，掃盲終有剋星？

（原載《天益社區·雜文天地》2007 5 21 由 文革小丑編輯）

「大躍進」時代走入歷史四十多年以後，《中國當代史研究》2003年10卷3期轉載了《沙洋師範專科學校學報》李慶剛博士的文章《大躍進時期掃除文盲運動述評》。述評寫道：1958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用革命精神掃除文盲》。社論認為，過去八年掃除了文盲三千萬，每年250萬到300萬。可是農村中還有文盲一億五千萬。按前面的速度即使每年300萬，也要五十年。如果要在二五期間完成掃盲，每年就要掃盲三千萬到四千萬，即加快十倍才行。述評認為該社論的「數字計算是明晰的，但是明晰的數字不是讓人量力而行，而是讓人蠻幹」。文章繼續評論《人民日報》的浮誇報道。從1958年1月到9月，全國掃盲達到一億人。這個數字比後來實際調查的結果四千萬相比，誇大了二點五倍。「中國仿佛一夜之間就甩掉了文化落後的帽子，完全陷入自我陶醉的狂熱幻想之中」。對於掃盲大躍進的浮誇現象，作者做了進一步的概括，同時也引用了毛澤東當年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毛在第四部分專門講了「作假問題」。舉例也特別以掃盲為例：「……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麼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連好大喜功的毛澤東也看出了掃盲大躍進的虛浮。當時中國的報紙公佈說，「截至（1958年）七月底，全國已有六百三十九個縣市基本掃除了文盲，占全國縣市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八點一，其中基本掃除文盲的省份已有黑龍江、吉林、浙江和甘肅」。其實這些省份到了九十年代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文盲。（轉引自《黃花崗》第十八期）

李慶剛的《述評》還介紹了1960年所謂「掃盲持續躍進」中出現了福建萬榮縣創造的「注音識字法」。該方法一度吸引各地的注意和學習。但是由於三年饑荒的經濟形勢已經無法將這種浮誇的掃盲運動持續推進，掃盲的勢頭每況愈下。

關於掃盲的浮誇現象，並非從大躍進開始。前面《漢字簡化與共產黨、與反右派運動的關係》一章已經引述了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林漢達的鳴放發言。他說：「1954～1955年做得比較好，1956年在冒進。冒進主要表現在規劃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務說成三年五年，實際上是紙上談兵。到春耕的時候掃盲工作本來已是在走下坡路了，《人民日報》還發表了篇社論，糾正盲目冒進。《人民日報》社論哪里來的？教育部的部長都不知道。誰能夠指揮教育部呢？說1956年掃除文盲900萬人，其實這是1954～1955年的成績，1956年的要到1958年才能看到成績」。他的言論導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1974年去世。

歷史已經證明，文盲現象是一個國家、社會的全局性綜合痼疾。必須通過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多方面綜合治理，才能逐步治癒。僅僅依靠革命精神搞大規模急功近利的運動，可以取得一些成績，但終究不能戰而勝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述評中提到了注音識字的方法，卻沒有提到關於簡化字有利於掃盲、認字的消息。既不熟悉繁體字，又不熟悉簡化字的文盲本人很難做出對比。但是如果確實有這類效應的話，有掃盲經驗的教師應該特別有體會。因為1956年前後的掃盲運動還有很多是使用繁體字教學的。這些掃盲工作人員，除了一部分被打成右派受處分被排除以外，很多人還會參加1958年開始的掃盲大躍進。根據我們在中國社會生活多年的經驗，大家都知道，凡是共產黨領導做的事情，有了成績，一定會被不斷頌揚，決不會被疏忽，甚至

少不得誇張其詞地宣講，而缺點錯誤就很難被說及。如果簡化字確能大有助於掃盲，一定會加以宣揚。可是這方面的具體材料幾乎找不到。說到的都是抽象的提法，「簡化字有助於掃盲」。如果掃盲教師有特別明顯的對比感覺，他們不是文盲，總會有所闡述，可是很少看到。印象中，《紅旗歌謠》之類的歌功頌德文字，幾乎歌頌了大躍進時代黨所提倡的一切，就是沒有看到讚頌簡化字有助於認字的內容。也沒有具體的人物和事例，能證明簡化字比繁體字提高了掃盲效率。這種沉寂或許恰好證明簡化字對於掃盲認字沒有任何幫助。這方面僅有一個數據被多方引用，稱用簡化字掃盲比用繁體字掃盲可以提高效率20%。（例如《東林史論》：聞人《幾千年中漢字演變的歷史》）這個結論沒有具體出處。簡化是1956年開始的。冒進和浮誇一直與掃盲相伴隨，而且出現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緊接著是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傾，三年大饑荒後，1962年開始全面強調階級和階級鬥爭。在這樣的形勢下出現的這類數據，既沒有精確到小數點後面的數字，也沒有實驗地點和時間，是不足以采信的。說得更極端一點，中國大陸單方面進行的漢字簡繁認知心理實驗，都不宜輕易采信。因為歷史上1956年漢字簡化是政治運動暴力下貫徹實現的，國家的《通用語言文字法》還規定簡化字為規範字，江澤民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公開講話要求堅持簡化的方向（1992年12月16日）。中國不是一個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國家，這些歷史和現實的因素會對實驗被試人員造成心理壓力，即使是沒有政治利害考慮的低年級兒童，也會在接受「簡體字、繁體字」等名稱信息的時候，受到較強刺激的心理暗示。這類心理壓力和心理暗示很容易影響心理實驗的結果。

引文（二）中「利用同音字表，只認打頭第一個字」的辦法，完全是投機取巧。李慶剛的《述評》中所說的「注音識字」

不能說是投機取巧，可以說是一種嘗試。1952年部隊文化教員祁建華利用注音字母教學，曾經紅極一時。然而，這類辦法對於十七八歲到二十多歲的青年文盲，可能還容易接受；如果是三十多歲、四五十歲的農民文盲，從來沒有接觸過外文字母，忽然要學習二十多個奇形怪狀的abcdefg，本身就是相當困難的事，學會了這些字母，還要學習拼讀，然後仍要學漢字，記住漢字；畢竟報刊和書籍都不是漢語拼音讀物。另外，還有方言問題。漢語拼音只針對普通話，不適合方言，北方地區可以嘗試，南方困難太大。各地文盲中不識普通話的大有人在，比如在粵方言區，r，er 這類普通話語音，十分陌生，ao和ou常常跟方言詞發音對不上號，要學會注音，這類麻煩困擾不可避免。在農村遠沒有廣播和電視的時代，想在方言區把推行普通話和掃盲畢其功於一役的做法是脫離實際的。

2007年6月06日美國之音報道，中國教育部表示，2000年到2005年期間，中國的文盲總數增加了3千多萬。中國官方的中國日報援引中國教育部基礎教育司掃盲教育處負責人高學貴的話說，在2000年到2005年期間，雖然有9億7千500萬成年人學會閱讀和寫字，但是全國的文盲總數仍然增加到1億1千6百萬人。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接受中文部採訪表示，具體的文盲數字其實很難估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對文盲人數的虛報和隱瞞。他說：「這個具體的數字我們很難估計，但是中國的文盲問題肯定是比較嚴重的，因為地方上存在著許多虛報瞞報的問題。應當說，中央是非常重視教育的，但是地方上為了減少財政支出，往往對那些失學情況加以瞞報，而且從目前來看還存在著。這種文盲增加的情況可能與現在的整個教育體制、整個社會的就業狀況不太好有關。」

高學貴表示，教育部目前仍然致力掃盲的工作，但是由於

目前中國的掃盲經費每年只有8千萬元人民幣，相當於每個文盲只能分到7分錢，因此遠遠無法滿足需要。他表示，掃盲教育處希望今年能夠爭取額外的1億元人民幣，招募專門的掃盲人員，並且給掃盲志願工作者提供補助。

中國共產黨五十年代急切地實行漢字簡化，重要的目標確實是為了掃盲。為幹部也為百姓提高教育程度，不能說沒有用力，不能說沒有真誠。但是各種錯誤的政策和推行簡化的冒進心態、狂躁行為使得掃盲成果並不理想。如果說，歷史上的文盲現象跟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有關，跟地主資產階級剝削壓迫有關，那麼中國共產黨建國五十多年以後，沒有外敵入侵，沒有對外戰爭，也沒有連續的特大自然災害，二十一世紀伊始，文盲不僅不減，反而略增，難道也要怪罪帝國主義，怪罪滿清和國民黨統治者，或者怪罪傳統的漢字嗎？掃盲經費每人僅得七分錢。對比黨政幹部的吃喝、貪腐現狀，揮金如土，一擲千金，七分錢算什麼開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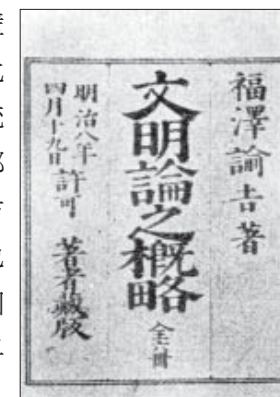
總而言之，五十多年的經驗足以證明，掃盲的成功全不在於什麼「革命精神」，關鍵是調動必要的投資，利用盡可能動員的師資，促成尊師重教的社會環境和風氣，頒佈相關的政策和法令。如果國家以階級鬥爭為綱，不斷整肅知識分子，社會以革命大老粗為榮，背棄尊師重教的傳統，必定擺脫不了文盲之苦。而漢字筆劃的多少，則跟掃盲毫無關係。

第七章 簡化運動是中華民族的宿命

1 · 漢字興廢的百年質疑

明末進入中國的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已經開始了拼音的嘗試。如果從日本改革家福澤諭吉於1885年（明治18年《時事新報》）提出「脫亞入歐」的構想，開始對漢字文化質疑和批判算起，對漢字的反思已經超過120年。

從19世紀末開始，以先進的科技人文學術為標誌的西方現代文化衝破了中國古老的封建專制壁壘，中國進入了一個劇烈的社會文化震盪時期。漢字，作為最重要的傳統文化載體，在構造和思維方式方面都與西方文字迥然相異，不僅受到西方人的貶斥（原始、象形、落後），也遭到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質疑。因此，改革中文的想法也應運而生。早在公車上書時期，變法維新的核心人物就提出過要用拼音文字取代漢字的主張。康有為主張「以字母取音，以簡易之新文」來書寫中國名物，也著手擬構過漢語拼音系統。梁啟超在《盛世元音》的序言中主張，贊同創制拼音文字。譚嗣同在《仁學》一書中更加明確地提倡拼音文字，主張「盡改象形為諧聲」。還有一位王照甚至上書皇帝要求以英文取代漢字。但是戊戌變法轉瞬間不幸流產，這類倡議便一一擱置。20世紀來臨，追求新文化的呼聲更加席捲全國，特別是五四運動的文化浪潮，將中國古代的文化事物全部都置諸於理性的天平，接受現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掂量，以決定棄取。以胡適和魯



迅為旗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驅勇士幾乎一致地認定造成中國政治的腐敗、民眾的愚昧、科學的落後、經濟的衰弱，歸根結底就是肇因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於是，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呼號聲響徹雲天。文學、戲劇、哲學、倫理、風俗、史籍、歌謠都被置於新的人文觀念之下，重新審視。一切含有封建意識的思想內容全都在掃蕩之列。可憐的漢字竟也在劫難逃。留日學者錢玄同對漢字首先發難：「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先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的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的這一過激觀點，代表了一時的激憤心理。在文學革命和白話文問題上，他的見解是正確的。後來他作為漢字改革的先鋒人物，不斷重複廢除漢字的說法。主張廢除漢字的另一位先鋒人物是共產黨人瞿秋白。他的觀點也非常激進：「說到具體的中國文字，我們不能不說，這是比較落後的文字，比較落後的語言」。因此，他也主張「中國的文字革命必須徹底的廢除漢字」。「拼音制度的新中國文字應當完全脫離漢字的束縛，用羅馬字母拼音」。二十年代末葉，蘇聯語言學界的馬爾新學說，語言的上層建築論和階級論也直接影響了中國左翼文化人對漢字的認識。在吳玉章等人主持制定的《海參崴第一次中國新文字代表大會決議》中，他們認為「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因此「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代替它」。直接在莫斯科接受過蘇聯學者指導的瞿秋白對漢字表示了極大的憤慨，說出了極其過分的惡言惡語：「這種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醜陋、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並根據階級分析理論把漢字定性為「封建社會的紳士文」。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在給朋友的信中也多次表示對漢字的憤慨，認為「漢字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裏面，倘不首

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亡」。「如果大家不想給舊文字作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魯迅的口號簡單強烈，斬釘截鐵：「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另一位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許地山還就文字改革問題指出：「中國學術不進步的原因，文字的障礙是其中最大的一個」。認為中國人民智力低下，「中國文字要負很重的責任。……漢字不改革，則一切都是沒有希望的。」1922年上海國語研究會出版的《國語月刊》出版了《漢字改革專號》高呼廢除漢字口號。特刊上發表了錢玄同的《漢字革命》、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的研究》和黎錦熙的《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等論文。他們明確地鼓動漢字革命，並在封面登出大幅漫畫，漢字被描畫成一群面目可憎，妖形怪狀的牛鬼蛇神，被拼音文字殺得無處藏身，一敗塗地。1934年蔡元培等中國文化教育藝術名流688人聯名向全社會發表《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意見認為「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但是這教育大眾的工作，一開始就遇到著一個絕大難關，這個難關就是方塊漢字」。意見呼籲加快推行新的拼音文字，「幫助喚起大眾挽救我們的垂危的祖國。」當時文化藝術界的知名人士，孫科、柳亞子、陶行知、巴金、魯迅、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沈鈞儒，以及趙丹、鄭君里等，都在上面簽了字。作家茅盾在《關於新文字》中指出：「要趕快地提高大眾的文化，中國的漢字就必須廢除」。一貫激進的郭沫若則強調：「現在已經不是新文字要不要的時候，而是我們趕緊學、趕快採用的時候了。」蔡元培的比喻更加形象化：「漢字如獨輪車，國語羅馬字如汽車，新文字如飛機。」傅斯年在《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初步談》（《新潮》1卷，第三號）中說：漢字「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在共產黨的根據地，1940年由林伯渠、吳玉章、董必

武、徐特立、謝覺哉、茅盾、周揚等99人發起，毛澤東、朱德、王明、洛甫、任弼時、高崗、李富春等52人贊助，成立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並召開了成立大會。在會上，吳玉章引用列寧的話高呼「拉丁化是東方偉大的革命」！他說：「我們要使愚昧無知的中國人變成過去，我們要消除文盲，只有用新文字才有可能。漢字是不能擔負這個任務的。」這個協會表示要和全國各地新文字團體、進步的語言學者密切聯合，推進全國的語文改革運動。謝覺哉則將漢字比作是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一個負擔。「好象過去文廟烏龜身上那塊石碑一樣，簡直把我們壓死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吳玉章主持漢字改革工作，他從蘇聯承接過來的漢字封建階級論和廢除漢字論等指導思想一直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算。他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指出：「早在1940年毛主席就提示我們：『漢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近年來毛主席更進一步指出了中國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這就是說必須把漢字逐漸改變成拼音文字。……漢字簡化是漢字改革的第一步。」這一講話成為中共中央高層直接決定漢字簡化和準備廢止漢字的鐵證。

以上這些言論紀錄，僅僅是部分學者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論述。這些觀點和說法，在當今中國社會已經變得鮮為人知。有的人甚至不敢相信。但是在歷史上，這些聲音曾經舉國上下甚囂塵上。拉丁化字母草案起草人倪海曙1948年在答美國記者問時就說過：「至於反對拉丁化的團體，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說明中國知識分子面對西方拼音文化的壓力，長期感到神經的暈眩，一度失卻了自信。

2．歷史上若干政府的舉措

推行拼音文字，以淘汰漢字為目標的改革，在歷史上也曾

被部分政府當局接納為一項國策。當時的學者們主張，漢字改革大體上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漢字拼音化。二是漢字簡化。簡化的目標是給漢字向拼音化過渡創造條件。漢字拼音化運動在五卅以前主要是為漢字注音，推廣統一的官話。1904年袁世凱批准直隸大學堂何鳳華等人聯名上書「頒發官話字母，設普通國語科，以開民智而救大局」。在保定蒙養學堂、半日學堂、保定駐軍中試教官話字母。1905年王照在北京開辦「官話字母第一號義塾」。從此，推廣官話字母的義塾就發展起來，達24處之多。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1913年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制定注音字母，就是臺灣至今還在應用的注音符號。1919年4月21日設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成員由教育部聘任，知名學者有黎錦熙、錢玄同、胡適、劉複、周作人、趙元任、蔡元培、許地山、林語堂、黎錦暉等。1919年9月出版《國音字典》，收字13000多。由教育部正式公佈，規定全國標準讀音以此為準。與此同時，由錢玄同、陸基、黎錦熙、楊樹達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劃案」。對此，錢玄同指出：「我以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辦法，減省現行漢字筆劃是治標的辦法。……我們絕不能等拼音的新文字成功了才來改革，所以治標的辦法實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胡適贊同錢玄同等人的簡化漢字的主張，認為「這雖然不是徹底改革，但確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樁過渡的改革，並盛讚這是「中國小百姓做了一件驚人的革新事業。」如前所述，1935年國民政府宣佈在小學試行簡化漢字，由於受到戴季陶等國民黨右翼領導人的反對，半年後擱置。在國民黨統治區大力推行國語拼音字母和羅馬字母的同時，共產黨根據地陝甘寧邊區於1940年開始大力推行拉丁化新文字。邊區主席林伯渠代表政府宣佈：「邊區政府已決定給新文字合法的地位。規定可以用新文字寫報告、遞呈文、記帳、打收條、通

訊……。一切用途，在法津上與漢字有同等效力。政府的法令公告等重要文件，也要一邊印漢字，一面印新文字。」毛澤東作為新文字協會名譽理事也就推行新文字作了指示：「今年必須用新文字試辦冬學，掃除文盲。」1941年5月15日毛澤東又為《新文字報》題詞：「切實推行，愈廣愈好。」在邊區政府的大力推動下，邊區開展了大規模的新文字學習運動。各地大辦培訓班、掃盲班、新文字講寫競賽等。編印了大量的普及課本和宣傳材料。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也對國民黨統治區發生了影響。上海、廣州、武漢、香港等地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研究會。當時全國成立這樣的團體有80多個。

漢語拼音方案最早起源於歐洲傳教士，例如利瑪竇的原始方案和《西儒耳目資》。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終身在中國傳教，首先嘗試漢語拼音。身後安葬在北京。

後來出現了魏妥瑪氏方案，在西方漢學界和印刷實用方面影響最大。其他還有留美學者趙元任等人編創的國語羅馬字等。所謂拉丁化新文字是指瞿秋白在1928年中共六大期間潛往蘇聯，與蘇聯學者共同編創的《拉丁化中國字》。後來經吳玉章、林伯渠、肖三和蘇聯學者共同商議修改編成了《中國拉丁字母》草案。草案於1931年在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獲得通過，同年吳玉章等人在海參崴舉行了「第一屆中國新文字代表大會」。拉丁化新文字與國語羅馬字雖有差異，但在總體上基本是相同的。兩者共同為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提供了主要基礎。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大張

旗鼓地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進行政治改造。原先局限在陝甘寧邊區的新文字運動此時此刻便成為一項重要國策在全國範圍內積極籌備，預期實施。國家訂立的拼音方案已經呼之欲出，簡化漢字也勢在必行。國民政府前往臺灣以後，1952年蔣介石又一次提倡簡化字，仍然遭到以胡秋原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反對，國民黨方面的漢字簡化又一次擱置。

北京在建立中央人民政府以後，立即成立了文字改革協會，然後於1954年改組為文字改革委員會，隸屬於國務院。文字改革完全成為國家行為。1956年開始了漢字簡化並普及漢語拼音方案。1986年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2001年元旦，《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生效。

3·包圍漢字文化的鐵壁合圍

回顧五四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不難發現其中的過分否定也囊括了對漢字的深刻質疑。更加不幸的是，前述的許多名人思想言論，在社會理想、經濟模式、意識形態的選擇上，以魯迅為代表的激進派（親共）力量和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自由主



1945年毛澤東和蔣介石在重慶會談。在歷史上，兩人都曾贊同漢字簡化。

義或所謂第三種人）力量全部都是針鋒相對，互不相讓，至少是各執一端；可是在對漢字的批判和存廢問題上卻驚人地一致。他們都期待廢除漢字，實現拼音化，在拼音化完成之前，簡化漢字作為權宜之計。雙方的學者例如趙元任、瞿秋白等人都在西方學者、外交官所創設的拼音系統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漢語拼音的系統。豈但是知識界的名人們異口同

聲，連為爭奪政權打得你死我活的蔣介石和毛澤東竟也在簡化漢字的問題上不謀而合！區別僅在於毛澤東贊同走世界文字拼音化的方向，而蔣介石僅限於減少官兵識字寫字的負擔。

國際的輿論也偏向廢止漢字。西方語言學家的結論，說漢字是象形文字的殘餘，是原始文字在現代發育未全的表現。日本在「脫亞入歐」的傾向中利用假名大量直接採用音譯借入西方詞語，不斷縮減漢字的使用。北朝鮮也在四十年代末完全廢止了漢字，獨尊諺文，韓國則大大減少了漢字的使用，越南在獨立的進程中完全廢除了漢字和字喃，全面推行了拼音化。現實的中文拼音嘗試實踐，西方的輿論批評，蘇聯的、帶有意識形態壓力的理論，日朝韓越的拼音實踐和縮減漢字字數，形成了包圍漢字文化的鐵壁合圍圈。

4. 不幸的民族文化宿命

這些輿論影響了國共兩黨的政權。國民黨政權1935年和1952年動議實行漢字簡化。出面反對的反而是政治家戴季陶和胡秋原。共產黨政權推行簡化字的時候，提出質疑的也不是學界的人物，反而是政界民主黨派人物章伯鈞和羅隆基。甚至因漢字簡化問題被打成右派的陳夢家教授也並不是堅決的簡化反對者，而是僅僅提醒要慎重，哪一類簡化字容易產生混淆。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可以說五十年代中國大陸這一場漢字簡化運動是中華民族無法回避的宿命。這次嘗試或遲或早幾乎是命中註定的。同時，對於「漢語文化必須以漢字為本位」、「簡化字並不能提高認字效率」的認知也的確需要時間和實踐來證實，非經實踐原不知其利害和得失。其中關鍵的認知心理學理論，國際上一般認為誕生在1950年代，跟中國大陸的簡化運動幾乎同步。其他相關的現代新學科，如神經心理學、計算機科學、信息學都是更加晚

近才有了長足的進步。客觀地說，在這些方面，中國共產黨並不能承擔漢字簡化惡果的全部責任，全民族的知識分子都應當承擔部分責任。況且中國大陸的文字改革運動中，中國語言文字工作者也作出了一些重要的貢獻。

第一，雖然目的是取代漢字，但是漢語拼音方案畢竟是歷史上最合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方拼音文字優點的方案。第二，取消異體字，規範化方面基本上也是值得肯定的。第三，全國推行普通話對於文化的普及和人民的交際，成績也是巨大的。

中國共產黨的罪責除了在徵求意見方面不民主、假民主；在強行貫徹中，借用了政治暴力壓迫這兩個方面以外，最大的罪責是它的僭越。作為一黨一派，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權利對全民族的文化載體實行這樣重大的改革。（德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一貫邀請奧地利、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專家參與討論改革事宜）。當時的形勢十分明確，共產黨奪取了大陸的統治權，但是並沒有統一全國，更沒有贏得全民族的民心。國土的佔領並不意味著文化的傳承，有的佔領者甚至是文化的摧殘者和毀滅者。當時國家的知識精英，許多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文學家、史學家，例如胡適、傅斯年、林語堂、趙元任、于佑任等人，1950年代都還健在，或居住在臺灣，或僑居在歐美日本。平心而論，假設當年國共兩黨沒有兵戎相見，而是攜手言歡，共商國是，讓全國人民和專家學者自由討論和民主協商，漢字簡化的動議非常可能獲得通過。而且可能進行得比較合理。因為當時不僅主張簡化的胡適、趙元任、周作人等人都還健在，同時章伯鈞、錢穆、胡秋原等反對派也都健在，雙方會提出許多針鋒相對的對立意見。陳夢家這類專業文字學家也會提出批評建議，這樣跟呂叔湘、倪海曙、周有光等激進派的對立可以形成制衡，使文字改革不會這樣倉促，不會從文改會通過決議僅三個月（1955年10月到1956年2月1

日)就開始全國推行。即使推行,也會邊實行,邊調整。實行到一定程度,社會可能會有比較冷靜的判斷和選擇。可能會像文革動亂之後,人們逐漸敢於講話,對於簡化字第二表,表示了強烈的抵制,然後大概在七八十年代交接的時代,電腦普及和中文輸入接踵而至,這一場民族文化的劫難就可能不傷大雅地合理度過。

然而,歷史沒有假設。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按共產黨人的手段操辦了一切。漢字簡化運動實質上是一個文化淺陋的武裝集團在奪取政權之後,對全民族文化實行的一場強制性媚俗整容。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簡化漢字運動已經半個世紀過去了。漢字應該在二十一世紀重新恢復原有的體系,同時又能革除舊有的弊病,或許將能促成中華民族文化復興時代的來臨。

第八章 識繁寫簡：恢復繁體字為規範正體，簡化字降格為行書字體

1・識繁寫簡的確切定義

識繁寫簡已經被提出多年了。這個口號到底是什麼確切含義,並不明確。是不是簡化字和繁體字都可以流通?那麼現在許多中國大陸上的店鋪招牌,為趕時髦寫成了繁體,早已司空見慣。而且國家法律也確認書法藝術允許繁體字存在。這樣的情況不是識繁寫簡的真實含義。一部分知識分子家庭早就開始對子女或孫輩進行課外的繁體字教學,讓他們認識繁體字,瞭解祖國的經典文化。識繁寫簡也不是指這類知識家庭的特殊家教;更不是指國家培養極少數學生從少年時代就開始認讀繁體字,成為專業人士的特殊學校教育。

我所主張的識繁寫簡是一套確定的方針:1)原則上逐步廢止簡化的官方正式用字,2)審慎地恢復傳統漢字為國家印刷品和教科書正式用字。3)所有簡化字重新成為非正式用字,允許在私人通信、交往中選用;國家語文工作委員會逐步審定行書字體,經過審定增刪的簡化字成為中文的規範手寫體。漢字正楷和行書遵照國家語文工作委員會的審定逐步規範化。為此,必須修改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改動應該不會很大,只要將規範漢字的定義改為正體字即可。唯第17條必須將「繁體字」一款改為「簡體字」,允許在特殊情況下使用。

2・社會用字的繁簡過渡

這裏說的1)逐步地廢止簡化字,意味著在經過較短時間的過渡(估計大約半年),不再在官方印刷品上使用簡化字。估計

言讠、門門、糸纟之類的偏旁，馬上就能夠舉一反三；其他例如因為認識鱗、磷、麟，所以可以很快地認識「鄰」的繁體「鄰」。當年宣佈三個月以後全國報紙都使用簡化字，人民群眾也是這樣適應下來的。關於2）審慎地恢復繁體漢字，意味著並非完全地簡單地恢復1956年以前的漢字。因為歸併的異體字中很多都被淘汰。今後不應再重蹈歷史覆轍。改革有益的成果不應一概抹殺。語文工作委員會應該從被淘汰的繁體字中找回歷史上比較多用，偏旁和結構都比較常見的一個，加以認定。恢復繁體字，並不是絕對地全部恢復，例如第二章所介紹的特例：龜龟和鬱郁。這兩個字的繁體確實是不好記。問題不是筆劃多，而是結構怪異，偏旁冷僻。宜當加以優化修改，最好字形與原字相差不大，但卻是常見偏旁。或者就沿用簡化字。從節約和切合實際情況的角度出發，貨幣、交通標誌、商店招牌、國家正式表格繼續使用，毀損以後不再使用，更新時全部使用正體漢字。關於3），簡化字的用途和出路，非常重要。由於幾代人的簡化字教育，當代中年以下的幾乎沒有人會寫繁體字了。由於閱讀港臺版武俠小說，練習卡拉OK，認讀繁體字的人還比較多，一般中國大陸公民書寫繁體字都有困難。所以，在民間場合繼續允許使用簡化字是必須的。同時逐步毀棄電腦中的簡化字點陣字符，不論用拼音還是用五筆字型輸入，屏幕顯示和機械打印全部是正式繁體。將簡化字逐步還原到歷史上的民間俗體範圍中去。簡體字，包括歷代傳承下來的俗體字，還有許多漢字的草書、行書寫法，從來不作為正式文書，也不講究文字淵源，實用而方便，都是歷史上勞動人民包括知識分子的創造。對於這一部分民間文化遺產今天也應當批判地繼承和利用。把這部分文化遺產繼承下來，形成中文的規範手寫體，將是一種重要的繼承。世界各國的語文都有印刷體和手寫體。手寫體比較方便書寫，但是正式文件一般都

要求印刷體，即使在電腦時代以前，西方國家的不僅公文、公函要求印刷體，比較正式的信件，例如致教授、致官方、致尊長的任何函件都要求打字，否則便很不得體。中國尺牘的傳統習慣是毛筆書寫，行草表示親近，正楷表示至尊至敬。印刷時代以後，官府公文也是印刷文件，而且出現了宋體，就是中文的印刷體。但是由於中國的書法歷史太悠久，藝術性太深湛，流派太紛繁，所以手寫體反而很難「定於一尊」成為單一的書寫體。現在電腦時代已經翩然而至，書法藝術已經成為專業藝術，不再那麼普遍，那麼跟西方文字書寫體對應的中文書寫體也就應該應運而生了。

3 · 過渡期中人民可以繼續手寫簡化字

簡化字並不被全面廢止，僅僅退出官方正體地位，並非落入非法地位，反而繼續擁有另一種稍低的官方地位，即正式的中文書寫體。在簡繁轉換時期的簡化字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它將幫助完成恢復繁體的平穩過渡。所有不會書寫繁體字的中國大陸公民完全不必驚慌，他們所寫的簡化字仍然是中國語文的書寫體，經過一定的整理和完善還將繼續通行于中文世界，只是不再作為官方文獻用字而已。他們要打印正式文件，用拼音，用五筆字型或其他輸入方法，因為已經毀棄簡化字點陣字符，所以打印出來的就是正式的正體。當然，必須充分利用電視和電腦信息的傳播，普及識繁寫簡的基本知識。各級電視臺、報刊雜誌將不斷地介紹一些簡繁不對應的字例，比如蘭字的繁體是草頭和門字加束，准字的繁體，什麼時候下面加十字，什麼時候仍然沒有十字。范的繁體什麼時候寫成竹字頭車字加巳，什麼時候仍然寫作范。讓成人公民逐步掌握這些語文知識。國家大量發行《簡化字、繁體字對照字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出版）推廣到千家萬

戶。與簡化字時代正式的簡化字不同的是，退居半官方地位，不再以楷書面貌出現，而僅以行書的面貌出現。楷書和行書分別按國家語文工作委員會的標準規範化。由於今天電視、電腦互聯網的普及，文化普及程度比當年更高，識繁寫簡廢除簡化字的過程肯定會比當初廢除繁體字更順利，更迅速。

4・學校教育的繁簡過渡

一旦實行識繁寫簡，務必事先有所準備，配備必要的師資力量。估計單憑中國大陸的師資不足以迅速付諸實踐。恐怕需要徵募臺灣和香港的知識青年志願者共五千人。務必具備較為紮實的語文基礎知識和國語講述能力，當然也要有為民族文化事業作貢獻的奉獻精神。中國大陸共有兩千多個縣和縣一級的行政區（包括大城市的市區和少數民族的旗）。每個縣級行政區分配到兩名志願者，直接奔赴縣政府機關，舉辦縣級繁簡漢字講習班。參加的學員是當地中小學校的語文教師和黨政機構的秘書、打字員和文字工作人員。經過學習和訓練，結業後的機關幹部再下基層，把文字政策和知識普及到鄉、村兩級機構和人民中去。中小學語文教師將在新的學期開始使用全面更新的正體字教材。徵募港臺青年志願人員的同時，由國家語委組織大學和研究單位編寫通俗易懂，豐富有趣的文字教材，以及編導相應的影視作品，供教學宣傳之用。志願人員在培訓教學結束以後，再下基層視察鄉村學校教學情況，給以指導和糾正。估計港臺青年志願人員大約要志願工作半年至一年左右。

國家語委自己培訓一部分相關教員，派往軍隊、國防、機要單位進行教學和培訓。

從實施的那一年開始啟蒙的學齡兒童從小就學習正體漢字。經過若干年的基本功訓練，然後可以掌握漢字行書，作為手

寫體。他們使用電腦和手機顯示的也都是正體漢字。他們對於傳統的文物和典籍將沒有文字上的隔閡，大概經過這樣兩代人，中華民族就能順利地走出簡化漢字的百年誤區了。

5・可以提前進行的準備

作為過渡性措施，可以儘快實行的政策就是，立刻改變以前中學教材內古文用簡化字印刷的情況，全部文言文課文恢復使用繁體字印刷，直排。讓教師和中學生能夠儘快接受一部分繁體字的訓練。

新的繁體字教科書不能簡單地將簡化字課本轉化成繁體。比如龜兔賽跑的故事，在簡化字課本就可以作為較低年級的課文，在繁體字課本中就不宜很早就讓小朋友辨認那個繁體的龜字；當然如果在宣佈識繁寫簡的時候已經決定將龜字的繁體予以改變，那就沒有問題了。教育界對於兒童智力早期開發，啟蒙認知心理，漢字教學規律的探討已有很多的成就，當語文教學轉入以繁體字為正體的軌道以後，也應對繁體字有及早的認知和材料準備。

前面已經闡述，小學生在習字階段多接觸正體漢字，揣摩漢字的筆劃和結構，實際上是認識民族文化的基本功，是理解中華民族「字本位」文化的熱身訓練。稍微承受一點負擔，可以終身受益。

整個小學各年級的功課不會很多，負擔不會非常重。歷史上百草園和三味書屋裏的頑童魯迅比今天兒童的負擔重多了。在完成這種基本功訓練以後，進入中學就可以開始傳授標準行書，即規範書寫體。可以參照臺灣的標準行書範本，出版相關的教材，發給師生備用。不用花太多的教學精力，中學生自會互相切磋、傳授，教師只需作適當引導，不使出現偏頗即可。由於範本

本身就是書寫體形式，給學生的印象就是手寫用字，非正式規範，也不作語源信息載體。小學嚴格訓練正楷，中學練習標準行書，對於未來中國人的行書規範化和書法普及具有正面意義。德國是現代化的工業國家。打字機在百年前就已成為商品。電腦時代打字更加普遍。可是德國小學初小畢業（四年級升入文理中學或其他學校）成績單裏卻有一項成績就是書寫。手書拼寫評分作為升學的成績之一，導致德國民眾的手寫體普遍相當規範。

6・用正體（繁體）字實現統一，告別一國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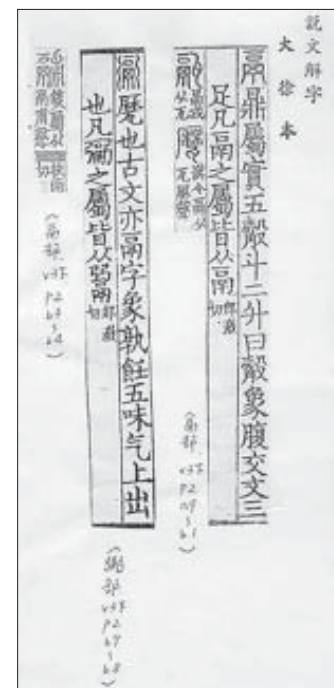
有人說，為什麼不讓港臺人民廢止繁體字，卻讓大陸十幾億人民廢除簡化字？當然必須比較哪一方較為合理。語文的合理是什麼意思？大概可以分三個方面，1）當今時代，2）未來前景和3）歷史傳承。

當前應該廢除簡化字，中國大陸人民的國學基礎越來越差，能夠接近古典人文學術的根基比之於海峽對岸明顯欠缺。簡化字在電腦時代所謂的書寫效率優勢喪失殆盡，而且所謂簡化字易認易學的說法已經被證偽。漢字簡化的理論基礎已經轟然倒塌。再不幡然悔悟，回歸傳統，更待何時？何況還不是簡單地回歸，而是繼承了部分改革成果的合理退卻。恢復繁體將恢復海峽兩岸和世界各地華人世界的語文統一，徹底告別一國兩字的荒唐局面。有人說：「臺灣人也在寫簡化字。說明用簡化字統一有希望。」這又是不瞭解臺灣情況的「想當然」。臺灣教育部在1980年頒佈了標準行書範本，小學五年級以上就可以使用。臺灣的書刊印刷仍然一律用繁體，但是平時書寫可以用行書。行書範本中有585個字跟大陸的簡體字一樣，還有金部61個、馬部34個、鳥部31個字形跟大陸的簡化字十分相近，稍有不同。在書寫中，遇到相同的偏旁，還可以類推簡化。今天的臺灣知識分子

在青少年時代都接受了手寫行書的訓練，所以他們在書寫時，有不少行書字體跟大陸簡化字相同或相近。這正是臺灣知識分子識繁寫簡的實際情況。大陸廢除簡化字以後，民間書寫情況也將跟臺灣日漸趨同。香港的知識分子中也有一部分擁有臺灣的高等學歷（例如散文家董橋），所以也可能會手寫行書簡字。但是港臺的官方文字絕對都是正體，沒有簡體。妄想用粗陋錯亂的簡化字去統一博大精深的正體字，是不可能實現的。

語文的改革必須適應未來的發展，適應電腦信息時代。廢止簡化字，所有簡繁轉換的麻煩問題，全部一掃而空。國際信息交換的統一內碼可以取消所有的簡化字符，大大縮減佔用的國際統一內碼。海峽兩岸甚至可以考慮廢除一套內碼，合用一套內碼，如果順利成功，甚至可以建議日、韓兩國也跟我們進一步協調漢字的統一規範，廢止日韓簡體字，逐步建立漢字文化圈的漢字字符集，全面單一化，那麼國際的漢字系統就真正適應現代化和信息化了。至於漢字不能完全適應電腦信息的殘留問題，應當由電腦專家與中文信息專家協同攻關。其實英文以外的各種語文都有一些疑難問題，並不是只有中文才有問題。德文在適應電腦信息方面也存在問題，機器翻譯也遠遠沒有成功，信息學專家不應太苛求漢字。

恢復繁體，也是合理地面對歷史。現代中國文化恢復正體漢



字就跟中國的傳統文化重新恢復了正常的傳承關係。任何民族的語言文字都非常重視歷史傳承關係。中華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國中，也是全世界唯一的、語言文字一脈相承的民族。1956年以前的高中畢業生可以認、讀名勝古跡中的對聯、碑帖，比如魏碑和多寶塔，不僅能認字，而且可以理解文字的內涵。可以查閱宋代出版的《廣韻》，查閱東漢的《說文解字》也非十分困難，畢竟古代知識分子對經典文獻已經作了不少整理工作。

漢字簡化以後，兩岸青少年連互贈的賀卡都無法卒讀。大陸青少年要閱讀繁體字非經訓練無法勝任，（閱讀港臺小說、視唱港臺卡拉ok 也是訓練）。漢字的這種歷史傳承不應該被輕易拋棄。別的民族是因為戰爭、民族滅絕造成了文化斷層，我們還沒有遭遇這樣的劫難，漢字簡化完全是一場人為的強制變革。既然發現是錯誤的一步，棄新圖舊就是當然的邏輯結論。

7 · 關於甲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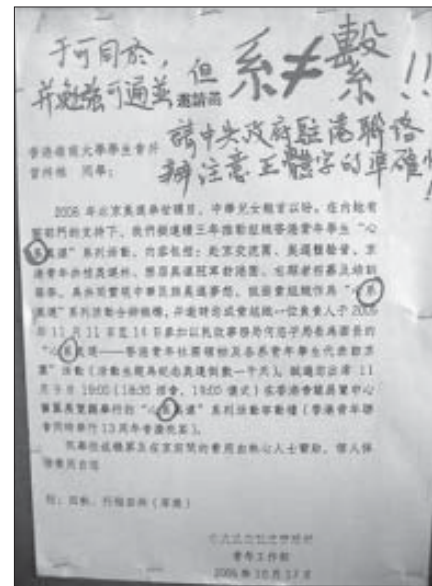
有的人譏諷說：「你說重新接續傳統，何不恢復到甲骨文，那可是漢字的老祖宗」。這是一種不講道理的抬杠。甲骨文是漢字的前身，甲骨文不論書寫工具牛骨、龜甲和石刀、鐵筆都很原始，根本不是成熟的文字，內容偏於卜辭，遠遠構不成豐富的系統。秦始皇統一六國，實行書同文，漢字獲得了歷史的整合。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進一步宣示了漢字六書的規範。漢字恢復跟傳統的統一，就是恢復跟秦末漢初以來的文字基本統一。認識繁體漢字的人，閱讀秦漢的隸書就基本沒有障礙。漢代是中國文字基本定型的時代。所以中國文字以漢為名。隸書從秦末逐漸成熟，進入漢代，行書草書和楷書逐漸出現，漢末已經是隸行草楷四體並行的時代。漢字經過隋唐科舉規範化以後，又從宋代開始進入了印刷時代，形成了中文的印刷體（宋體），一直

發展到元明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延續共約兩千年的漢字統一系統，就是這個系統，而不是统一到尚不成熟的甲骨文。

8 · 香港大學生對簡繁轉換的反應

這幅插圖不太清楚，但是傳達了很重要的信息。這是一封由中國官方駐港機構發給香港嶺南大學學生會的邀請信。內容應該說是十分客氣、友好的。而且為了尊重香港學生使用繁體字的傳統，信件改用大陸罕用的繁體字打印張貼。誰知道不寫繁體字還好，寫了繁體字反而惹出了麻煩。簡繁轉換不能一一對應，出現了錯別字現象。一封公函竟有錯字如許，令香港學生覺得大陸官方機構的文職人員連一封區區百字的信函都寫成這樣，實在水平堪憂；從另一個角度上看，駐港官方機構的文職人員因是肥缺，門檻不低，往往碩士學銜方可以問津。偏偏這類簡繁對轉，學校裏不教，市場上學不到，到了香港被當地學生指責，看不出自己有任何錯處，很可能產生反感，覺得港臺學生吹毛求疵，莫名其妙。

這種隔閡是由漢字簡化的同音替代造成的。同音替代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是一種語文的倒退。中文的發展已經能夠用不同的漢字（詞語、觀念）來表



達十分精微的區別，簡化漢字的同音替代卻放棄了這類精微的表現力，於是落入了粗放。任何語文，越能表現精微的語義和情緒，就越豐富、越成熟。從這個意義上說，簡化字的同音替代實在不是進步，而是反動。文學老人巴金生前提倡講真話，他在《隨想錄》中這樣寫道：「我不會再說燒掉線裝書的蠢話了。我倒想起三年前自己講過的話。語言文字只要是屬於活的民族，它總是要不斷發展，變得複雜，變得豐富，目的是為了更準確、更優美地表達人們的複雜思想，決不會越來越簡化，只是為了使它變為簡單易學」。（《隨想錄》第400頁）

9 · 不能一一對應的字例

恢復繁體，就會遇到簡繁轉換不能一一對應的部分字例。到底一共有多少這樣的情況，應該如何應對？全部統計下來，不超過一百個。請看：

厂 摆 板 表 别 卜 才 冲 种 丑 出 当 淀
冬 斗 恶 发 范 丰 复 干 谷 刮 合 后 胡
划 回 汇 夥 获 几 家 姜 借 尽 卷 克 困
适 累 里 历 帘 了 霉 蒙 弥 面 蔑 万 辟
朴 仆 千 签 纤 秋 曲 舍 沈 胜 松 苏 台
坛 团 系 咸 向 吁 须 旋 么 叶 佣 游 于
余 郁 御 愿 云 芸 脏 折 征 症 只 致 制
鍾 朱 术 筑 准

——摘自《救救繁體字》網站 香港 書蟲小組

表中一共九十六個字。當中，餘字已經有了新的規定，餘餘都能在簡化字庫中找到；於字也有類似情況，於字也存在於簡化字庫內。另外，凶字在轉換中也有不同的情況，所以應該是九十七個。廢除簡化字以後，一般群眾只要記住其中的常用字就可以

應付裕如，語文教師和出版社編輯（文史哲類大專以上學歷）則必須瞭解其中的大部分轉換情況，還有一些純屬專業的特例，不屬於普通知識。

10 · 識繁寫簡的開支

過去我沒有提出恢復繁體的主張，是因為擔心中國綜合國力承擔不起轉換字體造成的印刷、交通路標、貨幣、圖書館檢索系統、文獻檔案等部門的巨額支出。現在中國的國力正在迅速增長，國民經濟總產值增長率在八、九、十之間徘徊，產值和出口都開始超過聯邦德國，成為世界的重要經濟力量。每年的貪官外逃資金總在數百億美元以上，被雙規的幹部們，來路不明的浮財動輒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從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一日開始進行，至十二月十八日完成的中共中央紀委、國務院研究室、監察部聯合調研報告《關於黨政國家機關系統挪用、侵佔公款（稅收）的狀況》指出：「全國黨政、國家機關系統違規、違紀挪用、侵佔公款（稅收），吃喝、公款休假旅遊、公款出境出國讀書、公款送禮、公車私用、公款濫發獎金和福利，本年度高達二萬億元。二萬億相等於二〇〇六年全國稅收收入三萬九千八百餘億元的50.5%，相等於二〇〇六年國民經濟總產值十八點五萬億元的11.5%。」只要截住幾個外逃貪官，揪出幾個雙規幹部，只要拿出二萬億元的百分之一來，國家便足以承擔恢復繁體漢字的基本支出而綽綽有餘了。關鍵是黨政領導人有沒有這方面的理念。敢不敢坦誠認錯並及時改正，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党和政府曾實行計劃經濟，廢止了國民黨時代的物權法，幾十年過去，發現必須恢復實行市場經濟，又發現市場經濟不能沒有物權法，於是再重新制定新的物權法。繁體字的使用為什麼不能作如是觀？

第九章「漢字難」說法的由來與發展

已故現代作家巴金在他的《隨想錄》中講了許多真話，關於漢字改革，他曾經這樣寫道：「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學漢語漢字並不比學歐美語言文字困難。西方人學習漢語漢字的一天天多起來，許多人想通過現代文學的渠道瞭解我們國家。我們的文學應受到尊重，我們的文字應受到重視。它們是屬於人類的，誰也毀不了它，不管是你，不管是我，不管是任何別的人。」巴金也是曾經表示過「燒毀一切線裝書」的人。在《隨想錄》的這篇文章中他為此懺悔了。他是經過了文革之後，痛切反思後重新開始寫作的，每個字都是反思之後的想法。他是以中文為文字工具的作家，又是學習過歐洲語文的海歸學者和有大量翻譯作品的翻譯家。他的話應當有足夠的分量。

在1957年有關文字改革問題的「鳴放」中，詩人和文字學家陳夢家早就說過：「漢字雖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並不多，普通人認識三千就可以了。……有了這三千字，就來研究怎麼教。有人說漢字難學，我說不難，所以難，是教的人沒教好。」「首先肯定了我們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漢字還是很好的工具，是簡單而不複雜的，是和漢語語法相聯繫的，是一種不必廢除的民族形式。」「在沒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佈漢字的死刑。」「文字這東西，關係了我們萬萬千的人民，關係了子孫百世，千萬要慎重從事。」「漢字為我們過去許多朝代服務過，也為革命服務過，現在為社會主義服務也還是可以的。」因為這部分言論，陳夢家被打成右派分子。

另外，著名法國漢學家、法國教育部漢語總督學和博士生导师白樂桑先生經常這樣說：「我經常聽到中文難這樣的說法，很奇怪，說這話的都是你們中國人。」

奇怪嗎？其實也不奇怪。這跟中國文字改革的歷史有關。

幾乎所有的現代漢語教科書、掃盲材料、中國文字都有一章或一節說「漢字難學、難寫、難記」。這是為中國大陸簡化運動作理論鋪墊的基本政治口徑。說漢字難，就證明瞭簡化政治上的正確。

這種看法到底是從哪里開始的？是跟西方拼音文字發生碰撞以後開始的。這個說法，也對也不對。漢字在歷史上也接觸過外來文化，魏晉南北朝時代開始，中國文化就曾與印度文化邂逅交往，唐代佛教僧人玄奘不遠萬里負笈天竺，終於學習了梵文，取來了梵文真經，傳為歷史永恆的佳話。那個時候，也有中國的其他知識分子學習梵文，而且還逐步發展了佛教的哲學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國儒家特色的佛教分支禪宗。梵文本身就是拼音文字，接受梵文的影響，漢字注音開始了反切的時代。但是那個時代沒有聽說「漢字難」的說法，更沒有廢除漢字，改用梵文的主張。



現代作家巴金。

明末徐光啟也向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學習了外文，並將《幾何原本》等西方科學著作翻譯成中文，而且這些傳教士也開始編創漢語拼音的方案，甚至編寫了《西儒耳目資》這樣用拼音給漢字注音的書籍。當時也沒有出現漢字難的說法。

漢字難的說法有幾方面的來源。

第一，漢字難的說法應該起因於日本的脫亞入歐時代。1885年，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了「脫亞入歐」的理論，當時雖然也曾遭受反對，但是它標著日本社會的經濟文化轉型的開始。過去日本處處以中國為榜樣，此時開始，處處以歐洲為榜樣。日本的文字是漢字和假名並用的文字。這時漢字和假名都受到了強烈的質疑，有人甚至提出了廢除日文，改用英文的主張。假名不如西文方便，不方便打字，不方便電報傳輸，而漢字比假名更複雜，漢字難的想法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這類思想反映到中國，以錢玄同、魯迅、陳獨秀等人為代表的留日知識分子在日本看到了這樣的社會傾向，看到了漢字在日本衰落的趨勢，回到中國便不斷地堅持廢除漢字、改用拼音的主張。1892年福建人盧懋章提出了最早的拼音方案，一方面接受了西方拼音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受到日本假名的影響。

第二，漢字難的說法也來源於歐美。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面對陌生的西方世界。1900年庚子之亂，八國聯軍一度佔領北京，中國割地賠款，進一步門戶開放，西方國家的工商業更加大踏步進入中國。學會漢語中文的人也增多起來。但是學習中文的人主要都不是歐美國家那樣通過外文基礎教育那樣，按部就班地培養出來的。西方國家歷來注重學習外語的教育傳統，拉丁文教育源遠流長，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法文是知識分子身價和地位的標誌，英文是商界通用的工具，德文是醫學界、技術階層的基本功。可是中文則始終是遙遠東方古國的怪誕

的語文。德文中凡是說到不可理解的、怪異荒誕的、醜陋難看的事物，就可以說是chinesisch（中國的或中文的）。1964年中法建交的時候，戴高樂總統在新聞講話中仍稱中文是「難懂的語文」。那些時代在西方學習中文通常是不可能的事情。漢字本身的獨特性造成了西方人接近中文的困難。日文好歹還有假名可以拼音，漢字當時沒有一套比較科學的注音系統，威妥瑪氏拼音在表達上存在問題，不送氣符號容易被忽略遺漏，分不清舌面前音和舌尖後音，再加上漢語的聲調辨義、方言分歧，漢字完全不同於任何其他文字系統，筆劃複雜，沒有比較劃一的規則可循，這些特性在已有的歐美語言中，沒有任何參照系可供依傍。因此當時在西方根本沒有建立中文學校或教學體制的可能。只有到中國去的人才有一點點可能學習中文。這種狀況直到二次大戰結束以後才略有改變，西方大學開辦漢學系，招收漢學新生。歐美國家的青少年可以選學中文的教學體制更是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才稍稍起步。根據認知心理學的理論，學習語文都有一個關鍵期critical period。也就是說，學習語文的人往往在年齡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從兒童學語時期（各派心理學家略有爭議），到青春期末為止，是學習語文，包括第二、第三語文的關鍵時期，過了這個關鍵期，學習的效果和達到的程度都受到影響，年齡越大，效果越差。語言，主要是口語，還比較容易掌握，文字則更加感受到關鍵期效應。早期的漢學家幾乎清一色都是傳教士，如利瑪竇（意大利）、湯若望（德國）等人。他們具有宗教的獻身精神，努力克服學習中的困難，分別到肇慶和澳門長期學習中文，當時他們還比較年輕，分別為30歲和29歲，英國傳教士麥都思是在青年時代到達南洋，在今新加坡、雅加達等地接觸到華僑社會，20歲學習馬來語，爾後陸續學會了多種漢語方言；美國傳教士林樂知24歲到達上海，得以師從上海西學名士王韜，深入學習了漢

語漢字；二十世紀的西方來客，像司徒雷登那樣出生在中國杭州，能自如地操用中英兩種語文的人畢竟是例外中的例外。這些漢學家能深諳漢語漢字，都有一定的偶然性，都不是正常外國語文教育的結果。其他西方來客主要都不可能是從幼年就來到中國，或自幼就學會了中國語文的人。他們來到中國的時候，一般都已成年，甚至更加年長，早已過了青春（語言學習的關鍵期），為了職業的方便，商業、外交、科學考察探險等等，當他們不得不學習漢語漢字的時候，立刻感到這種完全不同於拼音文字的陌生符號，從思維習慣上就格格不入，不要說學習，就是接觸和接近都比登天還難。但是他們錯了。他們把兩種文化之間的溝通困難，即溝通中介的不足（注音方案不便捷）、輔助參照系統的缺失（西方語文沒有聲調，沒有筆劃部首供參照）等困難，誤判為個體習得的困難。他們的抱怨又恰恰總被中國最活躍、最有思想的外向型知識分子所與聞，於是當時中國知識界著名的知識分子幾乎大部分都受到了影響，都覺得中文的確是太難了。平心而論，錢玄同、魯迅、胡適、陳獨秀、趙元任、傅斯年等人都是當時中國社會第一流的飽學之士，他們的中文學養也都譽滿全國。自幼學習漢字他們應該並未發生過什麼困難。可是為什麼他們也會認同漢字難的說法呢？一方面當然是五四時代反傳統、反封建的氛圍，另一方面，也跟他們的精英主義的觀念有關。精英們相當關注下層平民的狀況，他們注意到，大量的平民「引車賣漿之流」大字不識一個，而且為認字叫苦不迭。他們的聯想邏輯只能是，自己因為是精英人物，是天才，所以學習漢字並不費心費力，而這難學的漢字對於廣大勞苦大眾芸芸眾生來說，肯定「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傅斯年：《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初步談》《新潮》1卷，第三號）。

第三，漢字難的說法也是蘇聯極左理論直接影響的產物。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蘇聯掀起了一場被列寧稱為「東方偉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運動。運動目的是將蘇聯各少數民族的文字實現拉丁化。這場運動也波及到了當時僑居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十萬華僑工人。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專門培訓中國革命幹部的培訓學校）中國問題研究所開始研究中文拉丁化問題。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和蘇聯漢學家郭質生（俄人漢名）等人參與其中。1929年瞿秋白在郭質生協助下完成第一個拉丁化方案，出版了《中國拉丁化字母》一書。瞿秋白回國後，此項工作由列寧格勒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的中文拉丁化委員會繼續進行。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礎上擬成「中國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5月，全蘇新字母中央委員會批准了這個方案。同年9月26日吳玉章、林伯渠、蕭三和蘇聯漢學家龍果夫在蘇聯遠東城市海參崴召開了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正式通過上述方案。會後，吳玉章等人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僑工人中，以及後來撤退到蘇聯境內的抗日義勇軍官兵中嘗試推行，展開掃盲。在蘇聯少數民族中這場運動實際上也是伴隨著政治恐怖的。瞿秋白在《論大眾文藝》中指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經認定凡反對韃靼等民族改用羅馬字母的人，事實上等於出賣階級。」瞿秋白為這段話所加的注解說：「胡愈之在《莫斯科印象記》上提到的正是這些右派機會主義者」。也就是說，蘇聯歷史上曾經將反對拉丁化的持不同意見人士打成「右派機會主義者」。《昭雪漢字百年冤案》的作者李敏生不勝感慨地指出：不幸的是，這一歷史悲劇於1957年也在我國重演（第276頁）。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還通過了《中國漢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則和規定》。這一文件今天看來也是相當極端的。例如：大會認為中國漢字是古代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

的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合於現在的時代。又如：大會認定那種認為「拉丁化僅是初級教育的工具，以後仍要教授漢字和文言文」的看法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態度。大會還提出要清除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上不正確的詞語，輸入國際上革命的、政治的、科學的、技術的新詞語。這類觀點與當時蘇聯語言學界存在的錯誤思想密切相關。1928年瞿秋白等人來到莫斯科（中共六大在蘇聯召開）的時刻，正是斯大林的文化革命時期（1928年至1931年）。「1928年斯大林發動了「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該詞的英譯是Great Breakthrough into Socialist Construction，中國讀者或許會由此聯想到毛澤東1958年提出的類似口號），「文化革命」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程曉農：《毛澤東向斯大林學到了什麼——中蘇文化革命比較和啟示》，《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三期》），也是所謂馬爾新語言學說在蘇聯語言學界狂熱抬頭的時期。馬爾新學說引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套用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之類的概念，將語言文字視為上層建築，認為語文具有階級性。1931年蘇共16大期間，格魯吉亞考古學家和語言學家馬爾院士作為全蘇科學家的代表登上講臺，一時間馬爾新學說紅得發紫。而瞿秋白的方案剛好在這個時期編訂出版，並經過蘇聯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龍果夫和郭質生的修訂，吳玉章、龍果夫等人的第一次新文字代表大會也剛好是在這個時期舉行。（1934年馬爾去世，但是他的那一套錯誤理論依然盛行）。馬爾學說在蘇聯氾濫成災，引起思想界的多年混亂，到了1950年斯大林終於不得不發表文章《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予以澄清，否定了馬爾的錯誤觀點。從瞿秋白在蘇聯編寫新文字方案，到吳玉章等人在海參崴召開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大約經過三年時間，而這三年正是斯大林厲行文化革命的時期。斯大林清洗與官方觀點不同的知識分子和

專家，將黨員和親近黨的幹部安插到學術和科研單位的領導崗位。在黨的意志統治一切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與瞿、吳等人合作的蘇聯學者不可能不接受當時紅得發紫的官方語言學理論，不可能不影響他們的語言觀和他們的方案和決議。1950年斯大林的語言學文章問世以後，吳玉章等人後來曾經做過檢討，而瞿秋白早已在1936年被國民黨殺害。瞿秋白的語文觀明顯是含有階級論內容的。他甚至將中國古文稱為「古代紳士文」（《瞿秋白文集·二》第658頁）。從代表大會的文件來看，當時的中國新文字派人士都有一種共識，漢字是封建社會產物，是統治階級壓迫勞動階級的工具，不僅不能供勞動人民使用，反而是人民識字的障礙。這些思想也在中國的左翼文化界留下了痕跡。1935年蔡元培、魯迅、郭沫若、矛盾等688人提出意見書《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說：「教育大眾的工作，開始就遇著一個絕大的難關。這個難關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難認、難記、難學」。瞿、吳和左聯人物的語文思想跟上述蘇聯語言學界的錯誤思想之間的內在聯繫是十分明顯的。

這些觀點一直長期延續，不論在延安革命根據地的新文字冬學班，還是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左派人士的新文字實驗班，都持續發生著影響。戰爭結束之後，毛澤東宣佈「我們一邊倒」。共產黨建國以後，崇拜蘇聯，追隨蘇聯的傾向更加壓倒一切。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文章對黨內知識分子有所震動，理論上也清算了「語言階級性」的錯誤，但是那是比較抽象的批判，並沒有具體落實到對漢字的認識上來。在如何評價漢字的問題上，依然認定漢字是不適合勞動人民的文字。這類觀點一直主導著文字改革委員會，例如對待漢字的態度也一直延續了上述決議的思路，堅決主張拉丁化，把反對拉丁化的態度說成是右派資產階級的態度；同時主張不能立刻廢除漢字，逐步推行拼音，才能取消漢字，所

以簡化漢字只是推行拼音的過渡階段。六十年代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無限擴大化，終於釀成十年浩劫，這類將漢字看成階級壓迫工具的理論如魚得水，始終沒有得到認真的清理，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然餘波蕩漾。近年來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報刊上爭論漢字繁簡的問題時，還有人認為漢字是封建統治階級故意不讓勞動人民掌握文化設置的障礙。這類青年學生的看法分明是從國內的教育中積累起來的。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堅持摒棄漢字的這些前輩人物當年真誠地、艱苦地展開過社會實踐和田野作業，在這些實踐中他們所見到的確實是一批又一批文盲，蘇聯遠東的華工，東北義勇軍的遊擊戰士，陝甘寧邊區的指戰員，武漢、上海難民收容所中逃難的百姓，他們都是錯過了語言學習關鍵期的文盲，說到底都是中國各地的農民。由於中國經濟的貧困、教育的落後，社會的動盪，帝國主義的入侵，造成了他們在幼年時代沒有獲得教育機會或太少享受教育機會，他們成年（錯過關鍵期）以後，掃盲不易。不幸，這樣廣泛的實例更加助長了新文字派的錯誤理論。這是我們今天應該冷靜地觀察和分析的歷史現實。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既要徹底地清算這些理論的謬誤，又不應脫離歷史環境地苛求前人。中國文字改革的歷史偏頗是偏重於掃盲的實踐，忽略了兒童啟蒙的研究。從現代心理學理論來看，兒童和成人的認知心理存在著根本的區別。本章開頭引用了巴金的真話，他的經驗告訴我們，學漢語漢字並不比學歐美語言文字困難。我們每一個有文化的同胞，不論是簡化運動以前還是以後正常啟蒙的中國人，捫心自問，從白丁孩童到逐步閱讀書寫，真的是非常艱難痛苦？還是並非痛苦，而是自然而然？不要忘了，從大約兩千年前，漢隸的筆劃就跟楷書相當接近了。今天認識繁體字的人辨認大部分隸書都不甚困難。從那個時候起，中國人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學習

漢字，傳承文化的。臺灣和香港同胞至今都是繼續認讀繁體漢字啟蒙的。（前面章節已經分析了漢字繁簡在認讀方面並沒有區別，尤其是在啟蒙階段教材更不會選用特別繁難的漢字）。甚至西方的兒童跟我們在啟蒙階段差別也不大。在學習字母的時候，a 讀作a，b 讀作b，就是要憑記憶，機械的記憶。我們的人手口刀牛羊，也不過是兩三筆，五六筆的漢字嘛！同樣也是機械的記憶。從兒童思維的特點來說，低年級兒童並不善於邏輯推理，對發音規則、拼寫規範並不敏感。他們依靠的主要就是機械的記憶。漢字的筆劃是多一些，可是漢字學一個就是一個，記住了就不再變化；英文的元音發音變化多，而且很多有法不依；德文名詞的性別有相當一部分必須死記，動詞的變位也有許多例外，單詞寫入文句就不斷有性、數、格的變化，即使是按規則變化的情況，對於啟蒙初步的兒童來說，規則、規範都太複雜，他們一時都無法理解和應用，最直接的辦法還是利用自身的機械記憶優勢，將他們記住。中國蒙童要記住音形義，但筆劃比較多；西方蒙童也要死記音形義，字母拼寫成單詞，雖然「筆劃」（字母）不見得比漢字多，（有時也不見得少），但是還要記住許多詞尾、屈折變化，很難說一定比我們的兒童負擔更輕。隨著學習的進步，蒙童各自按照本身語文固有的記憶路徑發展，（西方按拼音範型，中文按部首）逐步完成語言文字的修養。從實踐上看，沒有一種語文是輕而易舉就能學會的，而且一旦錯過語文學習的關鍵期，無論中外的成人掃盲都一樣的困難重重。

傳統漢字不僅記述了先秦四書五經，兩漢歌賦樂府，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說，而且也曾經承載了共產黨人的革命著述和解放區時代的工農文藝，漢字難完全是歷史的冤案，是外國人對漢字隔膜造成的誤解，是蘇聯極左思潮的惡劣影響造成的惡果。每一種語言文字都具有多方面的特點，僅從漢字筆劃的一個方面

就斷定一種語文比別的語文更難，這種判斷本身就是一種帶有先入為主偏見的判斷。這種誤判誤導我們已逾百年，在重新審視中華民族文化的新時代，我們應當徹底地清醒過來了。

第十章 漢字簡化和電腦信息化

漢字改革的成敗歸根結底還要看它對漢字現代化，也就是電腦中文處理和中文信息交換有沒有好處。從電腦進入中文世界以來的實踐來看，可以下一個肯定的結論：漢字簡化沒有任何好處，反而有多方面的壞處。也就是說，如果當年不搞漢字簡化，中文的電腦信息化可以減少許多麻煩問題。

1·漢字進入電腦是中華文化適應現代信息社會的里程碑

現在沒有人不知道，電腦中文處理的成功使得漢字簡化的所謂「寫得快」失去了理由。電腦輸入漢字不論簡化字還是繁體字，用各種輸入法，拼音、五筆字型、倉頡等等，都跟筆劃的多少完全沒有關係。輸入速度甚至不比英文慢。簡化字和繁體字輸入電腦，速度可以一樣快，運用一條命令，就可以自動轉換。反而是簡化字的同音替代造成了新的麻煩，造成特有的機器轉換錯別字。如果沒有當年的簡化歸併，今天的電腦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眾所周知，當電腦剛剛出現在國外市場的時候，很多人都認為中文很難利用電腦這樣先進的信息交換工具。可是經過短暫的時代，電腦已經在中國海峽兩岸飛入尋常百姓家。漢字成為電腦螢幕的語文，沒有外文知識，沒有電腦理論基礎的中國人也可以自如地運用電腦寫作，製圖，上網。各種輸入法不統一，被形容為「萬碼奔騰」，沒有獨尊一碼的輸入方法確實是遺憾，但是總比面對電腦，漢字無所作為而萬馬齊喑好得多。漢字進入電腦是中華文化適應現代信息社會的里程碑。從甲骨文到電腦中文字庫，迤邐綿延了五千年，居然仍能夠在互聯網無遠弗屆的空間廣闊馳騁，怎不令人欣喜不已。

現在，漢字進入電腦的情況發展如何？國際標準化組織工

程的實踐已經清楚地表明：（C、J、K三個字母分別代表英文中日韓三國的第一個字母。CJK 則代表國際標準化組織下，三國共通的表意文字編碼字庫，Extension 表示擴展集）。

像《四庫全書》這樣7億漢字的古籍巨著，CJK的20902漢字已經可以解決99.4%的問題（不包括小學類字頭），如果再加上CJK Extension A便可以解決99.9%的問題。即便像《四部叢刊》這樣被圈內譽為版本比較好、沒有做過規範化整理的古籍，CJK的20902漢字竟可以解決其1億漢字的98.1%的問題（不包括小學類字頭），如果再加上CJK Extension A便可以解決99%的問題。

像《中華文化通志》百卷本1300萬字的當代巨著，CJK的20902漢字可以解決99.97%的問題。像《人民日報》這樣內容寬泛的現代出版物，以其1998年一年的2,694萬數據為例，GB 2312的6763漢字就可以解決99.993%的問題，其中「鎔」和「佩」兩個字在0.7%%外字中的佔有率竟高達93%；如果採用CJK的20902漢字，外字僅出現6字次，所佔比例微乎其微。

至於CJK Extension B和即將頒佈的CJK Extension C1，主要適用於進一步支援類似《康熙字典》和《漢語大字典》這樣大規模字、辭書的電子印刷和電子出版。（中國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王曉明：《用信息化手段進行語言文字研究》）

2 · 漢字的信息

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中文輸入仍然跟西方語文的輸入存在編碼上的重大差別。在中文和西方語文的表達和豐富性上並不能說有什麼優劣之分。但是作為一種古老的表意文字，卻明顯地呈現出漢字在信息交換方面不如西方拼音文字便捷和便宜。這是我

們必須注意到的客觀情況。

第二次大戰以後，美國科學界出現了現代信息學理論，其中重要的概念是信息熵entropy或者譯為信息量information content和資料壓縮方法。信息熵理論涉及到信息科學最基本的原理和方法。

以馮志偉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從七十年代開始，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進行了信息熵的測算。雖然是人工進行，居然測算出了與後來用機器測算基本接近的科學資料。漢字的平均筆劃為十二劃，繁體字的平均筆劃僅比這個數字略高一點。漢字的容量極限是12366個漢字。漢字的信息熵為9，65比特。與之相比，西方主要語文的信息熵是：法文3，98 西班牙文4，01 英文4，03 德文4，12 俄文4，35。中文的信息熵大得驚人，比主要西方語文大一倍還不止。根據一些信息工作者的說法，認為漢字的信息熵越大，在信息傳遞、交換、翻譯、比對和查詢中就越處於不利地位。

面對這樣嚴峻的說法，應該如何對待這個文化和科學的問題？有一名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的教授V. H. Mair 在他的文章《評馮志偉教授的兩本書》中主張中國人應當逐漸淘汰漢字，在若干個十年內逐步廢止漢字，最終使用拼音文字。改革開放以後，大批中國公民留學或移民歐美，「英文盲目崇拜」現象也應運而生。一些中國信息界人士，包括一些海外華人信息工作者，竟贊同這位美國教授的想法，提出廢除漢字，改用拼音，以便於信息化。這是在老一代拼音派節節敗退以後，又一波拼音化的浪潮。不過已經完全沒有前一波拼音派那麼旁若無人，來勢洶洶了。這種要求實際上是本末倒置。電腦信息手段作為一種工具應當適合於各種文化。如果不能適應，就應當不斷改進自身的設計，而不應該去要求文化用戶來削足適履。當今的電腦中文系

統，實際上仍是建立在英文運作的基礎上構建中文字庫實現漢字化的。如果未來如馮志偉教授所構想的雙文系統，在電腦傳輸運作中使用拼音字母，在人機對話中又敏捷地恢復漢字顯示，那麼就可能避免這類信息傳輸的不利情況了。當然這種新的無字庫中文電腦現在還僅僅在設想階段，或者在實驗階段，還不是現實。那麼我們姑且就以「漢字熵過大，不利於信息傳輸」為前提，來分析實際的電腦中文處理系統狀況。

今天，漢字是作為一個圖形出現在電腦螢幕上的。每一個漢字無法如西文中的字母abcd那樣，用單字節來承載，每個漢字（圖形）必須至少用雙字節來承載。單字節承載的西文字母比較靈活，理論上說，幾乎可以跟任何其他字母結合，組成新詞、新句。可是雙字節組成的漢字，必須是固定的結合，兩個字節固定在一起行動，作為一個漢字，再與其他的漢字組成詞或詞組，然後再組成文句。漢字耗用國際統一編碼的字節比其他拼音文字多得多。即使這樣，漢字還是容易在傳輸過程中出錯，變成無法閱讀的壞碼，（不是亂碼，亂碼還能糾正）。為了能夠檢驗奇偶和抗錯，國際上應用了國際聯碼unicode。漢字不僅是中國大陸的文字，臺灣的文字，也是日本、韓國、越南的文字。西方拼音文字的國家不可能單獨使用互聯網，把中國大陸、臺灣和日本、韓國，將近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排擠在外。交流總是互惠的。國際標準化信息組織ISO反而比上述那些人物更加理性，理所當然地用unicode接納了漢字文化。應用國際聯碼成本的確會相應提高，但是為了能在同一個地球村上共存，在同一個網路天地中互動，這個成本還是值得的。而且信息熵比較高的文字並非漢字一家，各國也還需要許多固定的多種符號，也要分占國際聯碼的碼位。漢字在這方面佔用當然特別多，但是世界能夠跟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在互聯網上並肩往還，無論在經濟上、文化上絕對是利

大於弊的。漢字文化圈內的國家也應該有相應的自知之明，盡可能不要低效率地佔用這些空間。比如，應該考慮廢除重複佔用空間的簡化字和繁體字，統合各國的漢字編碼，努力實現完全的國際化、標準化、集約化。

因為中文信息處理的理論涉及到信息熵。一時信息熵成為一個重要話題。「漢字信息熵特大，所以中文信息處理就特別落後」這樣的論調便沸沸揚揚。信息熵作為信息科學技術的基本原理，當然不容忽視，我們也感謝中國的信息科學家在艱苦的條件下克服困難測出了漢字的信息熵以及平均筆劃和極限容量。但是中文信息處理的科研和實踐並不能只考慮信息熵。不應陷於科學主義的窠臼。好比二十世紀的營養學從小到大，漸趨成熟，發現了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礦物質和維生素，以及植物纖維素等營養素。尤其是維生素的發現，對於人體生理學、病理學、醫藥學、烹調術都有深刻的影響。翻譯西方營養學的中國學者甚至盛讚西方食品的營養豐富，符合科學，譴責中國人的飲食習慣，烹調方式，認為中國人的食品和烹調很多方面不符合營養學，甚至覺得中國不改變這些傳統方式，就難以摘去東亞病夫的帽子。其實營養學只是把飲食和藥品推上了科學分析的平臺。人們可以分析各種菜肴、飲料的營養成分，有計劃地設計營養豐富的菜譜和生產各種含量的藥劑。人們後來發現，在營養學誕生的歐洲，也會發生嚴重的肥胖症，反而許多西方人羨慕中國人飲食的合理，羨慕中國人身材的適度。營養學可以優化生理學、醫藥學，可以告訴我們菠菜豆腐湯雖然爽口，形成草酸鈣不能被腸道吸收。但是不能因為有了營養學就要徹底改變各民族的飲食習慣，改變中國的烹調藝術。按照中國傳統的烹調術，蔬菜的切洗方式和熱加工手段炒、煮、燜、焙，營養成分，多種維生素很容易流失，不如西方人多半做成涼拌沙拉，避免營養流失。中國人

的魚肉刀工講究片、丁、絲、糜；烹調講究煎、燉、煲、醃，比之西方的牛排、豬排臨吃現切，顯然也不易保持營養成分，特別容易造成維生素流失，很不「科學」。北京鴨的烤後風晾工藝更令美國衛生當局側目。然而香脆酥嫩的北京鴨仍以它的美味戰勝了乾巴巴的營養學結論。這就是文化與科學的不同。氣象萬千的人本文化常常不服從科學的簡單結論。中國烹調文化中營養素、特別是維生素的大劑量流失就相當於中文電腦信息中的信息熵。中國烹調雖有這般遺憾，人們還是珍愛中國菜肴的美味和適度，於是中國飲食在世界烹調文化中獨樹一幟，始終佔有重要的地位，與其他民族的烹調文化並駕齊驅。

信息熵是一個重要的科學技術概念。但是信息科學必須是為人服務的，每個人都是具體的，都是出生成長於某個民族的、屬於某種文化的。信息技術必須適應每一種具體的民族文化。某種科學如果是人力無法影響的，比如天體物理，它就是可能用數學解析式來充分表達和描述的。如果它涉及到人的思維、情感，它就不可能用數學解析式來簡單表達和描述。涉入越深，就越難表達和描述。語言文字當然會涉及到人的思維和情感，所以它們肯定不是某一個單一科學技術概念就能夠簡單決定一切的領域。

信息熵是信息技術的重要基礎，但是不是唯一的基礎。如果文字信息處理僅僅考慮信息熵，那麼全世界的文字信息處理都應該向法文靠近，因為法文的信息熵為3,98，比任何其他語文都低，連英文（4,03）也望塵莫及。是不是應該廢除英文向法文靠近呢？從純數學集約化的理念出發，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可是從人文語言的現實出發，答案絕對是否定的。人人都知道，電腦的命令都以英語為基礎語言。改用法語必令電腦世界天下大亂。英語、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的熵都相差不大，可是它們之間的電腦自動化翻譯也遠遠沒有突破瓶頸，為什麼偏拿中文漢字來說

事？一部分希望全盤西化的中國人，就是患了厭惡中國文化的毛病，一有什麼新的理論，就想毀滅中國的固有文化。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教授V. H. Mair 主張中國人應當逐漸淘汰漢字，在若干個十年內逐步廢止漢字，最終使用拼音文字。面對這種論調，我們不妨提出反駁，你們的拼音文字，信息熵也在四左右，分明也不是什麼最優化選擇。既然信息熵越大，信息處理速度越低，成本越高，為什麼不創造一種最優秀的語文，令其信息熵降低到1，甚至降低到不等於零而趨近於零？那樣的理想語文才過癮呢。然後世界各民族都廢止自己的語文，逐步使用這一種無與倫比的理想語言。有哪個國家願意這樣辦嗎？信息熵制約信息處理技術的問題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英文的言文不一，拼寫有法不依，同音詞、連讀等等也會制約英文的信息處理。將信息熵問題說得如何如何，似乎中國人的信息處理跟先進國家相差十萬八千里，非廢棄漢語漢文不足以亦步亦趨。漢字優越論固然是故步自封的說法，漢字落後論也是荒謬絕倫的自甘暴棄。

漢字「在國際信息交換中十分不利」到底是什麼意思？大致應該是指電腦信息交換的速度比英文等外文稍低。記得有人曾經說過，如果不廢除漢字，萬一發生戰爭，中文信息方面就會吃虧。這種說法看似有理，其實相當外行。兩國交戰，軍令往還收發一般不可能採用明碼信息，務必使用密碼。用不用互聯網傳遞，密碼轉換所需時間的長短，涉及軍事機密，都不是我們可以隨便探問的信息。抗戰時期中國軍方雇用的銀行高級職員池步洲比英美情報機構更早地破譯了日軍偷襲珍珠港的密碼。中日兩國都是借鑒西方的密碼技術發展出了各自的密碼系統。當年中國人能夠成功地破譯過外國的密碼，未來就一定會在密碼信息上失利嗎？

如果這種「在國際信息交換中十分不利」是指機器翻譯，

那麼外國的拼音文字之間翻譯瓶頸也沒有重大的突破，並非漢語漢字特有的問題。中國科學院概念層次網路理論、漢字本位理論等等也在探索中。

關於信息處理的新進展，我們可以瞭解到：按照處理信息的深淺程度來分，可將信息時代分為兩個階段：即現階段和新階段。現階段的特點是只對信息進行表層處理或淺層處理，例如，目前流行的字處理、基於語料統計的語言信息處理、具有一定語法分析和語義分析的語音識別等，這些都是僅涉及到對信息的表層或淺層處理。表層處理和淺層處理的特點是電腦不能理解人的語言或信息的含義。新階段的特點是對信息進行深層處理，例如，如何利用電腦將Internet網上堆積如山的信息變成人們可以利用的活知識；如何使機器翻譯的譯准率達到95%以上等問題就都要涉及對信息的深層處理。信息的深層處理的特點是電腦對人的語言、信息的含義有初級的理解。

涉及信息處理深層的領域和學科主要有：自然語言理解、圖像理解和知識開掘等等。

信息的深層處理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以美國和日本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信息表層處理上佔有絕對優勢，實力非常雄厚。但在深層處理方面它們卻仍處在徘徊的境地。以自然語言處理為例，日本早就提出過一個第五代電腦（又稱智慧電腦）的計畫，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使電腦能理解人類語言，但它沒有獲得成功。接著日本又組織開發了亞洲五國（日本、中國、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合作項目——「多國語言機器翻譯系統」。由於項目主持國日本沒有創新的理論和技術，這個項目也沒有突破性進展。美國微軟公司曾經投入了高額資金，用以開發新一代的軟件技術（自然語言理解、圖像識別、三維圖形設計），自然語言理解是其中的首要技術，但也沒有結果。數十年來機器翻譯的

譯准率始終徘徊於70%以下。信息熵值得中文信息處理界注意。但是除了熵以外，還有更多的問題值得注意。

專家發現，簡化字造成了比繁體字更多的混淆可能性，而且混淆的字例比原有的更加常見，更不容易分辨。例如漢字本來就有一些形態相近的已己巳和戊戌戌等等。但是經研究表明，戊戌戌之類易混淆字的概率大約在一千萬字次中僅出現123次，而漢字簡化後出現的「設」和「沒」這樣的常用字，尤其是沒有的「沒」這個否定詞，頻率之高是不言而喻的。另外，漢字的冗餘度遠比拼音大得多，（意思是說，漢字可以約略地掃讀，有些筆劃模糊，也沒有關係，照樣可以理解）。漢語中真正、征戰、長征、戰爭、成長、生產、章程、產生、長城、鎮長、戰神、真誠、政審等等語詞非常多，鼻音豐富，前後鼻音有辨義作用，這是漢語的根本特徵之一。這類漢字語詞使用拼音時，拼式雷同，目標不明顯，視神經容易緊張，極易產生閱讀疲勞；若用漢字表達則一目了然，遠遠比拼音顯豁清晰。這一對比充分說明拼音並不完全適合承載漢語的語言信息。恰恰是漢字的信息熵特別高，所以目標醒目，信息明達。這個特點在現代化的高速公路上已經獲得更加普遍的首肯。例如韓國的交通標誌又已改用漢字。（以上冗餘度的例證，參看《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1月第7卷第一期 張其均：《從信息理論角度談漢字的認知》）。文字畢竟是用來閱讀的工具，最終是給人閱讀的。為了提高（中間轉換過程的）一點點信息交換的速度，犧牲了人的閱讀方便和愉悅，豈不是本末倒置？漢字標誌醒目，冗餘度、信息熵遠高於中文拼音，正說明漢字，尤其是繁體字，更加適應需要快速閱讀、人機迅速信息回饋的現代化時代。

3 · 漢字的電腦信息和漢字繁簡

中國大陸實行了漢字簡化，把經過簡化了的漢字作為官方文字，其中包括簡化字和沒有簡化的漢字。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中國大陸又不能完全廢止繁體字。於是又必須在國家標準的《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庫》中編入繁體字符。同時，臺灣有關方面也編制了他們的漢字電腦信息的字庫。主要是繁體字（海峽對岸稱為正體字）作為官方文字。又由於種種原因也必須包括相當一部分簡體字。另外日本和韓國也分別創制了各自的漢字電腦信息字庫，日本是最早實行漢字簡化的，所以也有一些簡化字，這些簡化字不少還跟中國大陸的不一樣，畢竟數量不多。根據中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公佈的《術語標準化和信息技術》可以瞭解到，中國大陸、臺灣、韓國和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接受中國大陸的簡化字，所以沒有另外編制字庫）經過國際合作的統一編碼工作，現在已經完成了中（包括臺灣以及香港的繁體字）日韓共通編碼。中國大陸的六個字庫是：

基本集（GB 2312-80）

第一輔助集（GB 12345-90）

第二輔助集（GB 7589-87，收簡體字7237個）

第三輔助集（GB/T 13131-91）

第四輔助集（GB 7590-87，收簡體字7039個）

第五輔助集（GB/T 13132-91）。

基本集和第二、第四輔助集是簡體字集，第一、第三、第五輔助集是繁體字集。

在這六個字庫中，簡體字與繁體字存在著明確的一一對應關係：基本集中的簡體字與第一輔助集中的繁體字對應，第二輔助集中的簡體字與第三輔助集中的繁體字對應，第四輔助集中的簡體字與第五輔助集中的繁體字對應，並且對應的簡體字和繁體字在相應的字庫中同碼。個別的漢字在簡繁體之間存在著一對多

的關係，作為特殊情況處理。（馮志偉：《信息時代的漢字的標準化和共通化》）

這裏的所謂國際統一編碼，說穿了絕大部分是在協調繁體字的編碼，中國大陸1956年以後出現的簡化字造成了漢字字數的大大的增加，兩岸的文字不統一，結果出現兩岸編碼的不統一，跟日文、韓文的漢字更加分道揚鑣，增加了國際信息標準化的負擔。馮志偉教授在上述文章中談到：「在統一編碼的基礎上進一步統一中日韓漢字的各有差異的具體字形，更是一件空前艱巨的文化建設工程，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目前也許不存在一種無痛苦的解決方案」。其實字形的統一的問題還不太大，問題倒是簡化字的問題。為了更好地與國際接軌，應當儘早廢除簡化漢字。中國的簡化字是1956年才逐漸成為官方文字的。《現代漢語詞典》編纂組主持人之一，中國社科院語言所研究員韓敬體也承認：「廢除一個繁體字，增加一個簡化偏旁類推字，字數沒有減少，在我們的字典裏，只要是繁簡都收，就得都收下來。比原先沒有簡化時多收了一些簡化字。新造簡化字和類推簡化字又為我們的漢字總字庫增添出來數量可觀的新的成員。這與漢字簡化的減少漢字總字數的目標是不一致的」。（《談我國的簡化字問題》）

簡化漢字大大增加了國際信息統一內碼unicode佔有率，如果沒有簡化字，就可以只用一套正體字內碼，完全廢除簡繁兩體的內碼字庫，大大節省國際信息內碼。ISO 10646是國際編碼標準，該標準旨在囊括世界上所有文種。CJK特指其中的中、日、韓統一編碼的漢字部分。目前CJK由三部分構成：CJK 20902漢字、CJK Extension A 6582漢字和CJK Extension B 47211漢字。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ISO 10646已編碼漢字達七萬字之多。可是實際上常用和次常用的漢字僅僅在七千多個

左右。而簡化字就有兩千多個，而且還在不斷增多，接近三千。簡化字跟繁體字不能一一對應（例如干：干乾幹），要添加特殊的命令處理，也是額外的負擔。而且中文字庫的不穩定，主要也是因為簡化字造成的。化學新元素（新漢字）的出現不會很頻繁，甚至因為新的元素是有限的，這類新漢字也不再會很多。問題出在中國大陸為了繼續推行簡化漢字，要求把古籍文獻也翻譯成簡化漢字，就勢必將許多古籍中並非常用的漢字按照偏旁類推的方式印刷成簡化字，於是漢字的字庫又得接受這些新的成員。簡化漢字從總數上不但沒有減少漢字，反而大大增加了漢字。例如，表面上看，康熙字典等辭書收字上萬；可是經過現代漢語漢字專家的整理和研究，現代漢語使用的漢字中常用字為3755個，次常用字為3008個。可以表達99%的內容。為了漢字簡化，中文字庫徒然增加了兩千多個簡化字，由於簡化類推，古籍翻譯等原因，簡化字隊伍還在不斷擴大，向三千接近，翻譯越深入，這類類推還將增添，幾乎沒有底線。廢止簡化漢字就可以差不多去除將近一半的累贅，而且字庫也將趨於穩定。繁體字是古代傳承下來的文化遺產，像《四庫全書》這樣的大規模類書，字數達七億之多，只需兩萬零九百零二個漢字再略加擴展，可以解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字句。這些類書的漢字不會增加，只會減少，因為經過審核，可以剔除許多已經無用的字，異體、訛字。如果廢除簡化字，中日韓國際中文字庫就可以立刻減少兩千到三千個簡化字，而且一舉消除了字庫不能穩定的隱患：因為不再考慮翻譯古籍成簡化字本，不論在歷史經典文獻中找到任何漢字，都不需要再考慮是否類推創制一個相應的簡化字了。

4・統一兩岸文字，走向漢字文化圈統合漢字編碼

如果中國廢除簡化字，恢復繁體字的正統地位，一個重大

的成果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字重新歸於統一。中國的黨政領導不應有鬱悶之慨。恢復繁體（正體）不是向什麼人稱臣服輸，而是回歸五千年的傳統，通俗一點的幽默說法，應該是降漢不降曹。漢字簡化走了彎路，但是否定之否定，也有中文拼音和刪除異體等成果。走出宿命的怪圈，漢字輸入電腦踏上現代化的大道。漢字文化圈各鄰國也都經過了對漢字認識的否定之否定。漢字的使用又在重新復興之中。他們也充分認識到漢字並不是外來成分，而是本民族文化的固有成分。（參看本書第十二章《漢字文化圈》）畢竟中國是漢字的祖國，漢字在中國的變動，對於他們將具有強大的榜樣作用力。中國大陸如果廢除簡化字，就好像剷去了一個毒瘤，漢字文化圈的電腦字庫就清除了統一的最大障礙。臺灣、日本、韓國和越南的現有漢字和古籍漢字都是以繁體字為主，日本和韓國有少量簡化字，但是數量上根本微不足道。一旦中國大陸廢除簡化字，並且將「簡化字無助於認字、無助於快速書寫」的理論介紹給他們，估計他們很快就會放棄簡化字，重歸傳統。（臺灣、日本和韓國保留他們特有的部分漢字完全沒有問題）。只要中國大陸率先廢除繁體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必定會迅速跟上。走到這一步，通過平等協商，統籌兼顧，漢字文化圈內全面統合漢字，統一編碼和統一字形的無痛苦過程就可能不期而至，水到渠成。新的統合的漢字文化圈電腦字庫將削減大量重複佔用的碼位，清除所有的歷史障礙，達到最簡約排布和最有效運作。中國在經濟上的重新崛起令世界各國矚目，中國的文化也重新獲得了世界的再認識。中國應當在這個歷史的重大關頭深刻反省近百年來漢字文化的崎嶇坎坷，當機立斷，準備花一代或兩代人的時間，將簡化運動造成的缺失在關鍵的時刻重新挽回。亡羊補牢，未為晚也。萬萬不可失足百年，遺恨千古。

第十一章 全人類綠色文化意識

1 · 全人類綠色文化意識

德國議會在2000年六月通過決議，決定在三十年內全部撤除聯邦德國境內所有的核電站設施，逐步以其他能源取而代之。也就是說，他們為了保護生態和環境，寧可捨棄高生產效率，捨棄已經高代價建設完成的核電設施，也不願意損害不可再生的自然。而我們當中就是有一些中國人，為了所謂的高效率，不惜犧牲一旦犧牲就永遠不可再生的民族文化傳承。德國人認定的不是一時一事的高效率，而是萬世不移的高價值。

所謂全人類文化意識，是一種現代綠色文化意識，是從綠色環境保護的思想啟發而來的。它不同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意識。民族主義語言觀會把本民族的語文看得高於一切，只有優越性，沒有局限性。綠色文化意識則不局限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種語文。把世界的民族之林看作好比是一片廣袤的土地。多民族的語文好比是土地上生長的植物。憑藉大地上不同區域的氣候、土壤、光照和水文條件，生長出了各種不同形態的語文，千姿百態，五彩繽紛。每一種植物都有在大地上生存的權利。它們都可能遇到病蟲害的侵蝕，受到雨雪風霜的摧殘，人類可以在適當的時候修葉剪枝，治病施藥，遮風擋雨，但是不宜為了眼前的權宜而砍伐已有的植物，強行移植另一種植物。自然環境中全世界現在都已經開始提倡這種綠色環境意識，在文化環境中全世界也應當培育綠色的文化意識。漢語漢字，藏語藏文，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民族語文，除了漢字文化圈，還有阿拉伯文化圈，斯拉夫文化圈，印度文化圈，拉丁文化圈，各自都有它們生存發展的權利。人類分佈在地球的各個地區，享受到各種不同的氣候、

土壤、山川、河海的潤澤，各自產生了相應的語言文化，表達出不同的思維習慣和民族特徵。基督教的《聖經》中有上帝賜予人類一座巴貝爾塔的故事。從此人類有了不同的語言，彼此不能直接言說而溝通，務必通過翻譯。西方人常常反思上帝為什麼要這樣作為。我們也借用這個故事，說明人類並不需要統一的語言。既然思維習慣、宗教信仰、文學藝術、文化理理都如此不同，為什麼一定要有統一的語言？應該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互相取長補短，但是不必去強求統一的語言。當人類具備綠色文化意識以後，再也不能去人為地廢止某種語言文字，或抑制某種語言文字，反而應該在必要的時候，伸出援手去救援那些受到戕害壓制的語文，讓它們繼續存活下去。自然語言和相應的文字是人類文化的創造物。如自然物種一樣，一旦失去，就將永遠失去。漢字不排除有分寸的改革，以適應現代化，但是漢字簡化是一場人為的摧殘，傷筋動骨，剪除漢字的遺傳密碼，危及漢字的生命傳承。如果廢止漢字則勢將危及文化的生命。而漢字簡化正是廢止漢字的前鋒行為。

作為中華民族的後裔，我們當然要全心維護民族文化的妥善保存和健康發展。但是我們不必僅僅從狹隘民族主義的立場來表達和行動，反而是從全人類文化意識的角度出發來認識這個問題。例如德文，與英文相比，共同使用26個拉丁字母，在語族上同屬日耳曼語系，在深層結構上更是同構的語法兄弟。可是德語國家決不放棄自己的獨特性，堅持維護德文的特點，連電腦的鍵盤也保持獨立的字母排序，不與英文鍵盤混同。他們不為眼前的方便和效益所動，就是不能讓自己的文化迷失在同化之中。中文跟其他民族的區別這樣大，跟傳統的關聯這樣深，絕對沒有理由放棄自己的獨特性。漢字是中華文化的本位，也是適應中文獨特性的載體，世界沒有任何理由要廢除漢字文化。國際標準化組

織也並不因為漢字佔用了大量電腦信息空間而排斥漢字，反而是儘量地容納漢字信息，運用unicode讓漢字文化進入世界一體化的電腦網路空間。說明國際上的人文學者已經站在了全人類文化意識的高度，平等地對待一切文化，給予每一種文化都有進入網絡世界共存共榮的機會。

2・「去漢字化」代表人物的落後言行舉例

呂叔湘：

已故語言學家呂叔湘是廢除漢字、推行拼音的急先鋒，在他生命的最後年代，曾在《中國青年報》（1985.1.2）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譴責漢字「怎麼樣也不能跟拼音比賽」。曾幾何時，大約不到十年，彈指一揮間，他所列舉的一系列「漢字落後現象」，基本上都因漢字輸入電腦和進入互聯網而可以看到徹底改觀的燦爛前景。廢止漢字論已經潰不成軍。

1・中文打字過去僅是專業打字員的職業，今天電腦打字已經進入千家萬戶。圖書館書目索引、醫院病歷、身份證戶籍名冊都可以按漢字的音序加聲調或者按音序加聲調加出生日期編碼。同音同調字可以根據漢字的筆劃多少來再分先後，如果仍有筆劃相同，再根據點撇橫直的筆劃順序再細分先後。中文的學術著作也可以依此附加索引。新聞記者的新聞早已拋棄電報，用互聯網漢字傳輸了。

2・外文譯名的統一問題，因為有了互聯網也將迎刃而解。地名人名的譯名應該由語文工作委員會設立專門機構「漢語翻譯統一譯名局」全面審定，統一規定後，在互聯網上設立專門網站，隨時可以讓翻譯人員上網查詢。每個現有概念列出統一譯名，括號中提醒過去曾有哪些譯名，港臺有哪些譯名。例如：Thatcher，統一譯名：撒切爾，曾經譯為塔琪爾，香港譯為戴卓

爾。翻譯工作者養成習慣，凡是遇到人名地名，立刻上網查詢，不隨意定名。譯名局及時發現外文科技人文新詞，立刻定名上網公佈。如果譯名局還沒有公佈，翻譯者可以向譯名局申報，經核准便定為統一譯名。如果完全用外文拼寫外文地名人名科技術語，絕對不是沒有問題。我訪問匈牙利，發現匈牙利人名納吉Nagy，按照漢語規則那個gy不好讀，讀出來與實際匈語讀音noji不對應。阿爾巴尼亞人名霍查Hoxha按漢語拼音沒法讀音，讀成「霍西哈」不對，誰會想到是「霍查」？西班牙語人名何塞Jose跟漢語拼音發音完全是兩碼事。漢字的音譯倒是真正符合國際翻譯「名從主人」的原則的。英文比較普及，英文名稱轉寫拼音相對容易掌握，可是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譯名含有特殊發音字母和不發音字母，寫成外文時漢語拼音都會有讀音困難，其他語種的困難更大。把Jose寫成Hesai對國人，對外賓又有什麼方便呢？不如仍用漢字，關鍵是統一。有了互聯網，漢字譯名統一就不成問題了。國家語委不要再在拼音問題上徘徊不定，不如及早開始組建「漢語翻譯統一譯名局」，使用互聯網，開展規範化、國際化的科學工作。

3・呂叔湘說的科技術語音譯的問題，實際上並不全面。以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德國為例，我做過一點調查，德國的普通百姓也不一定懂得專業術語Sciatica是坐骨神經痛。大部分的疾病，他們都有德文的通俗名稱，跟我們相似。只有醫護人員和知識全面的知識分子才直接懂得這類術語。中國科技人員覺得科技術語困難，是因為長期閉關自守，政治運動頻仍，文革時代甚至懷疑掌握外語的職工裏通外國，造成科技人員普遍外文基礎差。隨著國門開放，外語普及，每一個科技工作者都能掌握一到兩門外語，自己專業的外文術語就變成了本專業的基本功，困難便不那麼明顯了。對於非專業人士，科技術語還是意譯更加通俗，也比

較簡明易記。像呂叔湘那樣懂得多門專業的術語，恐怕不是普通百姓。有了互聯網，要查詢一個術語的外文原文也變得相當方便了。

周有光：

《北京晨報》2006年3月23日報道了周有光先生的講話。周有光是至今健在的漢語拼音創制人之一。他也是堅持「去漢字化」的急先鋒。他在會見記者的時候談到：現在聯合國正在準備，所有的中文文件都用簡化字。因為用兩種字體是沒有必要的。「如果用了簡化字，這就證明簡化的方向是對的，是得到全世界多數人同意的。同時，我們國家在國際上的影響越來越大，世界各國學中文的人逐步增多，在這種情況下，簡化字慢慢會變成中文唯一的標準。」

這種說法是非常外行的說法。一個長期從事語文國際化、標準化的國家語委委員竟說出這樣的糊塗觀念，實在是貽笑大方。聯合國遵循的是國際上著名的「名從主人」原則。既然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所應用的官方語文就是聯合國承認的該國官方語文。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的是簡化字，聯合國當然承認簡化字是中國的官方文字。這是不言而喻的。至於漢語拼音的使用，這裏做一點補充。由於中華民國曾經是聯合國的成員國，到了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被中國大陸取代時，始終沒有提出過一套漢字羅馬化拼寫方案。國際國內雖有魏妥瑪、郵政、拉丁化新文字、羅馬字、耶魯等多種方案，但是沒有一種方案取得了官方認可的地位。國際上的外文地圖和國際文獻拼寫中國地名十分混亂，多半以魏妥瑪拼法轉寫，所以魏妥瑪拼法在國際上比較有影響。1977年中國代表團提出了以漢語拼音為唯一標準的提案，獲得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壓倒性多數通過。畢竟漢語拼音是中國官方機構文字改革委員會頒佈的正

式方案。後來又經2000年通用語言文字法的確認，更加加強了法律地位。簡化字也應依理類推。

至於聯合國繼續使用兩種中文文本的情況，完全是中國政府自己的責任。首先是它的漢字簡化政策是單方面突然實行的，並沒有涵蓋中國的全部領土，包括它所宣稱的領土臺灣省和金門、馬祖地區，香港、澳門地區，也沒有涵蓋海外包括東南亞、歐美日澳拉美非洲的華人社區。聯合國僅僅使用簡化字排印文件，在實踐上並不方便。備有繁體字文本方能滿足需求。其次，1971年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時候，國內的文化狀況一片肅殺衰敗。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運動摧毀了所有的出版社和辭書編輯部，知識分子幾乎都在五七幹校接受改造和再教育，很多專家學者被隔離審查，有的不堪折磨自殺身亡，有的背負莫須有罪名被監禁勞改。《辭海》、《現代漢語詞典》都是「試印本」、「試用本」，「供批判用」，沒有一本可供出口。聯合國幾乎找不到任何一本較為完備的簡化字辭書，作為出版、編印文獻的參考書。1977年中國官方宣佈文革結束以後，中國辭書、出版、版本學代表團出國訪問時，所能展示的中文標準化文獻竟然只有一本巴掌大的《新華字典》。這就是建國將近三十年的「共產黨中國」的國際文化形象。聯合國是嚴謹的國際機構，對於法定的五大工作語文之一的中文事務，不可以無法無天，不可以沒有一本高級辭書作參考。其三，按照香港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特區基本法，香港特區可以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加入一些世界性組織，最近香港的高級衛生官員出任聯合國衛生組織的領導職務，都體現了這一法定權利。既然香港的官方文字是繁體字，聯合國出版的文件也應該照顧香港的特殊地位，在使用簡化字的同時，使用繁體字也是順理成章的合理行為。

但是，今天聯合國使用簡化字，並不表示國際社會對於簡

化字的文化價值的認同和贊許。周有光說什麼「如果聯合國用了簡化字，這就證明簡化的方向是對的，是得到全世界多數人同意的。」完全是胡說八道。按照尊重主權，名從主人的原則，如果中國政府宣佈「全部改用漢語拼音為官方文字」，或者宣佈「逐步改用繁體字為官方文字」，聯合國都會表示尊重和接納。

北京晨報接著報道：「簡體字好不好，小學老師說了算，」周先生說，「小學老師說，簡體字好教，小學生容易認，容易寫。在電腦屏幕上簡化字閱讀清晰。」面對國內外恢復繁體字的呼聲，周有光又在玩弄半個世紀前文字改革委員會的花招。當時的教育部文件《致中共中央的報告》說：「教育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聯合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來自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和中央一級有關機關、團體和部隊的代表207人。出席會議的代表中，大約三分之二是中小學、師範學校和工農業餘學校的語文教師，其餘是語言學家、文字學家、語文工作者和教育行政工作者」。在人數上和層次上已經決定了不讓有關專家學者表達對立的意見。在事先組織的發言中「很多代表反映，簡化漢字普遍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河南省實驗小學教師胡逸生說，當他在講臺上向學生介紹簡化漢字，舉出「豔」字今後簡化為「艳」字時，孩子們馬上熱烈鼓掌歡呼。天津代表陳淑華說，一個女工說「盡辦邊」這三個字她再也記不住，這回改成「尽办边」一下就記住了。」

沒有科學試實驗，沒有學術論證，將學齡兒童的意見和文盲女工的意見通過基層教師在文字改革會議上作為代表性意見上報中央，然後刊登在各大報刊上向人民做宣傳。而政治家章伯鈞、文字學家陳夢家等人在反右時期發表不同意見後都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操縱輿論、搞假民主，歷來採用這類手段，至

今仍在香港立法會選舉中搞功能組別，也是這類手段。在二十一世紀重新開始的簡繁爭議中，這一類蠱惑人心的手段再也不能被容忍了。今天的小學教師，絕大多數都在漢字簡化以後出生，對於繁體字完全沒有系統的印象，如果恢復繁體，他們會感到壓力。一般小學教師都沒有高等教育的學歷，對於漢字的演變歷史和文化傳承不一定有深刻的認識，一般都沒有語言文字學專家那樣的深厚功底。一場關係到民族文化歷史命運的大爭論，僅僅聽取小學教師的意見是絕對不可取的。應該開放言論自由，廣泛聽取專家學者的意見，展開充分的討論。「簡化字在電腦屏幕清晰」的說法也是一種似是而非之論。現在的電腦硬件和軟件都允許調節字體的大小，可以排版（字體小，版面清晰），也可以把每一個漢字放大。港臺使用電腦漢字系統比大陸更早，繁體字使用至今，完全可以跟大陸的屏幕一樣清晰。

對於周有光這樣的百歲老人（1906- ），我們應當尊重他為漢語拼音和推廣普通話所做過的有益的工作，也應正視他在「去漢字化」方面所造成的遺憾。當巴金老人已經悔悟早年不該呼籲燒毀線裝書，不再贊同「簡化漢字以方便學習」的說法的時候，呂叔湘、周有光這些拼音派仍然在堅持三十年代以來夾雜著歐洲中心主義偏見和蘇聯語言階級論謬說的既定政策。他們已經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綠色環境意識，全人類綠色文化意識，也不知道漢字認知心理研究的新進展。對於這樣年邁的老人，我們不應苛求，更希望他們晚年安福。但是官方仍然讓他們擔任某些非榮譽性的職務，發表某些非禮節性的講話，則是非常不負責任、也相當不人道的做法。

3 · 中國社會亟待引入綠色人類文化意識

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在經濟上的飛速發展。但是西方的朝

野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在遇到中國人的時候，往往都會提到中國的經濟成長很大程度是建立在資源高度耗費和生態破壞的基礎之上的。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為了大煉鋼鐵，為了農業學大寨，為了改天換地，向荒山要糧，讓海洋獻寶，山嶺植被遭破壞，湖泊被圍墾蠶食，森林砍伐過度，草原地力被過分攫取，改革開放以後，發財致富的動力更加推助上下一致的開發行動，更加加劇了中國生態的破壞。各地罔顧生態的黨政官員們，大小企業的黑心老總們，個個都振振有詞，「提高了生產效率，改善了人民生活」。放眼望去，毒水河，癌症村，比比皆是，酸雨、沙塵暴、酷暑、頻發洪災、海岸紅潮、疑難怪病不斷向大地撲來。大量物種死亡，沙漠向內地逼近，我們失去的自然生態已經無法恢復再生。

更加可怕的是文化生態的破壞在中國沒有人關注。從漢字簡化運動以後，為了掃除文盲，為了提高生產效率，為了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沒有民主決策、沒有廣泛試點，就全面實施漢字簡化，沒有聽取反對意見就將不同意見者打成右派，使得漢字簡化「沒有爭議」地貫徹到底，甚至出現了1977年的《二簡》方案，天下震驚。各級堅持簡化有理的黨政文化教育幹部、簡化字理論家教授、取消漢字派老前輩、並不知道簡化運動的真實歷史的編輯、記者們，個個都振振有詞：「提高了脫盲率，方便了識字，提高了書寫效率，普及了文化知識，滿足了現實的語言需要」。他們所宣揚的卓越成就其實並不存在，而青少年一代比一代對古典文化更隔膜，對繁體字越來越陌生，高考的文言試題越來越淺顯，成績則越來越滑坡，兩岸青少年互相讀不懂對方的信件，港臺和大陸青少年同入國際網絡，邂逅不相往來。中國人民跟祖國豐富的文化遺產漸行漸遠。中國文化史上新的「今文」、「古文」時代已經來臨。糟蹋自然生態的官員、老總，跟

折騰文化生態的幹部、教授的言行和心態在實質上有什麼兩樣？

當歐美日本、韓國、拉美國家紛紛為本民族的文化創造申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時代，中國官員卻高調鼓吹堅持簡化傳承已經兩千年的傳統漢字。在歐美各國都堅持在中小學教育的中期開設拉丁文教育課程的時代，中國教育部門和語文主管機構的官員卻繼續堅持不准中國青少年課讀繁體字和原汁原味的文言文。當世界各國人民羨慕中國人民擁有兩千多年有文字記載、而且從未間斷的文化的時候，中國的某些語文專家們卻偏要人民「為滿足日常需要」而放棄既能滿足日常需要，又能承載古典文化信息的繁體字，堅持使用識、寫效率並不高，也不足以勝任日常兩岸和海外交流日常需要的簡體字。在人權理念普及，民族文化平等共生的時期，電腦大大提高了語文記錄、傳輸和保存的效率，仍舊堅持這類犧牲文化價值以追求機械效率的思想，實際上決不是什麼與時俱進的先進思想，而是非常愚昧的落後思想。

漢字簡化和大規模毀林開荒、圍湖造田之類的愚蠢行為都是大約從五十年代後半葉開始的。到了八十年代自然環境保護的意識開始進入中國社會，逐步深入人心，到本世紀初，保護自然環境，維護人民生命財產的抗爭已經是中國社會衝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綠色精神文明的思想，保衛人類和民族的文化遺產（漢字不僅僅屬於中國人，更是全人類的財富），維護漢字完整性和延續性的意識也將逐漸深入人心，中國人將像維護環境生態、生命財產一樣維護不可再生的文化財富。如果繁體字不能得到恢復，這樣的抗爭將會愈演愈烈。

4 · 恢復正體漢字百利而無一害

面對漢字簡繁的爭論，必須大力宣講人類的綠色文化意識，讓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感覺到，每一種文化都有自身的生存權

利，每一種文化都有自身的長短利弊，我們的中華文化曾經創造過燦爛的文化業績，至今仍然充滿著適應現代化社會的頑強生命力。她應該享有跟其他所有文化並肩生存的一切機會。漢字本位是我們文化的精髓。簡化字是去漢字化的前鋒行為的結果，沒有任何進步作用，是民族文化遭受暴力摧殘後的贅疣。恢復正體漢字對於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有百利而無一害，對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文化復興，有百利而無一害，對於世界文化寶庫的延續和繁榮，有百利而無一害。

第十二章 漢字文化圈

1 · 深刻的教訓

說到漢字文化圈，中國人常常不無自豪地重複一種老生常談：中華民族的漢語漢字文化曾經影響過日本、朝鮮和越南，以及東南亞的許多地方。那是古代的輝煌情況。他們忽略了一個近現代非常突出的問題，就是漢字文化圈中的日本、韓朝和越南在語文政策方面給中國造成了強大的壓力。不可否認，這些國家對漢字的態度形成過漢字改革宿命的包圍圈，給中國的漢字拼音化、漢字簡化運動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經過百年的掙扎和反思，漢字在日韓朝越的起起落落，恰恰又反復地向我們證明，漢字是不可能用拼音取代的。如果強行取代，社會生活必有強烈的反彈。

漢字簡化論者和全盤拼音化論者常常拿出漢字文化圈各國的實例來對照中國漢字的情況，要求取消漢字，其實都是脫離這些國家的實際國情與中國情況進行的淺薄類比，這樣的類比再也不應當繼續下去了。今天我們分析漢字文化圈的文化交流史應當重新反思中國周邊國家接受漢文化的教訓。總的來說，日本、朝鮮和越南這三個民族在歷史上接受漢文化衣被的時候，都曾歷史性地遭遇過「全盤漢化」的嚴重問題。到了十九世紀中華帝國跟西方列強在經濟和政治、軍事上出現巨大強弱對抗、並節節敗退的時候，這些周邊民族開始反省自己接受漢文化的歷程，於是開始放棄漢文化的傳承，脫亞入歐，全盤西化，這一波西化的浪潮一直洶湧直上，直到二十一世紀初葉方才走過了峰巔，終於開始回落。自漢唐以來，對於周邊國家的漢化過程，我們在歷史上並沒有冷靜的省思，反而沉湎於沾沾自喜，當它們意欲遠離漢文化

而去的時候，我們也缺乏冷靜地反思，甚至失去了自我，自甘暴棄，完全陷入了西化、拼音的包圍圈而不能自拔。現在，正是我們以現代綠色文化意識重新振作自我文化省思，建立漢字文化自信的時代。

2 · 日本和漢字文化

日本從公元一世紀就開始接觸漢字，公元57年日本部落接受了漢光武帝的「漢委奴國王」金印。被認為是日本發現的最早的漢字。日本文化承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時候，大約定為公元552年左右。這個時期是中國北齊時代，29年以後，進入隋朝，再過三十七年進入唐朝。這個時代，用漢字承載的中華文化，包括宗教、文學、藝術、政治各方面如潮水般湧入日本。公元593年聖德太子發佈用漢字書寫的詔書，要求官吏、貴族必須遵守十七條政治道德行為規範，具體內容深受儒教、佛教和法家思想的浸潤。整個日本社會將中國的風俗禮儀接受為時尚。大批的日本貴族士大夫學習漢字漢文，日本知識分子晁衡隨遣唐使出使中國，他的詩文已經達到能夠跟當時的大詩人王維、李白相互酬答唱和的程度。隨著漢字的傳播，中國的文學、藝術、建築、服飾全面地進入日本，漢語的許多固有成分也如影隨形，浸潤到日本民族的血液骨肉之中。例如折檻、牛耳這類詞彙的典故，源出於中國，現在中國業已失傳，而在日本仍然充滿生命力。應該指出的是在日本學習漢文化的時候也有「全盤漢化」的弊端隱含其間。根據郭沫若的介紹，早期日本的史書幾乎是完全用漢字來音擬日語，藉以表達意思。今天當然變得如同天書，無從卒讀。後來逐漸用文言漢文表達日語，史稱「變體漢文」，勉強描寫，終不免有強作解人，詞不達意之慨。也就是說，雖然他們吸收了大量的漢語詞彙，可是畢竟仍是另一種語言文化，終究還有很多不適應

漢字漢文的地方。於是到了公元九世紀，兩套根據漢字草書和楷書的筆劃創造的假名（平假名和片假名）應運而生。假名是表音字母，可以比較自如地拼寫讀音，可是日文中幾乎有一半詞語來自漢文，所以當時的士大夫貴族更願意能寫漢字的時候仍寫漢字。轉眼千年過去，西方資本主義叩開了東方古國的大門。一開始日本接受外來借詞仍然先將這些新詞翻譯成漢字詞，然後用於日文。這就是我們中文實行白話文運動時能從日本直接「拿來」不少現代術語的原因。這些詞語對於現代漢語的豐富和進步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瓦斯、淋巴、俱樂部、浪漫等音譯詞，另外還有很多意譯詞，立場、手續、引渡、取締、絕對、相對、見習、消極、積極、必然、偶然、主體、客體、通貨膨脹、可變資本、財團法人、社團法人、仲裁、注射、解剖、航空母艦、投資等等。但是日本接觸了西方語文以後，逐漸發現了拼音文字的長處。正是日本人率先（1872年前島）提出了「廢除漢字論」。但是這一建議並沒有被明治政府所採納。此後廢除漢字論和日文羅馬化的改革運動持續竟逾百年。1923年日本官方公佈了1,962個常用漢字表和154個簡體字表。當時的目標似乎很明確，就是要通過限制漢字使用的數量，達到逐步完全用假名替代漢字的目的。1938年正是日軍向中國全面入侵的時候，日本政府的漢字主審委員會展開了100次審議，1942年公佈的標準漢字表卻仍然收納了2,852個漢字。到了1945年日本戰敗後，甚至出現了廢日語，改用英語的運動。主管日本教育的佔領軍總司令部下令把漢字限制在1,500個以下。外語和數學的教科書用羅馬字母編寫。審議會建議把常用漢字表限制到1,295個，結果社會的反映是「用於教育太多，用於社會太少」，仍被否決。最後公佈的《當用漢字表》共1,850個漢字。1951年眾議院通過了改正案，允許以當用漢字表為依據，但不強制執行，繼續給

限制漢字松了綁。1978年，日本政府公佈有6,355字的JIS X 0208漢字編碼標準；1983年又有JIS X 6626-1983標準，等等。漢字的編碼標準字數一直在增加，也一直被認為仍不夠用。到了1993年日本公佈了JIS X 0221的20,902字編碼標準。接著，又公佈了1996年的〈表外漢字字體表試案〉，日本政府在公佈該方案時附加說明指出，它「是法令、公用文書、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一般社會生活中，使用表外漢字字體的依據」。「這個字體表將明治以來傳統的印刷文字字體〔並非〈康熙字典〉字體的本身，而是以〈康熙字典〉為依據作成的明治以來的鉛字字體即〈康熙字典體〉〕置於印刷標準字體的地位。」至此為止，可以大致上說，日本的「廢除漢字運動」算是劃上了句號，日本漢字終於「返祖」，「認祖歸宗」地回到了〈康熙字典〉和〈康熙字典體〉。這是漢字文化對西洋文化的一次勝利。這些循環往復並不是日本社會庸人自擾，而是日本文化生活離不開漢字而發生的掙扎和痙攣。社會生活中感覺削減漢字的使用，給社會帶來了不便。即所謂「用於社會太少」。當然，由於英文的普及，以及現代音譯科技術語不斷進入日本社會，計算機假名和漢字的輸入成功，日本青少年能認一些漢字的還比較多，可是能寫漢字的已經大大減少。日本電腦漢字字符不斷增加給予人民使用更多的漢字提供了可能，但是真正意識到要把漢字當作文化傳承之物加以保護珍惜的程度還差得很遠。日本畢竟還是一個東方國家，漢字的傳統也還是存在的，許多漢字所代表的意義，已經深入到日本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中。當朝天皇繼位時仍然從中國的典籍《尚書》中找到「成平」這樣的漢字詞語作為年號。現在日本已經設立了漢字能力檢定協會。每年都通過民眾投票選出最具代表性的一個漢字，來概括這一年的社會趨勢。漢字能力檢定會還舉行漢字能力檢定考試。2005年有兩百四十萬人接受了考試。

對於一億兩千萬人口的大國，兩百多萬人實在不算太多。但是該會的估計認為，應考的人數還有上升的趨勢。因為現在通過了漢字檢定考試，不僅對考大學有利，對考高中或其他學校也有利。可能也與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有關，越來越多的日本大學和高中都將漢字能力作為錄取新生的依據之一了。

3・朝鮮半島和漢字文化

朝鮮也是一個古老的國家。漢武帝時曾經在古朝鮮設置四郡。公元一世紀初，一些朝鮮人就能背誦《詩經》、《尚書》、《春秋》等中國文獻。中國的漢字文化在朝鮮傳播初期正值中國西漢和東漢時期。漢字這個概念一直沿襲至今。公元372年高句麗建立太學，傳授儒學，當時的知識階層的知識就是對漢文典籍的理解。《四書》、《五經》、《史記》、《漢書》、《後漢書》成了他們必讀的書籍。隨後漢文的典籍繼續傳播到日本。我國唐朝時期，朝鮮的新羅王朝統一了朝鮮半島，朝鮮的語言也得到了統一。公元682年朝廷設立國學，講授《論語》、《禮記》、《周易》、《尚書》、《左傳》、《孝經》，漢字漢文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漢字詞在朝鮮語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國號、王號和地名、官名都改成了漢字詞。唐代高度發達的文化給予朝鮮知識分子非常重要的影響。韓愈、柳宗元、李白、杜甫、白居易的作品成為他們崇尚的經典，此後宋代的蘇東坡等大家都是他們崇拜的對象。《搜神記》、《文苑精華》、《太平禦覽》等書籍都傳到了朝鮮。三國演義對於朝鮮的文學具有無與倫比的意義。《水滸傳》、《西遊記》、《西廂記》、《隋唐演義》等都在朝鮮廣為流傳。朝鮮崇奉孔子，每年祭孔，春秋兩次釋典。韓國學者認為，中國和朝鮮兩個民族有兩千多年長期交往的歷史。通過漢字的使用和頻繁的文化思想交流而形成了相似的文化背

景。韓國漢城大學沈在箕先生認為：「我國的歷史無異於隨著漢字的傳入而起步。漢字詞的增加，意味著我國文化的發展和變遷。可以這樣說，一直到李朝的後半期，我國的文化發展與漢字詞的增加具有平行並進的對應關係。」（《當代韓國》1993年12月創刊號204頁）朝鮮語跟漢語並不是同一個語系的兩個分支，但是漢字詞卻通過長期文化交流不斷地注入朝鮮文化，已經融入了朝鮮文化的血液之中，成為朝鮮文化不可缺少的有機成分，已經無法從文化機體中排除出去。然而，畢竟朝鮮語又不同於漢語，漢字詞並不足以完全表達朝鮮語所需要表達的全部思想感情，總有缺憾和格格不入的地方。儘管朝鮮語文分成三個層次，第一是文言文，完全按漢語的音義來閱讀和寫作。第二是吏讀文，是官員和貴族按朝鮮語音和漢字詞的意思表達的語文。第三是純朝鮮語文。純朝鮮文是十五世紀的李氏王朝世宗大王創制頒佈的拼音文字。雖然1446年朝鮮文正式誕生了，但是它並不意味朝鮮拼音文字的真正使用，由於中國漢字在朝鮮的強大文化影響力，朝鮮拼音文字一直作為「朝語拼音」而存在，被朝鮮婦女和沒受過良好教育的朝鮮人使用，被稱為二流文字的「諺文」，而朝鮮的貴族、官員還是繼續使用漢字的「吏讀文字」。由於兩千年的歷史傳承，朝鮮科學和文化方面的概念、術語全部都是漢字詞，拼音文字仍然作為拼音輔助文字。官方公文和文化學術活動的語文仍然是漢文。朝鮮拼音文字的廣泛使用是從二十世紀初才開始的，比世宗頒佈「訓民正音」晚了450年左右。日本擺脫舊制，學習西方逐漸崛起，1896年，中日甲午海戰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不僅中國成為列強的瓜分對象，朝鮮也完全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進入二十世紀，已經自身難保的中華文明古國自然不再是被朝鮮、日本尊敬的國家，中國的文化和文字也就自然而然的在朝鮮走下神壇，漢字詞過去被

輝煌的文化遮蔽的不足和不適應問題完全暴露出來。於是漢文被降格為朝鮮「諺文」（民間俗文）的二流文字，朝鮮世宗十五世紀苦心創造的拼音文字在使用漢字的中國強大之時得不到實質性的應用，卻在中國衰敗，朝鮮被日本人佔領之時得以通行。日本殖民當局推行日語，當時日語和朝語並行。社會上既有漢字朝文夾用的文體，也有純朝鮮拼音的報刊。跟日本幾乎一樣，廢止漢字的呼聲也曾席捲朝鮮半島。日軍侵佔中國期間，在朝鮮則廢除了朝語課程，全面推行日語的皇民化。1945年法西斯日本崩潰。朝鮮半島在1945年被蘇聯、美國分割成為兩個國家：朝鮮和韓國，西方社會稱為南北高麗（Korea）。世宗大王450年前創造的拼音文字分別在南北使用，區別是：韓國的「韓文」至今還允許少量夾用漢字；而「朝鮮文」不允許夾用漢字，現在的朝鮮文已經是純朝鮮文了，而且中國東北吉林省的朝鮮族自治區的學校也使用純朝鮮文。1945年剛剛脫離日本統治的朝鮮組織了80多人的教育審議會，通過的決議規定，中小學教科書中全部使用拼音文字，必要時在括號中加注漢字。大韓民國政府成立後，又制定了《韓文專用法》，小學完全停止了漢字教學。僅在初中和高中的國語科目以外教一些生活常用字。這之後韓國政府一直徘徊在興廢漢字的猶豫之間。從1958年到1961年，李承晚政權和樸正熙政權都制定了全用朝鮮拼音文字、廢止漢字的政策計劃和規定。1968年政府制定全用韓字的五年計劃，宣佈1970年從小學到高中教科書全面取消漢字。漢字使用進一步受到限制，韓字成為韓國的標準文字。可是就在1971年，韓國又恢復了漢字教學。1972年還制定了大中學校教學的「教育基礎漢字」法令。到了1974年韓國教科書又開始夾用漢字，恢復到六十年代的文字體制。1976年文教部又發表了增加常用漢字的學習方案。朝鮮語中保持著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漢字詞。這是不以

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實。由於漢字詞擁有較多的同音不同義的可能性。中文本身還需要聲調來幫助區分，仍然還不能完全避免同音問題，何況朝鮮語原本就沒有聲調，所以同音問題就更形嚴重。作為拼音文字純朝鮮文無法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同樣是sudo 這樣的發音，可以有九種含義的可能性：修道、水稻、水道、隧道、囚徒、首都、授渡（授受）、水都（港城）、手刀（小刀）等等。任何詞典的詞條，任何描寫和闡述，沒有漢字參與其間，意義就不能顯豁，形象就不夠鮮活。一旦將漢字適當插入，便立刻豁然開朗，一目了然。而科學、法律文獻絕對不容含糊，文學也需要鮮明、準確、生動。這就是為什麼韓國政府數十年來徘徊不定，屢廢不止，終於還是必須容忍漢字的原因。多年來韓國知識分子為了恢復在韓文中的漢字使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69年韓國成立了語文教育研究會，提出重新確立漢字韓文混用的體制，恢復小學的漢字教育。1990年召開了社團法人韓國語文教育研究大會，總結了近百年來日本、中國和韓國在認同表音派立場，提倡拼音文字的方向上的失誤，認識到使用行政手段廢除漢字的辦法並不是發展的正確方向。一度奄奄一息的漢字在電腦信息學的發展中又重新恢復生機，日本方面雖然將漢字仍限制在1500字的範圍之內，但在行政指導上卻朝著靈活應用這些漢字的方向上發展。作為與日中兩國同屬漢字文化圈的韓國也應當重新認識漢字視覺形象、構詞能力、節約力以及超越時空等方面的獨特優點，恢復開展漢字混用的運動。到了2005年2月9日，歷史文化終於發生了有趣的轉折，韓國政府宣佈：在所有公務文件和交通標誌等領域，全面恢復使用已經消失多年的中國漢字和漢字標記，以適應國際化的時代潮流。並且提出了《推動漢字並用方案》，為了發展韓國的傳統文化，促進與東亞漢字文化圈國家的積極交流和推動韓國觀光事業的大力發展，將目前完

全使用韓國文字的公務文件正式改為韓、漢兩種文字並用，以解決韓文難以清楚的表明漢字含義的歷史難題。方案指出：凡地名、人名、歷史用語等不寫漢字就容易發生混亂的語彙，均在韓文後面注明漢字。為了給中國和日本的觀光者提供方便，將逐步在道路交通標誌上實行漢字和英語雙重標記。此外，還將同教育部門協調改善漢字教育體制，前總統金大中說：「韓國的各種歷史古典文章和史料皆以中國漢字書寫，如果無視中國漢字，將難以理解我們的古典文化和歷史傳統，有必要實行韓、漢兩種文字同時並用」。而且韓國的許多專家、學者和居民都強烈呼籲加強漢字教育，要求全面恢復使用中國漢字。隨著中韓兩國建立外交關係，雙方經濟文化交流的迅速發展，韓國舉國上下新聞報道、學校教育和工商階層對於漢字漢語的興趣越來越高。按照韓國教育部的規定，初中和高中六年內學生需要掌握1,800個漢字，2000年開設的全國性「漢字檢定能力考試」一級證書需要會寫兩千個漢字，會讀一千五百個漢字。2004年韓國語文學會舉辦漢字能力考試，應試者竟達一百零四萬人。各地大學增開漢字學習班，寒暑假更有特別培訓班。韓國社會上出現了學習漢字的熱潮，各種參考書應試習題集如雨後春筍。用漢字書寫的名片和姓名成為時髦，成為學識和品味的象徵。在電腦信息國際標準化的過程中，韓國方面也參加了協調和統一的工作。

北朝鮮是世界上最封閉的共產黨國家，長期閉關自守，國內的情況外界很難瞭解。1945年朝鮮成立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時候，無論是日本、韓國方面的傾向，還是蘇聯、中國、越南方面的傾向，給予金日成的影響都是向廢止漢字的方向發展。根據官方透露，此時金日成曾經第一次指示共產黨的全部刊物停止使用漢字。1949年底北朝鮮徹底執行廢除漢字的方針。朝鮮半島的和平是經過聯合國協議劃分南北分治達成的。金日成片面撕

毀協議，發動破壞和平的戰爭，犧牲了中朝兩國近百萬軍人與平民的生命和鮮血，沒有撈到任何便宜，重新回到三八線板門店接受停戰和平協定。戰爭的結局使金日成看到短期無法將韓國摧毀併入北部，當然也不可能像北部這樣徹底完成廢除漢字的過程。他也看到，韓國政府在廢除漢字的方面反復徘徊。於是1954年金日成在對朝鮮社會科學院的指示中表達了他的看法：我們的後代需要看懂帶有漢字的南方出版物和歷史文獻，所以我們需要教他們一些漢字。從此在北朝鮮的學校設立了漢字課程。根據新華社發自平壤的報道，2006年兩名平壤金日成綜合大學的女生在北京參加外國學生學習漢語的《漢語橋》比賽中獲獎。她們回到平壤後，向新華社記者介紹說，朝鮮的青少年在高中階段可以學習到大約1000個漢字。

4 · 越南和漢字文化

中越人民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歷史時代。公元前的南越武王趙佗是中國河北正定人，曾有開發越南的功績，「以詩書而化訓國俗」著稱于越南史書。東漢以後，漢族知識分子南下交趾越來越多，論語、春秋等書籍在他們開辦的學校裏得到廣泛地講述。唐朝統治越南的時期儒、佛、道各種哲學思想經一步深入越南，唐朝高度發達的文學藝術文化深刻地影響了越南社會。當時的越南上層人士普遍地學習漢文漢字。他們可以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中舉者可以入朝為官，一部分也可以受封回到安南出任地方官。唐以後的越南封建王朝繼續沿用中國的學校和科舉制度，不僅採用漢字，而且提倡儒學。政令、軍事、歷史、經學、雜記、散文、詩詞無一不用漢字書寫。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四百餘年，越南繼續提倡儒學，用漢字書寫、出版了多種越南史地文獻，例如《大越史記全書》等等。直到1839年阮朝明命帝奏

請滿清道光皇帝向越南頒發《康熙字典》以便於當地人民學習漢字漢文。阮朝嗣德帝曾經說過：「我越文明至士燮（相當於中國東漢）以後，蓋上至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喪、祭、理數、醫術，無一不用漢字」。越南的Tet（節日）跟中國相差無幾，也有元旦（NguyenDan）、元宵節（TetNguyentieu）、端午（Doanngo）等節日，甚至還保留著在中國已經消亡的寒食節（HanThuc）。中國所尊崇的儒家思想對越南人來說十分熟悉，因為幾乎每個人都在Tamcuongnguthuong（三綱五常）、Trunghieutietnghia（忠孝節義）、Diboaviquy（以和為貴）、Kysobatducvatthiunhan（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思想的薰陶中長大。不懂漢字的老百姓通過漢越詞能流暢地運用漢語成語，比如Anculacnghiep（安居樂業）、Tamtongtoduc（三從四德）、Oncotritan（溫故知新）、Dongphonghoachuc（洞房花燭）等。

漢字文化已經在超過兩千年的交往中完全深入到了越南民族文化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當然，越南語畢竟跟漢語存在著一定的差別，完全用漢字漢文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總會有部分不甚適應、不得心應手的地方。今天中國國內的方言和地方戲劇都不能適應改用普通話直接表達和表演，何況對於民族文化方面差別還要大一些的越南語呢！為了適應越南語的需要，大約在公元十三世紀部分越南知識分子借用漢字的結構和形聲、會意、假借等方法創造了一種由一個漢字拼接一個字符的越南字，他們將它們命名為「字喃」。但是這種文字仍然不如漢字那樣得到官方的長期承認，官方承認時間極短，主要只是在民間流傳，記錄了民間文學作品。另外，字喃的筆劃比漢字還要多，字形不完全固定，表音不準確，因而並不能取代漢字。所以越南的歷史文獻大部分仍然是用漢文流傳下來的。越南也是多民族國家，但是京族人口占

八成左右。他們的語言同漢語最為接近，越南語詞匯中屬於漢語詞彙或者來源於漢語詞彙的占半數以上。

十七世紀的西方傳教士陸續進入了越南社會。他們希望越南接受基督教信仰，在語文上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他們本能地發現漢字和儒家文化是西方宗教傳入越南的思想障礙。葡萄牙傳教士首先利用自己的母語記錄越南語音，後來逐漸形成了越南語的早期拼音方案，後來的法國傳教士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改善，最後又由越南人張永紀、阮長祚完善而成為越南的拼音文字。這種拼音文字逐漸形成，但一直沒有成為正式的官方語文。直到抗日戰爭結束，越南獨立並分裂成南北兩半的時期，拼音文字成為越南的國語字。1975年美軍撤離越南南方，共產黨政府統一全境，南方延續多年的中小學漢字教育也被徹底剷除了。越南是漢字文化圈中讓現代語文全盤西化走得最遠的國家。現在他們的悔恨也特別沉重。當時他們的想法是獨立、「去中國化」。然而實際上，漢語詞彙和思維習慣已經融入了越南民族的語文和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漢字詞和漢字也是越南民族的文化財富。他們盲目地實行「去中國化」，實際上幾乎是完成了當年西方殖民主義者所希望的「去民族化」和「非越南化。」。

拼音化給越南帶來了一時的方便，掃盲比較快，電報、檢索比較容易。但是嚴重的問題也接踵而至。首先是漢語詞彙的同音多義問題。越語中的huong，是從漢語詞借取而來的，但是不論從音還是義，它既是「燒香」的「香」，又是「香味」的「香」，還是「家鄉」的「鄉」；越語中的tai，也是從漢語詞借取而來，在越語中既是「才能」的「才」，又是「財產」的「財」，還是「材料」的「材」。越語中的can，借自漢語「幹」、「肝」的音，在越語中除了現代漢語詞的意義之外，還保留了古代漢語中「幹係」、「關聯」、「連接」、「勸止（幹

預）」等意思。這種情況很多，更多的是一部分保留漢語詞的原意，同時又加以引伸，或增加了其他的詞義。，越語中的trang，除了漢語詞原義的「村莊」、「裝束」、「莊嚴」、「妝飾」等意思外，又增加了「頁碼」、「平整（土地）」、「清理」等詞義；沒有漢字的明確標示，語文的表現力和精確度就受到重大的影響。其次是歷史的傳承問題。停止漢字教育可以在較短的時期內實現。民族的文化根基失去歷史的傳承反過來將危及民族的現實生存和文化生態。越南知識界早已開始後悔，終於在2004年出現了以越南著名法學家、留德法學博士、河內國家大學法學教授范維義為首的十多位專家學者聯名向越南教育部上書，建議從現在起在全國中小學校實行必修漢語的制度，建議教育部制定教育大綱，規定學生在小學和中學畢業時，漢語水平必須達到的程度標準。文字是民族歷史文化的載體和表現形式，同時其本身也是民族歷史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改變文字將意味著割斷歷史，意味著毀棄歷史和文化。這個道理已經為越來越多的越南人痛切地認識到。范維義教授在他的新著《經濟法專論》中，在談到研究古代法律和鄉俗習慣的困難時，有這樣的感歎：「自從以拼音文字取代漢字之後，除了人們已經讚美過的那些好處之外，越南人似乎也自我築起了一道將後人與先輩隔離開來的語言和文化的圍牆。放棄漢字使越南的史學研究陷入困境。修越南歷史的學生只能讀到那不多的經過歷史學家翻譯加工的教科書，而大量的漢字歷史文獻卻只有很少的人能讀懂，根本沒有力量開發整理。整理出來的東西也走了樣，試想，拼音文字如何能夠承載每個方塊字那豐富的文化信息？長期以來越南培養歷史學研究人員的模式是學漢語、到中國留學。多年來，中國人民大學接收了大量越南史學研究人員。但由於缺乏漢文字的大眾化基礎，歷史研究的面終將越來越窄。」2005年越南主席陳德良訪

問廣西南寧時說：「我們認為拉丁文字有一定的便利，但同時也越來越顯示出不利的一面。十九世紀以前我們的文字年輕人看不懂。因此我們認為年輕人學習漢字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越南將派更多的留學生到中國留學，目前在華越南學生約四千人，還有研究生。陳德良主席本人還當場用筆墨書寫了「陳德良」三個工整的大字。隨著中國經濟重新發展起來，經濟文化方面對越南的影響力日益加深，越南社會對漢字文化的反思也開始深化，為適應越南改革開放的經濟文化往來，學漢語的人也越來越多。一些外資集中的城市如河內、海防、胡志明、岘港，大大小小的外語培訓班多如繁星，其中要數學漢語的人最多。越南語的詞彙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漢語借詞。同音詞現象如此普遍，拼音文字使用起來當然有問題。向越南教育部提出上述建議案的各位專家學者全部有留學國外的經歷，是當今越南各個領域享有較高聲譽的名家，他們的建議既代表了越南上流階層的想法，也代表了普通民眾的願望，同時他們本身就是知識分子階層的權威代表，可以說，他們的建議案具有最廣泛的代表性，是越南全民族經過百年拼音文字實踐和反思的結果。在政治上的障礙，估計可能是執政的越南共產黨是當年積極推行拼音文字的主導者，恢復漢字教育等於向歷史承認錯誤。不知道越南共產黨有沒有棄舊圖新的胸襟。畢竟國家利益、民族文化的前途是黨政領導應該思考的根本，而且越南的政治民主化也跟實行拼音化一樣，早已走在中國的前面，所以該建議案的通過或許還是可能的。當然，全面實施上述建議案在目前階段也存在不少困難，最主要障礙估計是師資力量不足。可行的方案只能是先從城市開始，逐步向農村和邊遠地區推行。河內等大城市已有一些以外語為特色的學校於多年前就從小學開設漢語課了。然而即使上述建議案得以形成制度並得到切實、全面和不間斷地實施，也要經過幾代人至少四五十年的

時間，越南百姓才會讀寫漢字，普及一些漢語，甚至較多地瞭解和重新認識字喃和字喃承載的越南傳統文學。另外這裏值得一說的是，如果恢復漢字教育，是什麼樣的漢字？越南1945年以前仍十分普及的漢字是中國當年的繁體字。而簡化字則從1956年才開始在中國推行。他們今天要學習的主要也是當時歷史文獻所用的繁體字。如果到中國留學，或者讓中國派遣教員去越南教學，能學的只能是簡化字。所以越南當局還要慎重考慮，究竟是否學習簡化字，或者派人去臺灣、香港學習繁體字？

5 · 以現代文化意識審視漢字文化圈

通過對日本、朝鮮和越南文化歷史的回顧，可以清晰地看到，廢除漢字，實行拼音的全盤西化潮流已經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尤其是徹底實行拼音化、對漢字不留任何餘地的越南，現在已經悔恨不已，在越南部分地恢復漢字教學的局面實際上已經出現。把中國周邊國家重新出現漢字熱潮僅僅歸結為中國的經濟騰飛是片面的。最明顯的反例就是韓國政府1970年代中期宣佈恢復教科書漢字與韓文混用體制的時候，正是中國經濟在「四人幫」極端主義統治下瀕臨崩潰邊緣的年代。當時中國跟韓國沒有任何經濟文化和外交往來。決定性的因素還是文化的深層結構。文字是依附在語言文化母體上的視覺載體。它跟語言文化之間有著血肉相連的有機聯繫。日本、韓國、朝鮮和越南在歷史上跟中國文化發生過血肉相連的緊密關係，漢字文化已經深入到了他們文化肌體的深層結構之中，其實漢字已經不再是中國人民獨有的文化財富，也是他們這三個民族的民族文化財富。通過行政手段可以在短時期內切斷漢字與這些文化的表面聯繫，但是隨著歷史的推移，文化深層結構中漢字詞的隱性存在最終還是會頑強地呼喚漢字實現顯性的表達。這三個民族在跟中華文化發生接觸的時

候，特別是中國漢唐時代的鼎盛時期，都曾經無一例外地實施了全盤漢化，非常全面地崇拜和服膺中華文化，當時也的確沒有其他比較發達的文化以供參照，他們的文化成分中有機地融合了大量漢語文化的重要成分，成為他們民族文化的有機成分，不容分割和淘汰。畢竟日本、朝鮮和越南文化都不完全是中華文化，日語和朝語被專家大致認定為阿爾泰語系的分支，越南語跟漢語也存在一定的差別。中國的方言尚且不能完全適應用漢語國語來取代和表達，何況是另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化。每一個民族都有自身獨特的文化心理結構，漢語漢字不可能完全貼近他們文化心理的每一個角落和皺褶。一旦中華文明遭到西方文明的挑戰，這些民族就會從全盤漢化的體制內痛感扞格不入的弊端，從而尋求革新之道。這是必然的宿命。經過一百多年的彷徨、爭議和反覆，各民族都分別找到了自己語文的表音形式，日本假名、朝鮮諺文和越南拼音。但是這些形式又不能完全適應他們民族語言文化結構中固有的漢文成分，於是幾經興廢，塵埃落定，最後基本上都重新認識和恢復必不可少的漢字作為民族語文的有機成分。回顧這一場跨越世紀的精神掙扎，全世界理性的人們應該可以認識到，漢字文化是東亞漢字文化圈各民族的在這一片土地上的自然生長物，漢字的功能是不可以任由其他語文工具取代或置換的。漢字文化擁有它在這個自然的人文環境中生存的權利，而且只有這樣的環境中，固有文化和漢字才能相得益彰。從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601年進貢北京並首創拼音方案算起，四個世紀已經過去。至今沒有一套拼音方案可以完全替代漢字足以承當中華文明的載體。東亞漢字文化圈漢字幾經興廢的歷史已經證明，作為完全的漢字文化，中文可以創制一套漢語拼音作為輔助工具，充當輸入、索引和編碼的方式，但是決不能完全取消漢字，沒有任何拼音系統足以完全取代漢字而不損害它的文化傳承。也沒有必要像

日韓兩國那樣將漢字與其他符號夾雜混用。

漢字有它的優越的地方，也有它本身的不足。既不應提倡漢字優越論，也應當反對漢字落後論。漢字是中華民族土壤上最適合本土生長的自然文化物種。中國和日本、韓國漢字的簡化運動對於語文現代化沒有任何推助，反而給信息化帶來了新的負擔。漢字已經跨越了電腦信息化的門檻，需要的是進一步的研究和呵護，再上現代化的層樓。鼓噪多年的漢字拼音化理論可以休矣。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6月12日《環球時報》發表了韓國漢文教育研究院理事長張喜久先生給中國方面提出的建議。文章明確指出中國漢字簡化的得不償失。現代中國人對古籍的認知能力明顯削弱是重大的損失。他還介紹了臺灣知識界的意見，認為大陸的簡化遺留問題很多。他認為漢字簡化造成了漢字文化圈國家的人民在學習漢語時的躊躇：學繁體字，能夠瞭解本國的歷史，卻不易跟現代中國人接觸，學簡體字，能接近現代中國人，但是仍然不易接近本國的傳統歷史。他的潛臺詞是，如果中國廢止兩千兩百多個簡體字，給周邊國家的漢語學習以及漢字文化圈的交流發展會帶來很大的促進。他希望中國能夠站在國際化的視野角度看待文字問題，他說：「希望中國這條騰飛的巨龍，以關懷鄰邦的胸懷，承擔起這個國際使命。這是漢字文化圈希望之所在，是亞洲希望之所在，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之所在。這件事情只要作為『老大哥』的中國站在前鋒，挑起這個擔子，一定能實現。這一努力如果成功，不僅能夠從微觀上與美國和歐洲，從宏觀上與拉丁文化圈的國家較量經濟實力，而且將開闢一條跨越經濟，領先走向文化和教育的成功之路。」

可以預料，一旦中國廢除實行多年的簡化漢字贅疣，恢復傳統正體，必將引起漢字文化圈對漢字的重新反思。中國作為漢

字文化的祖籍國，不僅為統一海峽兩岸的電腦漢字字庫拆除掉最大的根本性障礙，還將帶動日韓等國廢除非常不統一的日韓簡化漢字，甚至進一步協調電腦字庫的信息標準化處理，走向更加完善、高效的信息國際化。這樣的文化變動勢將影響朝鮮、越南等鄰國，重新重視漢字和使用漢字，並波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以及海外華人地區。漢字文化圈將重新開啟漢字文化自信的時代，展現東方獨特文化的洵美風貌，崛起在世界的東方。

第十三章 德國的語文教育和文字改革

1 · 德文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文之一

讚頌拼音文字、詆毀漢字的人們常常對於外國的拼音文字並沒有深刻的認識，或者缺乏理性的反思。尤其是長期使用英文的人，卻往往渾然不見其廬山面目。

我們都知道英文決不是完美的語文。是言文很不一致的語文。德國大學生有一連串笑話，嘲弄英文正字法的有法不依；例如：他們說ghoti 應該念成fish（魚）。因為在enough裏gh念f，在women裏o念i，而在nation裏ti念sh，所以ghoti拼在一起就念fish。

相比之下，德文的拼法比較規矩，例外較少。可是德文也不是絕對言文一致的完美語文。世界上沒有絕對完美的語文。頂多可以說，只有漢語拼音最守規則，但是閱讀漢語拼音的效果絕對比不上漢字清爽。不標聲調更加難以卒讀。現代中國文化人多少都學過一點英語，對於英語的不規則拼讀和連讀等問題和煩惱都略有經驗。這裏僅介紹一些關於德語的情況，以供對照。堅持廢除漢字、詛咒漢字難學難認的人可能沒有想到，恰恰是德文，這種拼音文字，而且是其語法規範最具有哲學嚴謹色彩的語文，卻被公認為世界上最難學的語文之一。

德文的名詞不僅有單數和複數形式，四個格，還分陰陽中性，而且絕大多數詞性跟詞義沒有邏輯關係，甚至相反，例如「姑娘」竟是中性，太陽卻是陰性，月亮倒是陽性。根據規則，看詞尾可以判斷部分名詞的性，但是還是有很多例外，沒有規則，必須死記硬背。動詞也很複雜。根據人稱、時態、語態不斷變化。每種人稱的變位都不同，所以比英文的變化多得多。

德文比英文多四個字母。就是a,o,u 上面加兩點ä, ö, ü成為三個變音，還有一個ß（祇有德文有此字母）。由於有了這四個字母，德文必須有自己的鍵盤排列，不能直接使用英文鍵盤，（中文電腦直接使用英文鍵盤）。其實這四個字母都有規定的轉寫形式，就是ae, oe, ue和ss. 如果偶遇意外情況，例如在非德語國家旅行，使用電腦時在英文鍵盤內找不到以上帶兩點的字母，就可以臨時用轉寫形式替代之。然而德語國家就是不願意正式地放棄這些特別字母。為了這些字母，不僅要另外設計鍵盤排列，而且影響到所用的德文程序，用戶甚至可能會因為字母與外文不兼容出現故障，乃至死機。但是德語國家堅持不放棄。他們只要做這樣一點點小的改革，就可以通用英文鍵盤，就可以完全不必另外設計德文程序，可是他們就是不放棄。為什麼？就是為了他們的民族文化特點。

三個變音一般用在一些特殊變位的動詞變位、名詞特殊複數變化和一些形容詞的升級變化上。還有許多名詞的愛稱變音，一旦這樣使用，就表示稱呼嬌小的、可愛的、親匿的對象。在這類語境中，字母上面的兩點，不僅是音變的記號，也是情感的記號。一般情況下，單詞的重音一定在這個變音上，（外來語詞匯如Büro除外），隱約說出了感情色彩的所在；特殊變位的動詞的第一人稱採用變音，也是一種強調，形容詞的升級，更如何，最如何，使用了變音，也是表達了修辭的強化效果，頭上的兩個小點不僅是語音的升值記號，而且也是情緒的增強記號。另一個字母ß跟雙s可以對換，但是一般都按規則寫成ß，然後展開變化。除了名詞的單數和複數，動詞的完成體和未完成體的表達上，也用在形容詞比較級和最高級的表達上。一望而知，就是程度的強調。從這些角度來分析，這四個字母除了作為語法手段以外，還有他們的文化意蘊。

其他還有tz這樣的輔音組合，發音短促堅定，在德文的文化裏表示徹底完全；i這樣的字母，它的上面一點相當於中文成語「畫龍點睛」的意思，表示點完那一小點，完美的工作就成功地完成了。這裏的實例可以告訴我們，文字，包括拼音文字，也決不簡單地僅僅是語音的表達。實際上都是滲透了該民族的文化蘊含。

德文的另一重要特點是名詞首字大寫。不論專有名詞，還是普通名詞一律首字大寫。恐怕世界上沒有第二種語言有這樣的規定。（過去丹麥文如此，後來廢除）。德國人認為，這樣書寫他們覺得習慣，而且在句子中詞性分明，一目了然，意義顯豁。批評的人們認為，名詞大寫，在打字過程中增加了大寫鍵的按擊次數，減緩了書寫（輸入）的速度，增加了錯誤的出現率。可是去除名詞大寫的改革爭議多年，終於擱淺。倒是從二十世紀末開始的德文改革不僅沒有將這些德文本身的特點加以削弱，比如三個變音和特殊字母ß，反而還要進一步強化ß和ss的使用規範。改革的目的是讓德文的書寫更加規範化，當然也更加易於輸入電腦，同時又強調外來借詞更加德文化，而絕對不是更加英文化，比如Photo改為 Foto， Telephon改為 Telefon。德語民族的民族文化意識如此強烈，值得我們深思。德國知識界非常注意防範民族主義情緒，因為它最有可能成為法西斯主義納粹思想的載體。但是在文字改革方面他們認為保持民族文化特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與民族主義無涉。因為他們更有綠色文化意識，認為德語文化雖然只是世界文化中較小的一支，（不足一億人口），但是它為人類貢獻過令人矚目的哲學、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成就。在語言文化的大地上應該有它存在的一片天地。它應當保有自己應有的文化特色。

德文還有一個特點更加值得我們反思。那就是德文單詞的

分寫和連寫。中國信息學界為了漢語詞界不清發生了許多爭議，為漢語詞的分寫花費了大量的財力和人力。努力研究當然值得稱道。但是也不用因為漢語詞的沒有分寫而過份苛責漢語。德文單詞跟其他拼音文字類似，也是單詞分寫的。但是它的分寫情況很複雜。首先是動詞。動詞中有一種分離動詞，前綴和動詞詞根可以分離。通常在主句中，現在時和過去時的表達，將前綴甩到句末，距離拉開很遠，又是當中隔著好多個單詞；完成體則整個分離動詞出現在輔助動詞後面的句末，連寫，但是前綴和詞根之間插入固定成分ge. 如果在從句中，兩個部分又連寫，不定式按人稱和時態變位，放在句末。在情態動詞後面，分離動詞必須連寫為不定式；在分詞短語中，分離動詞的兩個部分中插入固定結構zu，連寫。freisetzen, es setzt etwas frei.

Es hat etwas freigesetzt, Das ist klar, dass es Sauerstoff freisetzt. Es ist in der Lage, Sauerstoff freizusetzen.沒有學過德語的讀者閱讀這段文字，可能會覺得眼花繚亂。德語的確比較複雜，光是分離動詞的規則就這麼紛繁。機器翻譯時要讓電腦從句子中辨認出這些當中隔著許多單詞的分離動詞前後兩部分本來是一個詞，並掌握住它的含義和用法，也絕不是太簡單的事情。

再說名詞。在英文裏面，允許兩個名詞連續，當中留空格，表示一個詞組。可是在德文裏不允許這樣寫，兩個名詞只能無空格連寫，組成一個名詞，或者用所屬格關係組成詞組。形容詞跟名詞性數格一致地分寫成為搭配，簡單連寫可以變成複合名詞。

英文	德文	中文
hard disk	Festplatte	硬盤
graphics card	Grafikkarte	顯卡
Summer time	Sommerzeit	夏時制
north China	Nordchina	華北
east China	Ostchina	華東
	Mittagsbuffet	自助午餐
	Abendbuffet	自助晚餐

德文的連寫也有不規則的地方。以上的兩種自助餐，中午和自助餐之間加上一個s，晚間和自助餐之間就沒有s. 這樣的不規則情況，給記憶和機器識別或機器翻譯都帶來很多不便。如果用英文查找China，因為英文不連寫，所以華東、華北都會被選中，可是德文卻連寫，用德文查找的結果，華東和華北都不被選中，除非用*鍵。

嚴格地說，分離動詞的情況還有規則可循，名詞的連寫例外較多，更難掌握。

德文的拼寫是相當規則的。但是仍然有例外。德語裏還有一句有趣的成語：Ausnamen bestätigen die Regel. 例外剛好證明規律的存在。

ä的發音，理論上接近英語back中的[a]，可是實際上在德國人的對話中它跟e 沒有區別。有的詞當中用-ie表示了長音，可是習慣上還要加上一個h：例如關係Beziehung. 車輛Bahn，行駛fahren，尊敬的geehrte，其實沒有這個長音符號，這個音節還是應該念長音。輔音v在多半情況下都念[f]. 而kr- 和 chr-發音是一樣的，只是辭源的不同。德文也有同音詞現象。Waren貨物和 waren是（過去時），lies讀（命令式）和lie ß讓（過去時）聽起來完全一樣。必須努力將它們記住。

除了許多例外，德文本身的規則變化就比較複雜。一般認為德文是世界第二大難學的語言，（最難學的可能是阿拉伯語）。俗話說，初學德文的人，開口第一句話，立刻就犯五個錯誤。名詞本身有性別，要用不定冠詞或定冠詞，形容詞必須跟所修飾的名詞保持性、數、格的一致，動詞必須按主語的單數或複數變位，還要考慮時態和完成體或未完成體。更有虛擬語態的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由於以上這些複雜的情況，德文程序中的語法自動化檢驗功能就明顯的不容易完成。一般情況很少能依賴電腦自動化語法檢驗功能來檢查已輸入文件的語法錯誤。上述這些複雜變化對於德國兒童和外國人來說，處處都是「聽寫陷阱」。德國青少年的負擔也不輕。他們的聽寫練習，一般全科文理中學都要堅持到八年級。相當於我們的初二下。中國的漢字教學一般六年小學就基本告一段落，初中以上認字都是靠自己閱讀和補充了。

非常可笑的是，一些為英文或德文辯護的中國人，對那些不容易記住的單詞和詞組特別寬容，他們介紹說，這些例外都是有原因的，只要明白詞源上的原因就不難記住。他們不想想，絕大部分漢字難道不是也有字源上的來歷嗎？如果對英文和其他語文可以這樣寬容，為什麼不可以對漢字也予以寬容呢？

還有一些論者認為漢字難學，導致中國文盲眾多，應該改用拼音，至少先行簡化，可以減少文盲。他們不知道，使用拼音文字的聯邦德國，照樣有相當多的文盲存在。2002年六月五日，德國最大的電視臺ZDF社會專題節目《觀點》aspekt播送了一段採訪對話，記者跟一位叫做凱·烏維的工人交談，此人幼年生活不幸，父母離異，他隨父親生活，學校教育不嚴，父親更少管教，逃學一年，閱讀不順，書寫更加困難。成年後找路必先請人寫好字條，再跟路牌對照，工作或加薪總是因為不善讀寫而遭

遇困難，甚至因此被解雇。三十九歲，他重新掃盲。努力讀寫，終於上了電視臺，但是熒屏上展現他的書寫仍然錯字連篇。電視臺的評語說，文盲現象始終是德國的一個問題，大約有近四百萬德國公民讀寫都有困難。節目的標題也是耐人尋味的：《德國：詩人和思想家的國家，抑或文盲充斥的國家？》當然四百萬中還要分為文盲和半文盲。

德文難學，所以德國的學制也比較長，小學Grundschule四年，相當於我國舊時代的初小，從五年級到十年級相當我國的初中畢業，最後三年相當於我國的高中。總的來說比我國的中小學多了一年。從五年級開始，教育分成三個方向，一個是主課學校Hauptschule，程度較低，九年級或十年級考試及格以後，可以參加職業培訓，進入社會勞動力隊伍。第二個是實業學校Realschule，程度較深，也有英文法文課程，十年級考試及格以後，可以進入專業學校，也可以報考文理全科中學的高中部。第三個是文理全科中學Gymnasium，程度最好。十三年級經過畢業會考，成績及格後，便可以申請進入高等院校。當然還是要看成績高低，由高等院校擇優錄取。但是近年德國的中小學學制也在改革，未來學制將縮短到十二年。從初小升入高小，有一項成績就是書寫。在學會認讀印刷體大寫小寫之後，德國小學生必須學會基本統一的一套手寫體字母書寫。這種書寫也是國家規範統一的。中文也應當有一套國家規範的統一的漢字書寫體。臺灣已經在八十年代作出了嘗試，其中包含很多簡化字。如果中國廢除簡化漢字，官方用印刷正體，同時可以將簡化字加以調整後作為手寫體。

2·德國的拉丁文教育（古文教育）

德國的文理全科中學不僅有德文和英文的必修課程，而且

開設拉丁文作為必修課程。拉丁文是歐洲古代的語言，歷史上曾經是歐洲的官方語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拉丁文相當於亞洲漢字文化圈的中文文言文。要精通歐洲現代語言，必須具有拉丁文的基礎，要精通漢字文化圈國家日韓朝越的語文，也必須有中文的古文功底。德國學校的德文課程強調的是文學性和文化傳承，基本上不講語法。學生在五年級或者七年級必須進入拉丁文課程。拉丁文的文法極其嚴謹而繁瑣複雜，涵蓋了後世歐洲語文幾乎所有的語法現象。一旦貫通了拉丁文的文法，仿如登上了泰山極頂，一覽眾山小。再學其他主要歐洲語言，如入一馬平川，幾乎所有語法現象都能迎刃而解。而且歐洲現代各國的語文都從拉丁文中借取了大量基本詞彙，學習了拉丁文詞彙，再學其他歐洲語文，到處都能遇到許多與原詞根相關的詞彙，常有他鄉遇故之樂。德國中學生經過拉丁文的訓練，再回頭審視德文文法，就能完全一目了然。跟我國語文教學強調古文基礎道理完全一致。從馬克思、列寧的傳記故事裏，我們知道，他們的拉丁文成績都很好。這類信息告訴我們，這些人物都有雄辯之才，下筆更是文思泉湧，滔滔不絕，肯定跟他們少年時代拉丁文基礎有密切聯繫；此外，說明無論德國還是俄國，或者說歐美國家，歷史上重視拉丁文是重要的傳統。他們的拉丁文就是拉丁文，原汁原味，沒聽說只學翻譯的拉丁文故事，不學拉丁文本身的。中國的文言文課程完全用簡化字橫排，已經不是原汁原味。德國大學入學，如果是文史哲專業或者法律、生物、醫學、化學等科目，（這些科目涉及到很多古代文獻、專有名詞和命名法，都與拉丁文有關），必須有拉丁文成績才能報考，其他成績合格，沒有拉丁文成績，可以補修補考，否則不能繼續學習。在這類高中裏，數學是必修課，而物理、化學和生物，可以有一科甚至兩科不修，但是拉丁文不可以不修。「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德

國並不適用。

對比德國的拉丁文教育，我國的古文教育遠遠沒有他們的嚴格和系統化。

長期以來，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這種古典文化將來只有少數人才會涉獵，而絕大多數人都不再對它們感興趣。「繁體字是少數文史專家的事情，所以在基礎教育中沒必要包括這方面的內容」。這是一種嚴重的偏見和短視，違背教育理論的基本常識。按照這樣的邏輯，中國航天工業基地的工程建設和航天飛行都是極少數科技專家的事情，是不是應該撤銷高中物理學關於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核裂變原理和火箭推進原理的教學內容？

我們再看一看，德國（還有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就會發現他們的社會階層呈橄欖型，兩頭小，中間大。極少數最富裕階層人口很少，極度貧困的階層人數也不多，而中間階層，包括工程師、醫生、律師、教授、學者、公職人員占了社會的大多數。儘管經濟發展有波動，這些階層的收入仍然基本穩定，衣食無憂。整個社會還在不斷地提高生活質量，度假、休閒、旅遊，不一而足。他們無論男女，教育程度都比較完備，知識相當豐富，談吐可以涉入各個領域；跟過去時代相比，他們每天的工作時間越來越短，每週五天工作制，德國金屬工業工會甚至提出了每週三十五小時工作制，（目前名義上為四十小時）。人們為自己的生活必需而不得不從事職業勞動的時間已經減少。今後還將進一步減少。職業勞動時間減少以後，剩餘的閒暇時間用來幹什麼？按照俄國優秀的小說家契訶夫在他的小說《帶閣樓的房子》裏所表達的想法，未來社會除了職業勞動以外，只有三項事業可以從事：宗教、科學和藝術。這裏的宗教，我們可以更寬泛地理解為哲學，一切人類思維可以探索的崇高境界；這裏的

科學當然是一切對大自然的觀察和解讀，以及科學在現實中的技術應用；這裏的藝術，包括文學、美術、音樂、舞蹈、體育等等人類的一切創作活動。

在人類從長時間的職業勞動中解脫出來的同時，大量的人力更從職業勞動中解脫出來。享受閒暇的人，就會更多地從事上述的三項事業。為了從事哲學、科學和藝術，人們很難拋棄自己的歷史文化，很難不關注世界的、民族的歷史文獻。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論是在百分比上，還是在絕對數值上，都將有比過去，比今天更多，而絕不是更少的人會關注歷史的典籍。我們決不應該給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遺憾，讓他們在紛紛走向古代典籍探索尋寶的時候，發現我們這一代人已經將他們攀援高峰的繩梯給砍得破損不堪了。堅持簡化漢字和鼓吹廢除漢字的人們實際上就是在做「砍斫繩梯」的事情。

我國的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不是很愛講理想社會的理想境界嗎？人類社會的高級階段，決不是大量的百姓繼續給黨政官員勸酒上菜，送禮送錢，也不是燈紅酒綠，貧富懸殊，而是人們的個性得到充分的發展，知識的極大豐富和不斷的創造性勞動。在這些創造性勞動中，研究人類和民族的歷史文化，語言文字，以及這些語言文字所承載的思想、情操和意境，將佔據很大一部分。這怎麼會是很少一部分人的事情呢？

3 · 德文的改革

在介紹德文和德國教育的同時，還要介紹一下德國的文字改革。

德語本來不是一種官方語言，古代德國通行的官方語言和教會語言是拉丁語。十六世紀馬丁·路德進行宗教改革時期，用德文翻譯了聖經，使得德語從方言走向了統一，十八世紀格林兄

弟編寫了德語大辭典，德語更加走向成熟。1880年康拉德·杜登編寫的杜登詞典對德文正字法進行了規範，1902年杜登詞典的拼寫式被帝國參議院確認為德文書寫規範，然後又涵蓋了奧地利和瑞士。

1949年德國分裂後，出現了兩個杜登，一個在東部的萊比錫，一個在西部的曼海姆。1968年學生運動以後，文字改革有政治化的傾向，把正字法說成是壓抑性的，是社會淘汰的手段。各種建議不再是懷疑式的，而是斬釘截鐵地要求拼寫簡化，由此更使得學習簡化。許多建議人主張名詞小寫化。在第二次大戰以後，丹麥實行了這一類的書寫改革。跟中國差不多，比鄰小國進行的文字改革一度成為改革的榜樣。可是經過實驗以後，發現對於德國人來說，如果閱讀母語文件，名詞大寫和小寫對於閱讀速度有明顯的影響。大寫反而使得閱讀更快。這項改革的動議在歐洲各國引起了反響，其中包括英國，他們甚至開始討論是否要像德國一樣也實行名詞第一個字母用大寫。於是德文取消名詞大寫的改革就這樣進入僵持階段。

1980年東、西兩德加上奧地利和瑞士四國成立德文的國際正字法工作委員會，（瑞士日內瓦地區通用法語，但是全瑞士七百五十萬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都講德語），由四國的日耳曼學家共同組成。然後1986年和1990年四國舉行了兩次維也納德文會談。第一次會談文件宣佈，關於大寫小寫的問題任其逐漸淡出，日後在第二步驟時再作打算。

1987年德國文化廳長聯席會議委託曼海姆德語言研究所起草改革草案。其他三國教育部門也開始配合行動。

1992年委員會公佈了以「德文正確書寫法」為題的改革建議。

1993年正式撤回了關於改變名詞大寫的要求。「名詞大

寫」的部分改革正式擱置。

1994年第三次維也納會談宣佈這次德文改革並不是大改革，而是小改革，而且是冷靜的改革。

1995年各州文化廳長聯席會議決定，1998年8月1日起試行，過渡期直到2005年7月底。

但是從1996年起，各方爭議驟起，抗辯激烈。原來預料改革後拼寫會簡單易學，結果反而更加複雜。反對方要求撤銷改革，文化廳長聯席會議拒絕收回改革方案，但答應酌情修改。然而仍然有數百名作家和科學家在法蘭克福簽署聯合聲明，要求停止改革。一名教授銜專家宣佈退出改革機構，著名作家格拉斯宣佈他的任何著作都不得以新書寫法印刷，法蘭克福彙報和世界報等大報拒絕以新書寫法出版。1998年7月14日聯邦憲法法院宣佈，依據憲法，對文字書寫進行改革是憲法允許的。

但是在德國北部的石荷州全體公民在9月27日舉行全民公決，投票的結果決定不參加改革。於是出現了一國兩字，新的書寫法在石荷州不教不學不推廣。

1997年形成德文正字法跨國委員會，有關事務由該委員會協調。改革的改革開始進行。

各地出版社因為反彈情況嚴重，一般都根據作者本人意願，決定採用哪一種拼寫印刷出版。古典文學作品，一般仍舊沿用這次改革以前的傳統拼寫印刷出版，只有針對青少年的相關書籍廣告改用新式的拼寫印刷。

2005年8月1日起，全國除了巴伐利亞和北威兩州以外，在學校實行新的拼寫規則。又經過一年的過渡期，聯邦所有各州無一例外在學校推行新拼寫法，其中包括當年抵制改革的石荷州。

其他德語國家瑞士和奧地利也都面臨強大的反對聲音，但是都勉強在2005年8月1日將新拼法推入學校教學中。然而在知

識界和社會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不滿，實際上人們依然按原來寫法書寫。1996年呼籲書的簽署者們一直抗爭了十年還在堅持。明鏡週刊、施普林格出版社（都是德國出版和新聞大戶）仍然認為最好恢復原有拼寫法。政治家包括幾個州的州長，文學界包括多位著名作家，都提出要求恢復到原有傳統拼寫法。

反彈的原因主要還是改革造成了新的混亂，因為太具體的實例對於不懂德文的讀者沒有意義，這裏不一一列舉。總之是原來大家約定俗成的慣例，經過改革，各方面對新規則的理解出現分歧，例如兩家最大的權威大詞典出版社編寫的新詞典內，往往同一詞條兩家竟有不同的拼法，你分寫，我連寫；我大寫，你小寫；笑話連篇。素有嚴謹規範盛譽的德文變得遊移不定，莫衷一是，當然令德國知識文化界焦慮不堪。很多知識分子認為，改革幅度不大，卻花費大量財力和精力，（所有詞典重新編纂），反而增添混亂，未免得償失。目前的推行完全是行政決定必須執行。進一步的後果可能還要過一段較長的時間才能看出。不過德文的改革正如改革當局所宣佈的是一場「小改革」，根本沒有觸動德國文化的根基，德文原來的民族文化特點全部得以保留，僅是一場使德文更適應電腦信息化、更德文化的嘗試而已。德文的改革也沒有輕易地接受二次大戰後特別是六八年激進運動的改革動議。這次改革則從反復醞釀（1980年成立四國正字法工作委員會）到行政推行（2005年實行新拼寫法）大約經過了二十五年，其中試行七年過渡；中國從1952年成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到1956年籌備簡化僅四年，從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到1956年2月全面推行僅三個月，沒有試行期。德文改革從一開始就接納其他德語國家的專家學者共同協商，中間還經過「改革的改革」，聽取了反面意見，做出了調整，而且對於個人和社團都不得強制採用何種拼寫方法，對於作家不得限定使用哪種拼法出

版書籍，對於古典文獻保證不用改革拼法，等等。中國大陸當局沒有聽取臺灣、香港和海外中國學者的意見，單方面宣佈改革，又經過反右運動將所有提出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阻絕了一切批評意見。中國人沒有任何反彈和選擇的空間。而且簡化還是作為拼音化的權宜措施實行的。古典文獻也用簡化字印刷出版。在德國社會，可能經過一兩代人的使用，德文最後可以接受這次改革的變動。但是他們這樣的小改革尚且引起了這樣劇烈的反彈，恰恰可以反證中國的漢字簡化如果不是依靠政治運動強制推行，絕對不可能裹挾如此嚴重的弊病推行到今天。德文改革好歹對於長音短音的表達有了一致的規範，而且將外來語借詞更加德文化了。漢字簡化對於認知和書寫都沒有幫助，對於現代信息化沒有任何貢獻，反而增加了國際統一編碼的負擔，增添了漢字文化圈的重大混亂，阻斷了中國古今的文化傳承。經過這番對比，我們可以說，漢字簡化造成的民族文化損傷已經形神畢現，是到了必須徹底反省，重歸傳統的時候了。

第十四章 點評與反駁

2006年是漢字簡化五十周年。雖然官方仍把這件事情當作功績來慶祝，但是已經擋不住民間輿論對此的反思和議論。

《中國教育報》2006年7月23日第4版刊登了署名「俞雍思」，估計是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司（語用司）化名的文章，摘要報導了該司在北京召開漢字應用問題研討會的內容。主要議題實際上是針對近年來日益強烈的對於漢字簡化的質疑，作出回應和解釋。筆者針對這些回應和解釋以歷史和國際的角度展開了適當的分析和點評。以下斜體字都是報導和發言者的講話內容，正體字則是筆者的分析點評。

報道：2001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明確規定國家推行規範漢字，同時也明確了可以保留或使用繁體字的範圍：（一）文物古跡；（二）姓氏中的異體字；（三）書法、篆刻等藝術作品；（四）題詞和招牌的手書字；（五）出版、教學、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六）經國務院有關部門批准的特殊情況。這一法律確定了規範漢字作為國家通用文字的法律地位，為繁體字的學習和使用保留了一定的空間，適合我國國情、基本能夠滿足各方面語文生活的需求，應遵照執行。討論繁體字的學習和使用，要有法律意識，依法辦事，不能違反法律規定各行其是。同時，要妥善解決繁體字使用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正確使用繁體字。

點評：用法律的形式來限制人民的語文行為並不是明智的方法。五十年代實行簡化的時候，也並沒有立法，而是於1956年1月28日以國務院（國家行政部門而非立法機構全體會議通過）的名義發出《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三天後開始在全國推行，即使從表面程式上說也是不合法的。今天人民

開始自發地討論簡化字的得失問題，剛好說明人民對於歷史上的非民主決策造成的禍害開始反思。他們發揮民主的權利，要求黨政領導部門重新審視歷史和現狀，重新思考漢字簡化的問題，思考民族文化素質的未來前景和祖國統一問題，決不是「違反法律各行其是」。用法律來威脅人民的自由討論是徒勞的。法律本來就應該是由人民制定的。如果人民的討論顯示法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就可以廢止它修改它。不討論漢字簡化是否有助於認字，有助於電腦信息化，有助於漢字文化圈的國際協調，有助於實現民族文化的復興統一，就事論事地說「依法辦事」，並不適合國情，也不能滿足各方面語文生活的需求。因為當年非法地將簡化字倉促立為規範漢字這件事情本身就存在嚴重問題。

陳章太（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家語委原副主任）：50年來關於繁體字的應用問題有過三次比較大的討論，事實上這種爭論早已有之，也可以說有了漢字，有了俗體字，在歷史上就有了類似的爭論。漢字的社會應用，有社會性，涉及到政治、文化、心理以及應用，各個層面都影響到，因此，文字問題包括繁簡問題是個很敏感的問題，要非常謹慎。總體上看漢字簡化是成功的，簡化漢字的社會應用，也是成功的。語言文字社會性很強，政策就怕來回變，每動一次都要考慮到社會應用問題。這個我們是有歷史教訓的。因此，從法律層面，從政策層面，我們都不能動搖，必須堅持規範漢字。但可以從技術上解決簡繁轉換容易出現錯誤的問題，比如詞典的字頭，在規範字後面附上相應的繁體字，很有必要。

點評：從1949年以來，從來沒有充分地展開過有關漢字簡化的討論，1957年章伯鈞、羅隆基等政治家在整風鳴放中的講話（6月22日人民日報）揭穿了所謂「簡化字討論」的不民主真相。1957年正是需要對漢字簡化做出總結和檢討的時候，反右

鬥爭的暴力鎮壓將一切發表不同意見者全部打成右派，實行專政，知識界怎麼可能暢所欲言？著名文字學家陳夢家先生正是說了一句跟陳章太先生幾乎一樣的「文字改革要謹慎」，就被打成右派，文革初自殺身亡。認知心理學證明，簡化字對於漢字認知沒有好處，認字的難易跟筆劃多少沒有直接關係，偏旁使用頻率越高，其筆劃的多少越不發生影響。簡化字吸收了一部分行草簡字，排除了民間存在的大量行草簡字，實際上並沒有提高民族書寫的總效率。由於減少筆劃並不能直接提高認字效率，而且簡化字在掃盲常用字中所占的比例很低，（大約平均每字僅減省一筆），所以對於掃盲也沒有特別的作用。中國大陸的文盲比例長期大大高於港臺地區。大陸小學的學制依然是六年跟港臺一樣，數十年億萬人民反復實踐的概率雄辯地證明了簡化字不能加快兒童認字的效率。漢字簡化切斷了大陸人民跟古典文化的直接聯繫，把本來祖國統一的最堅實的基礎變成了實現兩岸統一的嚴重障礙。這怎麼能說是成功的應用？這種「不動搖」完全是堅持錯誤，執迷不悟。臺灣教育工作者當年面臨的文盲困境比大陸更加可怕。日本殖民當局五十年推行皇民化，學校實行日語日文教學，回歸中華民國的時候，民眾絕大部分不懂國語，（只懂閩南或客家等方言），不識漢文。教育工作者就是使用傳統的漢字一步一步掃除了文盲，推行了國語。對比實行了漢字簡化的中國大陸，難道不是發人深省的嗎？

佟樂泉（教育部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委員，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原副所長）：根據「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結果，截至上世紀末，平時習慣寫簡化字的占95.25%，寫繁體字的只占0.92%，有3.84%的人是繁簡並用。這說明規範漢字已經牢牢佔據大陸社會用字的主流，不容動搖。目前簡化字和繁體字使用的關係相對合理、和諧。

點評：拿這種社會調查來作辯解也完全是自欺欺人。五十年的教育全部使用簡化字，文革時代甚至將反對簡化字上綱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國家壟斷了所有的出版和新聞讀物，人民幾乎沒有機會接觸繁體文字的讀物，他們當然絕大部分習慣使用簡化字。如果佟委員1946年到臺灣去搞社會調查，得到的結論肯定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識字青少年都相當熟悉日語日文。這樣的資料決不說明臺灣人民應該使用日語日文。拿這種論據為自己的政策來做辯解，說明佟委員的底氣已經非常不足。倒是居然還有百分之三點八四的人能簡繁並用，告訴我們，繁體字經過四五十年的摧殘，還能在數百萬人的筆下殘存，說明繁體字在大陸民間仍有基礎。

王本華（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編輯室主任）：美國的很多中文學校，原來使用的是臺灣贈送的繁體字教材，現在都改用簡化字教材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簡化字課本有兩大優勢，一個是中文拼音，一個就是簡化字。他們放棄免費的繁體字教材，而主動花錢買簡化字教材，就是因為簡化字的教材容易學，受漢語學習者的歡迎。

點評：這種說法是用資源壟斷來證明方針正確，毫無說服力。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人大量移民國外。中國公民數十年接受簡化字教育，移民海外生存尚且不易，不可能再重新花費精力和時間去接受繁體字教育。他們的子女要學習中文，海外中文學校不是國內學校，鞏固教學成果，絕對需要父母的輔導，父母沒有學過繁體字，當然只能用簡體字教材。這是文化資源壟斷的結果，而不能證明簡化字有什麼特別的優越性。人民幣與美元差價懸殊，國內課本價格低廉，花一點美元買幾本國內教材，所費無幾，決不能說明什麼問題。如果王主任能拿出證據，說明大批來自港臺的華僑都紛紛搶購簡化字教材，送子女進大陸人的中文

學校。勉強還能說明問題。可惜現實的情況剛好相反，兩岸華僑的中文學校始終不能統合，雙方堅決不肯遷就對方。對中文拼音的看法，（臺灣注音符號第二式跟中文拼音差別已經不大），還多少有些鬆動；對簡化字則幾乎沒有商量餘地。這類情況王主任瞭解嗎？如果不瞭解的話，不妨到海外走訪走訪。不僅訪問從小學習簡化字的大陸人，也聽聽臺灣人的說法。還有韓國學者張喜久先生針對漢字的祖籍國提出的想法，不妨也請認真讀一讀。

宋若雲（國家漢辦教學處副處長）：我們向外推廣漢語，應該推廣我們標準的語言文字——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目前的漢語國際推廣工作，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國際上學習漢語的人越來越多。50年代出生的留學生，也就是新移民，已經占據了海外對外漢語教學主戰場，海外著名大學中文方面的領軍人物，多是40歲左右的新移民，他們教的都是簡化字，因為他們在大陸學的就是規範漢字。在歐美地區，簡化字和中文拼音，早就占據了對外漢語的主體地位。也有原來受繁體字教育的人參加我們組織的學習及漢語水平考試，為了便於他們學習、逐步適應簡化字，我們也提供繁簡對照版的教材和試卷。

點評：國際漢語熱並不能說明簡化字優越。海外教學使用簡化字也是長期簡化字資源壟斷的結果。並不能說明簡化運動的合理性。以上幾位專家的講話都是用既成事實來回應關於漢字簡化得不償失的討論，其實是答非所問。或許根據「劣幣驅良幣」的規律，剛好證明占領主戰場的簡化字恰恰是一種「劣幣」。粗放的簡化字驅逐了精微的正體字。他們回避了歷史的責任，回避了民族文化長期傳承的延續性，回避了祖國統一的文化思考。

傅永和（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家語委原副主任）：語言文字規範，從範圍講是在現代漢語範圍內。現代漢語裏面又分字的規範、詞的規範；字的規範又分通用和專用，我們

的規範側重通用字的規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已經把規範字和繁體字的使用範圍規定清楚了。在專業領域可以考慮搞電腦的簡繁自動轉換系統，為正確使用繁體字提供方便。

點評：語言規範，不說還好，說起來更令人生氣。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國家會有這樣的語文規範，讓文字不再適應古典文學和境外同胞。漢字本來既適合現代漢語，也適應古代漢語，堪稱是世界上最勝任承載古今文化的文字。港臺的中文完全不存在這個規範問題。恰恰是推行了簡化字，才造成了這樣的分野。即使是現代漢語範圍內，也不能適應所用的中國人，面對港臺同胞和老一輩的海外僑胞，又不得不使用繁體字。這種規範問題完全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未獲得港臺和海外學者的同意單方面實行簡化，強制推行幾十年的結果。如果當時發揚一點民主，允許爭議一二十年，到了電腦成功輸入漢字的時代，漢字簡化的問題就無疾而終了。

翟喜奎（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國家圖書館現在正在建數字圖書館，用字量很大。除了國家規定的20902個漢字，系統之外，還用到6000多字。因此，做數位化的時候用的字庫是unicodeISO10646的字庫，沒有用國標的字庫。因為數字圖書館的用字量太大。ISO10646將來可以做到71000字，它的好處是你隨便打一個簡化字，就會顯示出它的繁體字、異體字，所以可以利用現代化的手段，來解決繁簡字轉換的問題。

點評：從歷史的長河縱向觀察，從漢字文化圈的橫向觀察，我們發現，簡化字無助於認字、無助於提高書寫效率，二十多年的電腦中文輸入實踐更加證明，兩千多個簡化字對於漢語的電腦信息化毫無助益，反而在簡繁轉換之中徒增無數的麻煩。過去有人常說，可以把古籍翻譯成簡化字出版。可是一經實踐就會發現，類推簡化字的問題不勝其煩。不類推，則不規範；類推簡

化，則將增加極大數量的新簡化字，國際信息網路根本無法負擔。簡化字對中文電腦信息化毫無助益，反添麻煩，是漢字簡化運動最根本的失敗。如果逐步恢復繁體為書刊和電腦用字，將簡化字降格為行書手寫體，繼續讓人民書寫使用，——識繁寫簡，上述困擾就可以一掃而空，負擔也大大減輕。祖國文字統一，漢字文化圈的國際字庫的進一步統合、國際化、集約化都將成為指日可待的前景。

二

報道：一些人擔心在簡化字佔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許多人沒有機會學習繁體字，不認識也用不好繁體字，特別是當遇到用同音替代的方式簡化的字（即一個簡化字對應的是簡化前兩個以上的字，如谷：表「山谷」義時作「谷」，表稻穀義時寫作「穀」），在由簡到繁轉換中容易轉換錯誤，因此提倡「用簡識繁」，即在中小學語文教材中遇到簡化字與繁體字非一一對應時，在簡化字旁括注對應的繁體字，耳濡目染地使學生能夠認識繁體字。專家們就其必要性與可行性進行了研討，對繁體字的學習提出了意見和建議。認為給中學階段以上基本完成識字任務的學生適當地介紹些漢字結構和演變知識、漢字簡化及繁簡字的對應規律，使他們從總體上瞭解漢字，是完全必要且可行的；另外，在古漢語、考古、書法藝術等專業領域要對相關專業從業人員進行專門教育培訓，使他們掌握繁體字、古文字等知識。

點評：提倡「識繁寫簡」或者「用簡識繁」不是讓簡化字繼續占主導地位，隨機地使用繁體字。而是要逐步恢復繁體字的正統地位，將簡化字降格為手寫體，這樣既能保證過渡期中不會寫繁體字的人民不會變成文盲，又能恢復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原貌，只要優化少數確實太繁難的漢字，並進一步優化和簡化

手寫體系統，方便人民書寫，正統漢字則維持了民族文化縱向和橫向的一致性。識繁寫簡決不是少數文史專業人士的職業修養，也不是部分人民的文化愛好，而是全體人民應該重新獲得的文化權利。港臺人民長期享受中國文字的豐富、優美和精微，大陸人民因為漢字簡化走了彎路，失去了這些權利，現在已經到了逐步恢復這一權利的時候了。

傅永和：提出「用簡識繁」這個問題，不是第一次，在1986年重新發布《簡化字總表》前，也曾有過相似的意見。其實關於推行簡化漢字是不是就不能讀古書、割斷中國文化的爭論，在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發佈後，到1964年簡化字總表發表前，已經有一場大討論，當時負責討論的是王力先生。王先生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也做過專門的調查，調查表明在大量閱讀過程中自然就學會了繁體字，不需要專門學習繁體字。還有一次討論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有人提出「識繁寫簡」，引起了語文界的爭論，後來中央對此也有結論，要求繼續堅持漢字簡化的方向。

點評：王力先生的文章，反其意而用之，剛好說明如果逐步實行識繁寫簡，並不會在人民當中造成嚴重的問題。而且現在的電視、電腦、手機等多種信息傳播手段和視頻裝置已經在各地城鄉不斷普及，經過教育、新聞媒介等機構合作規劃的普及宣傳教育，人民群眾重新認知古今貫通，海內外統一的繁體字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情。比較困難的是要能夠正確書寫繁體字必須經過比較正規的學習和訓練才有可能，因為簡化運動已經破壞了漢字固有的正字法，形成了一套另外的正字法。作為過渡時期，人民群眾可以繼續書寫簡化字。現行的這一套簡化字作為基礎將進一步優化和深化，即排除不能一一對應和其他不合理的惡例，繼續吸收古代文化遺產中行書和草書易認、俗成的優秀簡字，形成一

套正式的中文標準行書，作為漢字的書寫標準式，與西方文字的印刷體、書寫體分別對應。所謂「中央對此也有結論」的說法正是五十年代簡化運動失誤的根本原因。羅隆基先生在鳴放中揭露，當時在政協中的確是討論過文字改革問題的。當時討論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討論中國文字是不是要最後改用拼音。說到漢字簡化，也沒有討論漢字簡化的方向問題，拿出來討論的是簡化字。而且拿出來討論時，說是黨已經決定了，這樣，如果展開討論，就會說是反對黨的政策，當時很多人是不敢講話的。在討論中還明確提示：「毛主席是贊成拼音化的」。這樣讓大家討論就很難發表意見了。1956年中共中央的成員以革命活動家和軍事指揮員為主，其中包括一部分文盲和半文盲。由他們作出決議，去決定中華民族文化的未來方向，本身就是十分偏頗的事情。今天的中共中央，大專學歷的成員已經大大增加，但是語言文字的改革是相當專業的文化決策，以工程技術幹部為主體的中共中央也不宜一錘定音。應該聽取語言文字專業的學者專家的意見，不僅如此，而且因為凡1949年以後出生的知識份子都僅僅接受過簡化字的教育，可能對於簡繁兩體的得失利弊不容易全面權衡，所以一方面要讓提倡恢復繁體的言論獲得充分的自由，還必須聽取港臺和海外出身的語言文字專家學者的意見，甚至參考漢字文化圈各國學者的意見，全面權衡和決策。

佟樂泉：有觀點認為漢字的繁難是針對寫來說的，對於認來說，繁體字、簡化字區別不大。其實不然，寫和認不能截然分開。我曾經做過這方面的實驗，漢字特徵越明顯越容易認，而不是筆劃越多越好認。如果我們把一個字的兩個形體比如繁體字和簡化字同時介紹給初學漢字的人，是不符合情理的。漢字的一個音一個形是相互對應的、固定的，繁簡字形同時出現在教材中，一個音同時對應兩個字形，對學習者來說不符合學習的規律。對

初學者介紹兩種形體，以後他寫的時候容易先想起印象深的那個字，會出現繁簡並用的混亂，學習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因此，如有必要，也一定要在已經牢固掌握簡化字的基礎上，再介紹另一種形體。以古漢語為專業的，掌握繁體字是必要的。在中小學、最好放在中學，要適當對繁體字、對簡化字的規律有所介紹。要正確、全面講述簡化字的歷史、繁體字的地位和功能。

點評：不是筆劃越多越好認，也不是筆劃越少越好認。認知心理學表明，有規律的組塊可以幫助認知。常用的偏旁部首就是漢字的組塊。實驗表明，出現頻率越高，筆劃的多少就越不會發生影響。所以將許多偏旁加以簡化對於認讀並沒有助益。這樣一來，簡化工作的大半都失去了價值。所以簡化字是多此一舉。一國兩字的現象正是簡化運動造成的結果。中國將近兩千年的文化教育就是用繁體字完成的。香港臺灣的人民也是這樣掃除文盲，培育人才的。為什麼偏偏大陸人民要堅持這種並無效率的簡化字？已經錯了，為什麼還要將錯就錯？要求實現識繁寫簡，就是可以避免初學者會遇到一字兩形的問題。只要當機立斷，充分籌備，在今天文盲已經大大減少，文字信息手段無比便捷的時代，恢復繁體，簡體降格，完全是可以辦到的事情。祖國文字的統一，民族文化的復興，更加充滿希望。

蘇培成（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會長）：「用簡識繁」勢必增加絕大多數人的學習負擔。在《漢字改革》一書中，王力先生對民國政府採取的繁簡並用的漢字政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最令人百索不得其解的，乃是教育部（指民國時期的教育部）一度公佈簡體字，卻教小學生同時認識繁體。這些全國認識的簡體字，我們天天看見它們，天天寫它們，何煩教育部公佈？學生之喜歡簡體字，如『水之就下』，今天國文教員在字旁畫了一個大叉，明天的卷子上它又來了，又何煩教育部

的提倡？如果說是正式批准，讓學生放膽去寫，國文教員也不必再打叉，這話有些道理了，卻又何苦叫他們同時認識繁體字？本為避繁就簡，卻弄成了簡上加繁，這不是所謂『治絲益棼』嗎？我以為教育部如果要公佈簡體字，必須同時廢止繁體字，否則所謂公佈者，對於漢字之改革，毫無用處，徒然增加書寫上的糾紛而已。」今天的在教材中括注「繁體字」的建議，與當年王力先生批評的民國政府的錯誤如出一轍。

點評：民國政府還比較能夠聽取不同意見，在遭到反對以後便立即停止了簡化嘗試。今天的一國兩字現象正是1956年簡化運動的結果。也就是說，將簡化字升格為規範字，卻又無法完全廢止繁體字。而且民族文化的延續、繼承和發展都少不了要使用繁體字，為了跟臺灣、香港和海外同胞溝通，也少不了繁體字。現在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倒是面臨一個新的考驗，能不能認識到漢字簡化得不償失的錯誤，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要想避免一字兩形，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簡化字的規範字地位，降格為書寫體，恢復繁體的正統地位。經過一代或兩代人的過渡，恢復到1956年以前的狀況。其實歷史上中國人實行的大致就是識繁用簡的辦法。印刷讀物是用正體，書寫則約定俗成地使用行草簡字。許多名人書簡真跡可以證明這樣的情況。陳立夫等人晚年編寫了《標準行書範本》是一次很有意義的嘗試。實際上是成功地繼承了這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

徐軼（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學語文編輯室副主任）：繁體字放在識字層面沒有實際運用需要，也沒有認識的必要，效率也不會高。從識字角度來看，識字就是為了閱讀，教材中繁簡對照，會造成繁簡字的混雜使用，肯定會影響教學效果，而且會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閱讀語境很重要，從識認的角度講，在一定的語境中，認識繁體字並不成問題，只是在用的層面會發生一些問

題。可以在一定學習階段，讓孩子們瞭解原來的漢字是什麼樣子，比如講「有趣的漢字」，讓孩子們猜猜原來的繁體字都變成什麼樣了。

點評：低年級兒童學習簡繁兩體當然是不必要的。但是要想徹底擺脫一字兩形的困局，只有一條路，就是廢除簡化字的規範地位，降格為書寫體。剛好也能跟西方英法德俄等文字接軌。它們都有印刷體和書寫體。剛入學的德國兒童學習楷體包括大寫和小寫，然後三年級左右開始逐步教學書寫體，結果全民的書寫基本規範。廢除簡體字的規範地位，就要籌備到某一年秋季，讓一年級兒童恢復繁體字學習。從一開始當然會有一點困難，其實低年級課本不會有很多難寫的字。中國人兩千年就是這麼過來的。但是應該明白，兒童從發蒙時期開始就認識傳統的漢字，是對民族文化認識的熱身活動，每天多訓練五六分鐘，不會給他們帶來太多的負擔，卻讓他們接受了終身受用的基本功。

王本華：中小學語文教材內容很多，不能把所有文化知識都放在中學教材中承載，在教材中進行繁簡對照，不管考與不考，無形中都會增加學習負擔，效果也不一定好。其實，在一定學習階段，可以總體上介紹關於繁體字的知識，過去我們在教材中一直都有相關內容，比如高中的教材，曾經附錄過《簡化字總表》，附錄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這輪新課標中，專門安排有語言文字的選修課，可以考慮專門講一些繁體字的知識。

點評：小學低年級應該只學繁體字。臺灣的教學經驗是，到了五年級開始，發給一冊《標準行書範本》（內有五百多字為簡化字），學生可以翻看、模仿，老師做適當指導。對於規範民間書寫體和傳承書法都有好處。

張萬彬（語文出版社副總編）：教材中用繁體字，等於是讓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都要掌握繁簡兩套系統，在基礎教育階

段，增加這麼重的學習負擔，是否值得？可行性不強。

點評：德國青少年進入文理全科中學，必須在五年級或者七年級，開始學習古典語文——拉丁文。除了字母大部相同以外，拼讀、文法都不同於德文，寫字並不困難，可是文法複雜，必須記誦的變化繁多，許多德國成年人都抱怨拉丁文太難學。可是，德國教育部門從來不動搖，因為這是歐洲古典文學的基礎。我們閱讀馬克思、列寧的傳記，發現他們都曾經學過拉丁文，而且成績優異。俄國學校堅持教學拉丁文，俄文字母跟拉丁文字母更是完全不同。

宋若雲：我們教外國人的時候，做過一個調查，外國人學漢語第一難是辭彙量少，第二是漢字難學難認，其實辭彙少也是因為漢字難學難認。所以歸根到底還是漢字難學難認，因此我們還是應該給外國人教學最簡單的漢字。在簡化字在海外學習者中大受歡迎的情況下，我們現在回過頭來搞「用簡識繁」，只能是自亂陣腳，既不符合對外漢語教學的實際需要，也不受海外漢語學習者的歡迎。

點評：「漢字難」的說法完全是西方歐洲中心主義和蘇聯馬爾主義語言階級論的殘餘。（參看第十章）。精通多種外文的作家巴金和香港金融家、基本法起草委員安子介等人都早已否定過這類陳詞濫調。法國漢學家、巴黎高等院校漢語教學總監白樂桑甚至說：「漢字難，都是你們中國人自己在嘮叨」。認知心理學認為：語言（尤其是第二語言）學習存在著學習關鍵期，一般從開始學話時起到青春前期。而且越早越好。跨越了關鍵期，語言學習的困難越來越大。到中國來學習漢語的留學生絕大部分年齡都在青春前期後期或已經過完青春前期。他們學習的困難跟漢語漢字沒有多少關係。中國留學生到國外，學習拼音文字的外文，情況幾乎跟他們一模一樣。中國文化完全沒必要妄自菲薄。正是對外

漢語教學的心理學實驗證明了一個非常嚴酷的事實：簡化字從總體上說，對於認讀並沒有助益。所以外國學生學簡化字還是繁體字，基本沒有區別。海外的漢學家從學理和職業要求出發，總要博覽群書，旁徵博引，縱橫古今，不限於閱讀近五十年的簡化字文獻，不限於閱讀中國大陸的中文文獻，從美學心理出發，作為外國人而選擇漢學為職志，總是對漢字文化懷抱嚮往和眷戀，總願意學習和欣賞中國的古典文學和藝術，他們一般地都認為繁體字才是中國文化的正統，如果學習漢語，只需要學習繁體字，恰恰對於他們來說反而是減輕了不少負擔，正中下懷。

董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所長）：今天談「用簡識繁」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本來應該不成問題，我們的字典、辭書都有繁體字。簡化字和繁體字的一對多問題，我們完全可以妥善解決，這個問題是徹底解決，還是部分解決，需要商榷。

點評：當然要徹底解決才好。最徹底的解決就是恢復繁體字，將簡化字降格為行書。一勞永逸，割除贅疣。

陳章太：在繁體字應用的具體問題上，比如在高中階段，給學生們提供一些繁體字的知識，這個可以考慮。比如韓國，漢字已經不用了，但是在韓國的高中教材裏面還是放了一些漢字進去。

點評：繁體字的問題決不僅僅是具體應用問題，而是中華文化更好地延續和繼承的問題。過渡的辦法是現在就可以開始在中學語文課本中恢復古文課文的繁體、直排，讓學生直接領略古文閱讀的氛圍。德國中學的拉丁文課文都是原汁原味的歷史故事，原本的句型句法。中國的青少年唯讀簡體字的古文和改寫過的古典文學故事，勢將跟古典文學漸行漸遠，中國文化亦將日益蒼白。陳委員說的韓國的漢字問題比較複雜，實際上是幾經興

廢，始終不可能完全廢除。韓文的辭書沒有漢字作注，將無法索解。現在韓國的漢字教學正有重新興盛之勢。

程榮（社科院語言所研究員、《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修訂版主持人）：真正識別繁體字，難度還是挺大的；在教材裏面給繁體字括注，更要費斟酌。比如港臺用的「廈」其實是異體字，異體字的問題很複雜，在教材裏面怎麼括注，怎麼給學生講解？還有新舊字形的關係，筆劃多一點，少一點，怎麼寫，這些都很複雜，古書都是用舊字形，現代出版的古籍都是用新字形，你在教材中括注繁體字採用哪個字形，還有怎麼跟港臺銜接？這些問題都很複雜，也很難一步到位地解決好，給中小學生增加這麼大的負擔，實在沒有必要。我們漢字的歷史悠久，在中小學教學中，比如印刷術，比如繁簡字，這些作為知識，可以給學生們講，當然最好是中學階段以上的學生，而且是在課外讀物上面加入這些內容。

點評：把握犖犖大端，不必拘泥細微末節。兩千年來中國知識份子都是學習繁體漢字繁衍文化的。港臺的教育事業也是如此進展的。所有的混亂都是由簡化漢字引起的。一旦取消它的規範地位，其他問題基本都不足為慮。至於課本編輯中選用哪些字體，可以交給專家討論決定。異體字比簡化字的歷史長得多了，許多簡化字本來就是異體字之一。千年的教學都進行過了，還怕今天沒法教學？莫非今人真的變得比古人愚蠢了？

三

報道：漢字是中華文化的標志和寶貴遺產，繁體字作為漢字發展演變過程中的一種形體，為傳承中華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否不學習繁體字就無法讀懂古籍，從而造成歷史文化傳遞的中斷呢？文字是文化的載體和組成部分，但並不完全等同于

文化。認識繁體字的人不一定讀得懂古文，而且文化的種類很多、載體很豐富，文字只是其中一種。並非所有人都只有通過讀原版古籍一條途徑瞭解、繼承傳統文化，古書今譯、用簡化字印刷出版古籍以及通過廣播、電影、電視、網路等媒體宣傳教育，都是方便現代人學習繼承傳統文化的有效手段。

點評：這是十足的詭辯。不學習繁體字，絕對不可能學好中文的古籍，絕對學不好中國的古典文化。這個結論毫無疑義。認識繁體字不一定懂得古文，但是要懂得古文必須學好繁體字。比如一本用簡化字排印的《漢字文化綜論》（作者劉志基）舉例列出《說文》的詞條：「朮，邑中道也，从行朮聲」。如果沒有繁體字知識，就會覺得莫名其妙。「從行」是什麼意思？原來朮字的繁體是術，行是它的左右兩旁（形旁，如通衢大道），朮則是聲旁。由此才能理解「術，邑中道也，從行朮聲」，這個字在古文中的本義是指城市中的道路。這類書籍以簡化字排印，弊病是顯而易見的。沒有繁體字知識，就不可能閱讀未經改編的古代文字，不要說古代典籍，就是名勝古跡的對聯、匾額也不能卒讀，連一些傳統的對聯、笑話和文字遊戲都無法理解。文字不等於文化，但是文字是歷史文化中最主要，也是信息含量最豐富、含義最確定的載體。任何其他載體，美術、音樂、歌舞、風俗、工藝等多種載體都無法跟文字相比。實踐已經證明，中國古籍汗牛充棟，如果翻譯成簡化字勢必造成大量類推簡化字，電腦漢字字庫根本無法承擔。漢字是漢語文化的本位。電化音像手段只能間接地介紹，只有傳統漢字才能傳達歷史文化的本真。連中國教育部語用司的幹部（這篇報導的結尾處署名為于虹、潘國霖）都會發出「是否不學習繁體字就無法讀懂古籍」這樣的疑問，中國歷史文化傳承的危機難道還遠嗎？

蘇培成：據說，有人在某大學圖書館借閱《後漢書》，恰

好此書名三個字都是繁體，管理員不認識繁體字，說沒有此書，有人以此為理由提出要「用簡識繁」。其實這個例子最多只能說明管理員不稱職，而不是因為推行簡化字造成的。讀不懂古文、古詩詞，那不是簡化字的問題，那是古代文化知識不足、古代漢語知識不足的問題。不是認識了繁體字就同時懂得了古代漢語。很多人有這種誤會，把繁體字等同於古代漢語。即使在漢字簡化前，不學習古代漢語也不一定就能讀懂古書。

點評：這位管理員的確不稱職。而這種不稱職肯定是推行簡化字造成的。如果沒有推行簡化字，一名大學的圖書館管理員絕對不會不認識繁體的後漢書這三個字。如果沒有推行簡化字，來這裏借書的大學教員或學生都不可能在借書字條上用后字來替代後字。這種惡性同音替代完全是1956年簡化運動造成的。認識這三個字不需要任何古代文化知識和古代漢語知識，簡化運動以前凡上過小學三年級的人都會認識這三個字，不論他是否知道這是一本古代歷史典籍。不學習古代漢語當然讀不懂古書。什麼是古代漢語？古代漢語包括文言的語法知識、古代文化常識，首先第一步是傳統漢字知識。不認識傳統漢字，不容易接近古典文獻；只能閱讀經過改編的古典作品。至少必須將繁體字翻譯成簡化字。同音替代會傳達錯誤的文字信息，只要具備一點古代文化知識，都應該知道，嬪妃的後宮和皇后、太后的后宮是不容胡亂混淆的。從閱讀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任何閱讀和學習，首先的前提是必須在文字上是熟悉的。傳統漢字古今貫通將近兩千年，學會了傳統的繁體字，就能直接辨認漢代以後流傳下來的文獻，甚至不難辨認先秦兩漢時期的隸書文獻。簡化運動截斷了這一文化傳統，中國大陸的人民非經訓練不再具有這樣的文化能力。而且古代文化也有各種層次的區別。甲骨文和小篆，還有歷代草書藝術作品，非經訓練不易學習。可是漢代的樂府詩歌就有很多平

白樸素的作品，只要識繁，就不難欣賞。說文解字這樣的字書，釋文也不是高深莫測，能夠識繁就不難索解。唐詩、宋詞、筆記、宋元戲曲和明清小說唱詞，有很多內容與白話文相去不遠，結果也因繁簡兩體而造成了隔閡。如果沒有學習過繁體字，許多人連民國時代的報刊都無法閱讀。現代中國的教育體系真的就應該這樣培養現代的中國人嗎？

朱小健（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國訓詁學會副會長）：有人提簡化字在漢字的文化傳承上有問題，不如繁體字。我看這不是繁體字和簡化字的問題，而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問題，如果你真要考察漢字的文化信息，最好用古文字，用小篆之前的古文字，而不光是繁體字。

點評：這是故意抬杠，而不是討論問題。人家說的是在文化傳承上繁體字優於簡化字，而不是說哪些漢字承載著古代文化信息。小篆以前的古文字當然承載著古代文化信息，很有價值。但是那些文字還不是成熟的漢字，僅是漢字的前身。漢字發展到先秦兩漢時期，秦始皇敕令書同文，書法由小篆逐漸演變成隸書，東漢許慎編寫了《說文解字》標志著漢字發展進入了穩定期。經過篆隸草楷四體共存的時代，楷體漢字逐漸成熟為正體（繁體字）。正體的傳統漢字由於字義的擴大，不斷地增加偏旁而「繁化」出系列性新字，（當然也有一部分簡化），逐步形成了形聲漢字占重要地位的根本特點，這類特點在漢字的前身那裏還不明顯。繁體字從總體上說，不僅接續了小篆和以前古文字的信息成分，而且又承載著漢字成熟以後持續發展的文化信息，一共擔當了近兩千年中華文明的文獻信息載體。傳統的繁體字既是古文字，又是今文字。它大約從戰國末期的隸書時代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都是中國的正式文字。今天仍然是臺灣、香港、澳門和海外許多華人社區的正式文字。儘管中國的通用語言文字

法將傳統漢字排除在規範漢字之外，但是仍然經常要使用繁體字印刷某些出版物，實際上傳統漢字在繼續充任現代漢語文化的文字信息的角色時，不僅不比大陸的簡化字遜色，而且比簡化字更加精確入微，更具有表現力。在輸入現代化工具電腦和信息網路的現代化進程中，繁體字一點也不比簡化字稍弱，反而根本沒有同音替代後發生的轉換困擾。類推簡化的問題使得電腦字庫根本無法負擔，辭書界進退兩難。從這個意義上說，簡化字是退而不能有效承載古代的文化信息，進又不能高效適應現代電腦信息網路的一堆垃圾。

程榮：從繼承傳統文化考慮，不光要認識繁體字，還有小篆、甲骨文、金文，只認識繁體字還遠遠不夠。

點評：小篆、甲骨文和金文等等都是不可忽略的古代文字。可是我們不能沒有數量概念。繁體字是最基本的傳統漢字。掌握了傳統的繁體字和基本的文言語法，就可能涉獵中國古代歷史的絕大部分典籍，即使是先秦兩漢的文獻也因為經過古人大量的傳抄和整理，幾乎都寫成了傳統的繁體漢字。可以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文學藝術歷史等各個角度去觀察、認識和研究。而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僅僅是一些出土的殘編剩簡、器皿、碑刻文物上的文字。往往需要有關的專家認讀、破譯。將普遍意義大得多的繁體字跟那些漢字的前身文字相提並論，很難說明什麼問題。用這類「顧左右而言他」的辦法並不能抵擋恢復繁體字的呼聲。

佟樂泉：漢字的繁難是確實存在的。漢字簡化使漢字容易學、容易寫了，也就方便人民群眾學習文化，使文化回到了群眾中，現在廣大群眾的文化水準明顯提高了。漢字中沒有簡化的也不一定都是合理的。

點評：漢字認知心理學的論證否定了漢字難學的說法。具體的論述，第二和第三章都有詳盡論證。並且論證了簡化字並沒

有提高民族書寫的總效率。其實每個個人捫心自問一下，只要不是成年掃盲學文化出身（錯過了語言學習的心理關鍵期）的人，難道漢字學習真的那麼難嗎？提倡簡化字的魯迅、瞿秋白、錢玄同都是文壇鉅子，家學淵源，滿腹經綸。他們往往自視為天才，區區漢字，何足道哉。他們萬分同情文盲同胞，目不識丁，悲苦無告。他們不瞭解語言學習的心理關鍵期，卻憤世嫉俗，將責任主要怪罪到傳統的漢字身上。其實文盲現象是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綜合性痼疾，必須綜合治理，跟改革漢字、廢除漢字很少有關係。佟委員認為「漢字中沒有簡化的也不一定是合理的」。這句話有道理。當年的簡化運動倉促草率，不少字當簡而不簡，不當簡卻簡。很不合理。現在怎麼辦？應該原則上恢復繁體，將現行簡化字降格為行書，同時將少數從心理學分析來看確實不易認、不易記的繁體字（數量並不太多，如龜、鬱）加以優化，合理簡化；並引進更多傳統行書草書已經約定俗成的字例，讓簡化字的隊伍更形擴大，加快書寫速度，取消惡性同音替代，讓手寫體更加合理而規範劃一。

張萬彬：現代教育與古代教育的學習內容、價值取向、發展方向都有很大的不同，傳統文化的學習只是現代教育其中的一部分，並不是全部。傳統文化的繼承並不是只有通過讀古籍才能實現，對多數人來說，對傳統文化的學習，也並不一定都要讀古籍原文，還可通過其他方式，比如電影、電視等等。中華書局和語文出版社出版的古籍銷售量很小，說明真正需要讀古籍的人極少。唐詩、宋詞及古文都大量用簡化字印刷，從出版部門來說沒有什麼不方便的，也沒聽學生說用簡化字不便於學習。

點評：現代教育當然不同於古代教育。沒有人提倡完全回到孔子、朱熹或王陽明的教育模式。但是作為教育內容的一部分，傳統文化仍然必須學習。除了電影、電視、小說、連環畫，

還必須讀一定的古籍。中國是一個文化遺產大國，萬國仰慕的中文典籍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中國公民必須具備一定的古典文化修養。這是毫無疑義的事情。既要學習一部分古籍文獻，就應當原汁原味，繁體字，甚至豎排。為便於教學，當然要加標點，並予注釋。歐美國家大多在基礎教育的後期（小學五年級左右）教學拉丁文，也是讓國家的社會文化中堅不斷承繼民族和人類的思想文明遺產。德國的拉丁文課程作為必修科，大學的許多專業沒有拉丁文成績，不准入學。拉丁文課程由淺入深，原汁原味，除了電影、電視等輔助手段，強調要求學生翻譯解釋，背誦大量語法變化的規則表格以應付活用。從實踐上說，古代語言專業會涉及拉丁語文，生物、化學、地質、天文這些專業的命名法也會涉及拉丁名稱，其他如法律、歷史、神學等專業雖有涉及，但也不是非常頻繁。實際上掌握拉丁文既有實用的價值，更是一種重要的文化修養。在中國，不少人反駁「提倡恢復繁體，加強古文教育」，總是重複說「閱讀運用古文的總是少數專家學者，是極少數人的事情」。甚至拿古籍出版物的數量來證明。教育部、國家語委、語用司的衮衮諸公為什麼不想一想，我國的教育內容中，數理化生都是必修科，學生畢業以後，又有多少實用價值？高中數學從平面三角教到解析幾何，除了部分進入理工專業後來成為工程技術人員的以外，又有多少人用得上？家庭、個人除了加減乘除，計算增值稅能用上一元一次方程就了不起了。高中物理從第一、第二宇宙速度教到原子嬗變原理，每一屆畢業生有多少將參與太空船和洲際導彈的建設？高中化學從元素週期表教到有機化合物、同分異構體，除了化學專業人士，畢業生會用洗衣粉和味精就行，根本用不著思考化合價和結構原理。為什麼我們的學校要開設這樣的課程，而且是進入高等學校的必修課程，搞成「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趨勢？說到底，是為了保證

民族文化的總體素質。數學是邏輯思維的健美體操；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知識都是現代科學的最重要基礎。如果關於數理化生的想法是基本正確的，那麼「提倡繁體字，加強文言文教學」也就順理成章，合乎邏輯，以促進公民的人文素養跟我們的歷史文化遺產相契合。兩相比較，教育高官們厚於彼，而薄於此，又該作何解釋呢？是下意識的重理輕文，還是另有隱情？我們進一步觀察，不難發現，一旦離開學校，對於數理化生的內容，絕大多數的成人幾乎都絕少接觸。除非是子女的功課遇到了麻煩，又請不起家庭輔導，只好勉強操持，再作馮婦。相反，對於古代的文字，古典詩詞，歷史典故，卻或多或少還會有機會主動或被動地有所接觸，比如旅遊時欣賞名勝中的碑文、對聯，觀賞藝術時涉及名人名言、字畫、掌故，做生意講求風水勘輿命理，如果是業餘愛好喜歡上了文史哲人文閱讀和創作，則更要涉獵古典文化。而且不論他們的職業是理工醫農還是人文學科，三百六十行，這類業餘的涉獵都可能發生。按照這樣的觀察結果來推斷，我們可以說，基礎教育中的語言文字修養從比例上比自然科學修養更加深入和長期地伴隨每個人的一生。再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德國這樣的發達國家，藏富於民。極富裕階層人數不多，失業靠救濟度日的家庭也不多，沒有赤貧不得溫飽的人。人數最多的是中產階級。兩頭小中間大。廣大國家公務員、律師、醫生、教師、職員、職業軍官，收入穩定，教育程度完整。他們不僅專精自己的專業，多半至少懂一種外語，言談可以涉獵廣泛的領域。德國實行五天工作制，工會已經提出每週35小時工作的要求。人民為職業的勞動時間將越來越少。中國如果發展正常，也將在若干年後，逐步走向這樣的社會境界。在週末時間上也在跟世界接軌。到了那個時代，將有更多的人民追求精神的享受，將有不少人醉心於研究古典文獻。從相對比例和絕對人數上都必定會大大超過

今天的文史哲專業人士。此外，從世界的教育比較來看，德國的基礎教育在世界和歐洲地區並不是最好的。中小學教育落後於芬蘭等國家，差距不小。但是德國畢竟保持了傳統教育的優秀成分。說白了，德國沒有特別強調數理化等自然科學的絕對地位，相反一向重視人文語言學科的教學。令所有中國人驚疑不止的是，他們這裏沒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一說。數學和語文（德語）都是畢業會考必考的科目，拉丁文和英文也必須修完課時，成績及格。倒是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等科目都作為選項，選了物理，又選歷史，就可以不修化學或生物，反之亦然。就是這樣的基礎教育，德國的思想家、藝術家、哲學家直到現代都代不乏人，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擁有世界級的科學家不計其數。僅以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人數為例，從1901年到2007年10月為止，共有八十三名德國人獲得諾貝爾獎金。其中九名獲得文學獎，五名獲得和平獎，其餘分別獲得物理、化學、生物、醫學和經濟等科學獎。德國學校重視外語教學。拉丁文（涉及許多語法現象和歷史典故）作為基礎，給外語和文史學科奠定了根基。廣播、電視和書刊全面開放，青少年可以直接看到英美法等外國的電視節目，聽到外國的廣播，購買外國的書報，直接瞭解外國的新聞和文化。中學生就能直接跟外國人用英語或法語聊天，純屬稀鬆平常。瞿秋白曾經詛咒過漢字，但他也曾很形象地比喻說，中國的古文就是東方的拉丁文。對比西方的拉丁文教育，我國的古文包括繁體字，也應當得到重視，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中國的教育領導機構切不可坐擁寶山不識寶。傳統漢字和文言文的教育經過了大約兩千年的發展。中國出現過群星燦爛的詩人作家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進入現代社會，學習繁體字的一代學人面對日寇入侵，國土淪喪的苦難，無論理工醫農文史哲，大師輩出；學習簡化字的一代又一代知識份子，文革前大

學生，紅衛兵大學生、工農兵學員、老三屆大學生，獨生子女大學生，無論是文史哲，還是理工醫農，在創造性成果和個人文化修養方面，都無法望西南聯大時期知識份子之項背。原因固然很多，以繁體字為外部象徵符號的人文涵養是否也是多項因素中的一項呢？

國家語委副主任、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司長王登峰最後總結說，這次研討會討論得很充分，專家們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見和建議。文化傳承的深層次問題在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和運用，而不僅僅是認識繁體字的問題。總體上看，國家關於繁體字學習和使用的法規和政策是明確的、適度的，應繼續作為今後處理繁體字學習和使用的基本依據，同時也要採取積極措施逐步解決繁體字使用中實際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使繁體字在法律允許範圍內得到恰當的學習和使用。

點評：身為國家語委主管人士的王副主任，遠遠沒有看到漢字簡繁的爭論背後是一個文化生態的深層問題。現在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的思想已經普及，可是在中國保護人類文化生態的思想還相當陌生。一些官員和專家根本沒有想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是人類文化生態中不可再生的一部分，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一旦被毀便可能無可挽回。傳統漢字難學難寫的問題已經不再存在，它的歷史文化信息卻是人類文明的瑰寶。而且它完全可以繼續為中國文化服務。生命力極強。電腦中文信息的成功更宣告簡化字是中文網絡世界的贅疣。在人類文化生態意識的面前，繼續堅持犧牲珍貴的古代人文價值以換取虛妄機械效率的思想是非常愚昧的落後思想。

簡化字無益而有害

港臺和海外知識份子關於漢字簡化得不償失的批評，國家

語委可以充耳不聞，甚至可以斥之為有政治目的；可是形勢的發展出乎人的意料。正是國內的對外漢語教學專家和基礎教育心理學專家發現了漢字筆劃跟認知心理之間的實質關係。根本不存在「筆劃越少越容易學」的規律。這些專家們不曾，也不敢提出簡化字得不償失的問題。可是他們的許多結論卻歪打正著，恰好說明了簡化漢字無助於認字效率。巴金、陸定一等前輩人物白紙黑字寫下的「傳統漢字並不難」的經驗之談，我們每個個人的識字經歷，現在都得到了這些實際上相當簡單的科學結論的證實。電腦輸入漢字的成功，早已證明漢字難寫的問題獲得了基本的解決。有人說電腦現在還不夠普及。不要忘記，五十年前中國城鄉連普通的自來水鋼筆也不甚普及。而今天的工業發展速度早已今非昔比。幾乎出於相同的道理，由於簡化字並不能使文盲更快地識字，而且「掃盲兩千字」都是經過挑選的本來就比較簡單的漢字，其中很多如人手口刀牛羊你我他大小左右上下，都沒有簡化，認識一千五到一千七，就算脫盲。所以簡化字對於掃盲識字也沒有明顯的助益。至於簡化字在電腦螢幕上比繁體字更加清晰之類的辯解，實在是理屈詞窮的哀鳴。這類問題在電腦中文程序普及早於大陸的港臺地區根本不值一駁。最為震撼人心的是在中文電腦信息處理的進程中，簡化字一點也沒有表現出比繁體字稍微優越的特性。無論簡繁，漢字的信息熵都是9.65。恰恰相反，由於同音替代的結果，在跟繁體字轉換的時候，不斷出現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話。漢字簡化得不償失已經成為事實上公認的結論。海外的人士比國內看得更清楚。瑞典女漢學家，《漢字王國》的作者林茜莉就公開質疑簡化漢字的必要性。西方人非常看重自身文字的傳承性，稍有規模的辭書總是要在詞條中注明，來源於拉丁文、希伯來文、古希臘文或梵文，並引以為自豪。他們不明白，為什麼中國大陸為了所謂的一點點機械式的效率，竟要捨棄

與古典文化緊密相連的繁體漢字。德國是綠黨的發源地。綠色環保意識深入了所有黨派和人民的心靈。他們寧可不要一時一事的高效率，（議會決議限期拆除所有核電站），卻要保護所有一旦消失就永遠無法挽回的物種和生態。語言文字也是人類社會生態中的自然物種，一旦消失也將無法挽回。我們不僅從中華民族的立場出發，更是從人類文化的立場出發，應該保護和繼承中國的傳統漢字文化。不是它特別優秀，世界上沒有一種自然語文是完美而完全符合科學的，總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而是因為它跟其他所有的自然語文同樣享有在人類文化的大地上生存的權利。同時漢語漢字又是最適應中國人民的思維習慣和文化傳承的語文。對於國內的少數民族，我們尚且要保護他們的語言和文字，沒有文字還要為他們創設文字。在國際上，我們應該充滿「漢語漢字是東方民族文化的重要一支，並正在適應信息現代化」這樣的自信。既然簡化字沒有預想的好處，尤其在電腦信息化過程中沒有任何好處，反而還有相當的缺陷，我們就應當當機立斷，及時改弦更張。1949年以後我們廢除了市場經濟，廢除了《物權法（1929年）》，現在都一一逐漸恢復，甚至恢復了一度被棄置的「先生、太太」之類的人際稱呼。為什麼傳統的漢字就不能恢復呢？不要怕丟失面子。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十六條》都是中共中央發佈的，經過實踐的檢驗，文革是一場浩劫，於是承認錯誤，撥亂反正。況且文字改革的工作還不能全盤否定。中文拼音方案為推廣普通話、輔助漢字教學、推動國際標準化、中文電腦信息化都立下了汗馬功勞，漢字異體字的整理和歸並也是有一定的功勞的。恢復繁體的具體方式也是可操作的。將簡化字降格為行書，讓不會寫繁體的民眾繼續使用，是非常合理的過渡辦法。花錢少，社會波動不大，各種標識、證件、貨幣、表格可以逐年替換，自然淘汰，不必花費大量資金。繁體字中確

實太繁的少量漢字仍可以謹慎簡化，變成行書的簡化字隊伍還可以進一步擴大和合理化。

師資和經費

具體的恢復繁體字工作需要一批熟悉簡繁轉換的教師。一種設想是到港臺地區招聘五千名大專以上、國語表達能力強的青年志願者。分批進入全國兩千多個縣級行政區，執教半年到一年，對各地的中小學校教師以及機關工作人員實行集中培訓，各地城鄉的電腦網路、電視節目和電化教學部門配合展開簡繁轉換的宣講教學活動，只要不是文盲，絕大部分中青年群眾可能在兩三年的時間內適應轉換過渡。大約在一代或兩代之後，就可以完成基本過渡，因為電視、電腦、手機等視頻手段比五十年前方便完備百倍，文盲人數也大大下降，恢復繁體可以比當年推行簡化字更加容易和迅速。恢復繁體甚至可能帶動一場考究文采、注重修辭的中華文化的文藝復興運動。另一種設想，則是完全依靠大陸中青年志願人員，自願報名，擇優錄取，交由北京師範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聯合舉辦簡繁轉換培訓班。經考試合格，分批進入各地執教。簡繁轉換不能一一對應的漢字一共只有將近一百字。其用例中還有一部分非常用詞例在小學教材和中學教材裏不會遇到。估計志願教師的培訓數周就可以考試通過，各地中小學教師，三個月一般都可以基本掌握，半年到一年全面鞏固。如果志願教師以每人每月津貼為2000元計算，5000人，12個月需要120億元。加上平均的交通費、保險費、辦公費每月500元，則需要30億元。估計教材、輔助材料和電影、電視教學片和宣傳片大約50億元。總計共200億元人民幣。交通標記、貨幣、表格自然替換淘汰，不必特別投資。相關的詞典和趣味讀物國家甚至還可以賺錢。這部分經費現在國家的綜合能力是能夠負擔的。甚

至個別特大貪官的貪汙贓款就高達上億美元。國家為民族文化的百年大計，支付這一點開銷完全值得。

現代國際視野中的漢字

從1987年9月20日中德兩國電腦信息專家成功地從北京發出第一封中文電子信件到達德國卡爾斯魯厄大學以後，中文信息開始全面進入網路世界。中國的語言文字更加直接地與世界各國的語言文字並肩存在於同一個平臺上。漢語漢字進入了現代信息化、國際標準化時代。新時代的意義在於，一切語言文字問題已經不能由一個黨的領導部門來決定，（所謂「中央已有結論」），不能僅僅顧及一個黨的利益，或一部分人民的利益，而是全民族的利益。語言文字甚至已經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內部的事務，同時也是國際網路中多個平等的成員之一。多國語文不僅有相互翻譯的轉換關係，還有共同佔有網路空間的共享關係。具體到簡化字問題，就不應該再僅僅考慮黨的威信問題，（其實能夠改正錯誤倒是美德之一），而應該考慮民族文化的長遠利益。不應該僅僅考慮一部分大陸人民已經熟悉了簡化字，重新學習繁體太困難，（其實根據王力教授的實驗結果，這個困難並不嚴重），苟且於一時的「輕鬆和自在」，將背負後世長遠的遺恨。民族語文是兩岸同胞共同的財富。簡化字沒有易認易學的好處，就應當退出歷史舞臺，讓位於縱橫古今，承載豐厚的繁體字，實現文字的統一。不僅在民族內部統一還不夠，從電腦信息的國際化和標準化的角度出發，更應當考慮漢字對電腦網路空間的佔用。漢字編碼使用兩個字節組成一個漢字所以佔用特別多。按照科學集約化的要求，應該盡可能地合理使用空間。人們不難發現，不論是哪一個字庫，數以萬計的漢字都是繁體字，僅有兩千多個是簡化字。它們的存在是漢字世界的贅疣。因為它們的存

在，繁體字跟它們不能一一對應，要制定很多特殊的指令，來解決這類麻煩。因為它們的存在，還將隨時準備接納古籍翻譯帶來的類推簡化字。這種字庫的擴大實際上是漢字信息空間無法忍受的。這樣的擴展既不實用，又不可能。簡化字存在一天，這種兩難的尷尬就會存在一天。一旦廢除簡化字，（將簡化字降格為手寫體，摒斥出字庫以外），這類困惑就可以一掃而空。再進一步推進，我們看到漢字文化圈也應該標準化、集約化。全世界abc等拉丁字母使用的都是相同的代碼，可是漢字文化圈各國都有各自的字庫，甚至兩岸三地還要分國標碼和big5碼。大約在將近兩千年以前，漢字文化圈的漢字原是基本統一的繁體字。後來在漢字主體之下，陸續出現了部分日本漢字、韓國漢字和越南字喃。西方列強入侵以後，日本、韓國也搞了一些簡化字。但是這些都不足觀。只要我們將簡化字並不易學易認的理論告訴他們，估計他們很快就會放棄簡化字，恢復繁體字。到了那個時候，漢字文化圈的漢字字庫的標準化、國際化和集約化就可以無痛苦地水到渠成，毫無愧怍地面對世界其他的文字文化圈。

繁體字將重新整合漢字文化圈

傳統漢字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是中華民族文化最直觀、最典範的代表。漢字也超出了民族的範圍，對於周邊國家發生影響，形成了漢字文化圈，使得漢字不僅是中國文化的有機成分，也成為漢字文化圈各民族各自的文化有機成分。對於漢字是日韓朝越等國家「民族文化自身的有機成分」這一點，各民族的認識經過了一個曲折的過程。他們曾經在中華文明面前幾乎全盤漢化了上千年。到了十九世紀，在西方列強攻破漢字文化圈各國的文化壁壘的時代，全都開始摒棄漢字文化，試圖全盤西化，簡化漢字，實行拼音，廢除漢字，甚至對中國的文字改革形成相當壓力

的包圍圈。可是在幾起幾落的廢除漢字過程中，日韓兩國始終無法徹底廢除漢字，越南在廢除之後，一直在後悔和無可奈何的焦慮之中，恢復漢字教育的呼聲不斷。這些民族文化本身的掙扎表明，漢字詞和漢字在千年以上的文化共存中，已經成為他們民族文化的有機成分，已經不可割捨。強行割捨就會傷及文化本身。

在中國實行漢字簡化、鼓吹廢除漢字的時期，日本和韓國卻發現他們並不能完全擺脫漢字文化。現在中國重新確認了漢字的文化本位，經濟上強大起來，文化上逐漸恢復自信的時候，勢將帶動漢字文化圈各國重新審視漢字在他們民族文化中的歷史定位。漢字文化圈國家除了越來越多的民眾積極投入漢語學習熱潮以外，更多的漢學家和教育官員實際上希望的是中國恢復繁體字。韓國學者張喜久先生的文章很有代表性。如果這樣，他們的青年學習了繁體字，既可以直接跟中國人溝通和學習中國文化，又可以閱讀他們的歷史文獻，學習他們的古代文化。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恢復繁體字也是漢字文化圈的共同利益之所在。

本書曾參閱吉文輝先生《漢字改革百年回顧》（《南京中醫大學學報》2006第三期）和李敏生、李濤先生《昭雪漢字百年冤案》。

謹此致謝！

附錄

艾偉和他的漢字認知心理實驗

艾偉（1890-1955）是中國現代心理學家和教育家。生於湖北沙市，祖籍江陵。字險舟。自幼聰明異常，考入宜昌美華書院，成績極優，升入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攻讀心理學，獲得哥倫比亞師範學院教育學碩士和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二十年代起，在美國展開了對漢語、漢字的教育心理研究。1921年回國，任中央大學教授。曾與夫人范冰心一起創辦實驗學校，培育天才兒童。實行多種教育心理實驗。抗戰時期在重慶組建教育心理研究所，戰後國民政府行憲時，出任第一任考試院委員。1949年赴臺灣，繼續從事教育和測驗的心理研究。1955年九月，因高血壓不治去世。

艾偉對於中小學語文教學的研究可以用他的最富有代表性的兩部著作來概括：第一是《漢字問題》，第二是《國語問題》。艾偉關於國語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字形研究。艾偉對漢字字形的研究，始於1923年。當時，他兼任美國佐治城大學外交學院的漢文教師。他以美國學生作為被試，觀察與研究其學習漢字的心理。艾偉先後設計了三種測驗，以測驗應試者的字形觀察能力、對「釋形」與「同音」兩種漢字教學方法進行比較，對課堂教學中的學習心理歷程進行觀察。結果發現：（1）容易觀察的漢字筆劃在一至十之間；（2）除少數例外，在漢字學習中，一般識記者觀察一字，大都注意其全形。（3）在漢字學習歷程中，形義與形聲兩結締同時組織。（4）字形經釋義後，所組織之結締，均較字形不釋者強而耐久，且此耐久力相差之大，達三倍左右。在上述三項實驗基礎上，艾偉指出，在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的編寫與教學中，應當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在教材前五課至十課中，選擇漢字的筆劃數應

在一至十之間。第二，在介紹和解釋生字時，在可能的範圍內，應取偏旁相同的。同時，應該對漢字的字形進行簡單、明瞭的解釋；第三，生字在教材中首次出現後，應有複現的機會，複現的次數應使其均勻，或比較均勻。第四，字形相似或字聲相同之字，須使學生特別注意，以免聯念錯誤。艾偉對漢字的心理研究，在推廣漢字簡化問題上也具有比較重要的意義。他從中外文字由繁而簡的變遷歷史中指出，為了節省時間及費用，應該推廣簡化字。他根據上述研究所得，提出了在漢字推廣中應該遵循的一些原則，諸如：避免形狀極其相似之簡體字；多用橫直線及相稱之筆劃，少用斜線及折線之筆劃；兩偏旁之筆劃數比率不宜相差過遠；在可能範圍內考慮六書條例或造字時之原意；少造形義毫無關聯的簡體字，等等。（二）字彙、詞彙的測量與編制中小學常用字匯的研製，主要作用是為各年級的漢字教學提供一個比較客觀的標準。具體地說，「是以客觀之態度，科學之方法，將日常生活中無論說話、讀書、寫字、作文各方面所應用之字，作一搜集、分析、歸納、統計，以及比較之工夫，求出一種有條理、有層次、有系統、有目的之排列，使國語教材之編制上，或國語教學之改進上，可以獲得一種科學之根據與有價值之參考。」

艾偉的論述都很簡明而實用，時隔多年，不少論述仍然不失其對教學的重要意義。正是他首先提出了漢字認知心理的筆劃數問題。他認為：筆劃數和偏旁類別對漢字辨認有重要影響。漢字筆劃在10以內的，容易觀察；筆劃在11至15以內的，依字的結構形態決定其觀察度；筆劃在13以上，且由左右偏旁組成的，兩側筆劃相差超過10畫以上的，字形的觀察極為困難；10畫以上的漢字，其結構分為3至4種，且由曲線和斜線組成的也難於觀察；字的一部分與另一個已識字的一部分相類似時，書寫

時易出現筆誤；合攏性的字容易觀察；字形由橫豎條組成，筆劃在15畫以內的，容易觀察；字的筆劃兩邊對稱的，也易於觀察。（摘自《結構對稱漢字認知》第三頁）

這些論述都是具有實驗基礎的結論。當時他是美國大學中的漢語講師，實驗中的被試都是沒有中文文化背景的美國學生。這樣的結論也是翔實可靠的。當然有些結論，例如筆劃數效應，也是初步試驗的結論，今天的更加深入的實驗結果說明，還有更加複雜的結論，例如對於中文有了一定基礎的中國學生來說，完全不存在筆劃數效應。

令人驚異的是，按理說，艾偉那麼早就提出了漢字應該簡化的想法，應該在中國有非常的知名度才對。可是事實上恰恰相反，艾偉的名字在大陸比臺灣還要陌生。由於種種原因，艾偉的漢字研究等書籍並沒有及早出版，直到1949年才在上海中華書局印行。可是就在這一年，國民黨退守臺灣，共產黨在大陸建立了新的政權。艾偉作為臺灣政府考試院高官（相當於國務院國家人事部領導班子成員），當然被認為是反革命知識分子，他的著作當然被打入冷宮。所以在漢字簡化運動中，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一個研究過漢字認知的心理學家艾偉的理論。直到近年來才有人逐漸提到這個名字。無獨有偶，在臺灣艾偉不幸於1955年便因病去世，恰恰就在這一年，中國大陸宣佈實行漢字簡化運動。臺灣國民黨當局視簡化字為赤化、破壞國家文化，所以艾偉著作中曾經主張簡化的論點便成為「為匪宣傳」的嫌疑。於是也得不到比較肯定的介紹。一位曾為漢字認知心理作過貢獻的教育家就在內戰和意識形態的廝殺中被湮沒了幾乎半個世紀。如果沒有這樣無謂的意識形態廝殺，允許學術探索，艾偉的求實精神得以傳承，中國的漢字簡化進程當不致走到今天這樣積重難返的地步。（彭小明）



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寫繁體字傳達了什麼信息

《歐華導報》蕭明

—

今年夏季德國《經濟時尚導報》刊登了胡錦濤的題詞：「高瞻遠矚」，不僅有落款還有紅色印章。非同尋常的是，該題詞不是自左至右，而是恢復過去的傳統，自右至左，橫寫。其中遠字寫作繁體的「遠」，應該是他本人想到是給海外華僑的題詞，所以儘量按照傳統的方式，而且屈指算來，胡錦濤（1942年生）入小學啟蒙當在1949年前後。當時的教學完全是傳統的繁體漢字，而且小學還有毛筆字的功課。因此胡錦濤還有傳統漢字的印象，還能寫出幼年臨帖功底的毛筆字來。不過，「矚」字卻錯成了簡化字「矚」。繁體應該是「矚」。繁簡夾雜，就不規範了。無獨有偶，海內外報刊又刊登了溫家寶多次給香港新界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中華基督教中學學生寫信的消息。這些信的不同尋常，在於是用繁體字，直寫，從右到左。內容大致是說，希望他們熱愛國家，熱愛人民，熱愛香港，努力學習，立志成才，回報社會，「香港的未來是屬於你們的！」按年齡推算，

溫家寶（1942年生）應該從小學過繁體字。不過從照片上看，信封上仍然是簡體為主，簡繁雜陳，並不統一規範。倒是下邊的簽名，繁體都寫對了。另外，溫家寶還用繁體字寫過一封信給新西蘭的一位臺灣華僑女記者，海外中文媒體也曾有報道。關於溫家寶用繁體字寫信，中國新聞社的報道少不得有些評語，除了照常歌頌以外，倒也提到了港臺知識分子對於漢字簡化的不滿，例如糟蹋了傳統文化，破壞了中文之美等等，然後又重談官方老調，說什麼簡化字提高了人民的識字率，對掃盲有貢獻。這種論調完全是違背現實的胡說。臺灣和香港沒有實行一天簡化漢字，文盲遠遠低於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實行了簡化，半個世紀過去，到2006年15歲以上的文盲仍然高達1，14億人（據新華社2006年9月9日報道）。文盲現象跟教育投資、社會安定、尊重知識分子等因素直接相關，跟漢字的筆劃多少全無關係。漢字簡化糟蹋了傳統文化，卻並不能迅速掃盲，是中國共產黨在文化上最徹底的失敗之一。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促成統一，功勳卓著；共產黨造成一國兩字，損害了兩岸最重要的統一根基，該當何罪？

胡錦濤和溫家寶作為黨政最高領導人，相繼用繁體字給華僑題詞、給香港兒童、華僑記者寫信，到底傳達了什麼信息？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9條，香港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除了使用中文以外，可以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第136條，香港特區政府自行制定有關的教育發展和改進政策，……。包括教學語言等政策。既沒有規定是普通話還是廣東話，也沒有規定是簡化字還是繁體字。幸虧沒有定死，否則規定要用簡化字，會有更多的香港同胞抱怨，更讓臺灣同胞敬而遠之。胡溫兩位的繁體字書寫，應該是向全世界華人表明態度，尊重海外華僑和港臺同胞的文化習慣和傳統認識；不敢強行推廣簡化字。不少人最近談到，臺灣人筆下經常出現簡化字，許多大陸人不免沾沾

自喜，以為簡化字贏了。其實他們不知道，臺灣人寫的是行書簡字，跟我們的簡化字有很多雷同。1980年左右，國民黨元老級人物陳立夫等人主持臺灣教育部完成了一次新的文字改革，就是編寫了一本《標準行書範本》，把一部分中國民間長期存在的俗體簡字包含在內，供五年級以上的青少年習用。官方的書刊仍然堅持正體漢字，教學也依然是正體漢字。傳統一脈相承，民間書寫可以作為行書，使用俗體簡字，方便迅捷。這些簡字有585個完全跟大陸的簡化字相同，金部61個，馬部34個，鳥部31個與大陸簡化字略有不同，十分相近。很多偏旁如言、車之類則與大陸一樣，還可以類推簡化。臺灣的改革證明，這樣既承續了傳統。

二

大陸的簡化實在是得不償失，徒然讓人民疏遠了傳統，戕害了文化的精華。留德學人彭小明最近已經完成《漢字簡化得不償失》書稿，從認知心理學、電腦文字處理等方面全面否定了簡化字比繁體字易學易記的說法，從民間行草簡字的歷史否定了簡化字提高了民族書寫效率的說法，指出漢字簡化得以貫徹是中國共產黨借用了反右運動暴力的惡果。簡化字喪失了漢字寶貴的文化基因，阻礙了中國大陸人民接近古典文獻，損害了民族的文化傳承。簡化字對於電腦文字處理和漢字文化圈的整合都是得不償失的贅疣。漢字難的論調是西方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是蘇聯語言階級論對中國影響的殘餘，為復興中華民族文化，讓漢字文化圈重新建立自信，必須逐步識繁寫簡，恢復正（繁）體字為官方用字，恢復小學的繁體字教育，將簡化字降格為民間書寫體，（成年人暫不會寫繁體字也沒關係）。從綠色文化意識出發，漢字文化跟自然環境一樣，也是人類文化生態的一部分，不容任意

宰割和破壞。中華民族必須維護和保衛漢字文化，使之與其他各民族文化並立于民族文化之林。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德國《歐華導報》2007年8月號